



曾宝荪回忆录

附 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 凤凰丛书 PHOENIX BOOKS / 岳麓书社

曾宝荪回忆录

附／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杨云辉
装帧设计：许康铭

曾宝荪回忆录
【附】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曾宝荪·曾纪芬 著

*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80,000 印张：9.5 印数：1—5,500
书号：10285·76 定价：1.65元



崇德老人曾纪芬像



曾宝荪及弟约农(中、左)

《凤凰丛书》总序

607413/26
07

俗说凤凰不死，
死后又还会再生。

——沈从文

这套小书取名《凤凰丛书》，因为凤凰和龙一样，都是中国观念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龙被捧得太神圣了，颇有点吓人，不是随便好搬弄的。凤凰则从来没有被赋予那么高大的权威和政治意义，使人觉得可爱多于可敬，和这套小书希望能够达到的目的比较合拍。

《凤凰丛书》专刊旧籍，不收新作，内容主要是：

一、有文化积累意义或学术艺文参考价值的一九一一至四九年间的旧籍。

一、海内外关于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的研究著作和记述，当然也包括近现代人物的传记。

一、可以称为文史资料的海内外报刊、文集的辑录和

汇编。

一、文化史、自然史、民俗学、中外交通史等方面的资料。

《凤凰丛书》的宗旨是宽容。入选之书，着重在史的价值和文的趣味，不一定代表编者和出版者的观点立场，不必要都打上五爪金龙的印记。

西方传说中也有所谓“凤凰”(Phoenix)，活满五百岁时，聚香木以自焚，从火中而新生。可见一件东西只要真有人喜欢，人们就不会愿意它永远死去。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也是如此。

《凤凰丛书》切盼得到大家的帮助，欢迎大家提供选题，参加编辑，使它能活得稍微长久一点。伊斯兰神话中的“西摩尔格”，也是一种华丽的神鸟，“上帝把它创造得十全十美，但后来它变成祸害并被杀死”(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但愿我们的凤凰的命运会比它好。

丛书主编：钟叔河

编辑：鄢琨

1986.5.20

出版说明

曾宝荪女士，是被容闳许为“清朝第一流人物”的曾国藩的曾孙女。她在这本回忆录中，记述了童年的乡下生活、在英国的求学生涯、主持艺芳女校的艰辛、历次逃脱死亡的幸运、湖南农村的风俗习惯、三十年教女学生的经验等等，文笔朴实生动，内容丰富。我们觉得无论从研究、借鉴近人的有益经验来开拓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还是本着使台湾早日回归祖国的民族愿望，本书都有其出版的价值。因此，我们把它作为《凤凰丛书》的一种，介绍给读者。至于她一些看法的是非，读者自能明断。

附录的《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为曾国藩的女儿（曾宝荪的祖姑母）曾纪芬八十岁时所著，尽管其中涉及的多为家庭琐事，但也包括了不少佚闻掌故，有一定的可读性，又是研究曾氏家世的重要史料，因而把它附录于后。

有两点需要一并说明：一是《曾宝荪回忆录》系从台湾版《曾宝荪女士纪念集》一书中选录，有些文字和个别章节，作了必要的删节。二是《崇德老人自订年谱》系根据一九三

三年上海聂宅发行的再版本重印的，只改用了新式标点。
原书前面所附的照片和绘图，则仅选用了一幅。

一九八六年五月

目 录

曾宝荪回忆录

- 一 我的家世……………(1)
- 二 家塾时期……………(11)
- 三 学校时期……………(19)
- 四 我怎么做了基督徒……………(24)
- 五 出洋留学途中……………(28)
- 六 在英国的中学时期……………(32)
- 七 未入大学前的访友……………(36)
- 八 入大学前的抉择……………(40)
- 九 伦敦大学的西田书院与我……………(44)
- 十 西田书院女生的生活……………(47)
- 十一 想办女学校的经过……………(52)
- 十二 在英国大学时所参加的宗教运动……………(56)
- 十三 毕业后的进修……………(60)
- 十四 返回祖国途中……………(64)

十五	创办艺芳女校	(70)
十六	艺芳迁入浩园	(73)
十七	艺芳的组织与学生的自治	(76)
十八	五四运动与艺芳	(80)
十九	四八节	(84)
二十	出席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会议	(87)
二一	在国内巡回演讲	(91)
二二	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	(95)
二三	第一次复校	(99)
二四	第二次复校	(103)
二五	香港寄居的痛苦	(109)
二六	回湘乡老家及抗日游击队	(116)
二七	第三次复校	(123)
二八	民国三十七、八年的几件事	(128)
二九	香港丧弟及来台湾各事	(131)
三十	来台后的忧与乐	(134)
三一	后记	(140)
三二	在欧洲与埃及国的朋友	(141)
三三	在美国的亲友	(150)
三四	在美国的老同学	(158)
三五	我曾会见的几个外国名人	(164)
三六	我们老家的几位特别人物	(177)
三七	两次做湖南省立女中校长琐记	(186)
三八	三十年教女学生的经验	(193)

三九	我与约农几次逃出生命的危险·····	(203)
四十	乡下的医药问题·····	(211)
四一	八十岁这年的几件大事·····	(220)

【附】 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曾纪芬)

年谱自叙·····	(1)
序二·····	(2)
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6)
廉俭救国说·····	(59)

(附注：《曾宝荪回忆录》中原第三十、四二两章删去未用，序目作了调整。)

曾宝荪回忆录

一 我的家世

我生于前清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阴历正月某某日，那日正是屈原的生日，所以我的父亲给我取名宝荪，字平芳，别号浩如。

我的曾祖父文正公，讳国藩，他的事迹载在史册和很多书籍中，不用我多说。他老人家实在是一个文武全才，道德文章，用人行政，都是后世永传不朽的人物。曾祖母欧阳太夫人也是名门淑女，是文正业师欧阳凝祉先生的小姐。欧阳老先生一方面是爱才华，另一方面，看出文正的高尚品格，知道前途功名福泽无限，才定亲的。欧阳太夫人生有三子，长子纪第早殇；次子纪泽公谥惠敏，袭侯爵，后来做过出使英、法、布（即德）、俄四国的钦差大臣，并且订了《伊犁条约》，争回中国已失给俄国的土地不少；三子纪鸿公是我的祖父，幼年好学不倦，精通算学，兼用苦

功念英文，以求能读外国书籍，但不幸因太用功，得了肺病，缠绵三四年，加上考进士不第，于光绪七年抑郁地死于北京，年才三十三岁。我的祖母郭太夫人，青年守节，自己又多病，有四子一女。最大的是我父亲，讳广钧，号重伯，那时也不过十五岁。同时惠敏公正在英国，家中全靠文正之弟忠襄公——讳国荃——作主维持，郭太夫人方能扶柩回籍安葬。从此便一心茹孽教子。有时住在湘乡老家，有时住长沙洪家井惠敏公所置之宅。因为我祖父未中进士，所以我祖母一定要我父亲下帷苦读，果然我父亲在光绪十五年己丑科点了翰林，年只二十三岁。一方面是我祖母的督教，一方面也是我父亲的天才，使他做了翰苑中最年轻的人，祛除了我祖父未第的遗憾。

关于我的祖母，我要多说明些。因为没有祖母，我们孙辈的教育，就会毫无成就。我祖母是湖北蕲水郭沛霖公之第三女。沛霖公做淮扬海道时，正值太平天国之乱，他就先将家眷送出逃生，而自己守城殉节。这充分代表了儒家成仁取义和忠君爱国的精神。所以我祖母更是儒教信徒，在家时已受了相当高的中国教育。但据祖母自己说“我十九岁结婚，大部头的书，如《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等都是到曾家来，在文正公指导之下才读的。”她老人家又最爱看杂志报章，谈政治时事，常说“袁慰廷将来恐怕要做伯理玺天德”。那时我们不懂，后来才知道是 president。他果然做了几年民国的总统，我们才佩服她老人家的远见。祖母年轻时得过一次瘫痪症，因此不大走动，大多时间在

自己外间房里看书，写信，习字，做诗（著有《艺芳馆诗钞》）。但家中事无大小，她都知道，而且管理教导得极其合理。家中人有错误，从不大声叫骂，只唤进自己房中轻言教训，撷古比今，总要人自知悔改才止。空暇时间，也喜种种兰花，做做小菜。但都是指挥别人去做，自己坐下监视。我和大姐宝龄也学学绣花。祖母起头做几针，便叫我们去做。大姐十岁丧母，三弟昭权因七叔（号季融）携眷在浙江，留他伴祖母，所以他们二人，祖母照顾得更多。五叔之子二弟约农也伴祖母。大姐在杭州师范未毕业便嫁与长沙姚愿愚。三弟考取第一班清华留美，是我们这一辈最早留学的一个。

我的父亲讳广钧字重伯，是文正公长孙。小时最得文正喜爱。年六岁时文正到江宁新督署，家人抱他游行，看见匾额楹联，已经认得很多字。我祖父去世，他才十五岁，便能处理各事如成人，且能与长辈吟诗唱和，可见他的文学造诣。至于武功，甲午之战时，曾带五千人，号刚武军，出国援韩，时年二十九岁。我父亲原配唐夫人，身体多病，来归七年，小产两次，均是所谓子痫（eclampsia），父亲因此不得不置侧室。先娶了帅恭人，她也无出。在北京时我父亲又娶我母亲陈夫人。陈夫人原籍广东电白，与梁鼎芬家有点亲谊。我外祖父因逃兵乱而早死，外祖母投靠梁家，去世过早。我母亲便由梁家的姨老太抚养成人。那位姨老太去世时对梁鼎芬说：“我这个女儿是我所心爱的，你要给她嫁一个才貌双全，少年科甲的人，至嘱至嘱”。后来姨老

夫人死了，梁便留心，看中了我的父亲，愿将他的义妹作平妻出嫁与我父亲（广东有此风俗）。所以我母亲十六岁便嫁来曾家，一切仪式也很隆重。我母亲温柔谨慎，在北京三人相处也算安静。后来唐夫人庚寅年十月初一因子病亡故，忠襄公亦于是年十月初二病死南京，于是全眷回湖南。我祖母郭太夫人大不以平妻为然，要我母亲交出所有聘礼（内有翠玉钏一双，后来郭太夫人赏了我，至今犹存我处）。那时梁家又因龚太太之故，家中不和，因此我祖母也不令我内眷与他们通来往。因此我母亲当时的内心是极痛苦的。但是我母亲温柔敦厚是本性，不但对祖母极顺服，对我父亲也无怨言，连对帅恭人也愿尊她为先，凡事让她。次年恰好有人为我父亲做媒，娶了衡山赵夫人为继配。赵夫人也无出。我祖母望孙心切，等我母亲生我，却是一女孩。但我父亲已经有四房家室，才有一女，所以祖母也很高兴。我长到七岁，家中还未添丁，我父亲便在外面另娶了华恭人，生四弟昭杭，过了周岁，才母子一同进入老家。我进十四岁那年，我母亲生了八弟昭桦，祖母非常高兴，因为我母亲一直服侍祖母未曾离开过。母亲产八弟后患乳痈痛苦非常，因此身体也就拖得很弱。后来我由英国回来时，华恭人生了满弟昭柯，自己却于十天后便患产褥热去世，临终将昭柯交我母亲抚养。我母亲对他真如己出，饮食衣服，处处关心，如有疾病，终夜看护不离开，满弟长大后，也深深的感激。

我祖母在我与约农由英回国之前一年去世，并无大病，

不过常有伤风等小病。我母亲自从生了八弟以后，便总是伴着祖母，昼夜侍奉。一九一六年丙辰三月十二日中午，祖母还由我母亲及二位堂姑母陪着一同吃饭，到下午七时便连呼心痛，汗出不止。七叔父母，四妹宝菡，与我母亲，便忙着用大毛巾揩汗换衣，换垫单。不到半小时便去世了。想是心脏病。因为那年代住湘乡，没有西医可找，但是在中国人眼中，说是无病而终，是极有福气的了。

说到我家世，我想顺便说说我家的居处及故乡习俗。我家世居湘乡荷塘乡，地名富托，我们的住宅，名叫富厚堂（据说是惠敏公照《汉书》功臣表中，关于列侯记有“富厚如之”之语，故以富厚二字为堂名）。这幢大屋，大体是照侯府规制盖的。宅有东西两门。进来是一个半月形的石板大坪，半月形外，是一张大塘，也是半月形，有如泮宫。中门因为门楼很宽，所以并不显得高大，门上有“毅勇侯第”四个大金字的直匾。进了大门，便象北平的四合大院。正屋坐西朝东，有三张大门，中门进中厅，名八本堂。左边大门内，靠八本堂有房子四间，是我祖母起居的所在。他老人家卧房在里间，外间供起坐及看书等用，后房供女仆等居住。中间是一大厅（南厅），吃饭和会普通客在内。南厅的左边另有四间，先前我的姑母，后来七叔父母都住过。八本堂的右边，也有一大厅（北厅），它左边四间房，那时归我父亲与赵夫人住。右边四间，我母亲带我们姐弟住。上进房子也差不多，不过迂回曲折些，也还多几间房子。八本堂正屋对面，我们叫它回照房，房子共有十几间，内

住男人等及放轿子与家俱等等。北边长廊内有求阙斋，是我们读书之处。南边长廊内，房子甚多，有无慢室及艺芳馆等十余间，因由其正厅进入，是一个八方的门，所以家人都叫这里做“八方门”。约农与我等自香港逃日本人的难而回家，便住在此。南北两边，都有三层楼的藏书室，乃是富厚堂的精华所在。因为怕白蚁，所以柱子都是麻石（即花岗石）做的。南楼分公记、朴记二楼。公记收藏文正的书，省县志书最多，大部头的经史子集也不少；朴记则是惠敏公的书楼，经史子集及有关西洋文化的书较多，中西文的都有，西文的是惠敏公由外国带回的。北楼名芳记书楼，其中是我祖父母所藏的书；二楼的杂书中，星相医卜都有，小说也不少；三楼即是经史子集等大部头书。我们小时，最爱偷上芳记二楼。管书的贺老头最严，重门深锁，怕我们进去。我曾经由后院子内的大茶花树上爬上楼外走廊，再由走廊窗户挤入楼中。因为窗户是格子式的，没有玻璃，以流通空气，中间有一方格，正可挤入。等到听见楼梯响，或是要吃饭的时候，再偷偷的爬下来。有一日被教书先生看见，大大责骂一场，才略为敛迹。光绪三十年（西历一九〇五年）我祖母携眷到湘乡老家，分家产与我父亲三兄弟（五叔不在内，因五叔出抚大房），在富厚堂住了八个月。约农弟因他父亲在省治刘侯太夫人之丧，所以没有回乡。我有了三弟昭权作伴，更多用这树与窗子为孔道，出入书楼，参观各样书籍。这也可说是我所以能杂学旁收许多中国文化常识的缘故。

我家祖训，不信僧道，也不许唱戏饮酒，赌钱打牌。却是有点例外。我们家每年吃素四天——观音斋——即是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又诸天斋一日，即十二月廿四日。这几天全家上下都吃斋，听说是文正夫人所许的愿。我祖母所以就恪遵了。家中唱戏，也限于祖母生日，和父亲生日，且都只各唱两日。前清大家人家都有花厅戏台。家有喜庆事，便请客吃酒筵，唱戏招待。我家因文正教训，不尚奢侈，所以很少唱戏。至于赌博，我祖母只许旧历十二月廿四夜起，可以掷骰子，如升官图、赶绵羊、三子猴等。大人们也可搓搓小麻将。年三十夜，就处处花灯红烛，炭火盆内，煨着莲子红枣桂圆茶。炉内焚起好香，神堂前摆上酒菜祭祖。后来大家吃团年饭，长辈分给小孩们压岁钱，帖春联，家中老管家们把大门关上，贴上“衡门衍庆”四个字的红纸条子。过一会儿，在外面的家人，便也贴上“开门大吉”四个字的红纸条子，然后大放炮仗，随即门户大开，炮仗灯笼一拥而入，大家大唤恭喜，升官发财等吉利话。在老家富厚堂时，还用松油树枝扎成高柱——即是古时庭燎——一齐燃起。这夜大人们多半打通宵牌，我们小孩辈也闹着要守岁。其实这都是因为除夕太热闹，防火防盗的原故。次日大清早，又祭祖拜年，各户送莲子茶“攒盒”（里面都是五格或七格的糖果碟），送到祖母房间里，那日来拜年的，都要吃莲子茶，攒盒，坐久一点的还要吃细面或鸡蛋。小孩子们看见攒盒就来吃，以为过年真是好玩极了。大人们——尤其是我的母亲，因为

侍奉祖母，从年内就忙起，忙着送亲友的年礼。过年后又招待来拜年的客人，赠送来客的小孩，每人少则五角，多则一元，一律是银元红纸封套。我们家中，虽有很多的太太们和男女工人，但非我母亲经手，祖母是不放心的。

赌博玩耍，一过正月十五，便都要停止。小孩子在年初，虽然可以玩半个月的灯，但正月十八我们家中的规矩，家塾就要开学。开学前一日请先生吃酒席，由男主人及男学生陪，我是女学生，不陪先生吃饭。第二日清晨，大家拜毕孔夫子，就正式读书，家中大人们也高兴说“野马上笼头了”！

清明扫墓，也是男孩们的事，所以我只到过家中直系的祖坟上，连大名鼎鼎的九帅（忠襄公）与外交胜利的惠敏公，他们的墓，我们也没去过，至于游山玩水，更是绝无的事。一直等我到了杭州读书，祖母留我在七叔家中，我才游过西湖，步行到岳坟，灵隐，孤山等各名胜。

端午节吃粽子，挂香袋，拜节，也与各处相同，不过湖南人除吃粽子之外，还要吃盐鸭蛋，每人至少吃两个，说是可以开聋。七月七日夜乞巧，那是女孩们的事，摆瓜果敬织女星，在新月星光下，要用红丝线穿七口绣花针。那夜用大磁盆盛清水放在月光下。次日早又用花针轻轻的横放在水上，如果花针浮而不沉，而且日影射入水下时，针影现出如花蕊，如笔，如算珠……等，便是乞到巧了。

七月中元节，是中国各处祭祖的大节，我家也不例外。从七月初一起，便大家折金银纸锭，写包封——上面写某

某祖宗冥中收用，下面写某某子孙敬具。这种指定某某人冥中收用的包封，只上追至五代祖宗为止，其余便有二三十个“曾氏历代祖先收用”的包封。至初十夜，厅堂上便摆两桌酒席为祭祖之用。桌围，椅披，椅垫，都是大红绣花的。席摆三面，朝外这面上摆花瓶，水果四碟，下面仍有桌围。再外一点当中，便摆一长桌，上面有香炉、烛台、花瓶、黄表纸、钟磬等物，也是大红绣花桌围，再外就是大红拜垫，放在红地毯上。初十夜黄昏时，便由家中男主祭人及男丁，带灯笼炮仗，到大门外向西行跪拜礼——在富厚堂则在宅西门外，取祖宗昔日曾西归之意——后再由主祭人手持香三炷，直走中堂，后面鞭炮灯笼送进。家主将香插入香炉内，众人便轻声传说：“祖先回来了。”于是家中大小，由长而次，向上座跪拜，撤席时，也是如此，以后每日三餐，都行礼如仪。一直到十四夜饭后，又是灯笼火把，香花炮仗，并有家人抬着“包封”送到河边，先摆祭品，行礼后，把“包封”焚化，这才算中元祭祖完毕。

我们小时，受当时的气氛影响，也觉得祭神如神在，在中堂不敢玩耍，或高声谈笑，或随意吃东西。

中秋拜月，是女界的事，我们有句俗语说“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不过中秋是大节，亲友送礼拜节，要比端午热闹。那夜除赏月吃月饼外，还有送瓜的风俗。若有太太们久婚无子的，便有亲友带一个小男孩送瓜，就是用长长的冬瓜一个，用小孩的红绸衣包好，瓜上又插两朵金花，由小孩抱着，锣鼓音乐，炮仗灯笼，送到那位太太房内。然

后将冬瓜放在床上，用被盖好，再出来向那对夫妻高声道贺，祝他们早生贵子。当然这些送瓜的人，要酒食款待。送瓜的小孩，也要红包赠送。

过了中秋，当然又要过年了。上面已经说过，不再赘述。不过正月初四，我家有个请佃农的欢宴。前清时有几十桌，每家佃农可来代表二位，在湘乡或附近的佃家都请。民国后只有十二三桌了。每桌六人，坐三面，桌子前面的开口面，留着好上菜。每位前面放荷叶或油纸一张，以便客人如要带菜回家，可以包裹。另外每位面前放粑粑四对——这是用粘米糯米粉和水调匀，用粑粑模子印出来的。每个粑粑如饭碗大，厚约半寸，上面用洋红点些花纹。这种粑粑在十二月廿四日就要办好。开酒席上第一碗菜时，就大放炮仗，由少年的主人，出去到每席上敬酒。在桌子开口前面，作一个揖，表示感谢他们一年的辛劳，为我们服务。我们乡下在这样场合之下，最特别是打条盘上菜的人。他一双手托住条盘，那条盘过肩齐耳，盘内有十几碗菜，或十几碗汤。他身体略弯，两脚平稳的跑步，不但菜不倾斜，连汤也不溅溢。在他面前，有个开路的人。此人弯腰倒退两手向外挥舞，赶开两旁的观众。到了大厅，打条盘的，手一转，盘就平下来，由开路的端菜上桌。有时再有一人跟着打条盘的后面，也帮着上菜。这样手面，我可说走遍中外，没有在第二处地方见过。真是一种特技。就是我家乡，也只有两三个人有这本事。

以上所说，都是些琐屑小事，不过读者可以看出，在

这样的家庭里，旧礼教之深，旧风俗之重要，要一个女子来摆脱，是很不容易的。

二 家塾时期

我开蒙时年龄很小，大约不过四岁——见先君环天室诗集中一首律诗——那时我们在北京，有二叔父二婶同住。二叔有一女一子与我同学，年龄都比我大些，称大姐大哥。还记得坐在凳子上，脚离地好远，深怕跌下来，可见我那时的幼小了。初发蒙读《千字文》，真是一点也不懂，却是字还认得不少。笔划多的字当然写不出来，但是看见还可认得——尤其是在那本读的书上，更不会错。那时大姐读《诗经》，大哥读《论语》。但不久我的《千字文》读完，也读《诗经》了。我非常高兴，因为赶上了大姐，虽然她已读《小雅》，我还读“关关雎鸠”，然而总是《诗经》。

我在北京读书时，有一~~段政治插曲~~——戊戌政变。我虽然很小，但有很深刻的印象。那是戊戌~~八月~~里一天。那天清早有蒙蒙细雨。我~~家里~~的人从祖母起，~~都~~起得极早。那时我父亲已于七月离京，家中只有二叔父母七叔父母及其余女眷。我只看见家中叔父们还~~指~~着~~着~~的出出进进，往来奔走，有时大声呼叫，有时附耳细语。连教书老师也没有上生书。我们三个学生，只想知道是甚么事。只听见说菜市口杀人，又说有湖南人，又说亏得我父亲走了！过了好几日，又听说我们忠襄公房下的伯航三叔服毒自尽，可

见我们曾家也是新党。我的祖母郭太夫人最有见识，当出事的那一天，便吩咐七叔去湖广会馆，把门簿拿去烧了，否则按图索骥，不知道会株连多少人！

六君子——康广仁、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被杀后，我祖母便想要全眷出京。那时我父亲指省广西——武鸣府，七叔指省浙江同知，只有二叔是刑部员外郎，不能出京。我祖母因天气寒冷，便等到次年己亥出京。她老人家还叹息说“只有二房在京，我总希望他们人口平安，国家无事就好”。谁知果然庚子年拳匪大乱，八国联军进京，我二婶与大哥都在庚子春间，因白喉相继去世。只留大姐，由忠仆贺媪带回长沙，二叔留京受了很多困苦。文正长子惠敏公之子六叔（广奎袭侯）之家被抢一空，家中人仅以身免，逃往上海。看守房子的家人四名，都殉了难！北京在八国联军之下，许多官员与眷属都自尽殉国。西太后与光绪帝后至怀来，由我们的二姑丈吴永招待接驾，见吴渔川的《西狩丛谈》，不赘述。

我随我的父母及继母赵夫人，庶母帅夫人，同返湖南。在长沙姑母俞夫人——我祖母的独生女——俞大维的母亲家过阴历年。后来我父亲独往广西，将全眷送湘乡富厚堂老宅。不久听说我父亲见了岑春煊制军，长揖不拜，当时做翰林的，称为天子门生，红片子长一尺二寸，见了制军抚台，都可长揖不拜。大约那时赴任的思想，便已打消了，因为属员见上司是要拜的。从这事以后，我父亲就不再加入政治舞台，倒很喜欢研究书法、诗词、算学及广学会所

翻译的外国科学，诸如声、光、化、电等学问。

我父亲是一个极其维新的人。我不妨在此述出。他对我的一生有三次大帮助。第一是不许缠足——见环天室诗集中的一首律诗。第二是不为我幼时定婚。有一次有一个同族伯祖父对我父亲说：

“你的女孩子快九岁了，怎么不给他定人家？将来大了就要给人家填房了！”

“我要得她的同意，才能定亲。”我父亲说。

“她年小无知，有甚么知识，能够同意？”

“等她有知识的时候，能够选择，让她自己去选择，我同意就是了”，我父亲笑着答。从此以后便没人再说这些话了。

第三件事是准我入基督教及出洋留学。我在杭州冯氏女校第三年，因看见世事崎岖，人生痛苦，便受了校长巴路义女士的感动，很想受洗（我受灵感信道，另有详文，兹不赘），但怕家中禁止，我父亲却有一封长信答我的疑问，并列举徐光启、利马窦等开学利民的好处。但是也介绍我看严复译的《天演论》、《群学》等书，认为西洋的学问是多方面的，宗教固然是重要，但社会科学也不可忽略。这样才许我同巴女士在民国元年一同去英国留学。

我每每回忆到我家塾时期的快乐，尤其是在老家富厚堂，有山，有水，有亭台，池榭，藏书楼。到了春天，田里禾苗绿色满地，夏天门外宅内都有荷花，秋天的桂花在我家后山开放，香闻数里，冬天有红绿梅花，在我家北面

小山坡的思云馆前大开，红绿交并，真是寒香扑鼻，玉宇琼楼。我们小时在这环境下读书，真有限幸福。

我在老家湘乡富厚堂由家塾老师教书。读的是《论语》和《御批通鉴》。《论语》每日读两三章，要背，《通鉴》却要四五页——但不必背。那时只有我一个人读书，另一个丫环陪读。先一个丫环名叫顺贞，读了几个月便给乡下人做媳妇去了。后一个叫来喜，陪读约一年多。她们读的都是杂字包举及四字女经等。但两个人均不聪明，进步很慢，记心也坏。我总能背熟她们的书，或提着她们背了书，便出外一同玩耍。

富厚堂房子很大，围墙内有山有池，还有水阁凉亭等等。我的长辈们，只要我不在内骚扰，便以为在书房读书。其实先生也只要背了书便放学。起初是一位殷先生，此人能写能画，教写字颇合科学。他在玻璃上画九宫格，放在字帖上，然后要我用九宫格子纸照临。可惜这位先生吸鸦片烟，每日不到十一点钟不起床，教书也很懒散，我在他手下读书，应景而已。好在家中有两个大藏书楼，一个在正宅之南，内分公记与朴记两大部份。公记为文正公藏书，里面包括经史子集各种书集，最要的是各省县志，凡文正公做过官的地方而有县志的，都收藏起来，所以我家的县志是很珍贵的一部份。朴记书楼是惠敏公的书，里面诗集不少，还有大字版的史记多册，是给子孙标点的，但最难得的是他所收藏的英法文等书，因为惠敏公出使英国法国，在外八年买了很多外国书籍，包括大英百科全书，法文书

等等。但我们最爱的有显微镜与望远镜，还有看彩色玻璃风景片的双眼镜。宅北的书楼叫芳记书楼，此乃我祖父母的藏书楼，我祖父喜研天文、算学、英文、星卜等书，我祖母却喜欢看医相等书，另外小说也不少。这个书楼有三层，进去真是宝藏与馮，五花八门，接应不暇。我那时虽然年纪小，但对医卜星相都抱兴趣。例如麻衣柳庄等相法书，命学津梁，渊海子平等算命的书，甚至如遵生八笺以及讲修练的书，都一一翻阅。另外还有大部头的佛经与图画，我只能欣赏佛画，却是咒偈也学会几个，用来辟邪祛鬼。乡下人极迷信，从我房到书房要经过一段长廊黑巷，我夜晚走过，总要念心经偈语，这也许是我宗教观念的起头吧。

壬寅年(一九〇二年)我祖母在南京，我父亲也因辛丑去北平接西太后及光绪帝回銮以后，回到了南京，于是我们全眷又由湖南动身去南京。我在这里便与我二弟约农，三弟昭权，大姐宝龄同在一起读书。我祖母是一个最公平的老人，她带了她每个儿子的最长的孩子，不论男女，都归她教养。我是大房的长女，大姐是二房的长女，二弟是五房的长子，三弟是七房的长子，恰好两个孙男两个孙女。我祖母的教育宗旨也很特别，她不赞成八股文章，也不愿两孙去考秀才，但她要我们学外国文字，因为那时正是留日高峰，所以我家里也聘了一个日本人森村要教日文。另外有陈墨西先生教国文史地等。每日要看报，点报——那时报上文章都是文言，也都不断句的，要小孩用朱笔点报可以晓得他们看得通或看不通。我和大姐并未习女红烹饪，

却要画画，读诗，学做诗。每礼拜请一画师教画一次——有个时期，是一个日本人名叫山本梅涯教画，后来山本去了又请了一位胡笛舟先生，革命前在湖南还请教过尹和伯先生。两个兄弟便有体操等课，我们每礼拜日作文一次。那时先生们也没有很多教授作文的方法，不过出些“看马戏记”，“鱼鸟问答”等浅题，要我们去自由发挥。深点的就有“项羽论”，“《郑伯克段于鄆》书后”等。我们也不知如何乱拼乱写，但不久也就由一二百字写到七八百字。我们自己感到这是因为看报，点报，点鉴的益处。

在南京时可以说是我最发展的时候，可惜我因一到南京就生了一场最厉害的肠炎症，不能与兄弟们读日文，病好后也只能旁听，所以我在日文方面茫无所知。但在中文方面就比他们强点，因为我在湘乡老家看书不少，小说书更多，我十岁时，已能看《聊斋志异》、《夜雨秋灯录》等文言书。在南京又看过纪文达的《阅微草堂笔记》，俞曲园的《春在堂笔记》等等。对于短篇文字，甚为喜爱，这些书帮我作文的能力不少。每欲作文，都能名列前茅，大姐，两位老弟有时也取第一，但仍以我为多次。于是暗中我便做了他们的领袖，教他们练气打坐，并虔祀帝君，颇多神道思想。但不久因祖母在癸卯年率全眷回湘乡，二弟与五婶留长沙，七叔母去杭州，三弟一人随祖母返湘，大姐已不读书——她年已十五岁，不便由男先生教导，因此到湘乡富厚堂只有我和三弟两人读书了。那时我们《左传》已读完，开始读《书经》，因文字古奥，也不要背，只要熟读或默写

一二段。我至今认为那是错误的，因为《书经》是上古的历史，地理，文诰，诗歌，因为没有背，至今毫无记忆，对于上古文化实在是模糊极了。三弟与我在湘乡度过一个很快乐的读书时期。我们的先生名王时亨，衡阳人，对于地理很有兴趣，曾画一衡阳地图，将他的家中住址写的很大——驼背松王福星堂，我同三弟也很羡慕，想画一张湘乡地图，上写富托曾富厚堂。但我们究竟没有那种勇气与恒心，始终没有画成。

我祖母到湘乡原是为了给我父亲辈分家而回的。在癸卯年冬间，请了族中长辈——最重要的是介石五伯祖父——他是澄侯公的儿子，乃是竹亭公房下纪字辈男丁唯一在湘乡的。他便将银折地契按价平分三份，分别包成福禄寿三封，又另外用红纸写上福禄寿三个纸条，搓成纸团放在米升内，要大姐，三弟与我三人轮流用筷子夹出。大房先拈阄，我就拈出了福字，大姐第二拈，三弟坐阄，他们的字号我倒忘了，恍惚大姐拈了寿字。拈阄后，就大家坐席吃酒菜，众人道喜说些吉祥话。我五叔没有分祖父母的遗产，因为五叔出嗣惠敏公，应得大房遗产。我在这里要说，我五叔的德行，他过继在惠敏公房下，后来惠敏夫人——刘蓉之女——自己生了我的六叔及八叔两人，所以我祖父要废抚，但惠敏公决计不肯，说是文正公所定，不能翻悔。惠敏公与刘侯夫人在世时，便将家产分成九份，计大二姑母各一份，四六八叔各一份，惠敏公夫妇各一份，公记一份，五叔一份。当时大二姑母都去世也无出，四八叔均幼殇，

所以他们的产业都是六叔的，惠敏公夫妇二份更是六叔的——只有公记一份或可对分，家族各处，虽嘖有烦言——尤其忠襄公——但他亦无法更改，只好自己送我祖母几十亩田，弥补家用。五叔立志自食其力，不用分家之钱，此志一直到日本人将要打入北平，五叔仓皇逃到长沙，才由二弟动用分家田产供奉老人，直到老人在香港去世。综其一生不过最后五年，用了遗产，也是因为时事环境所迫，不然他真可说“好男不吃分家饭”了。

次年甲辰春间，祖母又带我们全家到长沙，那时大姐已不读书，只有我与二弟三弟回到姑母俞夫人家（宝南街刘公祠内），与表姊妹兄弟，一同读书。有俞二姐俞四妹及表弟大维大纶同学。上午读中文，由熊菊如先生教。熊先生曾在校经堂读书，研究公羊学颇受梁任公等的影响。他教我们的，除中文外还有地理，历史及介绍新民业报的论说集一本，名《迷津宝筏》，颇富革命思想。我们的国文在熊先生手下，大大的进步。下午我们开始读英文——此乃五叔之发动，并请一位广东人钱伯良先生教。钱先生是上海制造局的学生，教我们英文，不过发蒙而已。同时他也教我们体操，并定制操衣，每日四点钟放学后，便操瑞典柔软操十分钟，我们因为有操衣穿，也很发生兴趣。我与俞二姐俞四妹约农二弟威谋三弟是大学生，大维四弟、大纶五弟是小学生，我们读《左传》，他们读《史鉴节要》。我们中间以约农二弟与大维四弟最调皮。他们在俞宅花厅后面桂花树上，攀援到很高的枝上，唬得我们深怕他们跌下来，

尽我们连声喊叫，他们总不理。

甲辰年秋季二弟三弟因七叔来信劝祖母让他们入学校，因此他们便进了明德学堂。大姐与俞二姐已辍读，书房里就剩我与俞四妹及大维、大纶四个学生了。不久熊先生也辞馆去了，另有一位杨先生，教我们不到三月，我也结束了家塾生活，由七叔带领我与大姐到上海入学校。七叔可说是我们家里最信新教育的，二弟三弟是他所劝入明德的，我与大姐也由他带到上海去进女学校的。岂知到上海时已是十月底，所有正式学校都开学已久，不肯收新生。只有一教会开的晏摩氏女学校还肯容纳，我和我的大姐宝龄，二姐宝荷——七叔之女——因幼年患软骨症成了残疾，所以祖母只带三弟读书，没有带她。七叔父母也很希望她残而不废，送她入学校。我们真是初出茅庐的土包子，加之我家世代俭仆，所穿的衣服都简陋非常，到此十里洋场，实在自惭极了。

我七叔对于我们教育贡献很大，他笃信中国需要新知识来挽回亡国之惨——甲午之战，他曾带兵出关，年纪只有十九岁，眼见过新式武器与新式交通的重要。因此他总要我们学新知识，尤其是科学与工程，我们后来学科学与工程，得他的启示不少，真可感谢。

三 学校时期

上文已经说到我到上海晏摩氏女校，初次离家，又一

切陌生，头几天真如在云雾里。加之这个学校，学生不多，大约不到一百人。学生程度高低不一，课程上面，也无一定规程。并没有正式教堂，只有零碎的几间房子，学生三三五五自寻老师。只有唱歌，做礼拜，做手工便在一间较大的房子即是教室，自修室与音乐手工教室。我也开始学弹风琴，做手工，勾毛线衣等，但没有学过算学，史地等。国文老师很喜欢我与大姐，因为我们的国文，比他们好得多。我们有时也作文一篇，读的是一种国文教科书，里面都是短篇文言文，如《桃花源记》、《岳阳楼记》、《赤壁赋》等，那当然我们觉得很容易。起先还有同学三四人，后来便只有我和大姐了。

这个学校是浸信会的，规矩很严，礼拜日要做六次礼拜，早上礼拜——大约是一种晨更——吃早饭后又有礼拜，十时到教堂礼拜，午饭后休息约一小时，便有主日课，五点钟时又有唱诗，夜七时在教堂又有礼拜。礼拜日不许做任何事，看任何书，只许看《圣经》。幸而还许写信，这些对于我们外来又是教外的学生实在太苦了。在这里我的宗教观念，可说等于零。只有圣诞节学生们每人得了一个洋娃娃和许多糖果，感到兴趣。对于唱诗我倒很喜欢，但那里的赞美诗却是上海土白，文理也很奇怪，所以也得益不多。说到讲上海话，我初入学校，真苦的不得了，许多上海土字如“搭子”“交关”“白相”等，我都莫名其妙。有一次有个同学把一个揩黑板的擦子，放在水内泡着，我因和大姐笑说“这些布是胶粘上的，把擦子泡透，只怕连布都要脱落，

这件事真是和猪一样笨”，谁知被那位同学听见了，就告诉值日老师来责备我说，怎么骂同学是魔鬼？我说“并没有，只说和猪一样笨”，“和猪”二字的湖南话同上海话“魔鬼”二字相近，懂得上海话的人听见这事，也会哑然失笑了。

我在晏摩氏女校时间不久，次年便与大姐、四妹（宝茵，七叔次女）入上海西门务本女学校，在这里我还有表妹李懿康及湖南同学几人。其中最佼佼的是张默君——那时她名叫张昭汉——她比我高了好几班，她是师范二年，我是高小二年，但我们很讲得来。一则因为都是湖南人，二则我们的思想很新颖，她灌输我的革命排满思想不少。务本学校的规模与课程，比晏摩氏强得多，我也很乐意在这里多读。不过那时有两个大困难，第一是我眼睛很近视，家里长辈不许带眼镜，所以看黑板总看不清，因而功课总只有中等分数。第二是我祖母那年恰好做六十大寿，七叔全眷赴鄂拜寿，我们当然同行。到了湖北，我二叔不赞成我们进学校，同时我也因为功课得不到鼓励，也不热心回校，这一来结束了我在上海读书的一段历史。

七叔全家返沪后，在湖北的只有祖母、我的母亲，和我的胞弟昭桦及我自己，我们住在二叔的牙厘局衙门。一年以后，二叔全家小孩众多，我祖母便仍带我的母亲母子三人与大姐同去杭州七叔家。七叔热心新教育。便把我与大姐送入杭州省立女子师范，我们二人都考入师范正科，不过大姐只读一学期，便由祖母带回湖南出嫁与姚家了。我母亲与小弟也一同返湘。

我在杭女师一年半，可说中文，算学，理化，音体等科都有进步。只有英文因师范班是选修的，所以没有多大进步。中文却喜翻阅图书室的书集，那时看过《明儒学案》，《黄梨洲文集》，及饮冰室等书，这可以说还是在务本时受张昭汉的影响。学生课外活动不多，校长汪藻泉先生要我们到附小去实习，因怕我们外省学生音不正，不许教国文、历史，只能教音体或写字，不过别的同学教小学国文时，也要在旁观察以资进修。这样弄得我们外省学生更忙。我在杭州女子师范一年半，从未参加赛球、赛歌、辩论会等，不能不说是一种缺点。我在杭州女师却交了几个很好的朋友，切磋学问的有沈兆芝、林眉镜、沈英、郑瑞、李懿娴诸君；在一块玩得起劲的有沈兆兰、郑怀、马仲容三人。因为我们四人年纪都很小，大约都是十六七岁，一下课，便唱歌、跳绳、吃点心等。这样的一起玩耍，于我很有益处，我学会了讲杭州话！那时还有程衡君虽不同班，交情都很好，程君在台湾还与我见过多次。

校长汪先生是一个脚踏实地办学的人，每礼拜讲“修身”课一次。她与学生共寝食，她的床铺就在我那房内，她的床在尽头当中，两边一边三个床，我的床恰在进门头一张，这是因为我入校较迟，剩了这头受门风的床铺，我也不觉得太冷。我们对校长都很敬重，因为她慈威兼有。另外还有位数学先生——陈伯原先生——他对于我的求学，大有关系。我初进师范，算学坏极了，因为在务本，始终没有学过，黑板既看不清，先生又是一口上海话。到师范

时，命分还弄不清。师范生已学代数、几何，我真是莫名其妙。陈先生要同班最好的算学同学为我补习指导，此人即是沈兆芝同学。她讲解清楚，教书耐烦，不久我便懂了。命分比例、代数一次方程，都豁然贯通。到了学期终，我便赶上了班，到第二年我也是算学班的好学生了。毕业时我的平均分数在八十分以上。陈伯原先生便向我说：“你的天资甚高，各门科学又很平衡，这样毕业后，便去做小学老师，实在太可惜了。我知道有一个教会学校就要开学，我已受聘担任数学、理化，你若愿去，我可给你介绍。这个学校名叫冯氏高等女学校(Mary Vaughan High School)，是英国圣公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办的，前途甚有希望。”我当时自然很乐意接受，不过因有晏摩氏学校的经验，颇有戒心，同时也不知道祖母和我父母的意思何如，便答复陈先生说：“我过了中国新年即来奉复。”七叔很赞成这事，便与我分别写信回湖南，我祖母同我父亲很同意，七叔又极力推荐，我母亲又不反对，那年我便没有回湖南。宣统元年阴历正月我便考入了冯氏女校。冯氏女校乃因纪念冯马利亚而建，开学时乃冯女士之好友巴女士为校长。最高班只有二人，一个是周庆曾女士，一个是我。我们俩人的中文又分二班，她念古文，我读《庄子》，我的作文比她好，她的英文比我好。校长为英国巴路义女士(Miss Louise Barnes)，英文教员文女士(Miss Morris)，在这里除国文和算学，本国史外，都用英文课本。我的英文也渐渐长进，到暑假时也赶上周女士了。第二年来了一位卫女士

(Miss Weightman)，她教授有方，我的英文在她手下，大大进步，可以看粗浅小说，也得了学校的英文奖。除陈先生外，还有一位冯小泉先生教本国历史，王奔川先生教国文，柯师母教英文，邓师母教音乐，田师母教图画。与我同上冯氏女校的还有四妹宝菡，表姐萧孝徽，表妹李懿康，李懿寿、萧孝麟，及丁氏姊妹等等。当时湖南人阵容相当强，学生成绩不坏，团结也很好。我是最高班的学生，自然就做了他们的领袖。

英国人本来很守旧，加上圣公会又是最保守的一个教会，宗教仪式也就很多，每礼拜有五次礼拜，不过礼拜六可以回家，礼拜日下午五时前返校，较晏摩氏略为轻松。我在冯氏可说很受尊敬，做了室长，得过奖金，也得了留学英国的机会，是我生命中一大转折点。

四 我怎么做了基督徒

当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我的二弟约农，三弟昭权也都进了教会学校——武昌文华书院——在他们与我通信中，常说到教会学堂的课程不好。尤其是中文。文华的宗教教育也不甚启发，所以他们对于基督教，毫不发生兴趣，我在冯氏第一年也有一样的感想，虽然看基督徒办事的精神，很令人佩服，但是他们传教方法与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大有出入，所以不能接受基督教。我的信基督教是很渐进的，因为这是我做这回忆录一个要点，我不妨细细说出。

我在冯氏第二年第一学期，我想是一九一〇年春季，有一天我同班周庆曾女士的英文练习本，忽然被不知何人将它撕了好些页数，以致她要交的课程都被撕坏。教师查问当然无人承认。当时不知是什么人出的怪主意，要校长巴路义女士宣告，如到午饭时，犯过错的人还不自己来承认，即全校学生都要受罚。到了午饭时，没有人承认，那时在饭厅里三三两两的人互相讨论，怎样对付。我是一个急性的人，便说：“学校当局既查不出人来，岂可全体施以处罚，我认为很不公平。”那时也不知学校到底如何处罚，到了四点钟下课时，全体学生都被驱入大讲堂内，命每人抄书一小时，不许讲话。我们都只好伏案照抄，抄到五点，有位英国教员进来说：“你们现在可以排队出去，在花园中走动一小时，再入餐厅吃饭。”看她那副神气，毫无体恤学生之意，我不觉大愤，就站起来说：“我不出去，我在这里抄书很好，抄书于我有益，走动无益！”我这一来就有六七个同学不肯出去了。于是我被算为不良学生，很受歧视。我当然更加生气，自认反叛领袖，并出了一张小报叫“竹头木屑”，专讲学校不平之事，对国事也颇带革命思想。校长大为惶恐，与教员们商量办法。在座颇有人主张开除我们的学籍，但陈伯原老师极力反对，说：“这些都是好学生，假如开除，外面舆论会对学校不利的。”那时我们已有风闻，于礼拜六回家后便不回校了。陈伯原先生写信与七叔季融先生说：“学校并无开除意思，不过要我们道歉，及停止发行小报，并且事情闹大了，两方都无益处。”七叔本是发动

学校教育，便极力劝我们返校。于是我们次日便仍旧返校，包括我湖南的亲戚六人及浙江同学一人。但是校长只留我一人她在房内，其余帮凶只进来向校长及二位监学一鞠躬即退出。校长两泪双流，十分恳切的对我说：“我晓得你并不反对学校，只是魔鬼在你心中害你。”便要我与她同跪下祷告，词句恳切，并无怨言，使我十分感动，也诚心答应一切改良，报也不出了。这一件事使我看出基督徒的爱心。若不是陈伯原先生的好意，巴校长的爱心，我被开除，那我以后的个人历史不知道是怎样了。

从这件事以后，我体会到基督徒的爱心，诚心佩服。不久丁立美牧师来杭州传道，每日听者数百人，我也去了多次，也表示有慕道之心。有一日游西湖，到了岳坟，不觉感到人世的不公平；看到苏堤、白堤，苏小墓等，又感到人生的短促，到底人生在世有何意义？古人说：“生为尧舜，死为枯骨；生为盗跖，死为枯骨。”那“人”又何必做好呢？曹孟德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是不是人生哲学？又回顾我国国势的衰弱更加不知所以。我回来便与校长巴先生说出我的感想，那时我们已经前嫌尽释——做了好朋友；我也被升为班长了。巴先生极其了解，便常常与我查经及祷告，我们除开念《马可福音》外，还看过《约伯记》。我对巴先生的真诚爱心，基督徒的行为，十分崇敬。我发觉她的学问并不很高，口才也不太好，是一个普通人。基督的精神就是这样奇妙，它可以把常人变作非常人，巴先生不过是一个“常人”，而基督的精神把她变成了一个“非

常人”。她的德行，等讲到我们开办艺芳学校计划时再述。但这时我已经感觉到我们中国需要基督徒的“力行”精神，就有想做基督徒的意思了。

另外还有一个人，对于我的宗教信仰，也有极大的影响。在我第二年下期的时候，教我英文的老师——卫道明女士(Miss Weightman)，她接文立士女士(Miss Morris)之手。她的教授方法很好，且很接近学生。有一日她带了一位跛脚的女士，名叫司徒女士(Miss Stuart)来，替她代几课。司徒女士年龄很轻，但为人和蔼可亲，讲话也很有趣，学生都很喜欢她。有一日卫女士忽然问我们说：“你们知道司徒女士怎么跛的么？她的父母原来在四川传道，庚子年(一九〇〇)拳匪之乱，她的父母兄弟在家中被乱民所杀。她躲在床底下，被一个乱民用带血的刺刀刺了一下，她不敢做声，那人以为是家具在床下，就丢了她走了。到次日，才有好心的教友来寻到了她，已是奄奄一息，他们把她略为急救，便送到汉口教会。她虽然逃了性命，但是做了跛子。本来她痛恨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既杀了她的父母兄弟，又使她成为残废，真是不共戴天之仇。但是她在克西克(Keswick)大会上受了圣灵感动，改变了初衷。”看了司徒女士的为人，使我更有信教之意。

要信教，在那时谈何容易——第一，我家是数千年儒教的家庭，由宗圣夫子起到文正公，我祖父，我父亲辈都是孔门弟子。第二，我祖母的父亲蘄水郭沛霖公是在扬州受太平军攻城殉节的，她老人家更是儒教的信徒，释道尚

且不信，何况耶教。第三，我们的亲友，没有一个“信洋教”的，出了一个女孩信耶稣教，简直是貽笑乡里。但我仔细地写了一封信，说到我的心境苦闷，基督徒的心爱与力行，耶教与儒教并不冲突，而且可以振兴我国的颓风，所以我想做一个基督徒来自救救人，请祖母与父亲许可。我祖母是不很热心，但我父亲很愿意考虑，并且提到明朝徐光启的贡献，不过，他要我先看几本其他学派的书。其中包括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另外还看几本浅近的佛教书，但对于道教，却无指示。看过这些书后，已经快到圣诞节了，就是那个圣诞我在杭州圣公会受洗，施洗的是俞显庭牧师。

我受洗的那一年也就是中国革命的那一年。辛亥双十日（阴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不久浙江响应，我七叔带领我等全眷到上海暂避。此时七叔也因国事家事，感觉种种沉闷，开始与我谈宗教，尤其耶教。老人家也渐渐有信心。等我与表姐萧孝徽回到杭州复学后，大约是阴历十月内，他也在上海受洗，并立愿要开一个中国自立耶稣教会。他受洗时大约与我相同，都在辛亥年（一九一一年）圣诞节前。

五 出洋留学途中

正当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巴先生有回国一年的假

期，她便写信与我祖母及父亲商量带我出国深造。那时我七叔父与聂云台表叔极力赞成，也同时写信去湖南劝助。因此我便由家母陈夫人带领由湘到沪转杭州，在巴先生家住了一礼拜。并由巴先生授我一张特别证书，证明我虽未在冯氏女校毕业，实在可以留学了。这是我生平的一个大转折点，若是等到毕业——两年后——那时我的家庭景况已大受革命影响。而且巴师已去，我无法留学了。我祖母的意思，在回巴师信中写得很明白，就是说，我在英国须有巴师照应，并且说：“如巴师回来，则小孙女亦须同回，不能独自留在英国读书。”

一九一二年三月中旬，我母亲送我到上海，聂云台表叔与家七叔请了伍廷芳大使为我致饯行辞，我与巴师坐上了去大连的轮船，在甲板上看见我母亲沉默，听见我老乳母陈妈的嚎啕痛哭，及诸亲友的祝福告别声，才觉得我走上了人生一条新道路——将来怎样，我不知道，但我充满了信心——信上帝的赐福，信巴先生的爱护，也信我自己有坚定的意志，为我国谋发展谋幸福而读书的决心。

一九一二年四月八日到大连，歇了一夜。我也无心赏玩风景，倒是有点气愤。想到东三省受日本人的控制，我国与俄国边界的纠纷，及日俄之战以我国土地为战场等等，心中万分难过。两日后我们在满洲里搭上西伯利亚火车向欧洲出发。那时俄国火车的头等厢是二人共一房间，两间房中间有一个盥洗室。所以用盥洗室时就开灯，让隔壁人知道中间有人。用时先把盥洗室内对隔壁的门关上，再用

脸盆厕所，用完时熄灯开对面门。车子设备很干净，每天侍者换卧单枕套一次。床铺的位置是丁字形，一铺靠窗子——也可撑上去，一铺与盥洗室对面。窗前还有小桌一张，所以客人可以在房间里吃饭。但我们都是去餐车吃饭。客人一上车，就有侍者来问：“你在自己房里吃饭？或是餐车？第一餐或第二餐？”因为餐车不够，每日早、中、晚三餐都分两次开，饮食亦很好，与欧洲国家的差不多。每日午餐及晚餐前遇有大站，必停车一小时，让客人到月台上散步运动。也有卖零食的人及小纪念品的人上前兜揽。以上火车设备，乃当时帝俄时代的头等车。

西伯利亚的旅行，开始只见荒郊旷野。那时虽是阳历四月初，还到处冰天雪地。甚至火车在贝加尔湖上面，横过冰上的临时铁路。这也是一种奇观。另外我看见一次整圆的虹彩，在那冷静的空气中十分美丽，恐怕即在西伯利亚，也不易多见。

我们到了莫斯科。因为要在这里换车，我们便停留了一昼夜。我在停车的时间内参观了博物院、美术院及克里姆林宫。宫中有俄皇加冕的礼拜堂，尚有俄皇加冕用的金交椅。这椅子真是黄金做的，而且花纹精致异常，靠背很高。我当时还是一个拖辫子的小女童，便试试在上面坐了一坐。那个向导不过笑了一笑说：“因是你是小孩，所以让你试试。大人是不可以的。”

车到波兰的华沙，又要换车。这里俄国关查的很严——倒是我们上西北利亚火车时，并不太严。也许巴先生预先

打过招呼，我不曾看见。那时的华沙，恍忽五方杂处。有皮帽大衣的俄国人；西服整齐的英法人；也有峨冠长袖的德国人；还有长须齐胸，道貌岸然的东正教神父。我也看不仔细，只是我想到梁任公的《波兰灭亡记》不觉黯然，亡国之苦是如此的。

在路上我们听见了一条英国巨轮Titanic在大西洋碰冰山沉毁的消息。据说此船是如此构造，不可能沉的，但毕竟冰山力大，将船撞碎，有一千五百余人丧命。沉的时候，皓月当空，波平风小，但是因为当时人们相信Titanic是不会沉的，所以救生设备不够，人们也不肯上救生船，那些好容易被劝上救生船的，又因上船太迟，大船沉下时离他们太近，致被大船的吸力把许多小救生船都吸下去了，加之海水冰寒刺骨，不溺死的人也会冻死。由此令我想到科学的发达，若只看一方面，而不全盘筹算，危险还是很大。

到了哥龙 (Cologne) 我们换乘去比国的火车，在比国的布鲁色尔 (Brussels) 换法国车去海港加来 (Calais)。法国人是最讲经济的，所以如此长途火车，却并无餐车，因为客人都自己带面包食品，餐车很少有人去过问。巴师同我事先都不知道，从头一日下午七时在哥伦上车前，略微吃了些点心起，车上住了一夜，次日早，既无早饭也无中饭，我与巴师连一口水也没得喝。直到次日，午后车到加来才能买些吃的。一路看见车上的客人，男男女女都拿出东西来吃，才知道我们的错误，满以为车上有餐车，所以一点吃的也没有带。这次饿的经验，很使我感到饥饿的痛

苦而原谅那些小偷偷食物的行为了。

车到加来，大约是午后四时，检查放行都很快，不久便上了英国的轮渡。我们在比国便打了一个电报到伦敦，要约农二弟到海港来接。船到英国杜华(Dover)，我们上岸坐火车，从窗外看见约农在月台上徘徊寻找，于是叫他上车，同到伦敦杰林克斯站(Charing Cross)换车再走，最后到巴师的朋友克以斯夫人(Mrs. Keith)家。克夫人家居黑山，这里是伦敦的郊区，有个出名的女子中学，也近英国的格林威治天文台。海外看见约农——第一个亲人，真是喜之不尽，又有克夫人夫妇照拂，很能使游子得到安慰。这是到英国的第一日——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日，我们在克先生夫妇家吃了晚饭，后来约农回伦敦。我们住在克夫人家，但我在床上，思前想后不易入睡。想到我的家人，想到我的前途，想到我如何应付未知的环境，总要不丢中国人的丑才好！

六 在英国的中学时期

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日到伦敦住克师母家两礼拜后，便去瓦津(Worthing)之私塾“礼堂学校”(Church House School)。此校乃一极小之住读书学校，宗教思想甚浓。大约是圣公会推荐与巴师的。我们五月初便去报名，住在巴师一位老友莱女士(Miss Lashley)家。这位老小姐姊妹三人。一个患了瘫痪症，但莱女士待她极好。照学校规矩，

学生每月只许回家一次，但校长Miss Fisher很可怜我是一个外国学生，准我每礼拜回家宿一夜，因此巴师便在瓦津租了几间房子，以便我礼拜六可回家住一夜，有时约农弟也来往，姐弟相会，其乐陶陶，我有时说笑话使约农笑得不能休止，巴师虽不尽懂，也很开心。那时她不但喜欢约农，更极想要他信教。

瓦津私校是一个旧式——维多利亚时代式——女校。学生只有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科。每日有礼拜，查经等课，我在这里受了圣公会的坚信礼，受了路易司主教的按手礼。我当时想学科学，但英文太差，所以只用心读英文，教务主任莫先生(Miss Morter)很肯帮助，常常单独教我，读英国文学史及莎氏戏曲等。但我殊感困难，然而我还是佩服她爱护学生的精神，这也是基督徒爱心的一种表现。暑假后，我们去伦敦请教伦敦大学西田院(Westfeld College)院长梅娜(Miss Maynard)。我问如何能进西田书院。她说最好进黑山高中读书一年，再考大学，也说先要补点英文。巴师遂带我到她一个友人寇女士家，请寇氏的妹妹为我补英文。教的是英文短篇小说如纪伯陵(Kipling)的印度故事，长篇小说如斯考特(Scott)的历史小说。我对短篇很有兴趣，但长篇就嫌冗长，且句子又复杂，不易懂。寇氏家庭也是旧式基督徒家庭。寇小姐的继父，很有风趣，会唱英文滑稽歌曲，常常与我讲话，我的英文会话也有进步。

九月中返伦敦，进了黑山高级女子中学(Blackheath

High School)。英国学制相当自由，并不要看文凭、验学籍，只是由校长，教务主任面试便可。巴师带我见了校长 Miss Gladston 及教务主任 Miss Froom。他们二位与我谈了一刻钟。我的英文是不行的，但是她们所问的我都懂，虽然答的不流畅，却也还对题。校长毫无犹疑的，说“放在 Sixth Form 高中毕业班，我想她可以赶得上。”这真是令我喜出望外，也便马上立志一定努力，不使她们失望。

我应说明想学科学的志愿——那时我们中国的学生，已经完全相信科学救国，也许比现在学生更加认真，因为我们并不是想出路，想赚大钱，而是诚心诚意的志愿用科学来服务国家——教务主任要我选课，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英文、数学，第二外国语是必需的，另外可再选两科即可，我便选了生物学、化学，因为我当时很想学医，这两门科目可以接上医预科的科目。最幸运的是中国文可以算第二外国语，因此我只要学英文、算学、生物学和化学四门课。

化学老师即是教务主任，此人循循善诱。我在黑山一年即得学校的化学奖。数学老师教得好，脾气也大，但我的数学在她手下大大进步，考大学不成问题。英文虽有巴师，终因底子太差，只有三年中国中学，每每不能迅速回答问句，考大学也是最弱的一科。好在一九一三年九月因英文口试好，勉强合格。其他科目都已绰绰有余，于是进了伦敦大学的西田书院。

那时黑山中学的设备甚为完善，学生约五六百人，完

全通学。每日早起八时半，到校礼拜，由校长领导，校长先读《圣经》一段，再读名人训辞一段，最后就是祷告。礼拜完后，由各班主任领学生回教室。计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各一班，四年级分上下班，五年级一班，六年级也分上下二班。我就在六年级上班。四年级有上下两班，好学生入四年上班，差点入四年下班。所以四年级可以读两年，同样六年级也可读两年。在这种制度之下，小学中学共可读六年至八年，看学生的功能而定。聪明好学的六年级生可读毕考大学，差点的即要八年，也有七年还考不上大学的。现在英国学制我不熟悉了，但是当时我读书的时候，感觉甚合理，因为使好学生兼程进步，差点的学生也有时间来从容学习，多受教养，而并无自卑之感。宗教方面也有查经班，这是自选的，并不勉强。早晨礼拜则必须到。我在听这些名人训话也得益不少。礼拜六礼拜日均没有课。巴师为我特租小楼房一座，每日我返家温习功课。据巴师说我的英文会话进步很快。起先我与巴师还说中国话，半年后我能纯粹说英文了。约农弟常来我们家，巴师特为我们煮饭，是白饭不是饭布丁。我们姐弟也常用英文谈话而不觉得奇怪了。

礼拜日，我们去礼拜堂礼拜，牧师是 Canon Barnes-Lawrence，很有学问，我们用的是圣公会公祷的仪式，跪拜甚多，翻书不少。起初很觉不便，后来也就习惯了。圣公会的祷文，都是好文学，措辞甚简短，但意义深长，有时我也觉得比有些教会的临时口祷——冗长凌乱——来得

庄严典雅。在信仰上，我在黑山之时可说仍然在幼稚渐进阶段，虽然信仰未改，却并未得到重大的启示，不过觉得耶教比有些宗教好些，基督徒人格也好些罢了。

在黑山高中时，我在高班，又比普通学生年龄较大，且是一个外国人，不易交友，同班中只有一个何女士，因为她有一个姐姐在福州传教，所以多来往些。另外有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因她的父母很热心教会工作，也认得巴师，巴师就带我到他家里去吃茶几次，与这个小朋友熟了，她就是巴克女士 (F. Berker)，她未出嫁，照顾她的母亲到一百岁，曾受英女皇奖贺。前四年她曾来台北到我家小住。我到英国去，也住过她家，我们每年总有几次通信。

七 未入大学前的访友

我未入西田书院以前，巴师带我访了几家她的友人。这些朋友们，都与我求学、灵修、做人有关系，所以我要略为记出。

先要略说冯氏女校创办人冯马利女士 (Mary Vaughan)。冯女士出自名门，家中富有。自愿来中国传福音，且深感中国之积弱是因为女教不昌，遂立志要开一女校，且要施行近代教育，教到入大学程度。到了校舍宿舍均已盖好之时，不幸冯女士忽患重病，不及见开学，便魂归天国了。她的为人，巴师及众人口中，可以得到素描，乃是一个最好的基督徒。巴师接她的地位，做了三年校长，然

后带我来到英国。因为冯女士的关系，便先拜访冯君的家
属。

我们先去冯君的妹妹家，——这位冯莉维女士 (Oli-
via)也是老小姐，喜欢社会工作，在当地Guildford办了一个
工人之家，都是男工。在这里工人们有很廉价的客饭和
宿舍，并有正当的娱乐设备，例如下棋、音乐、弹子、书
报、手工等等。她自己领圣经班，或唱诗班，有时也请外
来的人演讲，可说是一个小型的青年会。不过样样东西都
简单廉价，来往的客人，也都是工人装束，没有绅士气派。
我们在这里住了两个礼拜，我还向工友说过话，他们看见
一个真正的中国女子，那时我穿的中国服装，而且是他们
捐助的成果，高兴得了不得。因为他们每礼拜日每人捐一
二个便士，他们喜欢说“冯女士，巴女士是我们的传道人
(Our missionary)”。冯莉维女士的宗教思想，新得多。
她对教条不主张完全严格信守，她说：“我们为人行事模仿
耶稣，就是基督徒了”。这话对我的信仰，有很大影响。

我们所拜访的第二位也是冯家的家属，就是冯君的哥
哥爱德华(Edward Vaughan)。他是英国最著名的学校亿冬
书院(Eton College)的希腊文教授及学生导师，牛津毕业
生。学问渊博，早日留学德国，很受德国哲学思想的影响，
以调和经验与理性为宗旨。为人极和善幽默。曾教过英王
亨利六世(那时还是王子)的希腊文《新约》。有一日王子
忘了带书来，他说：“先生，我的书忘记带了，还在‘温莎
宫’里。”冯先生说：“那你便回‘家’去拿来，下次不可忘

记。”后来我常去访他，他有一次——我想是在耶路撒冷开会以后——请我向亿冬头一百名学生演讲。在藏书室并无讲台，站在约翰生的书桌上 (Dr. Johnson's desk) 演讲。这是他们一贯作风，凡名人演讲都在这里。我想我是第一位东方女士得了这种荣幸。冯先生结婚很迟，他太太是爱尔兰人，她极忠于王室，却也很自傲，因为她的祖先威将军 (Gen. Webber) 是签名要判英王却而斯第一的死刑诸人之一。以后许多次我到英国都住过她们家中，受她的欢迎优待。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女王加冕那年，我与约农弟还在他家住了二星期，那时英国食品还在严格管理之下，她笑向我们说：“你们到我家里来吧，我还可供给你们的鸡肉与兔子肉。还可请亿冬的教授来与你们讲话，你们肉体和精神的粮食，都不会缺乏。”冯夫人极其慈善，她虽不多讲教，然而那种基督徒的爱心到处显著。

另外还有两位冯君，我与巴师也拜访过。一位是菲利普 (Philip)，一位是他的妹妹。菲利普是勃理士妥 (Bristol) 的一位大绅士，他们是冯马利女士的堂姊妹。巴师与他们极熟，因为巴师曾在当地教过书。冯老先生极力赞成巴师与其堂妹马利来中国办学。后来巴师因我的缘故留在英国未返杭州，圣公会便不给她退休金（此事我另有记述）。冯老先生大不以为然，便自捐赠五千镑与巴师，她的妹妹也捐三千镑，任巴师如何使用，也可用作我的教育费。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汇兑困难，若是巴师没有这一笔钱，我的教育费是没有办法的。后来由聂云台三表叔及

我家中——因英镑比价仅四银元一镑——将教育费还清。在巴师遗嘱中，可以看出她的清楚账目。冯老先生的成人之美，我是不能忘记的，而老先生急公好义具备真正基督徒精神，更令人佩服。

另外还有一个朋友，虽非冯氏家属，却与我们有点关系，那就是赫太太 (Mrs Hett)。她的先生也是英国瑟郡 (Sussex) 的大绅士，极热心传教，捐予教会的钱也很多。我住在她家的第一日，忽然病了，发热到一〇一度，巴师大为焦急。但赫太太却很镇定，拿了点药给我吃，那时我也不知是什么药，只知吃了便想睡，并出大汗，次日就好了许多。我看见赫太太虽是富有人家的主妇，却是自己拿水拿药，上楼下地，并不呼唤她家中的女佣人——那时她家的佣人很多——我也感到一个基督徒家庭主妇的修养应当怎样了。她家每日早起都有祈祷，上下人等都加入。她有两个女儿，都比我大。大女海伦 (Hellen)，会自己驾车带我们游玩。

一九一三年暑假，在未考大学之先，我又与巴师到了她老人家的一个友人家补书。这位女士名费尔士 (Firth)，年纪轻轻，刚在西田书院得了伦敦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并正接受了圣公会差会秘书之职。她家中有三位未嫁姑姑，其中一个是不能行动的病人，她们相处很好，对病人也照顾亲切。我到英国一年多便有两家居停主人，都有不能行动的病人，而我在中国家中十九年，亲戚中没有看见这样的病 (学名 Parkinsonism)，一直到台湾，我的一位表姐

萧女士竟有了这病，才知道看护这种病的困难。费博士教我的英文，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喜剧、悲剧、历史剧各一本。喜剧为《一磅肉》，悲剧为《麦克伯斯》(Macbeth)，历史剧是《该撒》。其中《一磅肉》我曾在国内读过，而且我喜读悲剧，所以又读了《李尔王》(King Lear)及《汉姆勒特》(Hamlet)]。这地方离诺福克(Norfolk 英国东岸一州)不远，是一位公爵的采邑。费博士带我去参观公爵的堡垒，及堡中的陈设。她告诉我诺福克公爵乃是英国最老的世家，与维康第一(William the Conqueror 1027—87)由法国北部之诺门地(Normandy)同来英国(一〇六六)，所以已经差不多一千年了，这颇令我想到我们家里，不过四代的侯爵而已，中国唯一的最久世袭是衍圣公，其余的世家都很短，中古及近代的中国，根本说不上什么封建制度。

八 入大学前的抉择

上文说到巴师为我留在英国，辞去了圣公会传教师之职，这是她一生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一生的一件大事。

巴师休假原只一年，但因为考大学之故，她续假半年。从一九一二年四月到第二年十月便要满期了。我于一九一三年九月考上西田书院，那时我住在黑山，因为伦敦大学要十月初旬才开学，所以我们还未搬入伦敦。

我们在黑山草原(Blackheath)旁，街名和门牌是蒙伯理路二号(2, Montpellier Row)，面对草地，风景很好，

但不幸隔两家便是一个酒店，每逢假期日，酒友如云，醉客满地。巴师常对我说：“你不可看这些坏样子，这是基督教国家之羞耻，好在我们不在这里久住！”我当时还未了解她的意思。

有一日，大约九月中旬，我们在外面回家，吃过晚饭，巴师忽然说：

“宝荪！我有要紧的话和你商量。”

“什么事，请讲！”我答应着说。

“当初我带你来英国，正是我五年休假的一次，我看你有可造之资，又已是基督徒，所以愿意提携你出国。你果然未负我的希望，考入了大学，我很高兴。现在圣公会 C. M. S. 要我回杭州，再做校长。一则因为他们没有找到适宜的人接手，二则我还得再服务五年才能得到退休金，来赡养我的余年。我今年六十岁了，再做五年，恰好到了退休年龄，也有了退休年资，可以得到养老金。若是不回杭州，不但不能得到退休金，也很使我许多朋友，尤其教会负责人失望。他们来劝我回去的很多，并说‘宝荪现在已考入大学，应当可以自立了。有很多朋友们可以寒暑假内接她去住，四年毕业，正可回到冯氏学校，在你手下服务，她已有出路，你也尽了责任，岂不两全其美！’我再三思考，她们所说都并非无理。但是我总不十分放心，尤其你家人拜托我，我不能不尽我的责任，你自己如何想法？”

我当时听了，不免大吃一惊，因为我一向总没听说过这些话，更不知道巴师退休事体的重要，当然沉默了片刻。

我自己想，在英独自一人难免寂寞，好在还有约农二弟。不过巴师去了我便无家可归，加之家中经济汇兑不能按时。约农二弟在英，虽有家中汇钱，但仍靠一位高林士君 (Mr. William Collins) 转汇，我若独自在此，万一汇兑不通，那又向何人告贷——加之祖母再三说过，假如巴师回国，你必须同回，我怕万一不听话，祖母生气着急，又如何办法？巴师看我沉默不语，便又催我答复。现在我把当时的对白记在下面：

(巴)：“你不要怕，有意见，只管说出。因为离我回杭之期，只有一个月了。我必要决定。”

(我)：“巴先生，我的环境，您很知道，自从革命以后，已大不如前。何况我祖母再三吩咐要我与您一同回去。所以我愿意与您一同回去，虽然考入大学当然可惜，但我愿意保留您的退休资格，获取养老金，也不违背我家长辈的吩咐。”

(巴)：“我们今晚各自祷告，祈求上帝的旨意吧！等明早再决定。我们祈求诚恳，一定得着正当的启示。”巴师诚恳地说。

不消说，我们那晚真是心事重重，我虽然诚心祈祷，但是我很平静。我知道我的前途在上帝手里，也在巴师手里，上帝必然启示巴师走应当走的道路。到十二点钟以后，我也朦胧睡着了。

次早大约六点不到，天还不十分亮，我听见房门外轻轻地叩了两三声。我想一定是巴师来告诉我她的决定了。

我不得心中忪忪不定，因为究竟这是我最要紧的关头呀！我急忙披衣开门，看见巴师穿了晨衣，站在我的门外，我还未及开言，她老便很镇定地说：

“宝荪！我已决定了！并深知是上帝的旨意！”

“回杭州！”我不禁冲口而出。

“不！不！留在英国。我深深感觉，教育你一个中国人出来在中国为上帝作工，远胜我十倍！我培养你，就是做主的工作！”

“那您的退休金呢？岂不为我牺牲了？我又如何能报偿？”

“不必考虑！上帝会安排的。我完全信仰上帝会成全他自己的旨意，决不会使我们陷入绝境！”

我得了巴师这样的爱心，不禁两泪直流！我们在床前俯伏祷告，共同感谢流泪——不过这泪是得胜之泪，感激之泪。后来她还送了我一只金表，内面刻了“胜利”的字样。她的得胜和我的感激，是语文所无法表现的了。

这一段事，我照我所记得的两人对话写出，当然不能全部写出来——不过要点都有了。这真是天下最大的爱心，最好的基督徒舍己救人的榜样。在这种情况下，要我如何不决心做主的工作呢！

上文说到冯腓立先生赠金予巴师的事，就是在这以后的事。冯君的慷慨，真是难得，令人深感之至。但是巴师的决断在冯君赠予之前，纯全是像亚伯拉罕，或戴德生（Hudson Taylor内地会创办人）的信心，一往直前，只要

实行上帝的旨意，不怕世事的阻挠，上帝也果然祝福他们。

九 伦敦大学的西田书院与我

伦敦城是渐渐长成的，与北平、巴黎、华盛顿大不相同。它是由许多小城市慢慢地接凑拢来的。街道没有一定的计划，称为正街 (High Street) 者有十几条，都是从前那些小市镇的大街。例如肯心顿正街 (Kensington High Street) 等，所以伦敦大学也不像英国的牛津、剑桥。他们所有的书院都相距很近，学生教授往来便当。伦敦大学各书院却相隔甚远，而且每个书院的教学制度有它自己的一套，不过课程和教授都由大学审定，考试统一，由大学聘人阅卷。因此学生程度也很整齐。

我进西田那一年，不幸帮助我很多的那位梅校长因病辞职，所以我虽是她一手提携的，但没有真正聆她教训，至堪惋惜。继任校长为瑟琳珂女士 (Miss de Selincourt)，原是法国贵族，逃难来英国。曾受高等教育，在印度传过教，创建大学女士社区 (Univ Settlement) 为印度女生服务，例如有关入学、寄宿、寄食、阅览、品德、修养、医药等等，后来因为印度气候不好，她得了疟疾，才辞职回国，便接受了梅校长的请求，做了西田院长。以后我还要提到她，及副校长李女士，此处不多赘述。

现在我要略述西田的状况。西田位在伦敦之西北，离

汉普斯特草原 (Hampstead Heath) 不远。坐巴士由市中心到书院，要走半点钟。院舍建在一小坡上，有老屋一幢三层楼房，新屋一幢也是三层，两幢中间有一桥连接，如L形。学生住宿者七十人，通学者只有五人，且都是已婚印度人，因当时梅校长极反对学生人数太多，并且声明住宿生不得超过七十人，以便她的教育精神可以达到每一个人，而她也能深深地认识每一个学生。瑟校长接任的那一年，也是我入学的那一年（一九一三）。另外还有一位副校长李却逊女士 (Miss Richardson)，她实在也是创办西田最有功的人，但当初捐资建校的布朗女士 (Miss Dudin Brown) 是圣公会教友，所以她的条件载明一定要用圣公会教友做校长。李女士是清教徒——或称朋友会——不能合格。正好那时李女士也病了，所以我进入西田时，只看见瑟女士。

院中设有文理科。文科颇完备，而理科只有生物、数学、化学三门。我第一年选了生物、数学，但要去培福特书院 (Bedford College) 上化学。每礼拜二次，上午听讲，下午实验。学校给我们车费和午餐费。培德书院在伦敦摄政公园 (Regents Park) 中，风景秀丽又有一个长长的湖，真是在城市而有林泉风味，很好读书。西田书院原在市郊——现在已很繁荣，不能再算郊区了——虽地方较小，但每个学生仍有两间房：一间寝室，一间书房。设备中有壁炉、衣柜、书桌、沙发和椅子等等。墙上由学生们自己挂上心爱的画。那时我挂上了我父亲为我写的小屏四幅，及

中国湘绣斗方与家人的相片。外国先生和同学都很喜爱，我也不觉得太多异域之感。我的房间在老屋的下层，窗子对着玫瑰园与网球场，很美丽舒适。

我选的是生物学作主科，数学为副科。但在化学及生理课程中也选了些课。因为我那时颇有想学医的思想，所以如此选的。但等到第二年考过了第二考试 (Intermediate Exam) 就决计专学理科了。

我原来想以化学为主科。但西田的化学设备不够，要学化学的，都须上培德书院。我因为路太远，加以翻阅图书也不便，就决计以生物学为主科，生物教授窦尔芙博士 (Dr. Delf)，极其循循善诱，年纪甚轻，热心无比，对我也极尽提携启发的力量，我真是十分喜欢在她的门下。到如今已半个世纪了，她还维持与我通信，我的数学老师费特培女士 (Miss Whitby)，是一位已经四五十岁的人，但为人和善，做事精明。凡院中除总务外，一切的布置，招待学生，学生毕业时，安排典礼宴席，她都做得美满顺畅，因为她不但知道每人的学业分数，而且知道每个学生的好友是谁。所以坐起席来不会排入陌生的人一起的。至于她的专长——教数学，更是剖切详明，确能说到顽石点头。我的家庭可说是一个数学家庭，我祖父曾算出 π 的数值到二百多位小数 (见丁氏白芙堂数学)，我父亲也做了很多的级数及各种开方捷法。但是我相信若没有中国中学的陈伯原先生，英国中学的鲍女士 (Miss Baldwin)，及大学的费教授，我决不会选两门数学的 (一门纯粹数学，一门应用

数学)。

进了大学，英文便不是必修的了。但我的英文不好，所以要常常请教那些英文老师。她们都很帮忙。此外西田书院内及伦敦大学各书院还有课外专题演讲。我如能做到时，总去听讲。一则增加知识，二则学习英文。后来我的英文可以勉强过得去，就是得力于多听的原故。另外我还加入学院的学生基督会、辩论会、读小说会、科学演讲会。这些会大都每星期只开一次，但读小说会并不开会。只用会费买新书给大家看，我立志每星期必要看完一本。根据快读快懂为原则，并不常查字典。除非万不能解，才查一查。久而久之，能自己懂的字，也就一天一天地加多了。心领神会，更能得到趣味，日后用到这些字汇，也格外顺手。加之读小说，可以知道英国人的家庭、社会、朝野的风俗习惯，实在是一个学习外国的风土人情的好法子。

十 西田书院女生的生活

上文我略说了西田的大概，现在我要说说西田女生的生活。

每日清晨，大约七时（夏天就提早一小时），就有一次起床铃，但许多好早睡的学生并不起来。八时摇铃早祷（但也有不去的——学校并不勉强要去与会），学生在一签名簿上签名，并须穿制服（Cap and Gown）。八时半早餐，学生陆续入餐厅，可以随便坐。南面有一张横放的长方桌，

是校长与教授们坐的，通称它上席 (High Table)。每夜由校长的随身秘书写名单派学生陪坐。第一二名的人，一个坐在校长右边，一个在她左边，(这些座位我都坐过，非常荣幸)，其余的随意坐。每次陪坐的共十一人，所以每人都每两三星期有一次陪校长。不过假如学校有特别客人，或假期，均是例外。

西田的女生，可说是多餐的。早上七时，便有人送茶点——这是英国上等社会的习惯，称为早茶。我没有这习惯，便嘱咐工友不必送。十一时又有咖啡或牛奶。十二时半午餐。有去大学别的学院听讲的，都不回来午餐。下午四时又有下午茶点，这也比较随便。大餐七时。在六时半便有换衣铃，学生都换上鲜美衣服，也可以戴首饰。假如你坐上席，则更应当打扮。大餐较其他两餐都要丰富讲究。有人送菜到座上来，不要自己到旁边的菜桌上去取菜。每桌席都有一位教授做主人，虽然处处谈笑风生，但整个饭厅仍然是很宁静。并无大声谈笑喧哗之事。

西田最有社交性的会食是夜茶。大约是晚餐后，工友便送来一个大盘，内有茶壶、茶杯、点心等等，此乃是夜茶用的。夜茶在夜间九时方开始。九时有一次铃就是停止自修的记号。此铃响后——上楼下楼，人声鼎沸，笑语喧阗。各人端着自已的茶盘，应友人的约会。新学生的约会较多，一到学生报到后便得许多请帖。有时一二日前便接到老同学的请帖，届时你便端着盘子到主人的书房。茶点即上面所说由学校预备的，主人不过加开水罢了。如另

外加摆一二种较名贵的点心，就很客气了。这种茶会，可随便来多少客人，主人无加添杯盘之苦，点心也有限。但是可以聊天、说笑、讨论功课、认识新人。教授们也请夜茶，如其碰着同学也请，那就只好辞同学，去赴教授的“约会”。大多数教授在“约会”选她自己的课的学生时，每次只请一二人，以便深悉学生的兴趣与背景。约会其他系的同学则每次五六人或六七人不等。

除每日早祷外，还有神学课，但是听不听随便。每礼拜日学生都出外上教堂，或访友。我因为巴师为我辞了圣公会的职，又在汉普斯特（Hampstead）租了一栋屋，以便我回家。所以我每礼拜早便回家，与巴师同去做礼拜。我们去的也是一个圣公会教堂，牧师姓郝（Mr. Howe），曾在福州传教，太太是俄国人，但英文法文都说得很好。

学校规定礼拜日必要回学校夜饭，饭后由校长带领在学生起坐室（Common Room）报告各样关于社会及本校的大事，例如老学生的就业与荣誉等。后来校长便选读诗歌或文章，都是名人著作，与人生修养有关的。要到九时方散。至于上课，大多数是在本院内，但也有少数选别的书院若干课的，她们即去伦敦大学别的书院上课，我就是其中一个。伦敦大学书院甚多，而且散漫地布在各处，纯全是女生的书院只三个，一是西田，一是培德福特（Bedford），一是赦罗威（Royal Holloway），还有一个医学院（Royal Free）纯是女生，并有自己的医院。那时英国还很守旧，牛津、剑桥不开放与女生，伦敦虽然男女平等，

但是医学院仍不开放，所以才有专门一个女子医学院。

牛津、剑桥反对女生加入大学，并不是反对女生读书。所以牛津、剑桥都有女书院。不过他们不给女生学位——女生可以听课，可以参加考试，可加入研究院，但不能取得学位——因为一经取得学位，便是大学的一分子，有权决定大学的政策，大学有特别难题，可以参加投票。有些老学究便说：“我们的大学，几百年来都是为男人设的，不能让女生投票，损坏男人的利益。”因此牛津、剑桥直到第一次大战后好几年，才准女生得学位。我的选择伦敦大学也是为了伦敦大学真正是男女平等。不幸的是医学院还是很守旧，现在我想已经改良了。

西田女生相当自由，每日可出院，但假如要到午后十时后才回来，就要先通知看门的给你留门。她有一本小簿子，你须签名在上，但即使极晏，也不得晚过午夜。假如你要过午夜才回校，就要正式请外宿假。且一学期不能多过二次外宿。英国大学每年分三学期。秋季大约十月初旬到十二月中旬，春季由一月中旬到三月下旬，夏季由四月中旬到六月底。每学期最多不过十星期，一年上课不到三十星期。暑假最长，大都是三个月以上，理由是使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科学的学生，可以旅行欧洲各国加添借镜的机会。实在是一个好办法。学期既然很短，学生不能不尽心听讲。假期又长，可以慢慢的温习，这种一学年三学期的制度，似乎与我国不大相称，然而较长的暑假，实在是一个好制度，既可避暑，又可温书，很宜于我们亚热

带的学校。

西田有学生会，会长通称曰学长 (Senior Student) 遇见学生与学校间有关系之事时，就开学生会，决议或请求的事，由学长报告校长斟酌行事。例如第一次欧战时，学校节省电力，每夜十时即要熄灯，学生们请求加半小时，这事学校准了。学生书房中的壁炉也受限制，每日不得超过一小篓煤，学生请酌加，这一条学校不准，说是为国家节省资源，学生们也接受了。我在西田三年，从来没有碰到学生闹风潮的事，也没有碰到学校坚持不答应对学生有益之事的合理要求。

每年夏季期中必有一次游园会，可以请亲友，晚间也有跳舞会。另有一次演剧，或话剧，或音乐歌剧，乃是在校学生欢送毕业同学的活动之一，请他们上座，招待茶点，毕业同学也可请一二位客人同乐。至于每年二次的大辩论会或演讲，则每个同学均可请一二位客人来听。辩论题目，有时也很滑稽，有时很严正。例如“受过大学教育的女子不适宜于家庭生活”，“教假历史是于国家有利益的”，“培根 (Francis Bacon) 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作者”等。辩论会大约晚上八时开始，十时完毕。有时也辩英国的下议院所辩论的题目，例如“劳工保险”。总之这些演讲或辩论都使我们加添智慧不少，到如今回忆，还很有味。

每个学生房门上有名字卡片，放在一个小铜框内，房内另有卡片二个，一黑一红，上写 Engaged (有事)，即是不要别人随便进去的意思。黑的还可敲门问讯，红的则绝

对不可去扰她，都知道她必是有限时要交的卷子或文件，我自己就曾在房内写过考卷，到时候有教员来收卷，并不监考。西田的教育可说纯全尊重人格，相信学生，使我见习了极好的教育方法。后来我办艺芳，取法西田的不少。当然中学生没有大学生那么自由，不过艺芳也做到了不监考，不记过，不开除学生的三项实绩。

以上所说学生生活都是我在西田的一段时间的事。现在西田人数校舍都扩大许多，而且男女同学，已不是当年的情形了。

十一 想办女学校的经过

一九一四年秋天，我本来打算到德国去歇暑，但八月四日，英对德国宣战，因此便只好在伦敦休假，英国人的爱国心真可佩。八月三日那天，圣保罗礼堂大礼拜，为国家决策祷告。那日不但堂内座无虚席，甚至到礼拜堂外面的大街，也站着许多人，垂头默祷，恳切祈求上帝的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构成原因，实在是英德争霸之故，至于刺杀奥国王子的事件，不过是最后爆发的引火线，一般英国人忠君爱国，宣战后加入志愿军的约十余万人。很多是优秀青年而且多数是大学生。另外也有一些反战的人，最出名的如罗素 (Bertrand Russell) 及罗以敦女士 (Miss Roydon) 等。影响所及，便有许多青年自称是“良心反战者” (Conscientious Objectors)，其中多数为清教徒。他们

因为抵制入伍，受了许多刑罚与肉体痛苦，但始终不屈。我本人也感觉，真正基督徒不能操刀杀人，何况杀人于千里之外，老幼不分，善恶不辨？世界的基督徒若不互相亲爱，互相帮助，那就不能使基督的精神发扬出来。所以我也常去朋友会听道，也很感觉反对战争是有理的。那年寒假，我与约农弟除夕守岁，便立志贡献自己为国家、为世界致用，约定互相努力，互相帮助，以求达到这目的。所以后来他守了这个信约，一直爱护我帮助我，我办教育略有成就，靠他助力不少。

第二年春天，我便常常与巴师谈及立志回国与办学校之事。巴师起初要我回杭州为冯氏女校工作，我不十分同意。一则是巴师已经离开了圣公会。二则我想浙江人才多，容易有人办学。三则我要在湖南服务桑梓。四则最要紧的是，我要办一个纯粹中国人主持的基督教学校，教会学校不是不好，但我想基督教若不纯粹中国化，则中国人总不能接受它，使它成为自己的宗教，如佛教一样。我七叔也有此心，所以他在长沙办了一所基督教自立会。我很以为然。那时正是战事日亟，我离毕业时间还远，也就将此意暂时搁下。不过我从来就没有去杭州的思想。

在西田书院有一次科学演讲。同学举了我主讲。我也只得勉强策应。后来我选了一题“科学对人生的贡献”。大约讲得还不错，大受校长瑟琳珂的称许，叫了我去单独说话，我便把我自己求学的困难及想在长沙开一女学的思想告诉她。她极其赞成，并说她每每以为基督教若不和印度

及中国的文化融会贯通，便不能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宗教，哲学上的解说，也不完备。我得了她的启示，便与巴师说明。巴师便来到西田会见校长，把她与我的意思都告诉了校长。校长更是热心，为我找了好几位英国热心的名人支持我，其中之一即是威廉汤朴 (Dr. W. Temple) 博士——他后来做了英国的大主教。另外还找了李却逊女士，及马杜格女士 (Miss Medougall) 来帮我游说教育界的人，认为这才是真正传教的工作。

一九一六年夏天，我考取了伦敦大学理科学士，我想我是第一个中国女子得这学位的，因此校长与我们的教授都大大的喜欢。但是因为打仗的原故，我不能回国只好到剑桥、牛津去读研究科目。一九一七年回伦敦后又读了师范科一年。那年春天，瑟琳珂校长因乘自行车跌坏了手腕，得了破伤风，三四日即不幸去世。这真对我是极大的打击。我既伤校长的逝世，又感觉我的计划大受影响，终日忧愁。这时学校也惶惶无主，于是就请李却逊女士来做代理校长。李女士已经对我的希望，有一个大概的认识，现在她看见我的忧愁，更愿意援手。她与校长，本是至好的朋友，思想志趣都很相同。她既担起了西田的责任，更也愿意担起校长对我未完的这一份责任，所以一九一七年由春至夏，她都到处为我帮忙，请了西敏寺的牧师 Canon Storr. 为我代收英国友人的捐款。又请西田的秘书 Miss Child 为我写信道谢。若没有李女士，我的志愿很难变成事实的。李女士是北爱尔兰人，家资富有，常行善事。为人和蔼可亲，读

的是哲学与文学，能出口成章。艺芳女校成立后，有一小册子，就是我边说她边写的。不幸李女士身体不好，常卧病榻，我于一九二八年，耶路撒冷大会后还去了爱尔兰，在她家住了三日。那时李女士已在病榻，偶然坐起，也不过在轮椅上出来透透空气。但是她脑筋清晰异常，并时问到艺芳的教员与学生。艺芳的三位专聘的英国教员，都是她一人代为选择的。经她选择的人都是品教学萃。一位是曼珠女士 (Miss Madge)，擅长音乐；一位贾惠宜小姐 (Miss W. Galbraith)，专修英文，是西田的荣誉学生；一位顾萝兰女士 (Dr. V. Grubb) 也是西田的学生，是伦敦大学的理科博士。当然这几位都是艺芳开办了以后才来的，不过我要趁此表明李副校长对我工作的帮助。

不幸在这年（一九一六年）我们的祖母于三月中旬弃世。我们因仍在英国，故未能见到老人最后一面，真是我们最大的遗憾。我们的祖母对于我们这一辈的教育，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不但让我们出国进修，而且培养了我们一些中文基础，使我们在外国不至忘记中国文化。

当副校长李女士知道我祖母去世的事，她更加体谅，要继续瑟校长的遗志努力促成我办女校的志愿。同时巴师与我也都因为有了冯腓力先生及其妹妹的资助，学校已经有点基金，回到长沙办学找地址想也不会太难，于是我们只有恳切祈求上帝赐与我们的成功了。

十二 在英国大学时所参加的宗教运动

在英国中学时，我除了进过教堂以外，只参加过受坚信礼的查经班，对于基督教，可说没有甚么深刻的研究。在西田时，因为常听名人的演讲，例如汤朴大主教(Archbishop W. Temple)，李查先生(Dr. Richards)，庞博士(Dr. Barnes)及罗以敦女士(M. Roydon)，施特里教牧(Canon Streeter)等的演讲，渐渐思想扩大起来，对基督教与社会问题也很关心了。后来认识清教徒霍德进先生(Dr. Hodgkin)，思想更加进步，深深感到社会改良，非有基督教的精神不可。

正当我在大学第二年，欧战爆发，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英国政府因为德国军队侵入比利时，决定响应盟国，出兵援助，对德宣战。我记得在前一日，即八月三日，英国人民便聚众祈祷，恳求上帝指示，是否应当加入战争，指示英国政府是否应当宣战，圣保罗礼拜堂里外，聚了几万人。在正午十二时跪下祷告，那时围着教堂，满街满巷，都立正或跪着祈祷。这地区是伦敦最热闹的地域，那日交通停止十分钟，人民带着悲哀沉重的心情，恳切祷告。我也是在堂外的一个。我看见那种诚敬的精神，庄严的态度，规律的秩序，深为感动，认为不是基督教的精神，不能如此，这一件事上文已经说过，但它对我印象极深，因此再

说一遍。战争这个问题，真是很难肯定。为了爱国或站在正义立场，有时不得不打仗，杀人放火，做种种不人道的事。但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便应当爱敌如己。因此，等到英国宣战后，基督教中便有一小团体，出来“非战”。这些人大多数是贵格会人(Quakers)，他们的理由也很充足。我与约农也考虑了许多时候，认为(一)耶稣不要人杀人；(二)耶稣不要彼得用刀抵抗；(三)耶稣虽有大权能，并没有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撒玛利亚人；(四)耶稣没有自卫；(五)耶稣也没有因卫护弱者(他的门徒)而拔刀斗争。这样看来，效法基督耶稣，一定是“非战”者。所以约农便加入了贵格会，我虽未参加，但很同情这样的想法。

在英国有一个学生自献运动(Students Volunteer Movement)，在每个大学都有，西田也不例外。我加入了这个运动，并且去了斯王尼克会所(Swanwick)开会两次。此会每年七月或八月开一次，大学生加入的约一二千人，男女都有，男生住营篷，女的住宿舍，每日有一次大会，后分成许多小组，研究宗教与社会问题，结论后再报告大会讨论采纳。第一次我去是一九一四年七月，那时我的英文不好，也不敢说什么。大约那时战云已起，学生们也谈到战争问题。不过还希望不会打仗，所讨论的是一种理论而已。哪知几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英国初期打仗，不是征兵，都是人民自愿加入军队的。从军与信教的冲突，并不严重。等到第二年，征兵制度实行，就有所谓“良心非战者”的出现了。在西田学生会中我也说过

话。自从八年抗日战争，我才发现抗敌的意义，与爱国的热忱，真是基督徒一个最大的问题，怎样可以一方面保持博爱，另一方面不削弱爱国抗敌的情绪，到现在还是一个难解决的问题。近来美国有许多人，烧了他们的服役证，是否出于宗教爱心，我不知道，若是因为效法耶稣，爱敌如己，所以不杀人，那我还是很佩服的；若是贪生怕死，图享受，就不值得称许了。

在英国的中国基督教学生也有一个“会”，并有刊物名叫 *East in the west*。主持人为巢坤霖先生，会长胡伟德医生。每年在英国学生开会后就在斯王尼克开会，大约一个礼拜，我与约农、巴师都去过。在这里我们也讨论宗教、学术、国事、欧战等等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联络留英学生感情。当时在欧洲中国学生大半来自内地，已有相当组织，并有刊物。而留英学生，以广东人为最多，也最活泼。我们会中比较有名的除巢、胡二君外，还有梁宝鉴、梁宝畅昆仲二人，吴天保医生，傅铜，王雯、王锡韬昆仲，陈乙明，孙晋祺，周(Jimmie Chow)君等。女生则有刘大使两个女公子，胡素珍女士，何兴女士，郭凤轩女士，董女士及我七人。那时我们自称是“七人”团体，郭女士还有一个堂弟，善奏洋琴，甚受欢迎。外国来的朋友有天津的赫德博士(Dr. L Hart)夫妇，巴先生，施牧师，还有在日本传教的爱牧师夫妇，其余别的偶然来演讲的也不少。有一次龚子翊君与约农乘机器脚踏车来，要我试坐，差点摔了一交。

西田书院内，除了学生运动外，还有小组查经班，我

加入一个由瑟校长领导的查“约翰福音”班。校长学问渊博，语言清晰，道义通达，我十分喜爱这查经班。也是在这个查经班上，我对于“耶稣复活”的问题得了很多好的教训与理解。另外因要读《新约》，我也加入了一个读希腊文的新班，但是我功课多，性情又懒，毫无收获，也只好半途而废了。

除学校及巴师上礼拜堂之外，我们还邀了约农弟去贵格会开会。这个贵格会在西田附近的Hampstead草原上，风景幽美，地方清静，完全不觉得在伦敦嚣尘之内，真令人心旷神怡，有接近天人合一的感觉。这里既不讲道也不唱诗，只有大家默坐，静候圣灵的指导。有时有人起来读经，或讲话，证道，祷告等，但有时也有从始至终，没有一人做声，静悄悄的坐一个钟头。起初我很感觉静坐下来便思想紊乱，后来也渐渐的思想集中，可以专为国家个人或大战默祷。朱夫子也主张静坐，佛教更是提倡静默，甚至闭关多日，在贵格会中没有牧师、传道人，也没有洗礼和领圣餐等仪式，当然也有人讥讽着说“这种静坐不语，就是仪式”，但我还是承认当时我受益不少。何况贵格会中朋友，教育程度很高，品德也很优美，社会工作更是不可及，如英国人傅莱(E. Fry)的访问及帮助监狱犯人改善生活；福克思(G. Fox)的真诚信仰为贫民服务；郭特礼(Roundtree)的主张劳资合作，都是社会工作的开路先锋，实在令人佩服。我虽未做贵格会会员，但是心向久矣。

除以上所说的正式宗教仪式加入之外，我也常去小规

模的宗教聚会,那时我的英语已经可以通达意思了,所以常去传道,讲的多半是教会在中国的工作与贡献。那时正是欧战高潮的时候,我也常说,世界文明诸国要合作,免得受杀人灭国的痛苦,科学愈发达,杀人的工具也更精,更厉害,假如人类不能秉耶稣的爱心,和孔子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样精神,人类将要自杀,文化消灭更不必论。先前在中国山西传道,及在上海广学会工作的一位老教师,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s)已退休住在英国,我与巴师曾去拜访他,承这位老人错爱,把他自己著的一册书“中国的四百兆人”(China's Four Hundred Millions)送给了我,并亲自题名赠送,此书后面附有他自己建议世界各国合作的方法,名叫“天下一家”(The Family of Nations),里面的计划,很象后来的国联,真是学者有先见之明。可惜这本书,因为累次兵燹被遗失了,我至今引为恨事。

十三 毕业后的进修

一九一六年,我在伦敦大学西田书院毕业,得理工学士学位。那时伦敦毕业大考,不在六月底,而在十月(即下学期开始的时候)。这对一般找工作的人实在很不方便,因为要教书的人都在十月以前一定要去到差,但学位未得,又不能按时到差,实在困难。但大学也有它的设想。有些学生,学科也不十分好的,在这三个月内,可以请人补习,纵是临时抱佛脚,也不无小补。因此在有些差点的学生说

来，这是一个好办法。我的英文，总觉不如人，也就借此机会，请人补习，虽然学科学的人不考英文，但总要语言达意，文字清通才行。我的生物学(专修其植物学部分)，和理论与应用算学(Botany,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考试有八场：生物学理论两场，实验两场，算学每样两场。这八次考试，扯到差不多三个礼拜。因为不是每天有考试，理论可能在上午，那科的实验又不一定在当天下午。约农也是那年考试，但是他在伦敦大学皇家矿冶学院读的。他的毕业考试也在伦敦大学，我们虽在一个大学毕业，也同时考试，却没有在考场见面一次。可见伦敦大学之大，与考试之多了。我们都侥幸考取了，他取得比我高得多。一则我到英国比他后，二则我也素来喜欢杂学旁收，除正课之外，在图书馆内，我总喜欢翻阅别的书籍，小说、文艺、政治、哲学，甚至鬼神学，我都喜欢看，耽误了正课不少。但是回忆起来，也不后悔，究竟这些阅读加添我的学识不少。

我于考试后先得学校介绍进入牛津(Oxford)大学读英文一学期，我得到伦大考试及格的电报时，正在牛津的圣旭思(St Hugh's)书院。有人告诉我：“有一封电报给你的，插在你房门上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是考试及格的电报(巴师所发)，以为是友人约会。等到看见是考取了学士，我当然是高兴，但高兴中也带一点伤感，因为这时无人与我同乐，没有与巴师共享此乐，使我泪下。这里只有一个傅小姐(即与我补过英文的，她在牛津教历史)，与院长约女士(Miss

Jordan)是我认识的,其余都很陌生。我考试一完,就来牛津,教授只认得两人,同学也很少。我感觉她们也不见得对我的取中抱甚么兴趣,因此就只好告诉了院长与傅小姐二人,她们虽为我快乐,也不过普普通通。我那时多么的想能与巴师和约农在一起,他们不知如何的高兴快乐,要为我庆祝了。

圣诞节我回伦敦,那时伦敦已经灯火管制,也不很热闹。但是我们三个人,还请了几位中国朋友——袁昌英、杨端六、刘孝叔、邵畹堂等,邵君能玩魔术,助兴不少,既庆祝圣诞,又贺我们毕业,可真是乱世一点安慰!

春季开学,我继续读英文,及理、算、教授法等科。在伦敦师范学院(London Day Training College)及圣马利师范专科学校(St Mary's Training College)读书。这些师范生都是大学毕业后,再读一年或两年的。当时我因时时盼望早日回国,所以只预定读一年。夏天我又到剑桥大学复习植物生理学。我曾在剑桥大学纽伦书院(Newnham)读过二次暑期学校,旧地重游,甚为快乐。

剑桥风景与牛津伦敦都不同。它的书院,许多两面背着剑河(The River Cam)。上面有桥横过。剑桥的命名也许是从这里来的。每个书院的桥,建筑都不同,最有趣味的是圣约翰书院的桥,乃是照威尼斯的一道通入监牢路上的大桥的样子造的,那桥名曰“叹息桥”(The Bridge of Sighs)在剑桥这座桥却正好走进考场。学生们每每笑着说:“这真是叹息桥,我们的命运,就定在这里了”。因为剑河迂回

曲折，两岸都是垂柳，又有各学院的巍峨建筑与经年常青的草地，真是十分幽雅美丽，通称此河为The Backs(意剑桥后景)，我在剑桥曾备受龚君子翊及陈君一鸣之招待，均约农好友。剑河上也是学生划船游乐的练习所，每年五月，举行比赛一次。不是两三个船平行比赛，乃第二个船的船头要碰第一个船的船尾。若是碰上了他们便大叫Bump!。那么被碰的船便算是输了，所以五月间连接有很多的游客，更有学生闹着玩，与警察打耍架(Rag)。若能抢到一顶警察头盔，便是最光耀的事。这是与民同乐，警察也乐此不疲。

提到英国大学的考试，也可说真是荣誉制度。每个学生有准考证一份，但无相片，也不用学生的姓名，要抢替再容易也没有了。却是直到今天，大学从未发现这样的事。至于夹带，假如当场查出，当然就取消考试资格。但是我考过几十次，从来没有碰着过这种事。这不是说英国学生人格好些，主要乃是英国制度对于大学毕业文凭，没有我们的看得重要。至于理工科学生，尤其注重工厂及矿冶的实习，大学不过是做准备的初步，工厂实习二三年的学徒，往往可以得到更合适的出路。我们太注重文凭与分数了，而现在不少人读书的目的，更不是求学，而是做出洋的打算。大学毕业，可以考托福，可以去美国，考美国博士，做美国公民，赚美国大钱，不回国了。但看每年出洋学生的统计，再看回国留学生的数目，大约十比一之差，就可知道我的话不是十分荒谬的了。

我在英国读书的经验可说相当丰富，我读过小小的私

立学校，公立的中学校，伦敦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师范大学等，我虽考了研究院，却并未得博士学位，因为当时各大学，尤其牛津及剑桥，并不开放与女生。女生可以读书应考，但不能得学位，女生也不是大学的一分子。伦敦大学开放女禁最早，所以我愿意加入，与男生得平等待遇，不受歧视。但为时太短，来不及预备考博士了。

那年九月，我便返伦敦，在那里与巴师及约农等候出境许可才能买船票返国，我们到处谋船位，将近等了一个多月，才知道有一个加拿大军队及军眷回国的船，幸而我们驻英大使馆为我们谋得了三个位子。就定于十月底离开英国。未行之前，友人巴夫人（不是巴师一家）为我们饯行，正在吃饭之时，警报大鸣，我们只好都躲入地窖，还各人带了口罩，锄头和铲子，预备万一地窖口被阻塞，可以大家挖出出路。幸而没被炸中，已经饱受虚惊。我们想回国的思想自然更加浓厚，深喜得到船上的座位，也将出境及入加拿大和入美国证件办好。上船时也略查行李，并问是否为国家做事而返国。当然我们是为国家做事回国，不过可惜把我们在英国的身份证收去了，这身份证上面有我游过地方的戳记，最可留为纪念的，不幸被船上的警兵收去了。我们离开英国，是一九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十四 返回祖国途中

巴师、约农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得了三张加

拿大送军眷回家运输舰的船票。船名司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我与巴师还有一位穆女士(也是传教士),共一间房舱。另外我也认识一位恩博士(Endicott),曾在四川传过道,所以我们五人就在一桌吃饭。大家除谈战事外,便说中国的事。船由英国利物浦动身赴加拿大的蒙区阿(Montreal),共走了十天,本来不用走这样久,但因为躲避德国的潜水艇,所以迂回曲折,靠北边进行。我们的船有八只驱逐舰保护。我们全船的人每日都随身带着救生圈,两三日练习警报一次,可谓紧张之至。但是每日早饭桌上,每人面前都有一张在船上收印的无线电报纸,报告前方战争,如有特别新闻还有号外,这可证明英国第一次大战组织良好。船由北方进入寒带,天气很冷,摇簸也很厉害,我是最晕船的人,每日只能躺下,不能进任何食物,苦不堪言。已到了蒙区阿,还难过了两日,生平旅行痛苦以此为最。

我们由加拿大进入美国,要得特别许可。幸而我们在伦敦已经请施公使(肇基)办好手续,先到托朗多城(Toronto),再从那里入美国。在托城我们由恩博士的介绍参观了大学,并在赫华柯女书院住了二三日。因为他的校长杨格女士,也是西田老学生。加拿大的学生活泼天真,当我与约农与她们谈话时,她们随意发问,毫无忸怩作态,或是发无意识的问句的。由托城我们进入美国,入境之时,受了许多询问,虽有一切证件,还将我与约农压到最后,才放出海关。我们对美国人的种族歧视不无遗憾。那夜车

经过莱亚葛拉(Niagara)大瀑布，有许多人下来看夜景，赏玩月色中的大瀑布，但我们因归心似箭又受时间限制，只要到美国纽约参观几个学校，便回国，所以没有看世界的一个大奇景了。

到了纽约，去访青年会干事外尔达 (Mr. Wilder) 先生夫妇。经过很多时间，才知道他们住在新泽西，于是承他们爱心，留在他们家住数日，并拜访在纽约之友人。由聂其煥表叔及表婶介绍，初认识胡适之先生，参观哥伦比亚大学。又访陈衡哲女士，并参观法萨女子大学 (Vassar)，陈女士后来与任叔永先生结婚，在北平任教，我每次到北平必要去拜访他们。后来一九二九年在日本西京开太平洋学会，我也与她长谈数次。尤其是在我先父去世那一日 (阴历十月初十，) 我并不知道此事，只觉心神不安，连日本皇帝次日的宴会也不参加，反而在那夜竟麻烦她谈到夜间两点钟，古人云至亲之间精神交感，大约是有点道理。

从纽约我们再去加拿大坐 C. P. R. 铁路到温哥华，转乘亚洲皇后号海船回国，在船上除同行穆女士，还遇着去长沙开湘雅医院的颜福庆先生。谈及南北战争，十分慨叹。在此船上，有一极令人不快的事，有两位去俄国女青年会的美国小姐与一位中国女学生同舱，不幸这位中国女生晕船得厉害，每日呕吐，这两位美国小姐嫌她，定要她搬出去，事情弄到船主那里去了。船主说“这位中国女士有船票定位，怎么可以由你们随意要她搬出来，况且晕船的不止她一人。”这两位美国女士竟说她们不能与有色人同住一

处！最后还是我同颜先生劝中国小姐让步，搬出与女侍应生同住一室。事隔半个世纪，但至今美国人的歧视非白种人，尚未完全改善，真是一件大不幸的事。

船到吴淞口外，我远远看见中国海岸线，回想到离开祖国时（民国元年）满心的希望，现在回国不但国势没有好转，反而南北纷争，并且我们最爱的祖母也已去世，不觉热泪交流，无法制止。乘小火轮到上海虹口码头，就有聂云台三表叔派车来接。我们到聂府承姑母及各位表叔婶姑的招待住了十天。也到俞府拜见姑父母及表弟妹等。六年远别，说不尽多少离别重逢的忧伤喜乐。巴师初次住入中国大家庭——聂府——增加了不少见识，因为她以前传教的对象都是平民，后来办学堂，又自成一个单位，能看见一个大世家人家的和睦，子弟晨昏定省的规矩，敬老慈幼的态度，使她感觉中国文化的伟大，也加添她爱中国的心情。

后来我们又到俞府，那时我的姑丈——俞寿臣先生——与姑母，正因家中丧亡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极其伤心，见了我们也很欣慰。大维表弟正准备去美留学，另外几个表弟表妹都在学校念书，他们都进了教会学校，但对于基督教都不感兴趣。也许当时的教会对于中国一般民情习俗，社会问题，都太隔阂之故。大学校如圣约翰，沪江，金陵等，都不如北京大学的提倡新文学运动，或如当时的东南大学的研究旧文学，两校互相对峙，各有精彩。教会大学总未免偏重英文及泰西史、地、科学等，对于介绍新知

识虽有不少贡献，但对于中国历史风俗，传统的文化不免有疏漏之处，因此普通教会大学的人材就不易左右中国的思想。近来各教会经历了一番大风暴，乃有改革的办法，这是可以欣慰的。

阳历十二月下旬，我们离开了上海坐船回湖南，哪知到汉口之后，因为湘河水浅，无轮船可坐。幸有汉口吴主教(Bishop Roots)愿意招待留我们三个人在汉口圣公会暂住等船，住在拉牧师(Lassalle)的家中，记得好象过了圣诞节，才坐小火轮拖船到芦陵潭。小火轮不能再上去，只靠拖船撑篙摇桨走上水，一天一夜才到长沙。船上幸有颜福庆大夫及陈友古先生谈话，可以解闷。到了长沙，我的父亲与七叔父母都住在文星桥，房屋窄小，人口又多，所以巴师不能住，只好接受循道会任修本牧师(Mr. Warren)夫妇的招待，住在他们家里。我同约农停留二三日，就雇一只小船，溯湘水上湘乡。这船小得很，只有一间中舱，后面板壁隔住船家煮饭的小舱，前面与船头就只好用自己的毯子挂起来，与船家分内外了！由亚细亚皇后那样大船——可坐二千余人——到长江轮船，到小火轮拖船，到这样的小划子，可说是一落千丈！但我归心似箭，也不觉得痛苦。三日后，到湘潭，进了伙铺，住了一夜，第二日雇轿回老家。那夜在花石歇了一夜。那伙铺子真是又脏又臭，又有臭虫，一夜不能睡觉。次日清晨，我觉得今日就要看见离别多年的慈母了，心中感激快乐，不觉唱了一首赞美诗。约农在隔壁，大为诧异，因为他看不出那个脏环境，有何可赞美之处。

由花石到我们老家约八九十里，如起得早一日可到。顺路先到五婶家中，在杨家湾，约农老母卧病在床。见了约农与我，自然悲喜交集，母子相对垂泪。五婶不要约农住在那个小小田庄上——她老人家嫌富厚堂嘈杂潮湿，喜欢那小庄干燥，就搬出老屋，但要约农住老屋，寄食我的母亲处。因轿班在等着，所以我们略坐，便由杨家湾到富厚堂。进东宅门时，家人大放鞭炮欢迎，神堂上灯烛辉煌。那时约农尚未信教，我已受洗，所以我只在傍边侍立，他却叩头上香。我见了我的慈母苍老了好多，但小弟昭桦活泼聪明，也不禁悲喜交集。我们想到祖母去世已一周年多，我们受她老人家的恩泽，真是一言难尽，今日屋在人亡——祖母房中的陈设家具、书籍等等——照旧。我们看见，不禁悲自中来，我母亲更是涕泪纵横，立刻要我们去祖母的坟畔，吊祭一番。好在坟莹就在对面山边，不过十分钟步行，便可以到。我们即刻走去凭吊行礼之外，看见有一个墓庐小屋，住了一家姓赵的管坟人，也有个小厅房，中排长凳，乃是七叔用来传道之所。祖母坟斜对富厚堂，颇有老人倚闾望子之想，令人追思老人的慈爱不已。

我因想办学校，又因巴师在长沙，乃与母亲说明不能在家中过旧历年。便在腊月初旬离开湘乡老家。约农却在湘乡侍奉他的老母——我的五婶。我带一个老妪，一个家人坐轿到省，未坐小船。三日到了长沙。早已经与聂六叔——潞生——通信，借他的落星田房子，楼上二间，我与巴师暂住，再找长久住宅开学校。

十五 创办艺芳女校

“艺芳”二字是先祖母的馆名，前文已经说过。先祖母对于我们的教训也已说过多次。所以我们决计用艺芳二字来做学校名字，并且取孔子所主张游于六艺的思想，计学生六班，即以礼、乐、射、御、书、数六个字，依序命名为礼字第一班御字第一班等等。

民国七年二月到了长沙，先在聂府住了四五月，那时萧表姊孝徽也从衡阳来长沙，帮助我与巴师到处看屋。最后看到西园龙翰林家，正好美领事搬出，我们便照他的租约订约一年。此屋是中国旧时老房子，两进七开间，兼西花厅一个小三开间。于是我与巴师住了正屋下进东边三间，西边三间作为教室，后面萧女士住了一间，女仆住一间。上进东西六间均做学生寝室，厢房作浴室，下进回照房做饭厅会客室及学生阅览室。厨房远远在外。另外小花厅三开间即与我母亲约农及小弟等全家居住。规模虽小，倒也井井有条。当我初到上海时，聂云台表叔要我在上海接办启秀女子中学。杭州圣公会也欢迎巴师与我回杭州冯氏女学校，但我们都觉得海边省份容易找人，而长沙内地，不易找留学生服务，因此都婉谢了。现在居然看到艺芳有屋，很感欢喜。西园规模当然远不如上海杭州，但是正合我们心中所意想的中国学校。

不幸的是那年六月初约农母亲——我们五婶，由湘乡

下省，初八那天晚骤然在平塘发了心脏病。约农差专人由平塘送信，初九日信到长沙，要我找医生去治病，平塘是文正公葬地，离长沙三十里。我与杨医生赶到时，已是下午三时，五婶已于当日十二时去世。当时天气热，幸有二叔履初先生及李五舅杏岑先生在长沙帮同治丧。五叔也在北平赶回，就葬五婶于平塘文正公坟旁山上，也算有归葬祖茔之福。不久五叔回北平，约农弟留在长沙守制修墓。于是我们便邀他帮办艺芳。约农本来是学矿冶的，开女学堂未免用非所学，然而当时南北战争，农村紊乱，我父亲有矿山地契一箱，并且为买矿卖去田数百亩，都毫无开发机缘，即令从事矿冶，也只好教课，所以约农在艺芳教书也不算太委屈。在我们得了他真是无价之宝，因为他知道我历年的计划，又勤快好动，能拟稿、起章程，加上有二叔履初先生认识长沙绅士。于是我父亲、二叔、七叔与准商公所接洽，取得文正公祠房地为校址。先在西园由我们四人，巴师、约农、萧表姐与我买家具，印章程，做书桌黑板、学生衣柜，购买学校仪器书籍。于八月内招生，先办大学预科及英算专修班。

校董会之组织由先父，二叔及七叔邀请。董事会中最出力帮助的有朱菊尊、汪颂年、王莘田、龙黄溪、史春霆、俞秋华、曹籽谷，钟显荣、马惕吾、胡子靖……诸先生。申请在教厅立案。民国七年阳历六月初五批准后，于九月十二日在西园龙宅正式开学。计有英算专修生五人，张纯士、柳演仁、黄斌、陈嘉和表姐萧孝徽（表姐并兼舍监及

总务)；大学预科四人，龙沅、王传绮、曾宝衡，及张孝钧。巴师情愿做教员教英文，让我做校长，以一个高龄外国人愿在一个中国少年人而且是自己的学生之下做事，恐怕是第一个了。约农做教务主任兼英、算及理化老师。我也教英文生物，任牧师兼点英文，另外二家叔及李慧芳先生教国文，青年会之费雅师母(Mrs. Veryard)教音乐，何小姐(Miss Horjen)教体育，黄国厚女士教手工。总算教学慎重，因为学生只有八个人而教员倒有九个人。此时的艺芳除正课外，还请过几次名人演讲。后来我们成了定例。每礼拜五下午，一定请一位校外名人作专题演讲，学生得益不少。另外每礼拜六，我自己必要有一点钟的时事演讲，世界，本国，本省，或社会大问题，如欧战，五四，五卅等事，学生可发问及讨论。这些都指导学生观念不少。

巴师是一个最好的基督徒，且极爱护学生，并且很悦纳我们的建议。比如我们建议不可记学生的过，不可当堂叱罚学生，不勉强学生去礼拜堂，礼拜六课后至礼拜日下午五时，学生可以回家住……等等都是与教会学校不同的地方。艺芳崇奉基督，但不隶属任何教会，她很能了解接受，而且以六十老人与中国学生同吃中国饭，同甘共苦，真是难能可贵之至。

一九一九年春天，正值五四运动，那时我们的专修班已有第二班学生了，是唐冰瑜、颜兰禧、俞辉、夏秉恒、钟贤钧，预科班也加了粟翼明、曾长善、钟贤淑、柳敬常……等。这些是最早的学生，也最知道学校创办的艰苦，

师生之间的感情也特别厚。我们对于五四运动有很合理的反应，我们组织了抵制日货十人团，直到抗日胜利才散。

十六 艺芳迁入浩园

长沙曾文正公祠是用清朝皇室赐祭银三千两，及门生亲友祭奠银四五千两，其余由监商捐助建成崇祠。在长沙小吴门正街，度地广袤约百亩所建造。

祠堂外面有一大坪，为轿马停歇之处。正门朝南有甬道，直达正殿。两边钟鼓亭，正殿上有文正公神位，神龛上有“以劳定国”的匾。是翰林汪诒书所补写。其余匾额对联，都因为数次兵燹，荡然无存。大殿东边为思贤书局，内有客厅、船厅、藏书楼。西边为思贤讲舍，秀才们可以读书，也有山长讲学。后来由郭筠老（嵩涛）与先惠敏公商量，供王船山（夫之）的神主于思贤讲舍，当时清廷不许王船山配享孔庙，因为王船山种族革命思想甚深，所以连他的著作也视为禁品。船山的遗书乃是由文正公在江南传忠书局所印，也只有文正公因有挽救清室的功劳才敢印。因此惠敏公与郭筠老才想到把王船山配享曾文正。

文正祠正殿后面，有一花园名曰浩园。由正殿后门出来，便看见一带青山，山后有一个大池塘，大约广袤十余亩，成曲尺形。长边狭仄，抵思贤书局。短边宽大，尽头有一八角亭，久经摧残，匾额已不可考。曲尺转弯处有一玲珑石山并小石桥。石山上有一茅亭，题曰“存朴亭”。由

存朴亭下来，沿着石砖路，便到八角亭。八角亭南原来作为生员宿舍，迤东便到了“听雨轩”。此处楼台高耸，为园中最高处，可以看见城中风景。再东为回廊及石山小径，直达思贤书局，路上也可经过一大石桥，至正殿后厅。沿途花木竹树，极为美观。每年五月五日，仍照老例开放浩园一次。

民国八年五月，我们靠湘绅的力量，把北军退出浩园，我们急快搬入。那真是断井颓垣，危楼废阁。我们一面修造房屋，一面安置设备家具，聘请教员，招考学生。此时船山屡次阻工，与我们的泥木工人械斗，几经波折，才勉强修成。艺芳各建筑，均以池塘为中心，环绕东、北、西三方面。东边有厨房、饭厅，由走廊直达思贤书局——后来成为我们的小学部。北边有大门，内有门房及教员宿舍。进二门有校长室、教员室及教室到“听雨轩”。听雨轩下层是舍监室，图书馆，巴先生书房。楼上二层为教员寝室，三层藏文书家具等，也可用来眺远，日朗天晴时，可以看岳麓山。南边有一小山，山后是祠堂正殿。

由听雨轩往西，有教务室，教员寝室，及校长寝室等。再西便是原来文正祠生员住宅，后改学生寝室的大楼，楼上楼下均是寝室。此楼正对八角亭。由八角亭走过一花棚长廊，便到了坐西朝东一座大楼，楼上楼下都是教室。面对小山，楼外北有球场，东有跑道、操场，也就是正殿的后面。在正殿未被驻兵或船山强占时，我们用正殿作礼堂，每早有礼拜，每礼拜日下午有唱诗班，其余开会等均在此。

以上是艺芳全盛时代之景。

船山学社——即原来思贤讲舍——民国九年经湘绅汪颂年、朱菊尊、王莘田、龙萸溪、曹籽谷、史春霆、俞浩庆、胡子靖……等及老革命党人邹价人、周道腴、姜咏洪（当时长沙县县长）……等调停，筑砖墙以为社校分界之墙，暂时可以恢复开课。

浩园风景优美，为长沙城内最有名的。我们除了栽花植树之外，还预备了两只小划船，学生练习摇桨。内地会的毕庆爵士（Sir M. Beauchamp）说“这些小划子，是可以航海的，因为它很坚固安全”。我们也利用浩园的风景，开过“游园会”、“纳凉会”、灯会等等募捐拯灾。一次是新化蓝田等处的旱灾，一次是长沙水灾，一次是湘西水灾。每次均由学生自动设计，把浩园池塘照杭州西湖点缀，有湖心亭，岳王坟，苏小墓，孤山，五柳居，退省庵……等等名胜。学生销票一丝不苟，奔走车钱自掏腰包。所以每次捐款，都以艺芳为各学校捐款的第一名。有一次——湖南旱灾，艺芳捐款，仅仅次于省政府所发救济金，而那时的艺芳学生，不过百人。基督教的精神，救人济世可说完全做到了。

我们并非商业学校，但是学生却开了一个小小的贩卖部。同学可以加入股份。贩卖部卖文具用品，和学校许可的食品。学期终结账，分发股东红利。日本侵华时学友会组织一个十人团，抵制日货。所以价钱低廉的日货，不能推销。已有的日货，亦须十人团盖印，才能用，因为节省

家长的负担，大件如被帐等都是家中旧物，不必再制，只要十人团盖印登记，而该学生应许不再添制日货，就可以了。

关于学友会，我须略为补充讲明，学校在西园龙宅时，正值“五四”运动。我们便组织了一个“艺芳学友会”。这会包括老师和学生——每人都是会员。不过干事会只有五人——会长、书记、会计与干事二人。这五个人都是学生。艺芳行初高中六年一贯制，初中第一年第一学期，是学习期，不能选入干事会。六年级二期（高中三年，第二学期）是将毕业的学期，学生须准备联考及考大学，所以学校许其不必加入干事会。因此干事会只有五人，便相当代表各年级，干事会每月开常会一次。大会每学期开两次，一次选举干事，一次结束会务。如有特别要事，可以召开临时大会，师生一堂研讨。这个学友会对艺芳有很大的贡献，对于学生有最好的民主训练。因为老师学生每人都只有一票。假如学生有要求学校改革的事，须得大会两次通过，且两次的时问须在一学期以上。例如更换教员，加减收费等重要事，便适用此规定。成立学友会时，曾经很慎重地制定组织法，我们称它为学友会的宪法。上项规定，便是依据宪法订的。

十七 艺芳的组织与学生的自治

艺芳的组织与各学校大致相同，有董事会、校长、教

务主任、训导主任、总务主任，及各专责教职员。所不同的是，如上文所说有一个艺芳学友会，全体学生与教职员都加入，而校中大事的定夺，在这个会。不但校长教员不能勉强，就是董事会，也不能勉强。可以说实在大权操之于学生，因为学生人数占学友人数绝大多数。

学校得教育部许可为六年中学一贯制。初中不毕业——但学生如要转学，可以给她转学证书——四年级可以插班，收外面的初中毕业学生，五六年便不收插班生了。一年级招生，不超过三十人，等到四年级，即使因为有离校学生而补入插班生，也决不超过三十人。因此到六年高中毕业，人数很少，最多不过二十四五人，至少到只有九人。学生一律住校，每日三餐，师生同在一个食堂，见面特多，自然亲切，有如家庭父母子女。学生有小疾病，由学校校医免费治疗，但如有重病则由学校通知家长商量医治。

训育工作由师生分任，各班举班长一人，每寝室举室长一人，分任指导与劝化的责任。如有一同学不能听从，可以告知训导主任，再不听从，则训导主任告知校长，校长亲自与她个别谈话。艺芳从不记过，不开除学生，但经校长一番劝导，没有不改悔的。功课不好的学生，各科教员亲自为她们补习，甚至校长也亲自补教，绝不收补习费。我有一个学生，算学极坏，经我自己给她补一学期，后来是算学最好的一个。另有一个学生，在长沙各女学都读过，每次闹事出来。而她的父亲，是长沙一个有名学校的教务

主任。她到我们学校时，由她父亲送来，对我说“只要曾先生能把她在贵校毕业，我就感激不尽了”。第一个礼拜，有一天夜晚，我就请她来谈话，我告诉她“无论有何不满意的事，不管与同学、老师，甚至家庭、经济、或婚姻有关的题，都可来和我讲，我一定站在你的角度，同情地与你解析”，我要她答应我，“如发生你不满的事，先同我商量再取行动”。她答应了我。果然在三年读高中的时候，只与我谈了二次话，均满意解决，直到毕业。此学生是湘潭人，一九四九年夏天毕业。那时长沙已经乱轰轰了，我要同学人人回家，而这个同学坚持留校三日，为的要送我上飞机离开长沙。师生感情，有如此的深。

学校规矩，每日六时起床，七时早餐，七时三刻礼拜，八时上课，上午四堂课，十二时半中饭，饭后休息一小时，二时至四时再上二堂课，每日只六堂课，下午的课多半是科学试验、音乐、手工、图画、体育等不太用脑力的课。每礼拜六第一节课由我讲论时事——世界、本国、本省——的要事。每礼拜五下午请名人演讲——讲题包括文学、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使学生多得课外常识。学生的学业成绩，若用升学考试来衡量，可说极好，因为高中毕业联考，我校是百分之百及格；考大学，考出洋也是百分之百的成绩。最好还是学生读书的精神。夜间自修，不要先生监察，考试也不要监场，决无夹带，枪替，或私相传授的举动。至于普通生活上，也做到抽屉不要锁，园中花果不乱摘，别人的东西决不擅用。不是艺芳没有出过失物的案

子，有过两次，都查出来了。而且那拿东西的学生有一个痛改前非，有一个自行告退了。

有一次，一个四年级学生失去了一只金表，报告好几次，都没有人送回。于是学友会召开临时大会，有人提议“搜查”，我极力反对，同学中也有反对的。因为搜查，可以有坏人“移赃好人”的危险。但学友会通过要“搜查”，校长也无法禁止。我便将各班同学召集在大礼堂。然后由训导主任、学友会会长、干事一人及被查学生本人，拿她的箱子钥匙——若是锁好的箱子，去开箱搜查。我在大礼堂讲台上讲故事与众人听。我讲了些中国故事，如聊斋上的“王成”“劳山道士”等，也讲了些外国故事，如纪柏林的“失去的光”（Kiplings the Light that Failed）及戴华（M. Diver）的“报复”（Requital）……等等。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心平气和，同学中那些反对搜查的，本来很不高兴，也都不作声了。恰好听得出神之时，忽有工友来报告“金表在垃圾桶内寻到了！”于是皆大欢喜，也没有人追问了。我想那金表很少可能是偷去的人怕搜出，丢在垃圾桶内的，因为时间不许可，因此可能是扫地时，工友不小心，扫出去了，也可能学生们自己吃零食时，纸屑果皮包住，连金表一起丢了。总之，从那以后，没有失过东西。尤其大众听笑话故事时，把气氛和缓下来，大众嘻笑的再上课，将一天大事，化为无事。这就是艺芳师生合作的精神，也是艺芳的民主精神。

因为艺芳人数太少，体育竞赛，就差得多了。那时长

沙以“周南”和“一女师(古稻田)”体育最好，艺芳不能与同日语，但是艺芳有体育家的精神，屡败屡战，从不发“输”气。

学生对于学校财政可以过问，每两个礼拜，可以查学校的伙食账一次(那时因为人少，没有由学生自办伙食)，每学期也可查学校财务账一次，出入对照，可以看出学校收入的学费、膳费、杂费，远不够学校的开支。其中尚除开巴师、约农、萧女士与我不受薪水，外国来的教员，由国外友人支持，也不支艺芳薪水。因为如此，所以不敷尚不太多，而学生的杂费，每每还有多余的退回与学生(学生每人每学期缴学费二十五元，膳费二十元，杂费十元，均光洋计算。杂费包括电灯、炭、文具等，多退少补，中途退学，只退膳杂费，学费不退)。这样学生对于学校财政，很清楚，也很信任。

十八 五四运动与艺芳

上文说过“五四运动”，这个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它的起因实在基于爱国——不愿把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利权让于日本，因为我们本是加入联盟国，大家抵抗德国的。而联盟国反倒偏袒日本。因此北京大学学生发起反抗《凡尔赛条约》，驱逐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示威游行，北京各大学群起响应，连各大埠商人，也罢市为学生后援。各省大中学校也不例外。那时艺芳，仅只一岁大的

学校，学生不到二十人，但也不因人少而不参加，于是学友会决定除开不游行以外，要做点积极的事，不可只有五分钟热度。那时全国发起抵制日货，成立提倡国货的爱国十人团，艺芳师生一共成立了三个团，大家立志不用日货，只用国货，不坐日本船，要等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改变，才能解散十人团。每团举团长一人，执行职责，把学生已有的日货都登记过印，可以继续使用，以后不能再买新的。我本来有的日本物件不多，不过也有两三件夹衣里子，是日本洋布，也归学生印过。每学期抽签抽查一次。调查有无添置日货，当然抽到教员、校长，也是一样检查，可见艺芳的民主精神和法治作风。

有一次，有一个学生的新帽子的里子是日货，被团长查出来了，经团员通过，要没收或焚毁，那个团长十分谨慎，剪下帽里绒布一块然后拆下帽里，当众焚烧。当然那个学生十分不快，礼拜六回家告知家长。这位家长大发雷霆，到学校问罪。十人团团长便说“我们早已告知了某某同学，不可买新日货，她违章买了，原定要烧，只好烧了”。那家长便说“你可包你们同学没有一个有日货么？”团长说“任凭检查，连教员，校长都可检查。”那位家长毫不客气，在学生寝室内到处查看，并看了几位教员的衣服，果然凡是日货，都是旧的，也都盖过十人团的印，这才悻悻的去了。艺芳十人团一直保持了三十年，直到日本投降后，方才解散。

我们的学生对日本政府侵略中国的政策，虽然积极反

对，但对于日本的人民都很表同情。民国十二年九月日本东京大地震，学生们自动捐救济款五百余元，托基督教宣教委员会的霍德进博士(Dr. Hodgkin)带去日本。并且请霍博士询问，在日本有没有同我们一样，秉基督爱敌的精神的学校。如有，我们愿意与他们通信，让他们得知我们热爱和平的精神，与他们军阀恶意的真相——因为当时日本军阀蒙哄日本人民，极力的宣传中国如何仇日，去刺激人民的仇华心理。但是不幸霍博士竟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学校，也许是日本政府不容这样一个学校的存在。

对于新文化运动，学校老师，两方面都有。有的绝对主张读文言文，有的说“初中可以读一部份白话文”。我们初中学生作文，大多数用白话，但高中就都用文言，直到民国十七年以后，才文言白话都可用了，学生响应新文化，办了一份杂志，里面包括各样的材料：有文章，有诗歌，有小说，有笔记……等。我记得还是熊秉三先生给它题签“艺芳杂俎”。这个杂志每学期出二次，但不幸学校被毁三次，已荡然无存了。除此外，学生偶然也出过壁报、漫画，及各种游戏文章，但都思想纯正，富于文艺及幽默感，很受同学及师长们的欢迎。

学生们也极关心时事，民国八年秋，张敬尧督湘，要大大开放湖南米出境，每石抽税一元。那时正是湖南自己也有水旱灾情，民食不大充裕，所以各界发起请愿，不要放米出省。学生也不例外，艺芳学生与各学校学生联络，群起包围省议会，用意在使用到会议员无法半途逃席，一定

要得到代表多数的决议案。从中午直到下午七时，饥、渴、倦交并，很多其他学生都走了，唯独艺芳坚持到底，直等议员们说“你们回去吧，他们都走了（按：都由某些不认真的学校所看守的门溜走了），我们总尽力而为，禁米出境就是”。但不幸并未发生效力。

艺芳便改变方法来唤起社会同情。编了一个戏剧，名叫“绿波恨”。剧情大致是说一个米商的女儿，名唤“绿波”的，多次跪劝她父亲，不可放米出境接济日本人。后来又邀同学去沿街苦劝商人，不可损己资敌。他们用各种方法去说服。不幸被一汉奸设计将绿波害死。最后她还手持劝商人的信件不放。这样总算感动了有些商人，停止与日本人做生意。这戏的大意，当然也是讽刺当时的张督和有些奸商的。戏的台词及节目编织，当然也不能说很好，却完全是学生自动编写的，并无教员帮助。编剧，所有导演，道具，灯光，都是学生负责。而且学友会每人得推销票最少十张，我们做老师的也不例外。所得的款项，作为十人团救灾的费用。学生们不但所销的票价涓滴归公，连自己坐车的钱——如借道具，买用品等——也不肯用公家的钱。

浩园风景优美，长沙城内可算第一。学生们曾利用浩园扮作西湖，酌收游园费用来赈济湘南旱灾，湘西水灾，游园的入场券也是每人推销若干张，毫不自私，完全交与干事会。我至今想起，少年人真正可爱，我们收票的人，是小学生，进门时，连自己的父母姊妹兄弟，也毫不放松，一定要每人一票，才能入园。如中国每人都有这样公德心，

则中国要富强安乐，有何难办？

从民国十一年到十六年春，艺芳的外籍教员有顾女士(Dr. Grubb)、贾女士(Miss Galbraith)、曼女士(Miss Madge)、孙师母(Mrs. Gibson)，中外教员相处很好，至于巴先生更受尊敬，学生们都与外国先生很合作，她们也与学生们同住在一块，同在一起吃饭。

十九 四八节

五四以后，长沙有毛泽东、邓演达、郭亮、柳直荀等，在文正公祠西边的思贤讲舍开办了一个船山学社。民国十五年秋季，民军北上，有俄国顾问加拉罕、鲍罗廷等人到了。船山分子把艺芳与船山中间的墙打倒，日夜出入浩园，不能禁止。并且有一笔名“短棍”的人，每日在《湖南日报》上痛骂各校校长。艺芳当然更受诋毁，出有打倒艺芳专号。我看见我本身是众矢之的——身负土豪、劣绅、地主、封建余孽、帝国主义走狗……等等罪名，便想如果我本身辞职，或者可以保全学校，就在一九二六年寒假时，宣告学生，我要辞职保校。学生起初不肯，经过我再三说明后，便由校友会组织了一个“校务维持会”，聘了国文老师李碧棠、数学老师言自芳加入维持会，聘我及约农为顾问，以备商讨校事。我又告诉学生，明年情形一定更不好，同学中如有暂时愿意退学者，也可以回家静候。因为我校已失窃几次，与船山学生又械斗过一次，由警察解散，所以不

能不慎重。

果然第二年(民十六年)，长沙各校学生不是开会，便是游街，不能上课。店家十有八九关门，大街上一片凄凉景象。三八妇女节早几日，就有学生联合会人来说要各校全体出发游行，我们学生不肯答应。到三月七日，我们开了学友会全体大会，那天到了教职员十五人及全体同学。由学生陈某某女士主席。当时众人言论激昂，都不赞成参加。有一位教员先生说：“我们不必自去，只要有几个工友去，打起艺芳旗子也就可以了，这样或可保全学校”。但有一位学生任承华女士说：“我们从不参加，这一次也不例外。并且‘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我们是真心认为游行与妇女利益无关，又何必装假。充其量，他们不过封闭我们的学校，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结果任生的提议全体学生通过，只有教员十几票反对。教员是失败了，但是艺芳学生的自治独立的精神成功了。

十六年四月八日(星期五)，我上午照常上课(我仍是一名教员)，下午因头痛目眩上楼休息。约农仍在办公室做事。忽然来了两个人，要会学校当局，既无公文，也未着制服，只说“我们是农民协会的人，来接收你们的校址，你们的学校已经由政府封闭了”，约农当然不退让，便说“你们把教厅公文给我看”，他们说“人都来了，还看什么公文！我们限你们两小时出校。”果然就进来四五十个人，每人手拿一支“梭标”(是一根五尺多长的竿子，顶上安上长约六七寸长的铁尖刀，可以用来刺人)蜂涌而入，一面四

处跑，一面大喊学生出校，稍后便来了不少荷枪实弹的兵丁。此时学生便鸣钟开紧急大会，同时因怕我受伤，便由学生任承华与曾××护送我步行出校。

紧急会仍是学生教员联席会，由约农报告学校已经被政府封闭的事。学生激昂慷慨，有的说“决不出校”，有的说“去请愿政府，努力挽回”。这时梭标队和枪兵站在会场门口，环立虎视。我知道学生的性情，便写了一个条子，叫人送去请约农报告学生：“务必于天黑之前出校，不可做强，致生惨案，作无谓的牺牲。”学生得了这个信，又见此时人越来越多，除梭标队、步枪队之外，还有来看热闹的人及街上老百姓，乱哄哄的不下一二千人。于是决议自动解散，把毛笔大书特书“艺芳精神不死”在墙上，把玻璃器皿都打碎，连梭标队的人也说“你们有这种精神，一定要回来的，何必要捣毁东西！”此时军队准学生拿自己的东西出校，但学生都为学校抢文件器具等而不拿自己的东西。学生站成两队，由舍弟约农领队，三舍弟昭权殿后，整队走出校门，口唱校歌，并放万字鞭炮送行。

当夜我的学生徐君谭君便到去汉口的小轮上占了两个位子，未到天明，就要我们上船。我们一行廿六人离开了长沙。我们到上海在聂府及俞府小住，拟去庐山。那时巴师与顾贾二位先生已在上海，但英国的领事，不许他们去庐山，我与约农去庐山稍为休养。不幸巴师因见学校惨遭封闭，中国又紊乱异常，心脏病突发，等我与约农赶到上海，她不幸已亡故，她一生为艺芳计，竟未见其恢复，可悲可

恸！她的墓地在上海法界八仙桥。

二十 出席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会议

在我做艺芳校长时曾出席四次国际会议，一次在本国巡回演讲。

第一次是一九二八年春季的世界宣教会会议，地址是耶路撒冷的橄榄山，时间是四月份耶稣复活节。参加此会的有百余个地区单位。我国代表约二十余人，代表团主席余日章先生，参加的代表有在中国各教会的领袖，其中与我接洽较多的，除主席外，有赵紫宸、诚静谥、衣兴林、李天禄、韦卓民、谭沃心、陈马可诸先生，及郑章成夫人与蓝女士(Miss Lambeth)。我们由上海动身，在船上开讨论会，研究出席提案。船经香港、新加坡、哥伦坡，到埃及国波赛港上岸，住开罗约两日，得参观埃及古迹、金字塔，及古法老——帝王——的墓道。数千年前，在沙漠之中，有如此的建筑、雕刻、金银手工，真是了不起的文化。

我们半夜坐火车，轮渡苏彝士运河，夜间异常寒冷，这是沙漠区的特性。次晨到耶路撒冷。那时巴勒斯坦尚由英国代管，耶路撒冷的主教英国马英士(Bishop Meiness)招待了我与余日章、赵紫宸、诚静谥诸先生及郑夫人午餐。马主教的姑母，曾认识先伯祖惠敏公及惠敏夫人与五叔敬谥公，六叔君和公，大姑母福秀，二姑母宝秀，所以主教与我更有友谊，席上谈及前女皇维多利亚时的故事，甚有

趣味。

在大会两礼拜中，最令我难忘的是“受难节”前夕。那夜月明风静，大会主席穆德博士(Dr. Mott)带领我们下橄榄山，进入客西马尼花园。起先由主席读《圣经》，提及耶稣入园祷告及被犹太人出卖的事，后来大家沉寂默祷及追念耶稣的痛苦，再后又有几个领袖祷告，然后唱诗，迈步上橄榄山。山上会所乃是德皇维廉第二的行宫，曾经富丽堂皇。自从大战后又经过一次地震，也就狼藉凋零了，但是规模尚在，堡垒依然。我们住在这里面，自然感慨一代枭雄的没落，战争的可怕，与耶稣爱心的必要。再次日复活节，大家同领圣餐，数百人携手同唱离歌，依依惜别，表示只要有耶稣的爱，不分国界、人种、语系，全世界可以如兄弟姐妹一样的相亲相爱。

会后，我到意大利会老友曼珠，又到日内瓦，与青年会接洽，与余日章同去英国，余先生不久去美国；我在英国访友与传道，等到六月底才与赵紫宸先生同船回国。我们二人，都喜爱中国旧诗，所以在船上四个礼拜，随意唱和中国诗很多，因为没有存稿，现在都不能记忆，好在也不过是当时写景怡情的小品，聊以自娱而已。

第二次我再出席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会议是在一九三八年冬季的圣诞节，地址是印度南边的马得拉斯(Madras)基督教大学。同行的有赵紫宸、刘廷芳、诚静治、杨永清、郑少怀、蔡女士……等，我们因为正是抗日时期，筹备困难，所以代表们都是陆续到香港的，路上也很少预备。到

了哥伦坡，还受了一个小小的困扰，因为我们的护照只签到印度，而那时锡兰已经独立，哥伦坡是他的港口，没有签证，不能上岸。幸而我们中间有几位有口才的学者，上岸把海关说服，才能上岸去住男女青年会。次日上火车，通过锡兰岛，转轮渡往南印度。

基督教大学近圣多马山——传说多马来印度传教，所以印度在传教师未来时，便有许多基督徒，他们的名字也是基督教内的名字，如多马、彼得、马太……等。此次大会，比上次人更多，除一般新教徒外，有希腊正教的神父及信徒的参加，可谓济济一堂。后来在重庆由飞机到印度的，有吴贻芳校长及金陵大学的几位教授，都加入了我们的代表团。大会每日有全体大会一次。其余均是分组讨论，我加入了文化教育组，有时也加入妇女问题组，从耶路撒冷到马德拉斯出席两次世界会，我看出有两个重要目标：一个是物质文明不能离开宗教道德；第二是以前传教的都不免看异教为大敌，近来印看出极端的唯物哲学才是宗教的大敌。

大会中除开会外，我们还有些会外活动，在印度社交及旅行中我看出几点印度的困难：（一）印度人种不一，语言不同（不是像我们中国的方言不同罢了，而是各有各的语言和文字）；（二）阶级制度很严，各阶级几乎不通往来，不相接触；（三）印度教与回教的冲突，时时发生仇杀；（四）重男轻女，虐待寡妇；（五）农村穷困、愚拙、迷信、多病；（六）贫富相差太远，穷到我们中国人不能想象。以

上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是很显著。所以甘地先生有独立及自治运动来拯救。他用力行、入狱、节约来劝化印度人，我很佩服。

我离开印度，与郑少怀先生同赴英国布道，这次少了余日章先生，令我们感慨不已，因为余老先生是为抗日战争事，去见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在美国中风的。回国后，不久就因忧国忧民，而病情加重去世了。真是教会与中国的大不幸！在英国的出席世界代表七人有非洲、印度、南洋及中国人——我与郑少怀君——都受了英国坎特白勒大主教的祝福，在圣保罗堂举行按手礼拜，典礼隆重。

我在英国，从南到北，从英伦到爱尔兰，都演讲过，多半时间与其他的代表同行。但有一次是我一人去的，这就是到冯马利女士的哥哥家。她的哥哥名叫爱得华，在英国有名的忆冬(Eton)学校教书。忆冬乃是英国贵族学校，英国皇子们与外国的皇家子弟都来就学。这里也出过很多的人才：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宗教家、军事家，最出名的字典作者约翰生(Johnson)生前就是这里的老师。在忆冬图书馆内有他的一张书桌，请名人演讲时，演讲的人就站在这桌子上头。听讲的是他们最高班的一百最优学生(First Hundred)。我居然有幸，做了东方第一女性在这桌上演讲，讲的是“中国抗日必胜”。(此事上文说过，但因为很有趣味，所以重说一遍。)

二一 在国内巡回演讲

民国二十五年夏季，我接受了全国青年总会的邀请，到本国十二个大城市演讲。同时被请的有福州陈文渊会督，沪江大学涂羽卿博士，并有青年会干事一位陪同及办理一切旅行起居等事。我们的目的是把基督教义扩大的宣传，尤其是以受过教育的人及在校中学以上学生为对象。陈博士是专心宗教问题并接受学生签名慕道的；涂博士则偏重“科学与宗教”；我就注重文化教育与宗教的关系。有此分野，所以我们三个人的演讲，不会重复。

我于开学后，离开长沙到上海，有梁传琴干事来接，住青年会总干事梁小初先生家，梁夫人亲自办菜，招待甚优。在上海略略停留，便乘车北上，由江文汉先生护送。

第二个大城市我们去的是天津。我分在女青年会居住，由张女士招待。另外三位则分住在天津东城，因为分住的原故，开会时往往不能按时集合一处。天津最重要的教育机关是南开大学，我们当然都去拜访了南开校长张伯苓博士。他白手起家，由一个寒儒而创办了南开大学，辛苦经营三十余年，使南开名满中外，成名弟子数千人，真是可佩。伯苓先生年事虽高，但精神体力都很好，招待我们参观，情意隆厚可感。另外有剑桥大学梁宝鉴、梁宝畅贤昆仲招待我们，令人回忆剑桥往事，慨叹不已。由天津我们到了第三处大城市——实在是我国最大的城——北平。

在这里我们都住在北辰宫，往来聚会甚便，我们在北平的北大、师大、青年会都演讲过。后来到了燕京大学，有旧友赵紫宸先生招待。在北平又有多年老友陈衡哲女士留宴。我的艺芳老学生，更设盛宴在协和护理学校款待我，多年不见，亲情如故，真是令人衷心感慰。这次外出，差不多每个大城都有艺芳老同学招待，可见办教育是有真的感情和意义！

由北平南下，坐平汉火车到石家庄，换车进娘子关，往第四处大城市太原进发。到了娘子关，看见真是天险，有一夫当关，万夫莫进之势，但是现在有了飞机、火箭，这样的天险，也不能完全保护城郭了。从井陘起经过娘子关进入山西数百里，一路上都是岩石嶙嶙，山上不但无树，并且没有草，人民穴居在山洞里，贫苦不堪。本来古时是肥沃之地，因为开化早，砍树也多，造成山上无土壤的现象。陈博士比此处为米所波大米（中东文化发祥地），实是不错。十月初我们到了太原。太原本身可说是富饶朴厚，有许多有钱的人，持家还是很节俭。陈、涂二位并去了太谷演讲，我便在太原由青年会干事曾女士陪同到几个女校演讲及参观山西纺织公司与晋祠风景。另外我又拜访了赵戴文先生，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们见面讨论了些佛教与基督教相似之处，他以为两者都是济世救人。耶教由信称义，是自诚明；佛教由大智启信，是自明诚，所以两者相通。

离开太原仍由平汉路南下经过武汉，再到长沙——我

们先到长沙，因后来还要由武汉去南京等地。火车夜间方到，有朱经农厅长亲自来接。陈、涂二君去青年会住，我则回家返校。在长沙逗留不过三四日，这是我们演讲的第五个城，我因为是本乡，便让陈、涂二位多演讲。学生们极佩服他们，来请签名的，不计其数。离开长沙到了武汉。我们大部份住武昌，但在汉口、汉阳也有几处演讲，所以可把武汉看做我们演讲的第六个城。这里有程其保厅长聚学生于一堂，省去过江旅行的时间，我们除开在青年会演讲外，还到武汉大学、华中大学演讲。在华中我有许多学生，公宴我于华中大学。另外我也去武汉大学会见老友袁昌英女士，杨端六及苏雪林教授等，都极尽招待的雅谊。在武汉有一件不幸的事，就是梁传琴君忽患急性盲肠炎，须立即送入医院。因此我们三个说客，只好自动东下到南京了。这是我们所拜访的第七处大城市。南京学校不如北平之多，所以我们的演讲也较少。除中央大学，男女金大之外，没有很大的集合。我倒有机会去参观了“缺口碑”的旧址及兵工厂——两件都是先文正公的遗迹。兵工厂那时正由我的表弟俞大维主持，他还带了我看了马格理的旧宅，可见当时的名将，并不守旧，而极想革新当时的风气。我们当然也参观了中山陵、谭墓。我的艺芳老学生们还在风雨中请我游玄武湖，真是风雨同舟，另外又设盛宴招待。

由南京到上海，我住在郑章成太太家，并在沪江大学演讲一次，依学生的要求，讲的是“甲午以后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这是因为我曾出席日本太平洋学会的原故。在

沪江也出了一件不幸的事，住在涂羽卿博士家的一位吴女士，忽然触电死亡，真是可惜。我们次日便动身去杭州——这是我们的第八处大城市。杭州乃旧游之地，并在女子师范及冯氏女校读过书，所以老朋友特别多，姑丈俞寿臣先生及四妹宝菡也在杭州。因此我连日除演讲外，还去探亲访友——旧友楮、汤、林、沈、程、周诸君均赐宴。我们又到之江大学演讲，之江国文系同学能作旧诗者甚多。艺芳同学有仇敬芬及谭业驯，另外湘籍同学等数人，开茶话会讨论各种问题，一时皆作乡音，均甚快意。由杭州我们仍走上海乘轮去福州。陈博士先行开道，并布置一切。我与涂博士随后赶到，福州是我们所访的第九个城市。因有陈博士先去，样样程序都很好。教育厅长郑贞文先生亲自主持开会，讨论的精神，也很和洽，是这一次旅行最有意义的事。我们去长乐示范县参观，县长王伯秋是湘人。我们也拜会了老海军将军萨镇冰先生，萨先生年高德劭，精神抖擞，请我们吃饭，畅谈海军往事。从福州出发去厦门，由尚爱物先生(Dr. Munson)陪同上船后，尚先生因事匆忙，忘记带钱，只得电告夫人电汇钱至厦门，船上认作笑谈，幸而船到厦门——我们第十个城市——就有人来接。厦门是汀、漳门户，甚为热闹。我们在厦门大学演讲一次，又去集美中学一次。厦大林文庆校长在扶轮社上赠我花一束，林校长曾译楚词，对于三湘人士，甚为欣赏，因与我长谈。后由林工程师邀游厦门蓄水池，风景幽美。在座众人谈论，也富有科学思想。

由厦门去香港——我们的第十一大城市——仍是尚先生陪去，上船就遇着风，我虽不太晕，但很难过。到了香港，便有男女青年会干事来接。女青年会郭风轩女士是我留英的老同学，所以更加亲热，后来留英同学又请我们演讲，并由郭、胡、董、王、吴诸君招宴我们，旧友重逢，至为快乐。三日之后，我们离开香港去广州——这是我们第十二个城市，也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城。我们乘了船，溯珠江而上。到第二日天明时，船到广州，忽然听见门外叩门之声，开门看时，竟是舍弟昭桦与他的朋友邓赞标先生由广西乘飞机来接我，真是喜出望外。我们同去真光女校长罗有节校长处吃早饭。我往岭南大学由钟校长夫人、许夫人、李君、谢君，招待演讲。后又到中山大学演讲，并由友人陈天倪、曾星笠、黄润科、邓平标诸君及舍弟昭桦招待同宴。中山大学中文系，甚重中国文学。告白等文，多属文言，亦一有趣之事。

二二 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

上面说到了几次有宗教性的国际会，这里顺便说一次没有宗教性的国际大会。民国十八年春天，我在学校内接到许多日本寄来的宣传品，尤其是由东三省寄来的，对于日本在东三省所经营的南满铁路及其他商业，都极力的说是与中国有益，又有许多文化事业的宣传，说中日应当本同文的关系，互相友善。当时我虽略为浏览一下，并未太注

意。岂知在五月中旬，就有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请帖，邀我去日本西京开会。这个学会，原来叫太平洋人民外交委员会，但人民不能真正办外交，才改成学会的名义。这是该会第二届会——第一次在檀香山——这次加入的会员来自十国：中、美、日、英、加、菲、奥、纽、印尼、马来亚。另有苏俄与韩国为观察员，所以是很重要的会议，它的中心问题是满洲问题，另外有太平洋各国的侨民及殖民问题。这次苏俄因为有东三省问题，所以特派观察员，就是各太平洋沿岸国家，也都感觉东三省可能是一个迫切的“中日争端”的问题，甚至会引起世界战争。

在十八年七月，我国代表团在沈阳开了一个预备会。出席的有余日章、徐淑希、鲍明铃、陈立庭、王正馥、刘廷芳、陶孟和、梁××诸先生，我们住在沈阳医学院宿舍。除讨论问题外，还参观了许多工厂、商场、学校。我觉得北大营的兵工厂很了不起，火车一直开入工厂，可以直接运兵器出来。还参观抚顺煤矿，这个煤矿是无烟煤，煤质极硬，可以雕成花瓶、杯子、碟子等物，据说是世界最厚的煤层。又参观了北陵，古木森森，规模宏大，但朴实不华。东北的森林，真是可爱。其他出产，也甚丰富，那时我们中国的入超全仗东北的出超来平衡，日本人怎会不生贪心呢？

在沈阳还有一个惊险的小插曲，有一日午后，我们几个人，步出医院宿舍，过了一道木桥，前面就是街市。

我们上街玩耍买小物件。正在游玩时，忽然看见街上游人狂奔说“不好了，辽河决堤了——快逃！”我和余日章先生拔步飞跑，抢过木桥，鲍、梁二位在后。等他们刚刚走上岸，木桥便被冲去，若再迟两步，他们二位就要与波臣为伍了！好险！好险！我与余先生也打湿了鞋子衣服，幸而有惊无险，后来听说是辽河上游溃了堤，大水一直泻下来。第二天，那个小街市已是破损不堪。

预备会开过后，我仍回上海，并到庐山小住了一个时期仍回学校。到阳历十月中旬才又到上海，加入了中国代表团，那时团员共有十余人。女代表除我外还有吴贻芳女士、桂质良医师。另外还有一同去的余日章夫人、严鹤龄夫人、陈立庭夫人。男代表中是主席余日章先生，另外还有陈立庭、严鹤龄、陶孟和、吴鼎昌、梁××，及温××先生。在北平去的有徐淑希、陈衡哲、鲍明钤……等先生，他们直接由北平去东北，直接乘船赴日本。到了日本我们会齐。我们的会所是在西京的奈良公园内的旅社。这个旅社在公园中心，每日早晨有驯鹿来窗户边接受客人手递的食物，真是物我无争，天人和协的地方。西京代表日本传统文化，也就像中国的文化，一片谦虚诚朴的气象，我很欣赏。

开会的秩序是每日上午有大会，下午分组讨论，夜间公开请社会人士参加。有一次是讨论东西文化的比较，我站起来说“东洋文化，有人伦道德，个人思想自由（不受报章杂志的宣传），重义轻利的教训，实在可补西洋唯物主义及唯利是图的缺点”，颇得在坐听众的赞许。下午代表团

也有很多参观风景及社会风俗的机会。我们看了西京的大神社游行，中间的武将、文官，都是唐朝的衣冠制度，不意在日本竟看到中国古时的装扮。我们也去参观了茶道、婚礼、祭祀……等等礼节。风景处我们也参观了帝国大学及双洮瀑布等。另外还去见了一位中山先生（闻说就是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的居停），此人有一个大花园，名“苦乐园”，是由苦才能得乐的意思，此人慷慨热心，帮助社会事业不少，对于中日友谊的进展，尤其极力推进。

各代表团都由日本皇帝于十一月十二日请宴，许多代表自然都去，因为日皇请宴是不容易的事。那日只有我与陈衡哲女士不去。十一日夜间旅社冷冷清清的甚为寂寞，我不知何故，心烦意闷，不能安寝，上床后翻来覆去到了十一点多钟，只好去寻陈女士聊天，幸而她尚未睡，于是我便坐在她的床边讲话。我们天南地北，讨论了许多问题，直到两点钟，我实在不好意思再坐，便回到自己房中去，总感觉惶惶无主，挂念家中，挂念学校，一夜无眠。次日起身赴大阪，同余日章先生夫妇与桂质良君回国，其余各代表也分道扬镳，各回原处。到了上海，忽见四妹宝茵来船相接，甚感奇怪，因为她是最忙的医生。上船后，她两手抓住我说“大伯伯病重，望姐姐早些回去”。我说“不必瞒我，我想是十一日已经去世了！”于是我们急急上车，在车上相对哭泣。第二日我便乘轮上湖南，在九江又有约农弟与萧表姐来船相接。果然我的父亲是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三时，在湘阴因为脑溢血去世，可见我感觉不安，也是一

种灵性交感之故，这种经验许多人有，虽科学在今日尚不能予以解说，但不能说是不可能的事。

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学会是在上海南京与杭州举行的。这次是胡适之先生做我们代表团的主席。这时已有所谓“自由份子”加入。议论纷纭，加之先后要在几处地方开会，远不如在西京的气氛，同时因为我们也觉察有些“姑息妥协”份子在內，往往讨论的问题，不能得到什么结论。总之，这一次后，我便退出了太平洋国际学会。

二三 第一次复校

民国十六年四月八日学校被毁，我与约农逃亡汉口，多承圣公会吴主教（Bishop Roots）招待，住了十余日。我父亲早逃来汉口，但我们不知老人家住在何处，只知道在汉口。那时候的汉口十里洋场，人口繁多，到何处去找。但我们到汉口之后不过几日，居然有一个目不识丁的湘乡人，到了吴主教的门房里打听有没有两个湖南逃难来的人——一男一女。他不敢说出姓名，因为怕人盘诘，妨害了我们。我们偷偷出去一看，正是侍候我父亲的老人家蒋五十。此人老实忠心，不认得字，也没有什么计谋，只晓得照主人命令行事。我们看见他就大大喜欢。问他“老太爷现在何处？”他说“远啦！在汉防营！”我们就跟着他由他引路，坐了一辆破马车，到一个营房。老人家就住在里面的小民房内。我父亲是一个多谋足智的人，他老人家说“住

在兵窝里，便没有人来查了。我也改了姓‘曹’！”我们问为什么？老人家说“恐怕无意中写出姓‘曾’很容易改。”我们倒未想着，还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地不知汉口的危险。我到父亲处后，我们便设法买船票请老人家去上海。那时中国江船已停开，就是怡和、太古、日清三个外国公司的船也泊在江中不靠码头，伴着他们本国的兵船，上船的要用小划送上，并且非有洋人担保，否则买不到票。我们承圣公会吴主教帮助，居然买得三张武昌轮船的票，父亲一张，蒋五十一张，还有亲戚朱俊夫一张。上船那日大雨如注，江岸行人稀少，“巡逻队”也未见。父亲说“幸而下这大雨，不然要受检查，麻烦就多了”，老人家虽然极力轻松，但是衣服尽湿，上船时没有扶梯，要上煤洞口拖入，狼狈之情可以想见，约农送上船，我只在江边站着看望，怕有巡查人员来，好在没有。约农回来，我才放心。过了几日，我们也乘英国轮船到了上海，见了父亲，一番悲喜，自不待说。我们在沪约一月，仍借居聂俞两府，后来便上了庐山。巴师因英领事不肯签字，只好留在上海，住在马牧师家。在庐山我们忽得急电告知巴师去世消息，我与约农急急赶到上海，巴师因忧虑中国的转变，又挂念学校前途，学生的安全，因忧劳而发了心脏病，真是可恸之至。我们到时已有圣公会的马牧师 (Dr Max Well)，及孙牧师帮忙，大殓过了，停灵上海八仙桥礼拜堂，我与宝茜四妹约农二弟，都亲送下葬，就葬在八仙桥礼拜堂外的坟地。

在庐山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我的老师李却

逊女士的资助。她听见我们仅以身免，毫无财物，便送了我英金一百镑，这个真是雪里送炭，也表我们师弟的友谊，我希望我也能以同样的友谊待我的学生。不过绝不愿我的学生会在同样受苦的情形下，需要救济。

当我们在上海时，已听见许克祥领了一团人搞了马日之变，但学校被军队驻扎，我们也不能进去。我的学生却很勇敢，连夜由潘瑞笙、曹祖韞、彭坚三人爬墙进入某部的驻扎地，（她们早已打听出来我们学校的文件在哪里）偷出艺芳文件箱，内有艺芳立案拨地各重要证件及历届学生名册等。若是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一时尚无法恢复学校，所以她们的功劳不小。那时艺芳老学生有萧孝徽、左景馨、陈昭炳、徐少英、谭紫、张筠卿、任承华、曾昭燏、曹祖韞、彭坚、潘瑞笙、熊嘉巽等图谋复校。先赁了遵道会房子，恢复小学、初中，规模当然简陋，但是一片热心真可佩服。居然在十月中争回浩园。便开始修理，也拍电请我们回长沙。这是艺芳第一次复校，完全是学生的力量与爱校心所造成。民国十七年春季元旦，不幸听雨轩被军队完全焚毁，使我学校大受物质上的损失。但人心愤慨，更努力复校。高中也开始招生了。艺芳董事会因世局艰难，鉴于雅礼的大学部也归并华中，我们便专心办一完全中学，六年一贯，初中不毕业，蒙教育部准予试办，这也可说是艺芳成功因素之一。有六年师生一处，晨昏相聚，并且为读书而读书，循序渐进，不受升学考试影响，实在难能可贵的事。

民国十八年，学校已恢复一年多，校中无事，但我的父亲于这年阳历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去世，上文已经说到，加上约农二弟似有点肺弱，便与堂弟福保同去庐山养病，我所以很难过，事多心烦。因为大学既停办，便把左景馨、陈昭炳、徐少英三位，资送英国留学，谭紫则资送金陵女大毕业。

民国十九年春天，长沙政局又有摇动，五月中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打进长沙，湖南省主席何键出走，桂系有些兵扎在长沙司马桥的三公祠，离我们学校极近。三公祠本来积了历年驻军的军火，桂兵不慎，失火爆炸，一时火光冲天，飞弹如雨，更不幸的是我三弟昭权之长子也前一日在家中误玩一个桂军留下的手榴弹受炸而死亡。我只好赶紧送学生出校躲避。幸而学生未受波及，但司马桥左宅受损失极大，幸未伤人，长沙人民无不深受惊恐，好在不到一月桂系退去。暑假中我与约农因校址事要去南京。哪里知道，桂系去后，何键再来，不到一个月，七月廿八，共产党彭德怀又进入长沙。柯军又无预备，所以大家说“不到四十日，何军两次失长沙”。彭德怀进长沙，我与约农均不在校，只有萧孝徽，张筠卿、熊嘉巽三君守校。我们守学校的老师只得仓皇出走，到家母家中（司马里），离学校只有一条街。困在这小屋里十天，水米都缺乏。我们的书籍衣物一概没有拿出，只有我一具小小天文钟，由萧女士手提出，至今是巴师开办艺芳的唯一纪念品，现在仍放在我桌上。共产党八月七日离开长沙，由王东原指挥侯飞鹏

入城。我们的工友均极忠心，靠他们苦求，及邻居帮助，学校才未被烧完，只打得稀破，抢得一塌糊涂，学校号房李鲜梧老人，竟嚎啕痛哭，跪求众人不要烧屋，才留下屋架子及围墙。张君筠卿，熊君嘉巽，我母亲，约农二弟，萧表姊与我均投奔汉口，直住到十一月方返长沙。校内驻兵，无法恢复，这是学校第二次被毁。

那年冬季，我由湖南教育厅长黄士衡先生聘为省立第二女子中学校校长。二中是长沙省立女中最好的，但是人事复杂，总算做了一年校长，平安过去。我因病辞职去烟台后，二中学生的函电挽留，很令我惭感。

二四 第二次复校

经过学校第二次被毁，我有点心灰意冷，加上在上海开第四届太平洋学会时，奔走劳碌，忽然得吐狂血之病。家母由长沙赶来，大姐、二弟、三弟都在上海，极力劝我去烟台八弟处养病，我也感觉校既倾覆，上海不是久住之乡。于是在十月间家母、二弟、萧表姐与我共去烟台，因舍弟昭桦是烟台海关帮办。该处海滨风景宜人，空气清新，我们在那里共住了九个月。在烟台得了长沙一个电报，说赵夫人中风病重，要我们回去。我的病并未全愈，因为四月八日，我感怀学校的被封，又吐了一次狂血，海关医生极力主张我去协和仔细检查，他认为是一种吸血虫在肺内，不是肺癆。但他也不肯定，一定要检查后方能断定。我们

接了这电报之后，我母亲决要回湘，但我有病不能去。只好由约农二弟、萧表姐、母亲与我，同上北平，我去协和医院验病，萧表姐留平伴我。约农护送母亲去长沙，假如有事，可帮忙料理。我住协和一礼拜，由霍医生(Dr. Hall)诊断，证明不是痲病，服药医治可痊愈。我们住在七舍弟昭亿家，也住过赵紫宸先生夫妇家，留平约半月便回烟台。

家母与约农乘平汉车转粤汉车回长沙。到了长沙，喜见赵夫人虽中风，仍能行走饮食，不过言语糊涂。但家六婶（即是四八日学校被封时，我住她家的）与昭榕弟——福保——同于阴历六月十九亡故。福保弟久患肺病在牯岭住了很久，但他性情强傲，不肯遵医生治法，每每爬山，喝酒等等，因此病无起色。但他人极聪明，虽然中学未毕业，但中英文都能看书，也能作中国旧式诗赋。可惜早死，死时年仅二十四。至是六婶则本来虚弱，一听福保之死信便触动她的伤感，因为她的抚子昭揆，也是年仅二十岁时患肺痲死的。家中一日两堂丧事，真害得约农二弟忙得不可开交，我在烟台，也只能着急悲惋而已。

民国二十年秋，我接到左、陈、徐由英国来电说，她们将乘德国邮船返国，我与萧表姐便从烟台到上海接他们，家母与福保弟之母陈干妈及约农由湘到沪。我们在上海七婶家小住，讨论各种事情。左、陈、徐三位决计回湘恢复学校。我与表姐仍奉二位老太太去烟台，我仍须调养数月。约农与三位回国同学去长沙，图谋复校。

那时长沙军队驻扎学校，是极普通的事。我们的学校

被陶广的军队驻扎，校址也很破坏。经约农及董事会，又有老同学多人的奔走，总算将军队请出。于是学校聘请了左景馨为训育主任兼教地理；陈昭炳为历史教员兼管图书；徐少英为高中算学教员，兼管园艺与卫生，谭繁为化学教员兼管医药，约农自己为教务主任，以李宛为副，李兼管出版杂志校刊，萧女士为总务主任兼教初高中算学，彭泽芬女士教体育，周寿如先生教初中公民。国文教员均是男老师，计有张子炘、彭仲炎、周怀霜、李月浦各先生。另外有言自芳先生教算学，兼办对外关系。言先生对于复校功劳甚大，收回学校仪器家具也费了不少气力。此时我与萧女士仍在烟台，等开学后两个月，我的病也差不多好了，才动身返长沙。所以第二次复校可说纯全又是老同学的功劳。

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我们专心办中学，采六年一贯制，初中不毕业，直上高中，因此我们的课本，尤其算学、英文，采渐进式，而不用初中、高中局部重复的教法。大约可以说，到第五学年便可把高中课读完，第六学年再加深造。学生也孳孳向学，从无怠懒习惯。这六年毕业学生四班，在校毕业会考（联考）中，没有不及格的，也没有考不取大学的。

二十六年秋季，约农赴庐山开会，只有我与萧表姐及左、陈、谭三君在校。因天气炎热，都在楼下教室内住宿，七月七日半夜忽闻街上有人大叫“号外——号外！日本人开战号外！”我们连忙爬起来，叫人开门去买，原来是日本

人在芦沟桥与我国军士冲突。不想这一星星之火，竟尔燎原，掀起中日大战及世界大战。将士八年血战，毕竟收复华夏，这是后话。七月八日，报纸号外不停的发出，人心激昂慷慨，但是两国并未宣战，只是兵势已动，而且在上海两国已经开仗，飞机也出动了。八月中我五叔也由北平回长沙，约农弟每日去省侍。政府通告人民，尤其学校、医院、公共场所，都要赶办防空设备。那时人民尚不十分明了飞机的厉害，对于防空设备，更无经验，所有防空洞，防空壕，都草率得很。直到那年阴历八月十五，月明如画，突然警报大作。有许多街上行人，无处藏躲，至于在茶楼酒馆戏园中的人，更加张惶拥挤，失去皮包、踏伤手脚的更不知若干，这才知道防空的要紧。我们学校原有一假山，就傍着假山挖壕，上面密排杉木板，再上盖沙袋，此壕是马蹄形，有六张洞门，每班一门，每班有一位老师领导，一位工友照顾，另外有老师们带着水壶、饼干、药品、绷布、消毒药水等在壕内服务。从八月十五后，虽常有警报，但并没有见日本飞机来过。这时我校已经组织了红十字队，有担架，药品及护理人等。恰好长沙各女校要轮流值夜班去车站，义务招扶病兵伤兵。有些人怕车站正是目标不敢去，但我校师生，每逢轮值日必去，教职员连我在内，都去过。有一二次在车站时也遇过警报，但我们只略为躲一躲，不离车站太远。有好几夜，伤兵到了，我们供给茶水，为他们换药，代写书信，很得军士们的感谢。如此约有两个月光景。阳历十一月中旬上午，我与李琬去看牙医，医生正

在为我补牙，忽然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幸亏医生手快，马上把钻头从我口中退出，否则我口内将受重伤。后又连响三四次。大家都喊着说“丢炸弹——日本鬼子放炸弹了！”登时街上人拥车挤。我与李琬也赶急回校，到了学校，警报尚未解除。学生们依班次进了防空壕。不过我们的红十字救护队，因无电话，消息不灵，等到晓得是车站受炸，然后赶到现场时，伤患都已经抬走了。此次救护队的出发，最先达到车站的是三舍弟昭权的基督教自立会的那队，其次是各教会的，伤亡的以某旅社的为最多，因为那个旅社中，正有人预备结婚。死人多少。一时难计，有被房屋砖瓦压住的，还等着挖出。所以我们的工作那日不过送些包子，开水与无家的人吃吃而已。

十二月十五日，南京撤退的消息传到我们那里了，我们无限伤痛，于是便定了十九日放学，不幸那日早晨，家母忽病，她老人家患的是心脏病，陡然听见南京撤退，便怕长沙也危险，加之又看见了炸坏的房屋，凄惨万状，病便加重了。我请了一位德国安医生来医治。他给了些药，但由下午五时坐到九时方去（并未吃饭），我就知道严重，他说半夜十二时再吃药，如果睡得好不吃也可。我与约农、昭柯均等到十二时。看老人家睡得很好，我便裸被睡在外房靠椅上。到夜间二时，我听见母亲呼吸不对，起来看时，手已无脉，人已进入弥留状态，急唤约农起来，叫昭柯去南门找安医生，我虽用口作人工呼吸，也只听见痰响，并无呼吸，医生到时说“人已由睡中去世，并无痛苦。”我母

亲一生为人忠实和蔼、孝敬阿姑、顺从丈夫、教育子女，无一不好，竟然因乱世而死，伤哉——痛哉！但后来日本人逼近长沙，我们避地香港，受尽无穷痛苦，又觉天佑老人，不使受诸多磨折，也是有福的。经过此变约农便有护送五叔去南宁昭桦弟处居住的打算。

二十七年春天，长沙情形更加紧张。日机来了好几次，炸毁的地方也不少。我们幸而直到放学，都没有出事。约农也陪五叔去了南宁。八月十七日上午九时与萧、左、陈、谭正待下乡躲警报，忽闻紧急警报，我们急忙带学生尹纪新、曾雁翔及几个工友，携出各人要物及学校文件，仓惶进入防空壕。那时兵工署的汽油无数桶放在文正祠的正殿内，守油的官兵十八人，也寄居校内。我与萧女士急急的叫他们入防空洞，他们原先不肯，后来也只得进来。最后一人进洞时炸弹已下，一块小破片轻伤了那个人的一只腿，好在壕中有药，马上包扎。那时只听机声隆隆，炸弹轰轰，最怪的是炸弹并不太响。如此约十分钟，机声渐远。我忽然想起，文正祠有汽油，便大声呼唤：“我们出洞去吧。只要弹中汽油，火雨就要来了。”大家爬出壕沟一看，幸而正殿没着火，但是房子倾圮不少。对面颜子庙中的医务所，已炸得稀烂。舍妹宝苗原在所中服务，这时一脸血渍，由墙上走下，只唤“姐姐在哪里？”看见我们安然无恙，才包扎她自己的伤口。学校共中了十五弹，弹坑的直径约二十尺，深五至十尺，里面已充满了水。池内的莲花，如刀削去，壕口上的一株香椿树炸得无影无踪，幸喜全部师生个

个平安。几分钟后有学生张成智来看我们。看见我们的学校毁坏的情形几乎晕倒。后来幸而有湘雅的医车，青年会张干事，与老学生唐冰瑜女士派车来接，才把我们送至朱家花园旁边，我们所买的一个小房子内（原为家母及五叔避难的）。我立即拍电报与约农告知他校毁人安，他也由南宁赶回。于是定计把学校参加福湘女校，迁到沅陵上课。承蒋岫山校长许诺，我真感激万分，通知学生去沅陵，由彭泽芬，颜定为两先生陪去。左、陈因有老母不能去，我与约农、萧女士及宝苗带工友三人同去南宁。因为愿去沅陵的学生，不到二十人，两位老师陪着已经够了。

二五 香港寄居的痛苦

我们到了南宁以后，不久就有长沙的“文夕”（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大火之事。那时约农正去湖南想拿出文正公手泽及家中重要文件，我与五叔、萧表姐、宝苗及五叔的许姨老太都急得不得了，因为算日期正在长沙。无奈我已经答应去印度开会（上文说过），不能等他。正在又急又等的时候，南宁忽遭日机大炸，许多友人房舍受了损失。我八弟便力劝我等赶紧离开南宁去广州湾。十一月廿七日便用小汽车一部，小卡车一部，把我们送至广州湾，在路辛苦得很。并在广州界上险遭盗劫。最后总算平安到了广州湾。过了两日，我便乘轮去香港，到姑母俞太夫人家。过了三日我便会齐了去印度的中国代表团——有诚静

诒、赵紫宸、杨永清、刘庭芳……各位去印度，已见上文，兹不赘。

在印度过了圣诞，便与郑少怀君同赴英国巡回讲道，上文也已说过。七月初我坐P and O大轮返香港，那时约农已奉五叔来香港与姑母团聚。萧女士、表弟俞大纲夫妇也来港接我。在船上好在有两位中国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女教员与我同舱，也不大寂寞。一位名为胡砥砺的女士，是江西九江教会的，已经到了中年，并与我有共同认识的朋友，所以很谈得来。另一位名胡少卿，是四川教会的，年轻喜运动，每日必游水数次，也是很好的伴侣。到香港后都各自分别，我与萧表姐借居聂表弟（光堃）家，每日去姑母家吃饭，与五叔及约农及姑母家人谈笑，乱离中居然能有家人小团聚，亦不幸之大幸。姑母家中有大纲表弟夫妇及小女儿，另有大维表嫂，但不久她便去重庆了。我后来感觉久久麻烦亲戚，也不好，就自己赁了九龙大埔道八号房子，九月初搬过去。这时欧洲大战已经爆发，香港市面虽一时震动，但仍旧繁荣。这样住下去也很难维持，约农这时兼湖南大学教授名义（不支薪），代为抢运国外买来的仪器。也教点家塾来作笔耕，教了一位高德容先生，至今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什么不能做，因为那时我患上了间歇性的心脏病，有时一夜不能睡，只能坐着。因此不能找工作，幸赖巴师遗款维持家用。心脏病也由留英老同学潘作琴医师诊治，未太恶化，但不能去重庆出席参政会，只好在港，虽优游过日子，也忧虑国家的事，不知何日抗战胜利。那

年冬天姑母全家便去海防。

民国廿九年冬季，五叔忽患严重心脏病，便去香港马利医院诊治。经卫大夫（Wilkinson）诊治，住院三个礼拜，在这三个礼拜中，约农因侍奉父亲，得认识张灵甫将军（此事对于我们大有关系，后文再叙）。医生云此病只能静养，不必住院，却暗暗告诉我们，五叔的寿命只能维持半年。我们只好含悲接他老人家回家。此病除心绞痛以外，最苦不能吃东西，有时一日连汤水也不能进。毕竟于中历三月廿九日午刻含笑而逝，在此乱世，也算解脱。我记得做了一副挽联——挽老人，可说我叔侄两人的事都说了！挽词云：“幼继大宗，长承庭训，编带使重洋，不辱君亲，暮年心痛碎裂河山，荆棘竟能戕永寿；既失庭辉，又燔杏苑，寄尘来百粤，更倾诚命，今日目睹飘零屨杖，竹林从此有馀哀”。自从五叔去世后，我们更加终日闷闷，幸喜有几个广东朋友——罗有节校长、胡素珍校长、郭凤轩女士等及学生何琼，同乡余啸秋先生夫妇，偶然往来略解寂寞。后来任叔永，陈衡哲二位由昆明来，姑母大人与大纲表弟夫妇也来香港，又多一处走动。但姑母尚不知五叔已去世。

三十年十一月，香港忽然紧张，街上警察站双岗，中西人都有，也停止军警请假。那时谣言也多，但我们不通广东话，也无从多听见。十二月初，忽然警戒松了许多，（听说日本人来栖特使亲去美国讲和），人民也喘了一口气。岂知十二月八日早晨，我正在洗面〔按：即洗脸〕，忽然炮声大响，警报长鸣，初时以为是演习，后来越听越不是，才

知道果然是轰炸，街上已经人车喧阗。那日警报七次，人心大乱，当夜电灯都黑了。次日街上许多铺子都关了门，夜间一片抢劫声，打门声，打破玻璃声，真是可怕。次日英国兵士已经撤退边界，九龙市面暴徒横行。那天夜里，我们先把大门用箱子顶住，黑坐着。陡然听见有人敲门说：“收保护费”，我们不敢开门，只有祈祷上帝保护。正在紧急之时，忽然有人在四楼上开了一枪，叩门的人忙忙的去。逃过这关之后，忽见对面街上，来了七八十人，都带有手电。我们想，这次休矣！但真是上帝保佑，正好他们过街，最后一批英兵撤退，在此经过。看见他们横过马路，大约以为他们有意阻挠英兵，便放了一排枪，这些人便如鸟兽散。这两件事，都可说是祷告灵验的神迹。次日天晓，便看见日本军队陆陆续续进来。每队人数并不多，只十余人并且横托着枪，慢步沉着的进行。那日下午日本人便捉了许多抢劫的人，跪在我们对街角上——约有四五十人，我们非常害怕日本人要屠杀他们。后来有个留日的李天佑医生去苦求，方才放了他们。

十二月十八日，日本人大出告示说“皇军”就要进攻香港，敌前登陆，普通人民夜间绝不可出来，日里无事，也少在街上行走。果然有一夜，大埔道上只听见坦克车进行声，脚步声与马蹄声，绝无一点喧哗。走到我们房子下，忽然停了，只听得日本军官轻轻的发号令好象说“哈嘻吗噜”，大约是一种暗号，于是一路传过去，不多时他们又起程了。那几天真不是“人过的日子”，自来水断了，无水可

吃，家中粮食断了，没有接济。友人余啸秋先生因被人威胁勒索，由约农帮助，搬到我们家中同住。幸而他家还有点米，暂时接济。十二月廿三四两日，整天大炮，夜间英兵焚烧亚西亚油仓，满天红光黑烟，加之炮声不止。我们猜想，大约日军已登陆香港。此次日本同时打珍珠港、新加坡和香港。他们是与英美宣战了。我们一则一喜——这样可以促进日本侵华的失败，一则一惧，我们在香港九龙的人，便做了亡国奴，不知要受日本多少虐待。有一日我们听见姑母全家要出境了，我们便要去一送。那时没有公共车坐，我与约农便步行去送行。蒙姑母将他们剩下的米，把一份与我们，由约农背了回家——他们的米，还是靠游弥坚先生弄来的——岂知路上碰上了日本人放枪捉人，情形几同巷战。路上行人吓得到处乱躲，我们也只好东藏西躲，好容易转回住所大门前，但楼下住户不敢开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敌人拿枪射击，也可说第一次冒险，有性命之忧，最后蒙贴邻西医李天佑先生准入他家躲避，后来回到家中，还是心有余悸。

我们最幸运的一次——真是上帝的天恩——是被日本人检查。日本人早发号令，某日来检查民间住宅，看有无军火等不法物件。到了要查的人家，先将人赶出门，蹲在街边，由一日本人监视着，准家中一人带钥匙回家，带领日兵搜查。当然日本兵所欢喜的东西，他们可以随意拿，倘若查出有手枪……等，定然枪被拿去，那个人家还有性命的危险。当我们被查那一日，恰巧余啸秋先生由荆嗣佑

先生的儿子去约了一个日本军官来看照相机。余先生想卖给日本人，得稍济眉急。为表示好感，特地摆出两碟点心招待他。正好这个时候日本宪兵来查我们的家了。一进客厅，便看见一个比他们高级的日本军官在那里吃茶。这几个宪兵当然心下骇异，但揣度总是军官的朋友，于是并没有开一个箱子，只到处看了一看，使用粉笔在门上写了“检查讫”。我们真是脱一大难，否则查出文正公手迹，一定拿去，甚至我和约农也要被逼着去为“皇军广播”！这岂不是上帝的特殊保护。有一次约农在街上，被流氓挡住搜身，也蒙主恩逃脱，因为很多被搜的，被关入空屋以致饿死。

我们受上帝的保护，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当我们才到香港时，也带有一点美金及少许金首饰，因为恐怕家中不平安，就要租一个保险箱子来寄存，岂知各大银行的箱子都租了，只好租了一家小一点银行——永安银行——的保险箱，这也是冥冥中上帝的特别安排。到了三十一年五月一日，日本军部命令开保险箱——先从汇丰银行起，听说凡是好的东西，日本人都拿光，陈寅恪先生有几百美钞，也由日军拿去，其余我们熟人的损失，不计其数。日本人拿东西去时说是“替你保存”，给收条一纸，但不注明数值，甚至说是你“捐献皇军”的。我们的保险箱因为银行小，轮到最后才开，这些日本饿狼也吃饱了，便不太注意了。当约农提着一个布袋，与工友郑述生取出美钞，及金手镯等，请那个日本检查员检查，不料他只看一眼就放行了，这不是上帝的好安排么？

六七月里，香港粮食缺乏，日本人计口售粮，发粮票，每人每日六两米，粗糙不堪，还有虫子砂土在内。人民每日都有饿死的人，街上也有大批饿死人的尸骨，惨不忍睹。于是日本人准人还乡去内地。那时我们在大埔道楼上，每日看见大批步行还乡的人，拖儿带女，不顾路上流亡多么苦。我们便也设法要回乡。八月上旬，我们便申请返乡——约农改名曾仲，我改名曾莘——因为罗有节校长告诉我说，日本人可能要捉我广播了——我们其余的人的名字没有改。八月下旬得了许可证，我们只好急急的收拾行李，所有家俱及不重要的东西都送给房东——家俱原是陈衡哲女士回乡前所赠。八月卅日由九龙渡到香港。第二日上白银丸日轮。我在此处不能不提两位朋友的正义帮助，一个是余六铁先生，他介绍了我们认得一位四川廖傅亚先生。廖先生答应他先把文正公的手迹——家书家训、手书日记等带入，并说“我包你一张纸也不会失落”。若是没有廖君的一诺千金，我无法出九龙，更无法带回文件。我借此深表感谢。上船的时候，余先生来送行，由其友人某先生查关已经帮忙不少。正上船时，约农一手拿一只契箱一手拿一个药箱（都是日本人的禁物）正怕被扣，忽然有一个余六铁先生的日本朋友，代约农接去，直上船梯，未受检查，真是万幸。总而言之，我们在那时，到处蒙上帝的爱护，不然早已没有人了！我们承朱志群、刘耀黎二君借钱方能成行，并且未写借字，全凭交情，否则也无法离港，也应致谢。

白银丸起碇后，约农手拿行车票去受日本人检查，发还时忽然中间少了一张。这时，另外一人也少一张，那人便向日本人很客气地去要，不料这日本人竟大发雷霆，一顿拳打脚踢，修理这人。当他打人时，他手中票子纷纷落地。有一张落到约农的脚前，低头一看，正是我们所要的那一张，这种事真令人感觉亡国之惨，也感谢上帝的恩。路过澳门受廖校长招待，到了广州湾，不幸我与萧表姐、许老太，都发“天狗热”。艺芳工友宋增福，他因不慎也得此病，竟死在广州湾。只有女工张妈，男工友郑述生与约农未得病。约农最苦，除了照拂我们外，还要为宋增福办丧事，将他好好的葬在广州湾，并立碑留记。双十节后，舍弟昭桦派曾盛带钱来接，但因疾病都用完，幸而郑君仲衡为我们设法定车供钱。到柳州时，又遇见同宗曾丰、曾玉羊两位，对我们十分优待，方能乘湘桂路车安返衡阳。

二六 回湘乡老家及抗日游击队

我们坐湘桂路火车到了衡阳，路上也受了不少惊吓。有一次车近桂林，忽然遇着警报，只好大家手提一个小箱下车暂避，幸而约一小时日机便走了，大家再回车上，可喜留在车上的行李都没有遗失。到了衡阳，进了一家客棧，略事休息，岂知因报上登载了我们回来，就有青年会的干事请我演讲香港沦陷后的情形。同时艺芳老同学如张成智、唐新媛、冯友雪、王淑德、欧阳荣、黄美愉等都来欢迎，

极尽招待的热忱，不但把我们的房饭钱清了，连赏钱小费也都清了，真是令人感激无量。黄美愉的父亲黄伯常先生更是为我们着想，他说“这样乱世，你们若叫了五乘轿子，二十几个挑夫，浩浩荡荡，回转湘乡，那里能保路上不被抢劫，或者挑夫中有坏人，勾引盗贼来抢你们府上，岂不更糟？最好是由我的钱铺内派一妥人，帮你们带信回府，要府上派人来接，那才妥当。”我们便依照他的话，写信回家与四舍弟昭杭，他便派了我们的佃户三十二人，来衡阳接我们。昭杭也真能干，他除开预备人夫轿子之外，路菜也预备了，因为这条路上累经兵燹，小的乡镇，能买到饭，已是好事，不但没有菜，连盐也少有，幸而他们为我们预备，路上还可吃饭。那时衡阳警备司令陈君，是湘乡人，他也怕我们路上遇匪，一路要派八个枪兵，一位兵官护送，我们再三辞不脱，只好接受，一起同行。

我们是阴历十月廿五日动身，走了三日才到老家富厚堂，一则因为天雨，二则因为轿夫挑夫都是佃户，不惯于挑担子行长路，所以一直到第三日傍晚才到家。家中老少欢喜非常，大放炮仗接我们并款待兵官及枪兵，厚赏佃户。那一夜，我们真象由死里复生一样快乐。家中除四弟夫妇与他的儿子锡平女儿荣荣以外，还有六叔的周恭人，舍妹宝苏及儿女，九妹宝施与她的两个女儿，满妹宝苗与她女儿。虽说人少，总是至亲。这样悲欢离合，也是感人的事。小山上思云馆内，还住了一位袁先生与他的太太童锡明女士及女儿袁恬云，他们也来欢迎。现在跟我在台湾的朱祝

生，那时还只十二三岁，也夹在众人中欢舞。我与约农、萧八姐次日到处看了一遍，约农及萧八姐对于富厚堂尚不熟悉，我则是儿时嘻戏读书之所，旧地重游，有无限感慨，加之园圃荒芜，亭台倾圮，彩色剥落，全不是我记忆中的景象。我又想到我与祖母、母亲在这里的情形，更感到室迹人亡的悲痛，人世沧桑，真是令人迷惘，不知苍天生我有何用处，生命如此之短，世事艰难又如此之多，总是令人有事未做完，便有撒手而去的遗憾！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上帝的慈爱和祷告有灵了。

在湘乡老家住了将近五年，可以记载的不过几件事。

(1) 回家第二年，三舍弟昭权带了家眷回湘乡老家。那时七叔母已经中风不能动，由陈姨妈、三嫂李懿康及工人袁嫂招扶。三弟有三男二女，两个大的儿子已在外读书，剩下二女一小男孩在身边。我因无事便教了这些小孩们一班英文，计有三弟之女宪沅、宪煌，九弟昭健之女宪同，袁太太之女恬云，学生冯友雪之侄冯辉远，四弟之子锡平，及保管书楼的王席珍女士。学生中锡平最小，王席珍最大。虽然都用初中教科书，但仍照我自己的教法，先教韦氏拼音，再用简单字问答、造句、翻译等，成绩不差，较在普通初中学校的学生进步要快得多。

(2) 我们到了乡下，便专请了两个工人，探听各路游击队的动向，如若在我们的境内——荷塘乡下半乡——我们就差遣人挑肉、米、菜、酒去劳军，因为那时的游击队，并不都是守秩序的，不免有骚扰百姓的举动，我们也

很体谅他们。因为老百姓一看见军队，便吓得全家上山躲避，甚至连猪牛油盐都带走了，等军队到时，村庄上便一无所有，军队就光了火，于是就打碎门窗，燃毁什物。我们深知“人”毕竟是有“人情”的，只要到一处便有人招待，也就与百姓相安了。有一个端午节，我记得我们家送了七个“半边猪”与游击队过节。还有一次有一位军官赵某某，一定要驻扎富厚堂。那时我们家里住满了长沙衡阳来的避难妇孺，只好再三恳求，不要扎兵，最后访得赵军官是属张灵甫将军的，便说明我们是司令的好朋友，请格外维护，赵果打电报与张，张回电要赵极力保护，并说到危险时，还要赵保送出境，这样才保全了富厚堂。我们与来往游击队的关系，于是更加友好，连最出名的三十二师，过我们境内也秋毫无犯。

(3) 约农在三十三年春被彭位仁司令邀去娄底，那时正有四五路的游击队，要在富厚堂开会，一则解释各队间误会，二则划清各人的防守线，正好约农去了，他们却定日子要来，我与三四舍弟只好想法招待。先定了几条规约，请大家遵守：第一，每位司令只能带五个卫兵一二个副官，卫兵住宅外朱家祠堂或对面萧家堂，副官可随长官住富厚堂本宅。第二，敝宅招待以五日有限，一切伙食均由富厚堂供给。第三，临行送长官起程的轿夫均要放回。第四，在舍下时间，鄙人兄弟们绝对负安全责任，不必卫兵进来保护。到三月底各路英雄陆续到齐，有徐、唐、谢、谈、袁……等游击司令及他们的副官、秘书等，我一共开了七个

房间，三桌饭，虽无珍馐海味，也是大鱼大肉。但他们只开了三日会，听见衡阳沦陷，便都走了，那日正好下雨，乡下的轿子借光，才把这些司令送去。不料第二夜，湘潭的张碧村司令来了，他本来也是来赴会的，但他到时，那些人已散了，听说他的兵最多，枪也多，那天来时，有军队约一百余人，副官秘书二人，顶马四匹。他不肯住富厚堂，就在我们对面墓庐屋里扎下。当夜我叫厨子备菜与酒，要三弟与贺云章师爷送去，另送米一石，小菜一石，与弟兄们吃。次日早张司令亲来见我致敬，亲率军队敬礼，十分隆重，并赏我们的自卫队二千元法币，(那时我们有自卫队二十人，枪二十支，由队长贺云梯率领)，于是我也只好赏他们队伍一万元法币，那时法币还未十分跌价，还可以略为添补军中应用。等这些司令们去了，约农回来，我才透了一口气。

(4) 三十四年三月廿四三弟之母去世，同日镇濂八弟、镇洛十弟之母石夫人也逝世。我们家里平安办了丧事，他们家里刚好丧事才完，镇濂兄弟被诬告通敌。他们原有个黄姓妹夫通日文，曾在衡阳做过生意。因为黄某与在湘乡的文某萧某有银钱上的关系，黄某一手独占，触怒文、萧二人，便告了黄为间谍，同时也牵入了镇濂兄弟通敌。就有衡阳调查室的人一个王委员，一个欧阳委员来逮捕他们。镇濂闻讯于阴历四月十五夜，步行来富厚堂问计于我们，因为荷塘乡乡长曾宪润虽受衡阳调查室命令传镇濂兄弟，但他在信后面密书“万不可来”四字，于是镇濂就不知如

何做法，只好来问我们。约农以为非去不可，如若藏躲，反证实罪名。约农说“你们放心前去，我要贺云梯队长随后来救你们，你们只管直气壮的去，声明并无通敌之事”。衡阳调查室只带枪兵二人把守门户，除镇濂、镇洛外，还有被控五人，内有桐梁乡乡长彭岳生及中华中学校校长周庆等，究竟衡阳调查室是何种性质，以及何以来捉他们，均不明白。但那时四面均是敌人，荷、桐两乡，已入无法律地界，只有逆来顺受，或弱肉强食。此时王委员等看见有我们的枪兵二十名，他们只有两名，便把镇濂兄弟释放，他们即刻到我们家里居住了。我们因为招待游击队，也招待了别动队。常与第四别动队总司令温应冰往来，转托他将事实澄清，我们深深感激他的帮助，使镇濂兄弟得免通敌的冤枉，于五月廿五日回到他们自己家里。

(5) 不料正是他们回家的那一日，日本兵队走过荷塘乡，上午七时我被朱祝生叫起说“日本人来了，到了‘猫坳’”。我们慌忙吃点早饭，就与全家老少步行去文吉堂八妹家，文吉堂在富厚堂后面约三四里，须爬过一山才到。此时我们也只好走着过山。到了山上看见许多人在对面山上下来，我们以为是日本人，吓得都坐在草丛中，天热，蚂蚁咬人，真是苦极了。只好要昭柯及妹夫刘宏赞去打听，大约一小时后，他们回来说也是逃难的人，我们才敢起来再走。自从抗日起由香港回家，这是我真正第一次走兵，虽只两小时，逃得够苦了！这天约农正在富厚堂发平糶米，故未走，因他未走，大大的镇定了人心，我们在黄昏时才

回了富厚堂。

(6) 约农最后还调解游击队的争执一次。这是三交界——衡山、湘潭、湘乡，三处游击队，因争地盘，大有火并之势。由当地人民再三恳求不要打仗，免得人民受苦，要求约农出来作调人，立定和约，在湘潭某处开会。约农带了昭柯弟同去赴会，由别动队的副司令同去。三方面的游击领袖，当面谈妥，约农在那里停了一日，夜间连夜回家，路上连轿夫都不敢开声说话，恐怕误被人认为奸细，放枪射击，直到第四别动队的防地，才敢谈论这一日的事情。约农、昭柯，轻身入虎穴，居然能使那些互相猜忌的游击队，化干戈为玉帛，减少人民许多牺牲和痛苦，真是不容易的事，这是上帝的保佑，也可说这些游击队将军究竟还是爱国爱民的，所以只要有人斡旋，便能消弭争斗之气，同心向外御敌了。

(7) 还有一件小趣事，也值得提一提，就是别动队的四五个美国军事顾问，也到我家来过数次，他们在穷乡僻壤中，居然能碰到许多能说英文的，(那时我家有我们兄弟六人——昭权、约农、昭杭、昭桓、昭柯、昭健，并妹夫于希俭、刘宏赞，连我共九人，多少可说点英文)，真是他们意料之外。除开饮酒吃饭之外，还看了许多我们家藏的英文书籍供他们消遣。他们快乐得很，甚至不想回营。有一个特别胖大的兵官，吃醉了酒，只好用轿送回，但因身体太重，轿扛压断了，只得用两个人搀扶着回去，一路上高歌呼啸，颇引得乡下人注目。

(8) 民国三十四年阴历十月中，适逢约农弟生日。我们荷塘乡及桐梁乡的人们，都因为约农处理游击队，有功桑梓，定于那日送匾额致谢，曾氏族人也赠送匾额。来宾坐轿的，走路的约三四百人。鼓乐鞭炮、旗伞执事，一路热闹非常。匾上的字一个是“念祖兴仁”，一个是“乡帮蒙庆”，另一个我忘了。到了富厚堂，开会演讲，一切行礼如仪。约农当然十分谦逊，但是如果没有他，真不知两乡会弄到什么地步。衡阳县城只隔我们一百四十里路，两县以背冲山为界，山这边——荷、桐两乡，田价是每亩光洋一二百元。山那边——衡阳，田亩无人过问，因为兵患，五六年没人耕田，田内长了丛林小树，田塍破损，界限不分，所以没有人要。纵合起来说，约农除了招待游击队外，还整顿了育婴堂、社仓积谷，提倡教育，调停乡民纠纷，实在造福地方不少。约农生日，负责事务的总干事是四舍弟昭杭。他的处理人事，招待宾客，犒赏自卫队，及客人的轿夫从人等，条理井井。上席中席开到三百多桌，没有吵闹，没有口角，没有遗失东西，真真是不容易多得的才干。

二七 第三次复校

在湘乡老家，我们住了五个年头，从民国三十一年冬天到三十五年春天。在三十四年阴历五月，日本人过境后，我们就略为知道他们已经疲于奔命，不愿再打下去，但还不知道胜利如此之快。我记得是三十四年阴历八月十日，别

动队得了无线电报告说“日本无条件投降”。于是我们便差出家中工友三人，用高脚牌上面写上“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工友肩负高脚牌，手带短炮多串，到各处亲友家报喜。许多亲友看见了这个报条，也大放炮仗迎接，我家里的兄弟们，也都带着炮仗，在我家门外沙路上及田塍上绕宅一周，乡下佃民，都欢呼庆祝。

三十五年春天，老学生有张纯士、李琬、王恂来乡劝我们去长沙重开学校。我说“我们已经老了，现在时局又不定，恐怕不能有什么作用了”，但经他们苦劝说“不要老师们做事，只要坐守指导，何况我们已经弄得略有头绪，只要老师们的声誉信用，就可成事”。我们听见他们有这样精神热心，不忍辜负他们的护校精神，便答应他们等乡下交代清楚，便来长沙。

日本投降之后，我们宽大为怀，并没有要他们出赔款，所以大部份民间损失并无赔偿，至于学校，更是痛苦，因为除开日本人抢去烧毁之外，还有自己的土匪，天上的炸弹，再而三，三而四的损失。老同学张纯士、李琬、王恂、左景馨、张淑钰、冯友雪等居然千方百计收回了浩园一部份。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廿四日，我与舍弟约农和昭杭同来长沙。此时他们已收回浩园南边部份，我们可以居住，但是没有围墙，北部、东部、西部仍有老百姓居住，不肯出屋。那时李琬笑说“浩园现在有三多——大门多、厨房多、厕所多”。大约还在园内仍有上十家。后来又有王恂、冯友雪、张筠乡、童恩湛、陈昭炳等老学生，同心协

力，图谋恢复校址。她们真是至诚所至，金石为开，居然把浩园全部收回。并由唐天荪同学，向长沙救济分署余秋署长处，申请救济面粉二吨，才能略为修理，最要的是把围墙修好。以前已是大通道，凡是水风井到乐道古巷，由小吴门正街到局关祠，均取道浩园为捷径。至于零卖点心、糖果、包子面、油炸豆腐担，更是盘踞在内，好容易才半求——求其帮助学校，半送——送点小小搬家费，才把这些小生意及住家的劝出，我们学生的热心、毅力，实在不可没，我想很少的学校能只有十几个女学生就把这些难民劝了出去的，艺芳女生的确做到了。（详情及各同学的大名均载艺芳五十周年纪念册。）文正祠正殿，已经炸毁不堪，两人合抱的大石柱八根，都炸得成为几段，纵横颠倒，惨不忍睹，一眼看过去，只是一片大瓦砾场。东边思贤书局仍为小学部，西边思贤讲舍，仍未退出。教室、寝室、厨房等差可应用。同时又有老同学曾宪楷、李梅英、萧润娟、曾丽勋、李仲思、钟声骅、任承华、颜定为、王仲吉……等回来帮忙，于是中学招了初中两班，高中一班。中学聘李琬为教务主任，左景馨为训导主任，张纯士为总务主任。国文教员有曾宪楷、萧润娟、李仲思，另聘谭蔚先生；英文教员有童恩湛、张筠卿，并另聘英国教员桂女士(Miss Griffith)及劳女士(Miss Lowther)；历史教员李琬、钟声骅两同学；地理教员左景馨、曾丽勋两同学；数学教员张淑钰、李仲思同学，另加聘陈鹿莘先生；理化教员谭繁、曾宝苏同学，另加聘陈克和先生；生物教员萧鸾君同学，

体育教员彭泽芬先生、党义周先生，美术教员四舍弟曾爱山，音乐教员王先生，校医张慧雅同学。以上是第三次复校的教员，大部份老同学，小学部张筠卿同学为主事，也添了老同学晏源巽、陶湘蕓。这些都是照我的记忆，也许还遗漏了人名，如有当时同学记得的，深望告诉我，以便将来更正。

约农因为三十五年受王东原先生所聘请筹备开办克强学院，先将农工商三专校合并，所以不能兼艺芳的课，或担任教务主任，只有顾问名义。但是开教务会议，或是学友会，仍然出席，照样有他的建议和帮助。这时艺芳又大兴土木，修补或添盖房屋，半年之后，有相当规模，师生融洽，弦诵愉乐，学生也渐上轨道。这次招的都是新生，没有象上次复校，还有些老学生回来，所以校风的传统精神，一时不易恢复，加上大乱之后，有许多学生，尤其高中学生都是曾经步行随校迁去异乡的，虽然年轻，但很能自理，有独立的精神，初到本校，难免有“自以为是”之见，不象我先前老学生，是一块璞玉，完全在我们学校里琢磨出来的。我与约农及各位主任教员，常常讨论施教、施训应如何处理，方能达到使现在的学生能象当初的学生，既和众又有独立精神，能“守校规，又能提出有条有理的建议”，能“好学，又不专读呆书”，能“欣赏中国文化，又能具科学精神”，能“崇信基督，又不忘记孔孟之道”……等等。但这并不容易，我却可举一个学生为例，可说我们已做到了不少。此学生名胡某某，在长沙各学校都读过了，

每次不愉快而散。她的父亲再三拜托我，总要使她能高中毕业，我也答应了，入学之后，我曾请她谈话一次，说明无论她有什么困难，不管有关同学、老师、学校、家庭、婚姻、经济都可来找我，我当尽力为她解决，只要她不找人斗口吵架，她也答应了。我们学校从来不记过或当众责罚的，所以居然胡女士相安了三年。其中也谈过一二次话，但都是友谊谈话。后来我因为等飞机离开长沙，她竟在我们学校多住三天，一定要送我上机，师弟心中明白，恐怕后会难期了，这一种爱心的表示，十足说明了艺芳精神不死，耶稣爱心永存。（这事上文已经提过，但仍值得再提于此。）

另外还有一点可以说，新来的学生与学校的合作。在三十八年春天，长沙学潮时起，尤其是听见武汉打死一个学生，及明德失踪了两个，那时满城风雨，学生们每日罢课游行，正象民国十六年的样子。学生出外，不但不必请假，而且在外面组织的大活动，也不告诉学校当局。但我们的学生，却不如是，每次出发，都告诉我们，而且与我们商量进行办法，始终与学校当局，保持合作、信任。这是长沙大部份学校所没有的。到后来有楚怡的放火，长郡的杀人，明德的走失学生，时局一日坏一日，我才觉得大局堪虞。那时我本来先答应了印度甘地所召集的三十八年世界和平大会，要办护照，政府已迁到广州，非到广州，不能办手续。所以就在那年六月卅日高中毕业后，离开长沙，由舍弟绍杰陪同乘飞机离开长沙，约农留在长沙未动，

校务托曾宪楷、左景馨、李琬、张纯士、张筠卿五人暂时负责。我在飞机场看见送行的亲友不禁黯然！

二八 民国三十七、八年的几件事

我们学校从三十五年秋天开学，到三十六年已有相当规模，学校也上了轨道，师生合作，求学气氛很好。三十七年二月底，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南京揭幕。我本人原无政治野心，也自感才能不够，并未进行任何活动。那时张默君先生原定不竞选国大代表，竞选立法委员；于是有湘乡的公民数人，现在在台湾的李春陔先生也是极热心的一个，再三劝我出来竞选。我说：“假如湘乡父老、兄弟姊妹愿意选我，我当然不敢推辞，勉为效力。不过我决不能出来作政治演讲，或出钱运动。”李先生及我们曾氏宗亲，如宅蔭、仲煌、镇濂、龙秋、宪渠……等均极力帮忙。本荷、桐两乡自文正、忠襄起，对于地方公益，贡献甚多，如社仓、平糶、养老、育婴、修桥、造路……无不捐款辅助，甚至独立创办，所以两乡人士，对曾家极其尊敬，不但平日和睦，而且急难帮忙，我们的佃家，尤其爱护我们，因此我被选为湘乡县的一个国民大会代表。我并未花费金钱，奔走拜托，真是对湘乡的父老兄弟姐妹的推选，万分感激。直到被选后，我才在县城请客一次，聊表谢意。

我校学生，听见我选上了国大代表，高兴得不得了，我离开长沙去南京的时候，学生用乐队送到车站，教职员

也举帽挥巾，与学生们欢呼不已。与我同去南京的有约农二弟，昭桦八弟及朱祝生，在汉口承昭六弟夫妇招待。我们在四月十日到南京，由汉口坐了一只较小的长江轮船——小江陵，到了南京，不期有俞大维表弟贤伉俪来接，船主及船上人员都忙得不亦乐乎，收拾船上客厅，开汽水，摆点心，因为大维那时正是交通部长，是航船的上司，我真是不胜荣幸。上岸后，承昭杰五弟请我们住在他家，那时他的太太正生了第二个女孩还未满月，但他们仍然收拾两间上好房间给我与约农住，并把昭杰的汽车借与我用，招待无微不至，十分可感。最令人感到麻烦的就是很多重要资料，都是半夜送来，敲门打户，吵得众人不安，令我对他们家人，十分惭谢，无法报答。

开预备会不久，便选举主席团。女主席只选出三位，沈慧莲、张希文与我。在这里我要感谢老友袁昌英女士及萧运贞女士为我奔走拉票，也感谢那些投我票的人，可惜我的文件都已遗失，无法提名致谢了。

在南京时因为每日与每夜都有会，主席团每夜必须开会审查第二日提议案，常常十二时后方能回家，所以许多亲友都没有机会把晤。幸而还抽空拜了姑母俞太夫人的大寿，那时会到很多亲友，都是战后重逢，互道数年的惊险经历，十分欢畅。艺芳同学邀我与约农去游玩紫金山，莫愁湖等处。老同学中有任韵诚、曾昭燏等，经过大难重逢，真是愉快之至。那日虽然下了霏霏小雨，我们还是去参观了中山陵和谭墓，后又上了小船游莫愁湖，此时小雨更大，

但是同学兴高采烈，采莲叶，吃樱桃，又是风雨同舟，师生尽兴而返。

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后，我与约农、昭桦同去上海，到枫林桥骨科医院看四妹宝茵。她是骨科专家，曾经医好熊式辉由飞机上跌下来的背骨伤，也治好张知本先生的公子手上骨痲，不要开刀，免除断手之苦。我们姊妹本来最好，同具救世救人的精神，她常说“姐姐治人心，我治人身”。我与约农、昭桦三人同她在成都路住了三个礼拜就回湖南去，岂知此一别，再会不知何年。在上海我还碰到两位好友，一是沈英，一是林眉镜，都是杭州女师老同学。

回到湖南，正赶上学生放暑假。学校花园又重加整理，预备九月十二日开三十周年纪念会。到了那日，风清气爽，菊花满园，连小山上都是一层一层的各色菊花，加上池水碧清，真是读书的好环境。那天社会人士、亲友学生来的不少，连开办时学生八人也来了六人，可说是不易的事，因为离他们入学时已经三十年了。其余的开会、演讲、音乐、游艺，与例行的相仿。

三十八年春季，长沙学生几乎无日不游街开会。我们学校尚算安定，即算有代表外出，也先与我商量，回来也报告经过。

后来，我将校事交三位主任，应印度甘地和平会之约，由舍弟绍杰陪同乘飞机到广州，取得出国护照。在广州会见舍弟昭桦，同去香港。

二九 香港丧弟及来台湾各事

上文说过，我在广州只等出国手续办好，便与舍弟昭桦同来香港，住舍弟昭柯家中。那时内地来香港的人，纷纷如潮涌进。香港房东利市百倍，房子不但要顶费，还要押金，或先付三个月的房租。昭柯房子极小，在青山道又是四楼，还要顶费港洋六千，月租二百，真是贵得吓人。我们无法，只好暂时歇脚，缓缓再作打算。到了香港月余，我就十分挂念约农与萧八姐。有一日，正在想念，忽见街边停下一辆计程车，放下黄色油布被包一个——这是长沙特产油布——我就怀疑，不知道什么湖南人来了，哪晓得走出来的正是约农，我真是高兴极了。因为他原来不肯轻离学校，我再三劝他，但还是我先走了，现在他来了，我才放心。他到后，我们便差人去接萧八姐，由朱祝生护送来港。约农自己又到广州去接，写信要贺云章师爷把文正公手迹带出。不幸那时长沙湘潭间正涨大水，许多书籍及文正公奏稿都不能带。在香港姑母俞太夫人仙逝，我们总算赶到与老人聚谈几次，也得会见表弟大维大纲等伉俪及表妹大细。

印度圣人甘地曾主张一世界和平大会，但不幸他在一九四八年被刺死，他的门人尼赫鲁遵守他的遗志，仍旧召集这个和平会，我与约农都被邀请，遂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赴印度，上回已表过，兹不赘。我们在印度停留三个

月，多承罗家伦先生，张大千先生夫妇，吴俊才先生夫妇等的招待。一九五〇年三月底我们回到香港。舍弟昭桦、昭柯、绍杰等组织了一个纺织汗衫工厂，想解决衣食住问题，那时生意难做，一则时局不定，人们不敢投资，二则内地来的人多，竞争激烈。我始终不敢投资，我的钱很少，一家又要靠我每日吃饭，不敢冒险，他们都笑我固执，只晓得节流，不晓得开源，我说我们不是做生意的人，既不能奔走权贵，又羞于交结市侩，又不能逢迎当道，要生意兴隆，实在不易。现在回想起来，我实应极力阻止他们经商，后来果然失败，而且舍弟昭桦也因去南洋开码头，坐飞机在香港撞山身死，可痛可惜。在这里我不免略为说说昭桦自己。昭桦是我同母的弟弟，比我小十四岁，自小即极聪明，性情醇厚孝友，家塾后曾入长沙雅礼中学，及汉口博学书院，考入香港大学，得文学士学位。擅长英、法、德文，中文也写作俱佳，诗词等更是长技。曾考入海关为帮办，连任烟台、南宁、贵阳及重庆帮办。在汉口服务一阵后，就携带文正公要件到了香港。因有家难奔，才在香港谋蝇头小利以为自养之路。他对我的敬爱，如待母亲一样，只要我想一件东西，他必设法弄来。对于兄弟亦极友爱，昭柯可说是他一手照顾出来的。他年过四十未结婚，有人问他何以不结婚，他说一则乱世累赘；二则母亲已故，不再需媳妇侍奉；三则近来成家贍眷太贵，所以还是独身自在些。

三十九年冬天，孙沂芳先生衔命前来邀请，我们遂在

阴历年初动身坐飞机来台。陈夫人并为我们在青田街预备好房子，一切均极妥善，令人感谢不已。在台北亲友有昭承、兆六两兄弟的全家，陈辞公夫妇，谭季甫及绶妹、张、卓两家表姑母及表弟妹，表妹俞大彩，金妹及妹夫蔡声瑞，表侄俞博生夫妇。能看见许多亲戚，真不容易。阴历二月初四，我等在礼拜堂时，正是舍弟昭桦在香港乘机撞山身死之时。我到家中，看见一封电报，是绍杰发的，告知我“八兄乘飞机，不幸撞山身故”。我看了此电报真是晴空霹雳，一时不知所措，忧患之中又失去手足，悲伤自不待言，我素来不迷信，但此次颇有预兆，我来台时，昭桦送我上飞机，走过一所公墓，山腰有个“永别亭”。他再三唤我看，说“姐姐，你看‘永别亭’”并用手指着。当时我不注意，也未看永别亭，岂知这就是我们的永别！而且后来他就葬在这山上，天下事固有凑巧的，然而这也太凑巧了——他的死，对我与约农及曾氏全家，都是极大损失，因为他的中西文都好，写作俱佳，可以继武曾氏祖先的，不幸短命死矣——悲夫。

昭桦的骤死，我得回港料理丧事，于是我便与约农又飞回香港。此时昭桦遗体已经火葬寄存，我们与香港李求恩牧师商购墓地于华人永远坟场——即是永别亭上墓地。我们葬他后，预备离港来台，房子要顶出，纺织厂要结束，昭桦的财产要英国律师证明，种种麻烦，直到八月底方清楚。约农因为带了文正公手书日记、家书等，便先乘飞机去台，绍杰夫妇及小孩去了，最后我与萧姐带朱祝生夫妇

及小孩，由昭柯满弟及镇洛十弟陪同坐船来台。

青田街地方幽静，四十年时新生南路极其荒凉，也无路灯。第一夜，我们听见鸡鸣犬吠，几乎疑似故乡。在香港两年，人烟嘈杂，不但不闻鸡犬，且夜间车声吵人，不能睡觉。至此始觉另有世界。

我们在台北不久，约农便接了台湾大学之聘，出任英文教授。他有了工作地位，也解决了家中生活的一部份。较之香港，舒服很多。我未担任任何工作，但加入中华妇女祈祷会。每月开常会一次，每年年会一次，讨论及安排全年工作，聘请传道人等等。

三十 来台后的忧与乐

我们从一九五一年到台湾，有许多忧伤的事，也有许多喜乐的事。我先把忧伤的事说了，再说喜乐的事，免得以悲调结尾。

第一件使我们常常忧虑是萧表姊的病，来台湾后两三年正当她的弟弟孝嵩结婚时，她便得了行动不便，手足颤动的病——（帕金森氏病Parkinsons Disease）此病不能根治，只能管束。但她年事已高，虽屡经名医医治，也未见好。在台中（当约农任东海大学校长时）又跌了一交，病更加重，在台北住过中心诊所，安息会医院，台大医院，每次几个礼拜，总无进步，最后住在天主教耕莘医院，那时已濒危，日夜有人照看，饮食已用胃管，神志也不清楚，

终于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五日，魂归天国。她久病中一直由我和约农极力用心求诊治，已回天无术。在她这十余年的痛苦实在是一种解脱，在我却失去了一个至亲好友，深感悲痛。她在病中有她的堂妹孝狱，姨侄俞博生，及亲戚鄯够珍女士照顾，我们都很感谢。

第二件是我自己患癌症，两次开刀，第一次是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三军总医院，卢光舜大夫劝我检查左胸部一个小硬块，是否恶性瘤，经张先林主任切片检查，卢大夫原说“将片子看过后，就可告诉我是否恶性瘤。”那时我已经被抬回病房，由叶宝球护理长招拂，因为开刀是局部麻醉，并不太久。我很清楚的睡在床上祷告，求上帝赐我能力，可以担当这个痛苦。癌症在一般人看来，不啻是宣布死刑，但我并不如此想，我觉得上帝总要赐我能力担当一切。可是一上午都不见卢大夫来，我就猜必是癌症无疑，果然下午一时，卢大夫来说是一种慢性癌，幸而发现时早，可以用钴六十光照射医治。我坦然接受了，毫无惧怕。那夜有宪蕴侄陪伴，次日由舍弟约农陪同去台大医院，由姜蓝章主任用钴六十治疗。约农对我真是极尽友于之爱，每次陪我去照光。初次把我放在照光的枱上，医生护士都走了，并把门关上，我真有点害怕，万一光力太强，我怎么呼救。那时只有祷告上帝，安慰我救援我，好在照光是自动的，不过一分钟就停了，却是面临原子能力，不得不害怕。一共照了三十次光，满以为以后无事了，岂知到了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左乳又发痛，日夜不安，只好再进三军总医

院旁边的中心诊所，第二度开刀。我两次开刀多承邹院长、陆院长照顾，十分铭感。这次张主任，杨文达先生，俞先生便劝我去美国医治，蒙蒋夫人等帮助及约农的爱护，遂于六月底乘飞机去美国。感谢刘大夫 (Dr. Allen Lau) 的协助，关大夫 (Dr. Quan) 的帮忙，进入了纽约市的“纪念医院”癌症中心，有一位中国女医师朱剑华女士为我治疗。用的是极强烈的放射光“贝塔”光 (Betatron) 照射，这个光比钴六十要强十倍。当我进入照光室，躺在枱上，那个照光的器具犹如大照相机的镜头一样，罩住胸部，同时有声音如同火车过顶，隆隆不止，约三十秒钟照光。感谢医院的救济部克朗夫人 (Mrs. Crown) 给我减费，否则我的经济情况，真是负担不起。一共也照了三十余次。在这里我不妨顺便报告一点照光的苦处。当其照光时，并不痛苦，既不热，也不痛。已照到一半时，便感觉喉干舌苦，吃不下东西，内心发热，皮肤干燥发痒，皮上颜色也变成深褐色，这时有的人皮肤会破裂，我幸而没有。却是照光完后皮上异常发痒，直到今日几将十年，皮色未白，有时还痒得不能受，不能睡眠，所以对于这类强烈的光线，我认为能不照，最好不照。我感谢上帝，使我发现自己有癌症，已有十年多了，至今尚健在。不过左耳大聋，是否照光之故，我不能断定，左手麻木，抬不上去，那实在是因为开刀及射光之故，肌肉缩短了，神经被压住，然而比起因癌症丧生，又强得多了。我病中感谢我的家人为我着急，招拂我，祈祷会各位姊妹为我祈祷，我的学生来看护我，

真是经患难而知友情，令人感激不已。在纽约时朱表侄光泽，聂表弟光地、光坡常来看我们，昭柯伉俪招待我们寄宿吃饭，并此感谢。

第三件忧虑是我的右眼因白内障而须要开刀，一九六四年四月底，我再入三军总医院，因田可高医师发现我有糖尿病，须先克制糖尿病，才能开刀，所以住医院十余日，到五月八日才由林和鸣眼科主任开刀。用局部麻醉，开刀时间甚短，不过三十分钟，但是因整个身体盖上厚布，只留右眼在外，不能动，不能咳嗽，呼吸困难，口渴背痛，觉得苦极了，抬回病房，两只眼睛都包起来了，头部用沙包两边挡住，不能转动，不许说话或打喷嚏或咳嗽。全部生活都在床上。我真感谢亲友李施文、酆够珍、黄孝明、纪璆、沈树青女士等为我看家，陪萧女士或在医院看顾我，另外我的学生来看我的有徐少英、周莹、陈志英、曾宪蓉、唐天荪、赵琛、李熙、王栓、高传芬、贾宗兰，曾昭楣、何琼、何翠、唐新媛、龙泮芬、薛锦回、唐应元……等。尤其是李瑞华、曾宝苏、丑志琦、左焕芳，轮流与上述的几位亲友，日夜陪伴我，无微不至，充满基督爱心，令我终身不忘。至于约农与朱祝生每日必至，家中的萧表姊虽不能来，也十分挂念，幸有她的令妹萧孝狱陪她，邵、张、萧三位太太看护她，使我放心养病。病中又蒙蒋夫人陈夫人赏赐补品，更是铭感。老朋友邵校长、任校长也来过多次，我的眼睛开刀，十分成功，虽不能如好人一样，却也还看得清远景，已是大放光明，林大夫、田大夫之功德真是无量。

讲过以上忧虑之事，我要说几件喜悦的事。

第一是我出席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二是约农除在台大任教外，又做了东海大学第一任开办校长。他本来无心要做。当鲁斯(Mr. H. Luce时代杂志创办人)先生的令姐穆尔夫人(Mrs. Moore)捐款要开办东海大学时，未有适当的校长。于是校董会(我也是校董之一)邀集了几位对中国教会学校有关系，同时也是基督徒的人士与穆尔夫人相见，意思就是要她选一个适当的东海大学校长。来的诸君，每人说一篇“他对于基督教高等教育的意见”。约农与任何教会无关(我也并未推荐)，并且是未受洗的基督徒，他的政策意见，居然受穆尔夫人嘉许，就认为他可以做校长。董事会就请他出来，约农再三辞谢，最后他应许做两年，做开办创业的苦工，除建筑校舍，聘请教授，安排课程以外，他创始通才教育制度，并创设劳作助学方法，使清寒学生可以用工作来换取学膳杂费。约农本人也每礼拜一同做工数小时，表示劳工并不卑贱，深得教职员、学生与工友们的佩服，一堂融洽。两年后他辞职，仍来台大教书，不愿壅塞贤路，至今在东海大学师生中仍存去思，实在是可喜之事。但不幸他在东海大学因天雨地滑，跌了一交，跌断左手手腕，好在由西医卫大夫及中心诊所邓大夫医治，不久便接好，至今并无不便之处，年过六十断骨，居然接得如此之好，真是大幸！

第三件是约农荣获公举好人好事第一名，及赠“德教及人”四字的匾。那日不幸我正在医院，不能加入盛典。但是

有宗亲会许多宗亲及学生李瑞华等，亲友李施文等加入招待。有乐队，炮仗将匾送来，非常热闹，来台而能得到社会公认为好人，实在是不易得的事，我也为约农感觉荣幸与骄傲。

第四件是我与约农进七十生日，我们姊弟二人将寿金都捐与台北曾氏宗亲会，这个会也是约农与台北各宗亲创办的。其中最热心的，有曾虚白、曾也石、曾德志、曾文墨、曾坤灯等等，多位宗长，恕不一一唱名。我们生日有艺芳老同学与宗亲发起庆祝，在台北妇女之家设寿堂祝寿，社会人士赐与的诗词也很多，如张岳公、赵炎公……耆老名宿，也各予奖励，令我们有惭感不已的思念。至于学生们更是十分热烈的庆祝，我们觉得真是献身教育，有无限的温暖与酬报。

第五是一九六八年冬季，在台学生举行为艺芳母校开办五十周年纪念，也庆祝我们七十晋七的生日。到会的同学来自台湾各处，连在美国的老同学张慧雅医生也赶来拜寿庆祝，老教员贾惠宜女士从英国来，可惜未赶上，在台北的同学更不用说，大家写了文章，交来全家福相片，集成小册子。由学友会会长周莹女士，同学李瑞华、王介眉、唐天荪等，宗亲曾德培君清理，贴相片，及接洽影印，于十二月廿九日在台北妇女之家开庆祝会，来宾中有鲁立刚先生及夫人勒吉禾女士等多人，还有士林高中校长邵梦兰女士带了国乐队来奏歌舞，并自己弹箏、吹箫，与我的月琴合奏，我多年来未玩中国乐器，实在是滥竽可笑，但难

却诸君的雅意，勉强献丑。奏完乐后，筵开六桌，尽欢而散，古人师弟如父子，我与约农可说有这样的福气了。奉劝各位做老师的人，要知道学生孝敬，出乎真诚，有时与儿女的孝心，不相上下，所以不要灰心，受报答的日子在后。不但我的学生待我们好，连学生们的丈夫，儿女也很关切我们，使我们有家人父子的温暖感情，真是人生幸福。

另外我们在台湾还看见许多老亲戚，有聂府的张五姑母与她老人家的儿女张心洽夫妇，张心漪夫妇(妹夫费骅)；有卓八姑母及她老人家的儿子颢来夫妇及庆来弟，女儿湘来及女婿李孟平；表弟俞大维夫妇，表妹俞大彩。曾家自己的平辈有昭丞夫妇，昭六夫妇，绍杰夫妇，及堂弟昭楠，堂妹宝苏，妹夫蔡声瑞，堂妹昭楣，妹夫谭季甫。表妹夫宣诚夫妇都很帮助我们，尤其表侄俞博生夫妇，对我们襄助更为出力。海外劫余，居然能有许多至亲，可谓大幸。我们都期望早回大陆，为这个目标，大家都愿齐心协力。

另外还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萧瑜先生的高足，乌拉圭籍的爱兰娜女士(Miss Elerna Ramirez)，她在乌拉圭学会了中国文字，能写能画。到台湾来开了一个书画展览会。萧先生真可比朱舜水，而爱兰娜女士的传播中华文化，更是可佩。

三一 后 记

以上各事，都是拉杂写来，不成文体，而且有许多重

复。我一生遭遇，幼年经过大世家的家塾教育，过渡时代女子学校教育，早年的英国女子教育，看见中国改朝换代的转变，两次世界大战，八年抗战的奋斗与胜利，可谓极尽人生的经验了，所以一言难尽，真不知从何说起，加之累次因兵燹遗失文件，一切日记，记录都荡然无存。一切纯靠记忆，自然有许多错误遗漏，还望亲友、同学指示校正。我一生也受不少的困难，几次有性命之忧，但是都蒙上帝救援，得以避免。近来蒙社会人士不弃简陋，要我在大学、中学演讲，我都极力的阐扬精神教育，固有的文化，宗教道德，愿上帝的光辉，用我这微小的器皿，来显出一点点予这些青年，是为至祷。我也借此感谢许先生给我鼓励，宣诚先生及舍弟约农为我校稿，及刘先生云章与各位同学及舍侄宪荣代我抄写帮忙，均在此一一致谢。另外有几位朋友如高德容、朱志群、余若陶、郭述真、罗首席、曾德容、何心洙、傅依仁、文克立、殷德明、袁同畴、胡耐安、曹圣芬诸位先生，都直接或间接予我们很多鼓励，敬此道谢，其他的朋友，帮助也多，恕未一一举出大名，惟有衷心铭感，永不忘记。

三二 在欧洲与埃及国的朋友

前 言

一九七〇年我写了一本回忆录，但因最后两章写得太匆忙，未能说到在欧美友人的招待与我自己的经过，所以

要续写两章；再者，还有些旧时有意味的追忆，不但可以说明早年的风俗习惯，也可以记述当时人们的淳朴忠厚；还有一两章说到我所接洽的国际有名人士，现照我个人的意见介绍与说明。

曾宝荪 一九七二年

说到欧洲，我可说并不陌生，前后去过七次。第一次由西伯利亚去英国，与巴路义校长同行，经过俄国、德国、荷兰、法国，虽是走马看花，但初次出洋印象很深。第二次是为申请庚子赔款事，我独自由上海坐船到法国再转英国的，但交涉并无结果。第三次由开罗到耶路撒冷开世界宣教会后，我由土耳其转意大利的拉巴罗，与曼珠女士同住数日，看过罗马古迹后再去日内瓦，与余日章博士同游法国，再去英国。第四次是在英国与赵紫宸博士同返中国，由法国到意大利，看过庞贝古城，两人都做了诗咏此古迹，因为我们都爱古诗，也成了很好的朋友。第五次在印度开宣教大会后与郑少怀先生去埃及后取道法国入英国，在英国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战要开始了，就坐船直返香港。

到台湾后，我又去了欧洲两次，第一次是在日内瓦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开会时（一九五二年）。第二次是和约农在联合国开会后由美国到英国，参观英皇伊丽莎白加冕典礼——（一九五三年）。后来由法国经罗马，埃及，香港回台北。这两次研究与参观多于宗教会议，所以在回忆录上集里说得少。

我第二次由台湾到罗马时，有于焯吉先生及教廷朱太

太招待，于先生带我及舍弟昭柯在圣彼得游赏了一天，并登上礼拜堂最高一层，在圆屋顶上照了一次相。我对圣彼得教堂的印象有几个特感。第一，它的大广场周围的四层圆柱比例极好，一个人若站在广场中心，向四面观看，每一排的圆柱看见犹如一个圆柱；第二，礼拜堂本身之前部NAVE比世界任何教堂大；第三，神父听人认罪の座位后有一个半圆形的装置板，认罪人可细声说话，别人无法听见，只有神父听见；第四，梵谛冈雕刻，图案画以及金玉品之多，天下少有，还有中国明朝的一位皇后所献の珍珠灯，可惜我不记得哪一位皇后了。总之收藏品种既多且精，再看别国的博物馆，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所做的珍品——连建筑在内都是人手工做的，令我想起了宗教の感人效力之大。有些工作，真是人生的贡献。除宗教力量外，没有一个王朝，一个霸主能维持这样的艺术品一千多年的。甚至两次欧战，双方都尊敬梵谛冈，没有加以摧毁，这是宗教的影响。假如现在有人要极力打倒宗教，不幸而再发生大战，那这个宝藏也就很难保全了！

第三次，我与约农由法国再到罗马，那时于先生已去西班牙，教廷朱太太仍招待我们，并见到了她的公子与小姐，这二位青年，差不多完全意大利化了，我们的留学生，久不回国故而有此现象。大使馆已搬了家，不是先前那幢美丽的花园洋房，而是两间公寓房子，他们很忙，但是在百忙中仍然招待了我们。我们住进了一家旅馆，门外还有很多小食店。我们认为在小食店吃饭，一定比大旅馆便宜，

头两天果然如此，但三四天后便贵起来了，大概是欺负我们外国人，后来我们只好在旅馆里吃饭。欧洲旅馆供给房间及早点，但中饭、晚饭如客人不吃也要扣钱，大约每餐扣美金三、五角。在旅馆我们自己雇车游览，或加入观光团体。我们自己看了斗兽场、罗马古城，随众参观的隧道墓、教堂、花市等等。罗马古城中有一凯旋门，上面雕刻的浮雕有凯撒大帝的战利品，内有犹太人圣殿的约柜、七星灯、饼桌等，这些雕刻，使我们了解《新约》内的圣经故事不少。隧道墓乃是罗马人埋葬死人之处，隧道两边壁上都挖空，外面有铁丝网盖着，里面都是骷髅。这些隧道，长达数里，而且中间分歧道很多，一个人若无人引导者，很可能会迷失在内，而无法自己走出来。据说是当时基督徒被压迫时躲在里面开会的，至今我们进去，还感觉阴森森地有慑人的气氛。当初的基督徒，若没有冒死犯难精神，断不敢在此开会。

我去瑞士途中经过法国，有段茂澜先生及刘萃章先生夫妇招待，住在一家客寓，离中国餐馆不远。这家餐厅的中国老板娘能说流利法语，她带着我买了些法国香水及化妆品，以便到英国时送友人。刘先生又领着我们看了拿破仑的墓、镜宫……等等。我第二次与约农再到法国，仍旧叨他们各位的照顾。这次我们看了凡尔赛宫，及第二次大战签订和约的房子，与巴黎美术馆。综观起来，我们感觉法国的文明接近中国的文化。在巴黎我们也遇见一位在香港认识的朋友，我们坐在街边品茗，眼看来往行人，颇有

北平五龙亭的风味。我到天主堂宿舍看苏雪林女士，劝她回国，她实在在文学上是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的人。在英国的勾留，我要说说约农与我在英国参观女皇加冕的事。我们由美国到英国是一九五三年五月中旬，英女皇加冕是六月二日。郑天锡先生不能正式参加，但他有私人的请帖，约他进入了西敏寺（英皇加冕的礼拜堂）。我们没有请帖，原想买张票坐在敞棚内观看，后来顾小姐接我们去她的友人家看现场电视转播，那实在好得多。由女皇出发的白金汉姆宫一路旅程到西敏寺都看的清清楚楚，女王与其夫乘坐八匹白马的豪华金轿车，前面有开道车，后面有护驾御林军队不下数千人之众，浩浩荡荡，真是难得的奇观。进入西敏寺内，由坎特白雷大主教加冕，抹油（这是基督教承袭犹太王大卫加冕的典礼，用香油抹在王的头上），女王夫婿只做公仆的领袖，并不能与女王平坐，有如中国的驸马爷，地位在君臣之列。他是第一个半跪着吻女王的手，表示忠诚。其余的公侯伯爵按次序行礼，每一个人在来行礼之先，把他自己冠冕取下，交与一个童子侍者（听说是某一公爵之子，年若十三四岁），女王子女却未带来，因年纪太小，恐扰乱严肃的气氛。那日天气忽然转变，大雨如注，那些买敞棚票的，都狼狈不堪。邱吉尔首相出礼拜堂时，有三、四把大伞遮住，完全看不见，但是东加的女王站在敞车上，冒着雨与群众挥手，博得群众欢呼不已。听说英国气象天文台为了英女王加冕，推测了很久，认为六月上旬天气最好，而结果则大大的相反，可见人力毕竟

不能胜天。看这次典礼，我感到英国人的守秩序，守时间。女王行程及入寺各项典礼的时间不差一分，皇室的规矩严肃，虽皇子公主也不能混入典礼场所，沿途的民众，更是守法恭敬，这样的文明国，今竟沦为一个二、三等国家，诚令人不胜浩叹！

在英亲友上集已略说过，我现在只要说三个学校。第一是西田书院，我的老学校。自第二次欧战，学校即迁至牛津，并且同时招收男生，这与原来创办人的宗旨不同，但原来创办人绝没料想到英国——强富的大不列颠帝国——会受到德国人的猛烈轰炸，而且把繁华的伦敦炸得瓦石齐飞，许多学校都受到重大的损失，而不能不实施合并，而迁入较安全的区域，西田书院便是在如此情况下开放的。我到学校时，校舍已经修好了并且加了许多宿舍，已不是旧时面目。我回去时，很有 Tom Brown 再回 Rugby 的感慨。学校依然，而我已改了，满堂青年，而我竟是一个陌生者。幸而校长杰女士，看我如同老学生，并要我复试一次，讲“我的工作与联合国”，使我非常感激。第二个学校便是威示顿堡顾小姐的学校。这个学校是一个私立学校，规模相当宏大，学生约三、四百人，办理成绩甚好。内中有一个中国女生姓周，年龄不过十五岁，音乐方面天份极高，她得过很多音乐方面的奖赏且加入了英国皇家音乐会，算是年纪最轻的会员。其余的学生得过牛津、剑桥、伦敦等大学的奖学金也不少。但顾小姐说她办学校的方法取裁于艺芳的地方甚多，并且采用我们的师生联席会议，

来解决许多的问题。我当时听了真是感到十分喜悦与惭愧，自幸“吾道不孤”。约农也是如此，并且与他们高班学生谈过话。第三个学校是意冬书院，Eton——这是我朋友冯先生的学校，英国阁员出于这个学校的很多，连英国王子也在该校读书——我与约农这一趟去英国，不幸冯先生已经物故！只会见了冯夫人。冯夫人是爱尔兰世家，其祖先曾参加英皇查尔士二世时政变，并且参加了签字判查尔士王死刑的一分子，但她却十分“保皇”而极忠于王室。

意冬学生都系来自大世家，冯夫人请了许多教授来与我们会餐，我发现有一位杨格先生即是日本攻打香港时港督的儿子。冯夫人又因女王检阅童子军要我觐见女王，得了一份请帖，在女王面前走过，鞠躬而退，到现在我还保存着那份请帖。女王身材不高，穿的黑衣，玛格利特公主亦在，立在女王身后，因我眼很近视，未能看清楚她面貌，但身材也不高大。觐见礼虽然严肃，但侍卫人员并不多，英皇还有与民同乐的旧风气。可惜英国的家庭，已不是象旧时般的珍贵了。我在意冬，听见校长说“意冬的学生，差不多有一半的家庭是破裂了的，不是父母亲离婚便是分居了。”意冬大约有一千三、四百学生，都是来自上等家庭——英国的贵族向来保持面子，虽然夫妇不和，在旁人面前决不显露。可是，如今竟是这样公开，这真是家庭的一大变。上行下效，所以民间更甚，这不能不怪逊王爱德华第八的不良影响的了。青年变态心理也就极普遍，因而造成不良少年的恶果，除由宗教及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外，别

无改善方法。除意冬外我还受了陈源教授及他夫人，郑先生及陈尧圣先生的优渥招待，特别在此志谢。

说到埃及国我们都知道是古文明国，但是从罗马凯撒大帝征服后，累遭强邻攻陷，在十八、九世纪中由法属而变成英属，受尽了殖民地的痛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独立，(它已物故的前纳塞总统还成了中东的风云人物)。看起来这个古文明国到底有些根基。我曾先后三次到埃及国：第一次是去耶路撒冷，同行者凡二十余人；第二次是从耶路撒冷去英国，与罗运炎君同行，罗君返国，我去欧洲；这一次我同约农由美返国，一九五三年七月廿日在罗马动身，当时在罗马机场看见贾惠宜小姐。她由非洲返英，我们是由罗马去开罗，竟不期巧合。我们拍电报与驻开罗的何凤山先生联系，何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的夫人又是我的学生，所以我们烦他们在我们到达开罗机场时派车来接我们。哪里知道我机误点甚多，直到夜间两点半才到(原说是九点)；害得何先生等到深夜，至今思及犹令人惭愧交并不已！何夫人还在等着，把我们接了送住一旅馆，距离大使馆只有几分钟的路，房子清洁便当。我们早上吃罢早餐后，便由何先生或者大使馆参事领我们到名胜古迹去游览。何夫人有一位女公子，姣小伶俐，聪明可爱。家中另有中国嫫姆，做事负责尽职，在海外能看见这样一个和睦温暖家庭，可说是幸福的了。另外有一位王参事与他的夫人，王先生是回教徒，在埃及很有办法，他们最大的一个成绩是教会了一位埃及女工说得满口天津话。王先

生的教授方法与那位埃及女孩的天才都是极为可钦佩的。

我们乘船上溯尼罗河十余里，只见两岸的古建筑间参有青翠的花木，其中尤以玫瑰花在埃及的特别好。何先生说开罗可以三年不下雨，一切用水全靠尼罗河。我们后来真看见了埃及人的房子没有房顶，只有横梁，上面摆放家具等等，犹如一个收藏室样，因为不下雨，就大大的利用它做收放杂件的地方，东西堆放多了还可利用来遮太阳。尼罗河由上游的大瀑布一泻千里，滋润了埃及的沙漠地（可以种植），到了地中海岸分成五支大的支流，其间有无数的三角洲，富裕非常，河水由人力造成水厂，以供给全市自来水及各种用水等，尼罗河——真是埃及人的救命王菩萨！难怪被埃及人尊为父为神的了。

我们在那里的时候，还是纳吉布做总统，与西方国家亲近，后来因美国人不肯资助埃及人修筑阿司旺水坝，而苏俄愿出钱协修，这才使埃及人离开西方，等到纳塞执政，就完全倒入了苏俄的掌握之中。英、法、以色列三国为了苏彝士运河而相继对埃及宣战，但美国扯住了他们的腿，不让这三个国家军队打入开罗，以致埋伏下中东的纠纷，到至今是越缠越凶。而中东除以色列外，差不多都变成了左倾国家，苏俄的势力已侵入了地中海，连印度洋也常看见了它的兵舰了。美国的姑息政策，不但害人，而且亦害了自己。假如中东的油源全入苏俄的势力范围，前途真不堪设想。

埃及国的宗教以回教为主，人民极其诚恳守法，每天中午，必向麦加圣城祷告，一听到钟声，人民一律放下工

作就地匍伏祈祷，这种对宗教上的信仰，的确令人敬佩。但他们的耶稣教，却显得十分退化，而迷信甚多。有一个叫谷中礼拜堂，据传说是马利亚带耶稣逃难的所在，里面烧香点烛，并有一棵树，树上挂满了红绿布条，上面都是小孩寄名祈求免灾者的名字（此点与我们中国寺庙风俗相同）。其他古迹如牛墓、金字塔等我们都看过。金字塔相当宏伟精致，石头与石头间的接缝连小洋刀也不能插进去，内面封葬有帝王皇后的木乃伊。何先生带我们月下来欣赏这些古迹。沙漠中夜晚相当冷，而白天却很热，因气候的关系，所以把阿拉伯民族训练得强悍勇猛。至于他们上古时代的文物丰阜，可以从博物院中，得能觅见不少。图登卡门院所陈列出来的宝物，大到舟车以及战争武器，小到首饰珠链别针，都是极其精致的制造品。珠光宝气玲珑的装饰品，真是美不胜收，目不暇接的了。他们三千多年前的手工，就是现代的巴黎、伦敦、纽约的手工艺品，也不能相与比拟的；以数千年的古文明国家，竟沦为“落后地区”，真令人惋惜浩叹不已！但我个人觉得，现在的埃及人，因为历代战争的关系，而有混血儿的存在，所以，现在埃及人已不是纯粹的古埃及人。至于象图登卡门时的文化及技工，更加谈不上了。

三三 在美国的亲友

我在美国，虽没有读过书，但先后去过五次，旅行的

地方也不少。可惜我每次去，虽然感觉到物质文明在不断的提高，但道德观念却日渐减少，人情味也似乎很少。第一次我去美国是二次大战前，当时我与约农因不认识路，常要在路上问路。心中很害怕美国人看不起有色人种而碰钉子，但是很幸运没有一次碰上坏人。这些路上所遇到的行人，不但很和气的指点我们，甚至有亲自送我们一程的。大战后，美国人们就大不同了。公共汽车，地下火车人潮拥挤时，毫无让让老年人或妇孺先行者，至于起身让坐，则更是绝无仅有的了。彼此以为我有我的自由。除自己利益外，毫不考虑其他的事。马路旁的草地座位上，坐满了老先生和老太太，他们并不穷，只是没有人照顾。公园内或夜晚僻静街巷，若有人行凶抢劫，也没人敢去救，纯是怕惹火烧身，各抱不管闲事的态度。想到旧时美国人的冒险犯难，合作互助的旧道德，及高尚的基督教精神，今竟日见沦丧，真令人为美国前途忧！科学是工具，运用工具的是人，人若没有道德观念，而用科学工具，更能危害自己及别人。

近年在台湾，甚至在东南亚各国，无不以为去美国就是登天堂。父母及学校费尽心思把子女送到美国。依照教育部的统计，百个学生中难回来十个，人才外流，成了个普遍的问题。抗日时期，我们与美国合作，我国学人——军事、科学、文化、文学、外交……专门人才去美的不少，因此我也有好些的亲戚朋友学生在美国。老一辈的，大都想回国，都有思乡怀故旧的心情。

一九五三年，我与约农去美国参加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乘PAA先到东京，住在东京帝国饭店。这个旅馆是特别建筑的，虽经过东京大地震也不会倒塌，可惜的是房间里很热，房钱也昂贵，后遂由大使馆帮我们介绍迁入“雅叙园”，但房钱也不便宜。我们多承张伯瑾先生引导，参观了孔庙，（顺便买了些中国旧书），明治博物馆，一部份帝国大学。我深深感觉日本人的爱国心与进取心。他们对于自己文化及武功的成就都很自豪，虽然有美国驻兵七年，而国民并无一点自卑感，自认是亚洲未来领袖。原子弹使他们警惕，而更加努力，是一个可敬可畏的民族。我来往日本数次，承董先生、沈先生及使馆诸君的照顾，谨在此深深志谢。

在东京有陈夫人之妹谭润女士及其夫陈冠澄先生热心招待我们，他们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很小，他看我的白发满头，他说：“我喜欢你的玻璃头发”，真是形容得聪明。第三次经过日本，我与表妹张心漪也住在他们家，遇见聂府福妹，她们二位幼年同学，更有他乡遇故知之乐。润妹并带我们去看了一次日本脱衣舞，观众女性极多，但都是看纯艺术性的表演，并不猥亵。

到美国三藩市我们乘飞机直去纽约，住了雕达旅馆 Tudor Hotel。这里离联合国大厦很近，步行仅五分钟即到。我们每天开会，散会后便访晤亲友，在纽约那时有表弟卓牟来伉俪，聂光地、光坡表弟，朱光泽表侄，舍弟昭柯，及表妹陈润诸位。大家请我们吃家制中国菜，真是色、

香、味俱佳，大快朵颐，觉得无限快乐。我每次在联合国总请一次开会各国代表，这却很难定菜单，因为有些回教国家代表不吃猪肉，佛教国家代表不吃牛肉，只好请吃鸡。在中国鸡是美味，但鸡在美国是较便宜的一道菜，因为冷藏已久，失去了原有鲜味，吃起来如啃皮革，真令人倒胃口。有一次我请了长沙多年的胡美医师夫妇，旧雨重逢，我们都有着无限感慨。

会后我们去华盛顿，那时表弟俞大维夫妇还在美国，我们去访问他们，我们的老同学张成智不远千里而来住了两天（此节后文再叙）。在华盛顿看见谭伯羽兄和他夫人，谭夫人虽属德籍，但可以做中国菜。他们的女儿，既能干又美丽。表嫂俞夫人是陈散原诗人的女儿，我们都叫她九姐，她能诗能画，又善于烹饪，表弟与我小时同过家塾，所以我们在她家中享受极了，既吃好的酒食又每每漫谈至午夜后。九姐并带领我游历了许多地方，如：国会图书馆，广播中心、林肯墓、樱花林等。在这里的樱花比东京的更娇美，因为树多成林，有如红霞十里。近华盛顿的中国馆子，也尝试不少。在九姐家中得见韩将军，送我木刻文正公像一座，令我感激不少。另有王参谋，也代我帮忙很多。俞表弟夫妇有三位公子，长子已结婚做事，老二尚在读书，老三精于数学，还在家里研究，是一个孝顺勤俭的孩子。另外表侄朱光泽夫妇，曾招待我们；他们有儿女三个，都能说几句中国话，我很爱这一点，我不能不一提。许多中国留学生甚至中国学人都让他们子女只说英文，反而认为

自己是有色种的美国人，较之亡国数千年的犹太人，尚不忘记希伯来文和规矩习俗，这真有天渊之别。说到这里我不能不佩服赵元任先生夫妇，他们家里的小孩都能说流利的中国话，还有柳克述先生的女儿柳灿，和她先生朱希赞（老同学唐冰瑜之子），也教他们的子女说国语。希赞的弟弟炎正更由匹兹堡赶来看我，对于太老师可算真正亲切的了。唐冰瑜还有个侄儿唐仁寿也请我们吃过饭。海外乡情，至今思之，尤弥足珍贵。

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叫“双橡园”，亭园广大，建筑古香古色，景色宜人。我们曾先后应顾先生，董先生，叶先生等雅邀来此赴宴。这个地方很不易得，可说是众大使馆中最美丽的一个。可惜我们经济拮据，未能着意修理培栽花木。园内有香椿树数株，九姐为我们采了香椿炒蛋，大约是美国人不知道吃香椿凉拌或炒蛋。这不但是中国风味，而且是道道地地的湖南风味，吃了之后令我怀念湘乡富厚堂不已。重回故里未卜何日！

我在纽约医病时，每日去舍弟昭柯家吃夜饭，叨承弟妇张蕓殷勤招待，她每日上班，晚间仍为我做菜，真是感激之至。同时并与三个侄儿女见面，甚有家庭乐趣。他们的大女儿伽因已经与卓高煊先生之子卓俊结婚，我们也躬逢其盛，吃喜酒并祝福他俩百年好合。侄儿颂平读高中将来拟学医，小侄女小怜读初中，一家融融泄泄，很是快乐。在纽约由昭柯驾车，约农与我晤了钮永建老先生夫妇与他们的小姐与女婿李大夫。钮老先生年高德劭，虽在病中而

壮志不衰，只想到为国出力。钮夫人更是我们祈祷会的领袖，常常领导劳军行动。我们又访晤了何廉教授，又承陈立夫先生邀宴。我们住在纽约近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一五街，天气炎热又无电扇，幸朱光泽君为我们设法借来电扇，又代买汗衫，才感觉舒服些。约农的学生结婚请他去证婚，回家累了，次日发高烧，幸我们曾经认得一位湘雅毕业的钱太兹医生（曾在台北补文凭），所以请他来诊病，打针吃药。朱光泽君照拂帮忙约农不少，真是感谢。

聂府在美国的人不少，但在纽约附近的只有聂光地、光坡表弟及卓牟来、孚来与陈家润姐。牟来表弟是一个商业巨子，管理茶叶公司及航业公司，但他很长于旧文学，能写能诗。光地表弟有房子在新泽西，我们曾去府上吃过表嫂做的中国菜，他是位热诚爱国的好人。我也为银行取款，买票等事麻烦他不少。光坡表弟伉俪也请过我们，他们的小儿子长得聪明可爱。陈润姐曾在中国银行做事，现在自己创业与另外一位陈小姐同住一屋。润姐喜国学，曾订廿四史一套，因书店大意，竟未附上元史，虽经她屡次写信询问亦无结果，我回国后替她代查也无结果，书买如此，如何能得到海外侨民信心，真堪浩叹！

我们有一个侄女，小名曜曜，是五弟昭桓之女。五嫂黄友麒，曾在金陵女大读书，中英文都好且写得一手好小楷。夫妇二人只有此一女，曜曜出国，现已廿余年，五嫂虽然思女心切，但因无法出来，真可怜可叹！曜曜学的是病理检验学，已嫁与前王东原先生之子王定明君，他们住

在底特律——福特汽车厂所在地，曜曜夫妇有儿女二人，年纪都还小，但都聪明可爱已极。我们去参观了福特汽车厂，规模宏大，员工众多。我们从炼钢部份看起，由废铁成钢，钢成轮轴，齿轮，车身，再装上设备等等，一部部新车直到有人驾驶出厂，不过二三分钟，工程过程真是了不起。我们住了三天。也参观了超级市场，又看到了他们的新屋，便电话到支加哥通知老同学余叔恒说我们将去访晤他们。有关余君的招待我留到下一章再说，但在这里有一段小插曲，我不能不说。在我们没有离开支加哥之前，约农便去航空公司划座位去洛山矶，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说：“今天下午便有一架喷射客机去洛山矶，何不划这架的座位……？”约农踌躇了一会，便问要多少钱，他说：“每人十七元”，约农便划了喷射机，回来告诉我时，我说：“太贵了，卅四元可以买很多东西”，他说：“我看你新病方好，坐飞机时长，坐喷射机时间短一半，何况我们没有坐过喷射机，这也是一新的经验”。于是我们通知余叔恒及张惠雅君，他们都来送行，我们也电话去告知了李孟平兄及表姑母，当日下午三时离开支加哥，下午六时便到了洛山矶，八姑母，表妹卓湘来，表妹夫李孟平都来机场迎接，大家欢欢喜喜的到了李府。

八姑母在台北时本来与表妹同住，所以到了美国时也在李府。孟平兄是洛山矶总领事，每日甚是忙碌，湘妹又教书，老人家既可含饴弄孙，也可栽花种竹，怡然自得。我与八姑母小时同玩过，也很投机缘，当夜同榻话旧，直

到午夜。次日早起正在早餐，大约八时半，忽然电话铃大响，乃是领事馆的电话说：“今早八时由支加哥飞洛山矶的螺旋桨推进飞机在飞行途中失事，碰上了高压电台，全机廿六人，全部罹难，无一幸免。”初听了我们还只骇然，后来一想，这架飞机正是我们原来订座的那架飞机，当时约农若不改换乘喷射机，那我就与世界永诀别了，好险！既而我们忽然笑说：“我知道我们的命值多少钱了，十七美金一条”。本来是狂飙大劫，竟成我们莞尔谈资，这不能不感谢上帝救恩和祖宗德荫了。我们回国原定美国 A. O. A. S 飞机，原是美国退役军人所设，极不守时，普通得迟到数小时向为常例，这一日忽然提早一日起飞，幸而我们因坐喷射机也提早一天来，否则我们也赶不上它了，约农先见可佩。在洛山矶承表姑及表妹夫妇，带我们参观了中国城，这里的要比较纽约小些，但干净得多，陈设也有些中国手工艺品，不过我看了很多的象日本货。孟平兄请了几位朋友来会我们，其中有陈锡恩博士夫妇，在东海一别十余年了。听说长沙陈玉钰校长及其令媛陈铎也在洛山矶，但未谋面。湘妹的子女都很好，读书每列前茅。八姑母则写字消遣，写文正公不忤不求诗极好，曾赐我一份，台北市曾氏宗亲会一份，特此附笔鸣谢。

我们也去参观了一个花园，里面玫瑰花品种极多。还有一个中国式的花园，内面雕梁画栋，外面绿瓦红墙，亭园曲栏，古色古香，不过亭榭间无匾额对联，真是美中不足。我总认为中国的对联匾额是一种特别中国文化。无论

多少亭榭楼台，千红万紫，若没有题字其间，中国文化气氛，就减少了很多。游园次日，我们便乘坐 A. O. A. S 飞机回国，中途路过琉球群岛，停了一夜。琉球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影响还是不少，不过美国势力，到处可见，日本人的潜力，也深深的存在。

三四 在美国的老同学

艺芳学校可算是人数最少的学校了，全校大、中、小学生总数亦不过三百余人；但是老学生在社会上工作的几乎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而留学外洋的也不少。我们出席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来美国，就承她们的热烈的招待，在纽约时有晏源理同学及她的先生朱定一热情的招待。朱先生在美国国防部做事（这是很不容易的），他俩有一个女儿新从大陆来美，聪明而好学，虽只初中程度，在美国不到半年，便赶上英文、数学各科。

我在华盛顿时，老同学张成智不远千里而来看我们，坐夜航飞机由阿特兰他 Atlanta 到华盛顿；那时俞大维表弟及表嫂都在华府。张成智同学便住在女青年会，她每天都来看我，真是可感。她的先生杨胜德君，在美国南部做事。张慧雅同学的儿子陆胜云和李香林同学的儿子赵友勤来台探亲，两人都来我家吃过饭。张成智同学的两个女儿秀菲 Faith 秀亚 Emmeritta 也来过台北，并都到我家来过。张君在美国教中文，两个女孩都聪明俊秀，而热中国文。

化，张君可说是爱国者，能使她的下一代不忘祖国文化。一九六一年我因为看乳癌病去纽约，她又从南部飞来看我们，自己住在一个学生旅馆，每日亲趋侍问，我们同参观了联合国，她又殷勤照拂我们；师生感情能如此，真不易得，使我们得安慰不少，我们五十年的教书，并未曾白费时间。

既在纽约，我还要提一提两位小门生，一是朱希赞，一是朱炎正，都是老同学唐冰瑜的少君。唐同学的先生朱志群是湖南有名的实业家，到了香港，夫妻二人同办商业，我每次过香港时，都由唐同学招待，尽心尽力，无微不至，可惜天不假年，唐同学不幸于一九六八年去世，这真是艺芳的最大损失。我们一九六一年在纽约时，朱希赞君请我们去他家吃饭。他的夫人柳灿是柳克述先生之女公子。他们有两个女儿，柳女士教她们说国语，朱君则与她们说英文，我们都感觉到柳女士的教育方法不错，能在国外而保全国粹。那天朱炎正君由他处赶到纽约，到哥哥家来看太老师，实在难得，可见唐君教子有方了，虽是万里海外，还叫她的儿子们恭敬师长如此，诚属难得！我们去朱家——他们住新泽西州——离纽约一河之隔。舍弟昭柯自己驾车，我们过河后走过很多市镇，街道整齐，但走了很久，想要找人问问路却不见一个人。家家户户都关上了门，似乎无人在家。最后才找到一家小糖果店问清了路来到朱家。可见美国地广人稀，也可说是美国人人有事做，而在街上闲逛的极少。

我们离开了纽约，先摇电话给余叔恒同学。她的先生姓陈名鹤梅，是一位学政治经济的。住在支加哥。支加哥乃是美国一个最大的工商区，我们数次往返，我与俞大彩及张心漪表妹来美都是叨承她家招待，留住、请宴等等。我们参观了科学博物馆及支加哥大图书馆。科学博物馆有各种新出品的工业物品及电化工具，真是令人感到近代科学的可爱和可怕。图书馆则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但与别处的图书馆也没有多大的区别，不过书多，取阅服务方便，图书阅览室阔大。陈君夫妇俩有儿女三人，尚有一族兄弟在同住。支加哥本来有种族歧视，有些旅馆不许有色人种居住，现在已好些了。余君又为我们订了一个Motel房间，此种房间专为自驾汽车的人歇宿的；楼上卧房，楼下即为停车场地，吃饭去餐厅或者叫菜送来房间里吃（自然叫菜来吃贵得多）。此客寓在郊外，与湖滨甚接近，风景宜人，余君使我们又看到了美国幽雅的另一面。她曾留我们住过城区的一方面，实在是设想周到。我们就是在这里与张慧雅同学接洽，去她家拜访的。

张慧雅同学是在艺芳抗战时毕业的，后在湘雅学医，胜利后回长沙又为母校校医。她来美后，学业与家庭并臻优美。她的先生陆卫平也是一位有名的医生，他的家在盖镛Gary，我们由支城驾车，约一小时即可到。她的家小巧玲珑，甚为精致。他们有三个小孩：长男腾云长于音乐，曾来过台北就读二月；次男腾达善演讲，在演讲竞赛时曾得冠军；小的女儿腾珠，也在学校名列前茅，真是一门学

敦品粹。慧雅同学在学校五十周年校庆，曾来台北加入庆祝，乘长风万里，来赴校庆，可说是尊师重道，至于极点的了。陆卫平医师，也来过台北二三次，最近还在台大医学院做了客座教授约二月。她们夫妇两位，在留美学生中，取得的荣誉不少，这不但是艺芳之荣，也是全中国之乐。慧雅同学，本来品学兼优，又能同时服务国家、社会、家庭，做到好公民，济人救命的好医生，又能教出三个好的儿女，每人都有专长，真是难能可贵。一人集爱国者、贤母、良妻于一身，当之无愧。最难得的是她们对我的爱护，为了我的耳疾，曾寄药给我，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最近陆卫平大夫来到台北时，又为约农介绍老年病医生，为他诊治高血压及记性不好等病。他们俩位的尊师重道，在这人情浇薄的现实世界内，真是令人感佩。

在芝加哥曾与余君叔恒夫妇及张君夫妇同驾车在湖滨游赏，Lake Superior湖可算世界的大湖之一，一望无际，差不多同海一样辽阔。据说有时风起，浪高如山，也同海中现象。总之到这样地方看看，才感觉美国之大，风景之奇特，出产之多。后来我们又一同去吃中国饭。大致说来，在美国生长的小孩，都喜欢大块吃肉，如牛排、半只鸡……等，比起我们中国菜，用肉做佐料——除猪蹄膀之外——在他们则不够享受，所以他们小孩，除中菜外还吃了牛排及烧牛肉等。当然少年人需要更多的蛋白质及肉类，而老年人则不需要，甚至近代医学认为有损，因兽类脂肪太多，易长血油，看起来我们的祖先是从几千年经验中得来的。

甚至有许多中国老年人根本素食，认为长寿之道。我与约农还是从众吃荤，但不吃肥肉猪油一类的东西。

老同学夏开息(现已与丁君兆治结婚)，虽未自己招待我，但她通信要她的姐姐夏开享招待。夏开享君是医生，在纽约“癌症研究中心”做研究工作，考查癌症的成因及治疗法。这个研究中心，也是我医病的医院的一部份。我每日去照“培特”光，在走廊上看见了她，她总是迎上来招呼我，并且请约农与我到她们的自助餐厅，吃过两次饭。这里的食品较外面便宜，而且干净。有一次她因有事先走了，忽然来了一位外国人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我们说是的，他就用国语与我们很亲切的谈话，声调不错，平仄也准。我们不禁问他是否到过中国，他说：“没有，我是在美国雅礼语言学校学的，我已有两年的学历了。”我们问他何以要学中文？他说：“中文是世界大多数人说出的语言，将来前程无限，加以我是犹太人，有传统文明的爱好，我现在还能说希伯来文，我也没有去过以色列。”后来他告诉我们在美国的犹太人是如何爱他们的民族与文化，又如何想复兴故园。我们便告诉他只有在中国，犹太人便受同化，因为近河南开封，有犹太人的后裔，已经完全中国化了，他听了很为骇异，我们说：“这不奇怪，因为中国人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思想，所以不逼迫犹太人，让他们可以安居乐业，因此犹太人也就放弃那种防敌的思想了。”他听了很以为然。我们后来虽然见面数次，而每次都讲中国话，可惜我未记清楚他的名字，但属这一类的犹太人恐怕美国还有

不少。

老同学周光美君去美国差不多十几年了。艺芳学友总还记得她的豪爽性格，爱校心情。在长沙时，她曾为学校申请救济署而取得药物二大箱。到台湾后常来我家，喜欢谈星相，扶乩等事。人极其风趣。我们到美国，她也曾来信请我们去伊令洛玩。但我们不能去，因时间关系，要赶回国，她的好意，我们心领谢。周光美君现在已与张立权先生结婚。

李熙同学前年与她的先生彭清仁去美国。

彭先生为中国航空公司开辟新航线，为国家谋利增光，甚可佩服。李君去后，我未去美，但她常常写信问候我，且寄中国物件，及中国旧小说等。每次有人来，她必要带点东西来，使我愧谢不尽。她们有四个男孩子，大的学医，在台北，三个小的在美国三藩市，虽读外国学校，李君仍然教他们中文，以保全国粹，贤母良妻，李君当之无愧，何况师生之情谊如此深厚，更加使我佩服。

除这些正式学生外，还有几个小门生，也与我通信或赠送东西给我，如王曼曼女士、宣久青女士、蔡月辉女士、王世颖君及陈旭昭女士、邵祖恭君……等，虽然信息不多，然而敬老之念可赞扬也。

约农的学生，对他很好。最令我记得的是，有一次我们在煮饭，而两人都是外行。忽然袁守谦先生的女公子来了，她是约农台大的学生，留美已久，但对烹饪很有研究，便帮我们把饭煮熟，也陪我们吃了她自制的中国饭菜。到外

国吃门生的手制菜饭固然多，但总不如这一次解除我们的困难的难得，不然我们只好吃半生不熟的饭了。另外有好几次，约农的学生——有些东海的，也有台大的——都来欢迎我们郊游野餐。还有人请他为他们各人证婚，师生之情谊，甚有古风，且有家庭父兄子弟之感，最是令人追忆的。

最近余叔恒同学与她的先生陈鹤梅君来台湾参加海外学人国家建设研究会，停留三周，对于国是，均有贡献。后来九月下旬张成智同学和她的先生杨胜德君也来台湾观光五日。艺芳学友会，我与约农都能略尽地主之谊，请他们吃便饭，并畅叙远别重逢之情，十分愉快。

三五 我曾会见的几个外国名人

我所谓外国名人是与中国有关系或世界闻名的人。我看见他们的时间，有些我已记不清楚了，但印象却很深，名次的前后并无重大的关系。

李提摩太先生 Timothy Richards

他是介绍西学到中国的先锋。开创中国的广学会，在上海发行许多翻译出来的科学书，例如声、光、化、电、数、文、地理……等书。我小时便看见我父亲看过这些书，有时还同我讨论，我还记得有一本书名叫《热学须知》。我不懂甚么叫“热”字，父亲便说了瓦特用热烧水，使热变成能力推动壶盖，后来进步到用热能来推动引擎而产生动

力，这种研究，就叫热学。庚子赔款，拳匪在山西杀教士最多，赔款也多。教会人士的家属不自己接受钱，便用这些赔款开办了山西大学。李提摩太被举为校长，他办山西大学极力想沟通中西文化，成绩很好。这位老人退休后住在伦敦西郊，我与巴先生和约农曾去拜访过他，承他与夫人款待茶点，并把他最珍贵的大作《四百兆人》亲手题字送给我，文章内容是赞美中国文化与如何使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沟通。最后一章是拟一个国际联盟的蓝本。

The family of nations，这时的欧洲人民并无这种思想，可见这位老先生的高瞻远瞩。后来又去访问了三、四次，他知道我们是文正公的后裔后，他又说与忠襄公在山西同时赈过灾荒，又赠我们他在山西赈灾时的一本小册子，可惜这些宝贵的书，都因累次的兵燹而遗失，真是可惜极了。

威尔斯 H. G. Wells

他是有名的历史学家也做了许多科学小说，并且曾预言过中国抗日必胜。此人有儒教的世界观念，抗战时（一九三九年）我在英国与他同过席（在俄国大使馆）。他对中国文化很同情，并说他将来一定来访中国。俄大使餐桌上餐具都是金的，俄大使说：“这些都是沙皇括削的民脂民膏”，我不禁忍不住问他：“那你为甚么不退还给人民，放进博物馆，或变卖出钱来赈济贫苦人民呢？”他说：“这些是俄国的艺术品，代表俄国文化，用在外交上正是表扬俄国的

文化”。他的话真是外交词令，也表示俄国人对于俄国的传统艺术品，仍旧保存。

达尔文爵士 Sir Francis Darwin

他是天演学发明人查尔士·达尔文的儿子，相貌很象他的父亲。他研究生物学。因为他的贡献，英国皇家就特别赐颁以“爵士”衔。这是英国一种奖掖成功人物的办法，不论文、武、工、商、医、科学发明家、音乐家……等人，只要其对国家有特别贡献者，都可封为“爵士”，连近来蹦蹦跳跳的披头也封官晋爵，便有些从道义观点上来看的人，不愿重视此所谓的爵位，而辞谢了他们的爵位。达尔文爵士却是一个极其诚恳的科学家，他在剑桥大学授课，我曾经听过他的课，演讲时声音洪亮，程序分明，交待清楚，学生们都很佩服他。

坎特伯勒大主教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一九三九年我在印度开基督教宣教大会后去英国，代表大会演讲。在未巡回演讲之前，先受大主教在圣保罗堂祝福。我们一共七人，计中国二人——郑君少怀与我——印度人两位，非洲人亦两位，日本人一位，（参加这次祝福典礼的人员，都是教会之人，及代表们的朋友。我的居停谷瑞姆女士也在内，她照顾我在英国的生活，我住在她家，如在巴师家一样。她有二位妹妹，有一位耳朵甚聋，我也请了她两位吃中国饭），当我们就坐后，乐队奏乐，唱诗班

唱诗，大主教由堂中迈步上圣坛，我们七人随即步出座位，到坛前栏杆外跪下。随后大主教宣读《圣经》并致训辞，无非奖誉我们海外已成的工作，并勉励未来的辛勤，又特别注重基督教对亚非二洲的责任，开发民智，努力灵修，并达到世界大同为目的，讲完后便用双手按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口内提名祝福。后来全体起立，唱诗，我们也各自回座位，大主教退入圣坛后面，礼成。总之仪式虽短但极庄严隆重。大主教乃是为英皇加冕的，得他按首亦甚荣幸。当日大主教又请我们至兰伯特宫茶会，谈话中我发现两位印度的代表是马太先生及夫人，他们是印度的老基督徒。据当初传说使徒多马去到印度传福音，所得教徒，都改用《圣经》上的姓氏，所以印度有姓马太，马可、约翰……等姓者。另外一位非洲主教也是在一九二八年与我同开过会的。后来大主教又与我们合摄了一张照片，这照片我至今还保存着。

庄士顿 Johnston

此人虽然在外国不是大名鼎鼎的人物，然而在中国知道他的却很多，他是清朝逊位宣统皇帝的老师。曾教过宣统英文，并给他起名亨利。在宣统逃出北平后，曾劝他留学英国，但受了瑜妃、瑾妃的阻隔。他说溥仪人甚聪明，学习能力也好，但性情懦弱，而没有刚强果断的能力，每每受他父亲载沣，兄弟溥杰及瑜妃、瑾妃等的处置。若是听了庄士顿的话，最少不致受日本人的挟制。我会见庄时，

正是陈友仁收回汉口、九江、芜湖、镇江、南京等五处的航运主权。而只有上海英国人决不肯退让；才有收回上海租界的会议。英国法官费澄Feathem来上海开会，庄士顿也在会上，我当时也在会上，会议谈了两次，庄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在座各人，中西人士都有，但我已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了。

翟教授 Prof. Giles

翟教授早年曾在中国当领事，喜爱中国文学，曾翻译过中国的四书，现在这个译本四书，仍然用得很广，又编印了一本翟氏中英文字典，并翻译蒲留仙的《聊斋志异》（神怪小说），这些书都很有名气。他告老之后，他的儿子翟兰思Lanslot也做了中国长沙的领事。他在长沙时并到艺芳来过。翟老先生退休后做了剑桥及伦敦大学的中文教授。我在考伦敦大学时选了中文为第一外国语，占便宜不少。中文题目是他老先生出的，中译英是翻译一段四书“当尧之时洪水泛滥于天下……”一章，英译中是一篇秋瑾女士小传，大约是三百多字，另外还译些中国成语造句等；这些我当然不觉得困难，很容易的通过了。后来我到剑桥拜访翟老教授，与他老畅谈旧事，他深信中国文化有永恒持久的价值，并且称赞中国开科取士能得到真正人才，还提到先文正公的湘军领袖大半是科举中来的。

罗素 B. Russell

提到罗素，恐怕是连中国的中小學生都知道的。他出

身贵族，从小就享受到高尚的家庭环境，在剑桥大学，因精研数学、哲学出名。民国八年受北京大学之聘来中国讲学。后来到了长沙，同来的还有杜威夫妇，霍德进博士及勃拉克女士(Miss Black)。我们起初以为勃女士是罗素的秘书，但经当时同来的赵元任、杨端六两位先生告知长沙各界同人，才知他们是未婚而同居者。原来长沙教育界拟请他们来，借长老会礼拜堂演讲，再来艺芳女校接受欢宴，因为艺芳的校园风景优美宜人，在长沙城内算第一，请帖也都发出了，不料前一日长老会福湘女校校长林师母清早到我校问我说：“曾女士，你晓得罗素与勃女士他俩是未婚而同居的么？”我说：“我昨夜才晓得，但请帖已发出，而且请的都是知名人士。”她说：“如此我们几个教会学校将要退出，也不敢借礼拜堂给他们！”同时巴老先生也不大以他们为然。她说：“我们是一个基督教的高中女子学校，怎么能请一对未婚而又同居的男女来吃饭呢？我决不赞成”。当时我也心理上感觉对青年女学生的楷模及平日我的教育，都不适合，便硬着头皮写了一封信给罗素，说明有些学校不同意罗、勃二人的生活，不愿意请他们。他们回了我一封信，大意说：他们的生活行为，是英国法律逼迫成的，因为那时英国离婚法律必要有遗弃、相打、外遇等事情同时存在，才能离婚，所以他们不得不如此。这封信我留了多年，到逃难时不幸遗失了。

他在长沙演讲内容很深奥，没有适合的翻译。长沙人士便请约农来翻译。约农是时正守母孝，鬓发蓬松，身穿

灰布长衫，土气十足，听众骇然说：“这个乡巴佬如何能做翻译？”岂知约农翻译得很好，大受众人称赞不已。虽然如此，我们总以为与罗素他们不会再有来往的了。岂料在几年后，我去英国申请庚子赔款资助学校，在一位贵族家宴会上又碰到了罗素。主人介绍我说：“这位是曾女士，来自中国长沙。”罗素说：“曾女士，我很知道，我们是旧相识。”席间也没有再提起长沙的一些往事。但是后来庚款委员会上他还帮我说了话，说：“艺芳是一个值得帮助的学校。”不幸过了两年后“七七事变”发生，计划遂成画饼。虽然我没有得到庚款，但是我仍然感激罗素的宽宏大量，不念旧恶，不愧是一个有修养的大学者。同他同来长沙的还有霍德进博士(Dr. Henry T. Hodykin)，我也替他翻译过。

赫德夫人 Lady Hart

赫德是办中国税务最为有名的人。在庚子义和团闹事时，他也提出了些计划来谋求和平。后来李文忠——鸿章——谈和时，他更是奔走不少，近来有些论庚子以后的事的人甚至说庚子以后的中国，乃是西太后、袁世凯、庆亲王、赫德等的政权。赫夫人我在英国曾看见，是个明智的女子，很能帮助她的丈夫。她告诉我庚子使馆被围的事。虽受了许多苦楚，但极赞颂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的东南互保。她说只有在中国才有这样的可能。

以上都是英国人，也是我留学及重游英国所遇到的一些事实。最后我不能不一提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和她的

妹妹玛格利公主。一九五二年，我由瑞士开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后去英国访友，由冯爱德华夫人的介绍，见了温莎宫的管理主任，得到参观英女王检阅女童军的许可证一纸。这个证件，我至今还保存着。当日我们站在西廊，女王及公主缓步进入操场，这时军乐大奏，其时女王居丧，尚未加冕，与公主都穿着黑色衣服。检阅不过半小时，然后由走廊步入行宫，我们参观的，都向她鞠躬，她们也颌首含笑答礼。所有一切仪式很简单而隆重，这就是我见英国女王的一点经过情形。

现在我要说几个与中国有关系的美国名人：

穆德博士 Dr. Mott

他是位热心为青年服务的人，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夫人也是如此。我虽听过他几次的演讲，但真正与他有正式接触是在耶路撒冷，一九二八年开世界宣教大会时，他当主席，我真佩服他的精神与能干。虽然来自各国的代表有近千人，但他能过目不忘。凡站起来发言的——固然他面前有份名单，但总很客气的说：“请某某先生或某某女士发言”。这种本事我十分佩服，因为我自己是近视眼，总看不清楚人家的面貌，以致相见过多次的人还认不清，但幸记姓名的本事尚好，看见过的名字，总会有点印象。穆德先生在耶路撒冷克西马尼园所领的祈祷会，是我一生中一个最大的灵感，上卷已经说过。第二次宣教大会是一九三八在印度马德拉斯省的坦勃兰举行，主席也是他。在这次

的大会中他强调科学文明如无宗教不能教人济世。会后并推选我与郑少怀君去英国代表这次大会宣扬真道。

杜威 Dr. John Dewey

提起杜威博士，因为是胡适之先生的老师，更是无人不晓。杜博士夫妇，也在民国八年来过长沙，亦是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杜威的教育方法，是以供给社会的需要为宗旨。近年来也有人与他的意见不同，认为教育应当领导社会，不可迎合社会。这也是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约农与我都替他们翻译过。杜博士言语爽利，段落不长，比起罗素的要简短许多，较容易翻译。杜夫人在女青年会讨论“女子职业与家庭问题”，是我所翻译。长沙来了这些贵宾，害得我们连早饭都被人请去做陪客，中、晚两顿，更不必说。总之杜威、罗素对中国的新文化及青年影响甚大，我也感觉到有幸认识他们。

罗斯福夫人 Mrs. A. E. Roosevelt

她是有名的女政治家，曾协助罗斯福总统经过世界第二次大战。罗斯福去世后，她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极其努力，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就是由人权委员会分出来的。我在联合国得见过她一面，这位老夫人思想有点左倾，同时也极喜招待左倾的青年作家、美术家、游历家等等。这些对于美国政府的容共颇有关系。

尼克森总统 R. Nixon

他夫妇二人是一九五六年来拜访我们“总统”与夫人的，那时他还是美国副总统，旅行各国做友谊的拜访。台中东海大学曾请他主持破土典礼，我因为是东海校董之一，所以也加入典礼。他的演讲不过是“勉励中国把握住下一代青年及保存中国国粹”。我们虽然说了几回话，不过是彼此见面问候而已。他与他夫人却在那日在台北酒会与我再度会面。我们谈得较多。尼克森副总统那时很帮忙我们，认为到处可以看到文明作风，而且深信我们代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他的夫人更与我谈到她的家事，她说她有两个女儿，都在读书，她本身也是教书的。我不禁笑着说“那我们还是‘同行’，但我没有你的福气。”他问我在东海执教否？我说我已老了、落伍了，她还笑说“‘人老不在年龄’。而在态度思想、我看你并不老。”

赛珍珠 Pearl Buck

原是在中国传教的，她作了一本以中国农村背景的小说 *The Good Earth*，得了诺贝尔奖金，又翻译了《水浒传》，也很有名气。我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妇女作者会上看见她。她的谈吐很有风趣。说她翻译《水浒》的经过相当困难。她很了解《水浒传》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认为中国的秘密结社及临城劫案都有点《水浒》意义。她的家庭，不算太美满，第一任丈夫与她离了婚；但他们生有一个低能的女儿。她

因写作，不能把女儿留存在家中照顾，只好送入一个低能儿童教养院。这样聪明的母亲，偏有个这样低能的女儿以致母女不能同住在一起生活，也就很苦恼的了！

磅德 Ezra Pound

他是美国诗人，但他多半时间寄居在意大利。他的诗曾得过多次奖赏。英国诗人爱利奥德Eliot曾说：“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磅德最爱中国诗，尤其是《诗经》，他曾经翻译过一部。我在路过意大利时，友人曼珠女士曾带我去见他及他的夫人。我们讨论了中国文化，诗词及传统道德，相谈甚融洽。不幸他后来忽然大大地赞成莫索里尼的法西斯党，甚至为法西斯党广播。因此大战后就被美国人认为他是疯狂并把他关进疯人院内十二年之久。最近放出来后，他仍在意大利，他的夫人曾有信与我，说他仍是在吟诗自娱，他可说是廿世纪的一个有名怪诗人（最近他死在意大利）。

以上所说的都是有名的美国人士。现在我要说几个有名的亚洲人。

尼赫鲁 J.Nehru

我们都知道印度的甘地领导印度独立而以不用武力为主。我与约农到印度参加召开一九四九世界和平会，正是甘地召开的。但不幸甘地在前一年被人刺死，但他的门生尼赫鲁照甘地遗训仍旧召开会议，本来中国有好几个代表，

却只有我和约农去参加了。同船有日本代表三人，内一女代表高良富子与我同房间。我们在船上数日，相处甚好，把中日间的问题平心静气的研讨一番。到了大会——在加尔各答的三达尼克顿——乃是泰戈尔的家乡，也是泰戈尔所办的国际大学所在地，来的代表有英、美、法、荷、丹、瑞典、缅甸、伊朗、中、日以及印度代表等共约三十余人。开会时，尼赫鲁也到了，因为尊重大会的非武力主义，没有带卫兵，与我们共进午餐，并且自己洗涤自己用过的碗碟刀叉，与众人一样毫无分别。后来我又与他同在一广场上演讲，听众约二、三万人，但毫无喧哗紊乱现象，直到演讲完毕，这真是难得的了。

甘地夫人 Mrs. I. Gandhi

这位甘地夫人不是独立领袖的太太，乃是尼赫鲁的女儿，尼赫鲁夫人去世很早，她的女儿一直为尼赫鲁的助手。当尼赫鲁到达国际大学时，她——甘地夫人来了没有，我不记得了。但我们这些代表在新德里晋謁印度总统普拉沙德Prasad时，得看见她一面。照印度的美的标准，她的相貌很美丽。英文说得极好，交际手段也高，她父亲死后，沙士理Shastri接任，但不久沙士理死在俄国。那时印度正在危急之秋，大家举了尼赫鲁女儿Mrs. I. Gandhi甘地夫人作首相，以为不过靠她父亲的名望，渡过难关，再行选举。岂知她真有政治干才。在她掌政之时，经过了本国政党的纠纷，巴基斯坦的骚扰等，她都处理有条不紊，她实在是

一个不平凡的领袖人物。最近有东西巴基斯坦的战争，又处于两个强邻之下，实在不容易。她今年居然得大多数的选票，是靠自己的政治才能，而不是仰仗先人的遗泽。

梅尔夫人 Mrs. G. Meir

她是以色列“六日战胜”后，一九六九年的首相。当她被选时，大家以为她是女的，恐怕对埃及的战争态度不会太坚强。岂料更比前首相坚决不让。她仍起用戴阳长军事，伊班长外交，并将各党派拉拢，万众一心，维系国家命脉。我在联合国内见过她一次。她的英文很好——她生于俄国后移民来美国，受的美国教育，再去巴勒斯坦落籍。曾做以色列驻俄大使，及外交部长，长于外交词令，待人也和蔼可亲。最近受埃及及阿拉伯集团的围攻，俄国的阴谋骚扰，及美国与法国等的外来压力，定要谋求中东永久和平，逼以色列军队退去运河区，或准埃及军队过运河而达西奈半岛、或不供给攻击性的武器。最近外长伊班请辞，而梅尔夫人也萌退意，总之：四面楚歌，八方风雨。但我仍相信梅尔夫人的聪明睿智加上以色列人民的爱国心，一定能渡过难关。

以上是我所见到的亚洲各国要人，而在台湾我也曾见过泰国国王蒲美蓬及王后、伊朗王子、中非共和国总统、刚果共和国总统及夫人、沙乌地阿拉伯国王及约旦国王……等。但都仅限于外交礼节——握手或鞠躬而已。

三六 我们老家的几位特别人物

祖父栗诚公

在上集回忆录上我已说过我的先祖，如文正、惠敏、忠襄都载记在史册，我也未能见到，我的先祖母我也曾讲过，但祖父栗诚公我虽未见面，却听见说到他老人家的甚多。他是文正次子，生下来便身体孱弱，结婚后又曾患过一场天花，在南京制台衙门，几乎送了命。他老人家性情内向，不喜炫耀，但秉赋极聪明，除精于国学外，还学习英文，至今我家犹存有他老人家的英文练习本。至于数学则更喜研究，著作有《圆率考真图解》，乃求圆周与直径之比率到二百余位小数（见《白芙堂算草》及英国李约瑟之《中国文化与科学》），及《对数详解》等书行世。除这些经史算学外，又博通音律，奕艺等艺术，不幸因在北京会试未中，郁郁不乐，因而身罹肺疾，恰好“颜回”之年而逝！若是我先祖不去世，则忠襄、惠敏之后，继起有人，曾家可以有维新中国的希望。

父亲重伯公

我父亲重伯公天资极高，凡是他要学的，则无所不能。祖父去世时，他老人家不过十五岁，但办事如成人，已能与当时诗人唱和。他老人家出身世家，幼承庭训，宠爱有加。当时社会习气又是提倡风流才子的时代，所以我父亲

也算湖南四公子之一。花街柳巷，古刹名山，足迹未履者几希。家中除原配唐夫人外，还有四房家室，我是他老人家第三位夫人所生，也是本房第一个小孩——但是个女儿——所以他老人家又在外娶了华夫人，在生四舍弟昭杭时，他老人家已是三十四岁了。虽然生活似极浪漫，但是极关心国事，甲午年曾带刚武军出关，不过没有打大仗，中日便讲和了。戊戌维新，他老人家也加入新党，时常和维新派人物相往来；所以梁任公的诗界八贤诗中，有赞他的诗句。他老人家与陈散原老人也很谈得来，唱和诗文不少。戊戌维新失败，他老人家有心先一月出京，否则也难免大难或遭受其他处分。庚子年他老人家做了《庚子落叶词》十二首，以吊珍妃，极受当时文人的赞颂。老人家喜欢玉溪生诗，教我读李商隐七律很多，现在我能背诵的还有几十首。我当时虽不懂诗意，但很喜欢它的声调铿锵，对仗绮丽。我在上集中已说到他老人家对我的三大赏赐——不定亲、不缠足、准出洋留学，兹不赘叙。

使我最记得的一件事是一九二七年他老人家逃难的经过。在这年春天，长沙发动罢课。游行、喊口号。父亲也感到时局严重，便于四月二日坐小火轮下汉口，带了一名书僮叫史二，还有一仆名蒋五十。既到船上，忽要史二回公馆来找图章，史二遍觅不得，又回到河边。船已开航了。当时蒋五十大大的叹惜！但父亲说：“我有意要丢他在长沙，图章我其实带在身边来了。史二阴险，可能会出卖我。”后来果然应验。昭柯满弟也由宝苏妹的母亲周夫人由保节堂

领出。我们的学校被查封后，次日即是四月初九清晨，我与约农一同来到汉口。到了汉口后，承圣公会吴主教的好意，留我们住在圣公会会所内。我们忧心如焚，既不知父亲在何处，又不知学校师生们的下落。那时我们还不知我们私宅荷花池已被查封，只听说长沙大乱。住在圣公会三、四日后，忽然有一个乡下人来圣公会门房打听有没有长沙来的难民，是一男一女；门房料到是我们，便叫我们去看。一看之下果然是蒋五十，不觉大喜过望。便问：“老太爷现在在哪里？”他说：“远得很，现在汉防营，离汉口要坐好久的马车。”于是我们叫了一辆马车，由蒋五十带路，大约车行三刻钟，才到汉防营——乃是一个军队驻扎之处，中间有少数平民住宅。我们到了一间小木屋，见门窗关闭。敲了一下门，看见父亲开窗窥视清楚，才放我们三人进去，一见面，老人家很感慨的说：“我自从庚子以后，便绝迹仕途，只想略为振兴些农、矿实业来富国裕民，而不问政事。前日看见报载：叶德辉、俞浩庆，都先后被杀死！可见治学、做慈善事业的都不能逃命，真是幸亏你们劝我出来。在这个‘兵窝子’住的地方，他们不会来查，你们只问曹先生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便问何以改姓曹？老人家说：“有时提笔难免写出姓曾，只有‘曾’字改曹字最不现形。”我看房内居然有床铺、桌子、板凳、锅灶等。他老人家说：“这些家俱，都是自己想法或借或租来的。蒋五十不识字，又不认得路，但是忠心耿耿，不会起坏心，也很听我的吩咐。”我们听了这些话，真是佩服老人家能屈能伸而能适应环境

生活。虽然是大世家公子少爷出身，平日养尊处优，一点粗事也不能做，但到了危难的时候有如此急智，如此周密的计划，真是为后生辈之楷模的了。后来我们为他老人家及老家人蒋五十靠吴主教的帮助买了江船票，在大雨滂沱中离开了汉口，去投靠在上海的姑母俞太夫人。

七叔季融公

七叔季融公也是位很特别的人，他老人家是我祖父母的少子，祖父去世时，他老人家那时才七岁。少时生长白净聪颖，是家中的宠儿。十七岁才入学，不久便与萧韶公之女公子结婚。我七婶来了在第二年便生了一女——二姐宝荷——七叔十九岁便带领湘军五千之众去接应我父亲的刚武军，出关不久，便中日讲和，所以没有正式双方对阵过。七叔少时，也是与我父亲一样的世家习气，养尊处优，年轻时喜欢在家唱唱戏，虽未玩票彩排，但家中制做戏衣很多，又喜玩刀舞剑练架式，家中旧式的兵器——如剑、戟、单刀、金背大砍刀等不少。另外也喜欢各种博奕如围棋、象棋均甚精湛，赌博如牌九、番摊、麻将、单双骰子、轮盘赌等也都一一会来。有次在乡下一个宴会中——那时他老人家已不玩赌博了——看见人家在压单双宝，他看了一会，忽然劝众人不要玩了；众人只道他说教。他说：“不是说教，这付骰子是有弊病的，有几个角磨圆了，你看：我怎么摇法吧！要单就单要双就双。”他老人家当时不要人压钱摇了几宝，叫单就是单，要双就是双。这时众人才心

服，便转而向庄家吵着退钱，还是由七叔要庄家把赢的钱退回给输家一半。当时庄家说骰子也是向人家借来的，并不是自己做的，这才勉强息事。

庚戌春间七叔之第三子，我们的六弟昭树患白喉去世。此子极聪颖，七叔一则伤悼爱子夭折，二则因时事政局动荡不安，而心灰意懒。这时他老人家开始研究宗教——聂云台表叔与我都有点影响——第一件事便是戒鸦片烟，七叔因少年时骑马出关打仗，得了所谓“骑马痛”痛苦异常，当时只好借抽鸦片烟止痛，久而久之便抽上瘾。后来因信了教（未受洗），下决心硬要戒绝鸦片烟，躺睡在床上七日夜，眼泪、鼻涕双流，汗出如雨，痛苦呻吟，辗转床第间数日，精神、肉体痛苦异常，“烟”毕竟是庆幸的戒绝了。七叔也在革命的那年圣诞日在上海受洗，他老人家要立志创造一个中国自立耶稣教会。一九一八年与我及约农商量在浏阳门城外买了一块地皮。该处交通极不方便，又是长沙县极为贫苦之区，但七叔说：“我正要在这里与贫苦的人作工”，便这样买下来了。由聂姑祖母及各位表叔和其他亲戚朋友合力捐助，在一九二一年开始动工兴建。构想是个四合大院，正中厅是礼拜堂，东西两边有些房间，预备做牧师住处、查经室、阅读室、教徒休息室等，楼上房间较多。可惜房子尚未盖好，七叔即因肿病而去世，时年仅四十八岁。我很佩服七叔，因为他老人家是我家讲新教育之先锋；由花花公子一变而成一个极其虔诚的基督徒；由极图享受者一变而成一个极耐劳的工作者。张敬尧来湘时，兵士不

守法纪，七叔亲自率领浏城桥难民妇孺到红十字会躲避，赤脚撑雨伞，毫不在意，真是深富“爱心”。若没有七叔，我们兄弟姐妹的教育也完了！可惜天不假年，不然自立会当可能有所建树。

忠心的工友

我家中还有几位特别忠心耿耿的工友，我也不妨借此来提一提，以表示中国古风之忠诚可佩，这连不识字的文盲也可得到的——“忠诚义”。我家待工友甚为优厚，每个人总是在我家十年后才告老回家，甚至子袭父职，代代相传者。我的乳娘屈妈是我家照顾她从老至去世止。陈妈活到八十岁，她虽已辞工回家养老，我家仍养她的老，直到她寿终于自己的家。但我大姐宝龄的乳娘贺五老“奶奶”——这是我们乡下对老妪的尊敬——对乳娘用这称呼，当然更表示她的不平凡的了。她老可称为一个有侠智的女子。庚子年八国联军进京，那时我二叔是刑部员外郎，不能出京。二叔母及昭楞大哥又于春间相继去世，只有大姐与贺五老奶奶在家。等到洋兵进城后，秩序大乱，才想到要逃出京城。二叔因有官职不能出来，便要陈文霞师爷带大姐与贺奶奶赶紧逃出危城。二婶去世后有些金玉首饰，二叔要挖地埋在烂面胡同。贺奶奶说：“万不可以，因为歹徒退去时必然烧、杀、掠、抢，洋鬼子到时也难免来这一手，那时房屋变成一片大瓦砾场，这些珠宝从何寻起，而且说不定被别人挖走……。”二叔听了觉得有道理，便说：“那

又如何带走哩？”她说：“我把一件旧棉袄缝入了这些珍贵东西，不太贵重的便放在枕头内，脸上用黄梔子搽上，只说有虐疾，路上可以瞒过盗匪耳目。”那时正是农历七月初，天气炎热异常，这位老人家居然穿上旧棉袄，一手提个被包，一手牵着大姐。大姐那时刚十一岁，又是裹的小脚。她们跟着大伙难民出城，总算在出京城不远赶上了些湖南官军到湖南去催粮的，是由胡定臣带领。她们请求跟着大队，起初是步行，大姐脚痛，只好由贺奶奶背着走，就这样走了几十里后才雇到一辆车，陈师爷和胡军走得快，路上受虚惊不少。有一夜他们在离一个小村庄不远的地方扎了营，贺奶奶与大姐则在一个小茅棚中歇宿，正好贺奶奶想解开衣服凉爽凉爽时，忽然听到营棚中大声喊叫，好象说：“抢呀！抢呀！”只吓得贺奶奶连忙穿衣服，背起了大姐不顾泥灰与汗，急忙躲入高粱田里，躲到人声清静时，才敢爬回茅棚里，看看营棚里也清静无哗，四周也无乱人，才略微睡睡。次早一打听，原来是那天发了饷，兵勇高兴饮酒猜拳之声外溢；我们湘乡土音，念“请”字有点象“抢”字，尤其说“请呀”，更会连合喊成“抢”字。她这一惊骇，使得众人都笑她兴风作浪，庸人自扰；但她老的忠心可的确令人钦佩不已！走路过信阳境后，路上便太平多了。她老竟平平安安带了大姐和财物到了长沙，投奔大姐的外公黄自元“榜眼”家。这的确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虽不识一字的妇道家，也深受其影响而做到了侠义忠信的行为。

另外还有四个忠义可风的工友是为我们曾家而殉职的。当庚子年八国联军入北京城时，我六叔——讳广奎，是袭侯爵的，当他老人家率领全家人逃出京城时，台基厂的房屋遂交给四个工友住守。看门的姓韩，工友彭隆三，另外有裁缝司务及他的妻子。当乱兵来家时，先由门房阻挠着不肯开门。这些乱兵并非完全是义和团，也有董福祥的兵，他们都有武器，大伙合力撬门，也有爬墙头进来的。顷刻之间，乱兵蜂涌而入，因韩某誓死抵抗，便首先被乱兵杀死，然后穿房入户搜抢财物，这时，彭隆三上前略为抵抗，并跪地请求不要放火，乱兵嗜杀成性，亦挥刀把彭隆三杀了。裁缝司务无法，只好跳井自杀，而他妻子也紧跟着跳井。四个忠魂，不到一刻钟时光，都光荣成仁了！这些都是事后根据邻居的告诉才知道的。我们想法为他们检尸安葬，并举行超度，以慰忠魂。台基厂房屋都被烧毁。文正、惠敏公的书籍与纪念品等以及当代名人的手迹也跟着付之一炬。而这四位殉难的工友，我们家中后来想从优抚恤他们遗族，但只找到彭隆三之弟彭隆四，其余三位的遗眷，惜因兵乱走散，以致无法寻找，事至如今使我们常觉痛惜！佩服而惭愧不已。彭隆四在我二叔——履初公做臬台时，曾做过消防队的班领，后来到长沙，他也成家立业了。这几位殉难者，也是受中华文化的薰陶者，真是可歌可泣，堪为后人凭吊，以事效法的。设想：当时兵荒马乱之时，他们四位尽可各自分检财物，各作鸟兽散，反正房屋被乱兵烧、财物遭乱兵抢，趁火打劫，有谁作证？又

有谁知道？可是他们选择一死以报主人，视财物如糟粕，视仁义为泰山，慷慨成仁；义薄云天，足为我辈所师法。

前集说到我们家的“书楼”及看管书的贺老头，他管理书楼甚严，一概不许我们小孩子上去。几百架书籍，摆设得干干净净，不为灰尘所积，又不为蠹虫所伤，而且每有书面破损，便加以整修或换封面。不过那时是我家全盛时代，家中有门房、帐房、长工房、亲朋戚友来，有专司接待部门，日入日出，秩序井然，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等到民国初年以后，贺老头告老回家，换了个姓王的——王子陵——他本是个裁缝，略识几个字而已！我们小时候所穿的衣服都是他量做的。他为人忠实但颇固执，贺老头推荐他可以胜任，我祖母便派用他管理书楼。他的负责、勤劳、诚恳则更胜过贺老头，看护书楼，亦如自己生命，连我们七弟昭亿，拿了几本书出来，他都急得连忙来报告约农与我。并详说甚么书拿走了。听说七叔因信耶稣教烧了许多异端的书册及各种章回小说书，王子陵不能阻止，急得几日几夜寝馈不安，经苦苦哀求七叔，才救出一部份小说及杂书。一九一六年后，祖母仙逝，后来家中陆续搬出老家，差不多二十年并无一个主人在家，上房地下都长出了很多笋子和小树，房屋荒芜成这样；但是王子陵的书楼照拂的仍是一尘不染，毫不懈怠一点。七七事变后，第二年四弟昭抗回家后，开始整修房屋，清除杂草，搬进居住。我们人未回来时，巍巍富厚堂书籍的人实不少，尝借词窥视接近，但都被王子陵婉言拒绝，使巍巍者知难而退；

或请地方绅士排解，得免于书册散失。比起忠襄公家中藏书，散失得未剩一本，这真是有天渊之别的了。我们于一九四二年由香港回家乡——富厚堂——时，书楼藏书，仍然是富厚堂的精神中心，书楼一尘不染，书籍琳琅满架，类别、目录分明，这是王子陵之功。那时他已老迈年高，由其女王席珍负责，他则数日来看一次；王席珍也能肖父，书楼收拾一如其父样，后来艺芳有些书籍，因逃日寇之祸乱，也都存放在富厚堂书楼，内有英文书籍不少。我因教侄辈英文而教了王席珍英文三年，她可以按名寻书，按英文字母摆书。王子陵先生二十余年来管理我家的书册，丝毫不苟，他并不是不知道书可以卖钱，但他不肯做这种不诚、不忠的事，真是任劳任怨负责尽职的好人。

三七 两次做湖南省立女中校长琐记

我做两次省立学校的校长：第一次是一九一九年至二一年，做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校长。第一女师的校址在长沙古稻田，所以长沙人都叫她稻田师范。原来的校长是马惕吾先生，因年事高并且眼睛不好，一定坚请辞职。那时正是张敬尧督湘，一班教育界人士，怕一女师落入军阀之手，一致请马校长亲自来请我出掌一女师；等我答应后，再行辞职。衡粹女校校长黄国厚，与我是朋友并有点葭莩亲，也来劝驾。马先生努力提倡女学，年高德劭，黄国厚先生为女子留学日本最早的一位，专心办学，又当我与巴

师病时，屡次亲来看护，与我志同道合；而今两位先生亲来劝我并责以保全湖南女子教育大义，我只好答应了。一九二〇年春季我接掌一女师校务，可是我自己的艺芳也正在草创之中，加之又有船山学舍的人时时来吵闹，实在是顾此失彼而疲于奔命；必须选一位品敦学粹，在社会上又有地位的人，来做教务长并能代拆代行，好容易才找到了何特循先生，我才能两边兼顾。我自己每礼拜去三个上午，另外我要求黄国厚先生做训育主任。当时，她极力辞谢说：“我有衡粹，它又是所职业学校，一切手工作业，非我自己躬亲指导不可。”经协商后，黄先生便荐了她的姨侄女陈淑萑先生来接替斯职。陈先生也留学过日本，才具不凡，而肯负责，办事认真努力，宽严得合情、合理、合法。我有了这位能干帮手，才敢于接篆视事。另外我要我的大姐宝龄做训育员，可以从旁襄助陈先生和皮莪先生。

提起稻田师范，它也有几种特色，它是湖南所谓“中路”最高的女子学府，第二女师在常德（湘西也称西路），第三女师在衡阳（湘南也称南路）。在前清按这三路来收税，所以第一师范一定要招收属于中路的偏远县的学生如武冈、城步的县。这些学生一切功课都比长沙、湘潭、岳州的学生差些，然而取学生仍照前清秀才名额，一定要收若干名额。我进去时所有偏远县的学生，都请老师特别补课，可是成效并不太大。那年初冬，长沙人民发起驱逐张敬尧运动，学生也参加是项运动，共同向省议会请愿。一女师因为是省立的，便首先被教厅停课解散。当时学校经费也

成为问题，政府也趁此机会，省得各省立学校的会计主任包围着财政厅吵闹要经费。一师解散后，学生都回家去了，当时只剩下六个偏远地区学生，因交通的不便而不能回去，我就要他们来艺芳借读，那时我正有几个学生因病或因事请假回家了，因病的有薛锦回、曾长善，因事的有柳演仁、汪清若。对于薛锦回，我要特别提一提，她是在西园加入英算第一班的，人既聪明，功课也好，特别是英文擅长，因为她是上海启明学校出来的。可惜到西园不久，就因生病而休学（在台无意间再见到她，已是张惠长先生的夫人了，真是高兴之至）。我便把这六个学生加入预科听讲，同时也增加两个床铺安置她们，岂料她们不能赶上功课，又爱不请假出外，住了一个多月，放寒假便由她们的家长或保人领回家去了。

次年春初开学，一女师也照常开学，这六个学生也都回去。我深感艺芳学生的自治生活方式，并无挂牌记过、开除等事；而师生大家都恪守校规，以致师生感情有如家庭父母子女。但是我在一女师也想做到这样，无奈政府规定，三小过凑成一大过，三个大过则开除……等，而且规则条文繁多，使学生很容易犯过错，我在那里实在无法改良。有些小过，我不让记，只教学生来当面说说算了。三、四月时，长沙驱张风潮更炽，到六月里，南军由衡阳下长沙，张敬尧狼狈的逃出长沙，南军由谭组庵先生、赵炎午先生率领，一路之上很顺利的就进了长沙城，次日出示安民，除张敬尧之镇湘楼被焚外，则别无其他损害。不过一

女师久已经费无着，拖欠教员薪水甚多，那时的教员真是枵腹从公，不但没有罢课要挟，也不搞包围索薪。我自己还用家二叔的名义，借来了两千元到一女师做伙食费。教育界人士那时实在是够清高的了。

长沙虽然脱离了北军之手，我们艺芳却大受船山的压迫，船山份子邀约了許多人把校社间界墙冲倒，人潮蜂涌而入，使我校门户洞开，不能管理，只好请来了两位警员负责维持学校安全，这也是一种象征式的管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如何能兼两校之长？便力辞去一女师校长职而专心来办理船山交涉。最奇怪的是我突然间因受此刺激，音带忽然松弛到说话没有声音，到正要用嗓子的時候，竟然失音，当时真急得要命。我家有几位老长辈，都是经过庚子痛苦的，定要我偕同巴师及另一位外籍老师去见当局，我一定不肯这样做：“我决不利用中国官场怕洋人心理来办交涉。”结果还是请湖南乡绅汪颂年，朱菊尊，王莘田、龙萸溪、曹籽谷、史春霆、俞浩庆、胡子靖……等及老革命党人邹价人、周道腴，姜咏洪等先生协力调停，将局关祠原归文正祠一带民房让出与艺芳，原来老界墙让出二丈多与船山，筑墙与迁出民房由长沙县负责，姜咏洪那时是长沙县长。经过这样协调后，艺芳总算在秋季可以开学了。但是一女师我决计辞职不干，而由童锡楨女士接办，幸继起得人，我也放心了。一女师的学生如吉衡贞、周荇荪、李淑一、任韵诚、范新群……等都是好学生，在台湾我还看见范新群是苏忠恕先生的夫人，也是稻田的入室弟子。

一九三〇年，长沙已经过两次失守。第一次是桂系入城。大约是五月间，离我们只隔一条街的三公祠，在左文襄公家旁边，内藏军火突发生大爆炸，把左右邻居都吓得魂不附体，我只好将校园的学生由两位外籍老师带领到舍弟昭权的自立会暂时躲避。不幸昭权之子宪基也因桂系兵丁留下的一颗手榴弹，因被宪基拾起玩耍，小孩无知以致误触引线而引起爆炸，把好好一个天真活泼无邪的孩子炸死！学生及教员们又怕且惊，大家只好坐以待旦，这样在惊慌中渡过了一夜，幸好学校未受波及，次日回校照旧上课。暑假后我与约农到南京向行政院请愿，请将曾文正公祠产全部发还，幸蒙许可。

长沙一女中已于一九二七年后被改为第二女子中学（第一中学是男生学校），本来全是师范，现在以中学为主，师范为辅。冬季毕业典礼时因何主席正在汉口，便请省务委员会曹籽谷先生代表致词。曹先生一直依从主席的四维八德为训词主旨，顺便提到女子的三从四德等道理，那晓得听训学生嘘声大起并乱踏地板咚咚作响来催促曹先生下台，曹先生也只好仓卒间作一了结。散会后，曹先生倒无所谓，不知事后何人对曹先生说：“曹先生，这不是对你的无礼，乃是轻视主席，不可不予处理。更何况长沙共产党刚走，哪里可以纵容这样犯上的事件？”于是本来是件小事，因被人一挑剔则构成轩然大波，以致有魏寿璋校长，及陈淑萑训育主任辞职之事。正在酝酿这事件时，何主席又回到了长沙，在例行的省务上便有人提出此事。正好第一中

学也因学生毕业在答辞中，出言无状，校长及训育主任也同时辞职。第一中学改聘余砥吾先生为校长。第二中学尚未派人，黄士衡教育厅长便亲自来请我说：“军人荐信已有许多，教厅用人行政若不能自主，那湖南教育也就完了，务必请先生帮忙，保全教厅用人之权，只要我提出先生的名字，别人就没话说。”我看黄厅长如是恳切的说，只好答应了，就在农历年底接事。所有教职员，我一律挽留，因为我只打算替教育厅渡过难关，最多办一年。但陈淑莹先生一定不肯做训育主任，另外两位训育员皮葵及陶联璧女士他们也推让不肯做。我只好自己兼任（不兼薪），但加聘萧孝徽女士及张敏文女士，因为我实在不能做到管理照护之责，教务主任我请了言自芳先生，他在艺芳多年，尽心尽力。与我们相处极好，在长沙是算学世家，因此我请他帮帮忙。

在二中我看出只要教师诚意教书，严格公正，学生是会诚心接受的。有一位数学老师陈鹿萍先生，教书从不缺课，并且按时上课，细心批改学生作业，考试极严也最公平，但学生都很敬爱他。有一次二女中与周南比赛篮球，几乎全校十几班学生都去看球，或做啦啦队以壮声势，只有陈先生算学班学生没有一个人去，因为她们知道缺了一课，便损失很大，到了下次恐怕听不懂了，这实在证明只要教师有德行有学问，青年人是肯受教的。

就是比赛篮球的那天晚上，大约已是十二点钟，因我还未睡。忽然听见寝室内人声喧哗，我出房门，便碰见张敏文先生奔来告诉我说：“学生苏镜是今天校队球员之一，

她原是周南的好球员考入二中，今天当然代表二中，因为二中打败了周南，那些周南的老同学便都骂她不忠于周南，不想想看她的球术是哪里学的，忘恩负义……等语。她受不了，当时仅只哭泣，到了晚饭以后，竟捶胸顿足只喊‘不要活了’！现在还在哭闹，弄得满寝室都不安。”我一听此话，当时便去她的寝室，果然有几个人拖住她，不让她奔出来，她看见我时，神智略清醒，停了一下，我看她眼神涣散，是得了严重的神经刺激症 Hysteria，便连忙摇电话到红十字会医院请一位医生带镇定剂并详告其病状，并请带担架来，一面通知其家长。好在住的不远，等医生到来时，她的父亲也来了。医生立刻使用了一种闻鼻的药，几分钟内她便睡着了，抬入医院。三天后回校，我和她长谈了体育的道德及忠心于母校的原则：“你虽替二中打败了周南，谁不知你是周南训练的？将来你或进了北师大，或南京体专，而打垮了湖南队，我们只会因你是湖南人而骄傲，而不会恨你的。”这时她也似乎领悟了，至少以后再也没有发生类此的事件。

一九三一年的二中，很不容易管理，在学校内的共产党学生有五十人之多，均由校方负责管理督察，而这些人又都不是坏学生，但当然都有她们的坚强个性。其中有一个叫邹某某的，国文、数学都特别好，有一日清晨她忽然失踪，据同学说她没吃早点就不见了，后来有位冯老师说在街上看见她，等到上第二课时，她又回来上课了。此事发生后，训、教两部门人员便同时召开会议，讨论怎样

处理此事。大家说：“非记大过不行”，我则即席起立反对说：“让我先问问她，暗地规过一番，也就够了”。但众人说：“她原是共产党分子，我们不能太放纵”。这时我乃叫该生前来问话，她说：“因为我的祖母有病，我昨夜忽然梦见祖母病危，所以天一亮便赶着回家，因此亦未请假也迟到了……”。如是训育处便签拟了一个“某生不假外出，擅自离校旷课，着记大过一次”的牌示，我便提笔改着：“某生未请假，擅自离校由上午七时至九时，着记小过一次”。她的同班同学都为她说情，说旷课两小时何必记过。我告诉她们，学校不能不处罚，我已改成上午七时至九时，正是保全她，说上午断不是夜间，所以不是犯法之事，而是一般行政性的轻微处罚，一来顾及该生颜面，二来顾及交办事项，三为顾到学校的法纪尊严，此乃大事化小，你们告诉她我很抱歉而不能小事化无，若在艺芳，我断不会记过。众同学方才了解校方的处境，她也不怪我。后来在北平她来看我，有艺芳同学那般的亲热。

现在台北板桥有罗首席校长，靳吉禾校长，都是二中同学，我们的师生感情也不下于艺芳，但她二位品学俱优，办理教育的成功，在此我不敢掠美，乃是二中后届校长及各位老师的功绩。

三八 三十年教女学生的经验

我写这一章回忆，并不是象我们湖南人的一句俗话：

“老鼠上秤钩——自称自”，乃是传授青年同行的一点方法，有时也可应用得到。大致说来，可以分别为心理、生理、伦理（意思就是人伦和协的意思）三样方式，让我在这里先举几个例子，先说心理吧：

在我上集回忆录上，我已经说过有一个女生失了一只金表，当时学友会定要搜检，群情激昂的说：“难道我们都是贼不成？何况我们各人有各人的私人物件，若是搜查反倒会使我们的东西遗失。”当时我也反对搜查，不过学友会既然大多数通过了，连我也不能违背，更何况我们大家真金不怕火炼。是这样罢，我们公举训育主任、干事会一人、学友会会长、及被查学生本人拿钥匙去开启箱子。查的时间中，我们众人都在大礼堂等结果，我说故事给大家听，有些笑话逗得他们哄堂大笑，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这时大家也心平气和。幸好金表是在垃圾桶中找到，顿使得大家欢欢喜喜的上课去了。这件事不是失物寻到的幸运，乃是当时平群众心理的方法运用恰当。假如我们教职员中，也加入查与不查的纷争，而校长又严词厉色的说学生不守秩序，定然学生们会大起哄，而把事态扩大，象我这样轻松解决这问题，可说是避重就轻计，做老师的应懂得运用这一方法。

有一年有一个三年级学生黄经哲同学暑假回家后第一个礼拜六回校忽然得了痢疾，因为暑假躲北兵，而逃入一小村庄，误吃了腐败不洁食物，遭痢疾细菌侵入身体，当时她并不觉得，直到肚痛时想着可以赶回家医治，所以没

有告诉学校而自行返家。岂知到家后，得的竟是所谓“禁口痢”，又因为医治的不得法，黄生一周后竟告死亡了！于是她的生前同学及学校同人在礼拜天就举行一追悼仪式，学校也急忙在她的床铺周围及一应器物上进行消毒手续。岂知那晚上原来她睡的寝室共七人，床铺并不相接，便大闹怕鬼，说得别的寝室的人也害怕起来了。劝导责备毫无效果，我便吩咐工友把我的铺盖拿放在黄经哲的床上放好，学生们是九点半熄灯，我九点钟去，带了一只小台灯，在床上看书，十点熄了灯；第二日早起，学生是六点半起床，我七点才离开。这样头一夜学生看见我来，看见我燃灯床头看书、睡觉；第二天她们已经都起来还看见校长高卧在床，虽然也有些学生蹑手蹑足地恐怕惊醒我，其实我早已醒了，不过我要学生们看见我是睡在那个床上。不但本寝室，连其他的寝室里的学生也在窗外络绎不绝的窥看；后来我又穿着晨衣走回自己的寝室。未几果然清静下来，也不再闹鬼了。这个道理很明白，任何人都对于每一件事，都是最后印象最深。学生们最后看见黄经哲睡在那个床上，每一默想，便幻想起她的容貌举止，神经稍紧张的人是越想越怕。但我故意拿灯去睡那床，又故意早晨晏起，从此以后大部份学生，一闭目就想起了我，一睁眼又都看见了我，这印象已深入，因而也就不再怕了。甚至有人说校长一正辟百邪，以后连那张床也有人敢睡了。

浩园地方很大，花木茂盛，假山水池，幽径曲折，景色美丽宜人。我们因怕小偷，便喂养了两条狼犬，它们都

受过训练，很守规矩，认识本校学生，从没乱咬过人，白天多半在我或约农的书桌旁边，晚上便在浩园内巡逻，大家习以为常，而不以为怪。民国十年北军去后，忽然有军队来说：我们园内某一山后，浅葬了一位军官尸体的薄棺木，当时因北军张敬尧进城太快而无法抬出，故只好草草葬于此。当天他们把棺材挖出，由文正公祠正殿侧门抬出。这样一场热闹，自然是瞒不过学生，于是谣诼纷起，硬说半夜看见有人在园中行走，又说山后有脚步声，学生及工友都在相互夸大其词，绘影绘形益增其是。我说脚步声乃是狼犬巡逻时的足步声，人影也许是我与约农老师。有一夜，大约是一点钟左右，我带了狼狗，在学校园中及各教室走了一遍，并有几个学生在楼上窗子前看见我，我说是我带狼狗在巡逻，她们这才相信，从此闹鬼的谣言，也归于寂静无声了。

现在再说生理，女学生身体构造不同，每每因经期来潮前后，可能心情恶劣，身体不适而乱发脾气。我除了事先请体育彭老师注意每个学生的生理有无变态外，还自己随时侦察，若有学生无理取闹，或痛苦不肯饮食等等状况，我都要训育老师多予开导，不计较她的小过错。但有时也是真病，学校要给她医治并报告其家长。艺芳都是住校学生，没有通学，有校医每星期来一次，检查学生健康。学生在生病时很容易受慈爱感动。我有一个学生唐某，有一夜我巡夜时，忽然碰着她与另一学生王某在园中散步，我便询问为甚么这样晏了还不去睡？王生自知错误说我是陪

她来的，而唐生竟说：“学校寝室太闷了，我出来换换空气，这也不算犯规吧！”我说：“我们的学校寝室，算是最透气的了，你们半夜出来，风寒露冷，既怕狗咬又恐蛇咬，若大家都是如此‘夜游’，总不成个规矩，快回去罢。”她们才回寝室。次日唐生便说有病不能上课，我头一个念头想她是在赌气，但再一想她既说有病，我总应当去看看她。于是我便上楼去看她，只见她蒙被而卧，我用手一摸其头额，的确有一点发烧，我因为看学生多了，而且学过战时护士学，对于初步病状护理有相当经验，我便说：“你不用起床了，我给你送点东西来”，于是我亲自拿了一颗APC及苹果一个给她吃，并不提及昨夜之事，只说：“你只要静养，不要再受风寒，休息一下，明天就会好了。”果然次日她来上课。病中有人关心，乃是每人最需要的，学生有病，老师关心照料，是最好的感化力。后来这学生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络，并且在重庆时招待过约农，极其周到。

另有一个学生汤某，出身汤姓世家，父亲早去世，母亲守寡而抚养这个女儿，未免娇养惯了，身体不强健，读书也不太敏捷。后来我发现，她耳朵有点微聋，我便叫她来，亲自为她补习，有病时我也去与其母商量医治方法。到毕业那年，她的成绩也可毕业，但不幸大考后，发高烧，一连四、五天不退，请了德生医院安医生来诊看，我认为恐怕是肠炎，安医生说：“现在还不能断定……”。但他次日再来诊病时便说：“曾校长，我真佩服你老的断症，她果然是伤寒。”不幸汤生原来就有肺病，这一高热也就把肺病发

了，以致病情加重。我每天都去看她一次，因为她家就离学校不过两条街口，拖延至九月病情更为严重。有天下午六时，她家里派人来请我去，我去到汤生家看汤生进气少出气多，近似弥留状态。她说：“校长，我要请您老为我施洗，归主耶稣……”，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她，当时就用白磁碗盛水替她点水额上并画十字架，有萧先生及两位同学及她母亲和工友在旁，大家肃立一同祷告，我要同学先回学校，我与萧女士略等一会，不到半小时她便与世长辞了！她在校本来很内向，又很自卑，自从我关心她的健康，与她多接触，她遂改了很多，变得和睦快乐。她也加入了学生基督徒会，最后她在临终之际，自请受洗，临终亦精神愉快，魂归天国去了。她母亲与我做了好朋友，最后汤老太太出了家，但我们的友谊则来往不断，直到我离长沙时汤老太太还来送我上飞机，我只可惜我假如早知她女儿的病源或者能救她在尘世的生命，至今思及，犹引为无穷遗憾。

我另有一次成功的看护学生，这是一位陈姓学生，她已经毕业留校服务，担任教历史之职，但不幸在广东中山大学教书时，夜间忽然被日军过境而受惊吓，不但受吓，并且失去了她所有的首饰及资财。陈君受此刺激，精神恍惚不安，不思饮食，也难安眠。学校派人把她送回湖南，寄居姑母湘乡家中，到家虽百般调养，无奈抗战时期乡下没有好医药，所以病况日见沉重，我便冒险将陈君接到我家——富厚堂。我看陈君的病，一是惧怕在她自己家中安

全可虑，一听见任何声响她就吓得浑身发抖，甚至讲话不清楚。二是感到所损失的资财中有些是她妈妈的，心中自疚甚深。我便要她与萧孝徽女士同一床，另外还有我家老梁妈在床后另摆一床，我就在隔壁房内。每日与她闲谈，并相偕游玩富厚堂山前山后。山是围在自宅内的，围墙有丈余高，让她看见我家甚为安全，又有荷枪实弹的自卫队二十多名往来梭巡，她慢慢地安稳睡觉，也不再做恶梦了。至于损失，我并不提及，我只说我们逃出香港，丢的东西很多，祖上遗物，固然可惜，但也不见得能永保，所以我与约农都看的很达观。她是一个聪明人，不久也渐渐的思想开了。她母亲又再三的说：“失了东西不要紧，更不能怪你……”，她也渐趋正常。一九四四年七月某日她在我家洗头洗澡，因浴后着凉，次日便不好过。两三日后，忽然两脚发肿，渐渐上肿到腹部，她只嚷着要到宝庆去住医院，我说：“到宝庆要坐三天轿子，你的肿如此的快，我不能放心。”于是我给她请来一位军医并告知症状，他说：“这是忽然受寒，心脏不强之故。”我问医生“毛地黄”可用否？因为她心跳每分钟一百二十余下。医生云：“可以，但是哪里有？”我说：“我有，因为在香港时，老友潘作琴医生为我开过，是一种德国药，每服八至十滴。”那晚我便给她八滴，服下后，我一直在担心，并嘱萧老师留心听她的呼吸，那一夜她睡得很安宁，次日她小便十余次，我看药已对症状，又给她吃下八滴，下午也是小便多。第三天我只给四滴，第四日又给三滴，她肿胀全消。我便要她禁盐一个月，因怕

她有肾脏炎，由我厨房每天供给淡菜一、二样。她很听我的话，我又给她维他命B₁吃，怕她是脚气痛。好在我在香港逃难回家，带回药物不少，例如：磺安片、药特灵、奎宁丸、各种维他命丸、眼药水、硼酸粉、双氧水、消炎片、红药水、膏……等等。上集里说过这个药箱正是由余六铁先生的日本友人带上船的，否则我们遇到急病便束手无策的了。陈君禁盐一月后，脉搏正常，小便无蛋白质沉淀（这些象征我都试验过），她完全好了，不但病好了，而且一切的怪脾气也全好了。胜利后，她仍回艺芳教书，并在湖南大学教历史。有些人说我：“你怎敢乱用药？”我说：“当病情危急，找不到医生时，难道我看着人死？或者由乡下人迷信乱用药？最少我有点医药常识，家中也藏有些普通能用的药，在药品不失时效及对症下药的情形之下，我在我们乡下救好的人也有好几位呢！”不过我不赘述了。

最后，我要说到伦理上的治法。上集我已说到一位胡某某学生，在长沙没有一个学校她不是闹得不愉快出来的，她的父亲再三拜托我教导她。我在一开学时便叫她来个别谈话，我说：“你无论有甚么心事，都可以来与我商量，我能力可以做到的无不尽心力以帮助你，甚至于家庭、经济、婚姻等都可帮你计划着而实行，但只要你答应我，在没有同人闹气之前先来告诉我就是了。”她很欣欣然的答应了，并且在三年之内，我们只谈了两三次话，都是愉快融洽之至。这个学生真是驽马回头变成千里驹，对我的以爱心来勉勵也极重要，也就是以我的方法来弥补其家庭中得不到

的爱。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尤其是年轻人，有对父母不肯言者，而对于一位陌生人反愿把心事和盘托出。我不是要以老师们的爱心来套取子女对父母的信心，乃是要以师尊的爱来弥补父母所对子女有想不到之处，以指导少男少女内心的幻想，而达到教育为目的，使人人都成为国家有用之材。正如一位心理学医生把病人做朋友看待，老师不把学生做病人，而把学生做子侄看待，古人尊师如父母，就是这个道理。

另有一个新化学生谢某某，父在母亡，由其姨母带大，她母亲临终时托孤于姨母，姨母有一个儿子，比她大三、四岁，小时常在一起玩耍，姨母有意娶她为媳，亲友之间，也很赞同。岂料此儿不成材，长大后，烟、酒、嫖、赌四字俱全，她有意解除婚约，但她姨母不肯。后来由亲友劝说让他们双双都出来读书，她进了我的艺芳学校，但她姨母的儿子怎样，我就不得而知了。谢生性情悒郁内向，功课中等，有一次英文考得不好，忽然发狂。那时我正在雅礼学校演讲，学校派人来要我快回去。当我赶回学校，发现谢生果然不认得人了；我走近她床前，很镇定和善地大声喊：“谢某某，我来看你了。”她竟认得我是校长，她说：“校长，我要回家！”我说：“这就是你的家，你跟我来吧。”于是我牵了她的手，到我睡房里有另一间房，仅一门通我的房间，隔壁便是巴先生的房。我把门窗都关好，晚饭同我们一起吃，英文在夜晚我帮她补习，如此住了三夜，人也清楚了，我把她送到家母家中食宿，每日来校上课（因为

夜间，同寝室的同学怕她打人)。如此约一月，才要她家人趁年假时接她回家过年，不幸她回家后，疯癫病更厉害，大概是婚事不能解除，家人又不能体谅，内心犹郁成疾，直把似锦前程活活断送了。若是当时长沙有精神病院，谢生也不至于死。但是谢生在我身边及在家母家中，都很正常，可见人伦之爱，实在可以改移一个人的性情，变换气质。至今念及谢生，我还是惋惜着没有救她救到底，而引为终生遗憾！

另有位学生唐某某君，年龄较长，曾教小学，为人精明能干，读书用功，尤其对于艺术品有新奇设计。不幸在民国十年，她的哥哥唐君被人诬告为北军间谍，未受公开审问，惨遭枪毙在常德。消息传来，唐生痛哭昏厥者再，累次要自杀在南军某军长前为哥哥洗冤。我们大家都日夜守护着她，以免发生意外。不幸有一日她由同学张纯士陪同外去，而把她哥哥的遗书及账簿遗失在人力车上。我晓得后，随即会同约农及很多同学，当夜写好了一百多份赏格启事条子，愿出光洋五十元酬谢送遗失物的车伕人等，果然在第三天晨间，有人送来唐生所失之物，唐、张二生也才放下心来。我对唐生说：“你哥哥已经人死不能复生，但他还有儿女妻室，需要你帮助，你岂可轻生，并且你没有了父母，现在哥哥又去世，你把我们看做家里亲人罢，有事只管来找我，最少可以尽我的力量，来帮助你。”后来唐生果然把我和约农老师视同自己父母，无微不甚。她结婚，也是我证婚，往来如家人一样，她的先生朱智群及她

的儿子等也待我们一如亲长，这是种伦理上的补偿，是双方最为珍贵的友谊。另外有些同学如：左、陈、徐、谭、高、晏诸生都在庐山舍下歇暑养病，张、左、王、冯、李、任诸生都在我老家富厚堂住过，相处融洽一如家人。

总之女学生“爱好”及“自尊心”重，所以凡事都要体贴她们，不可当众给她们难堪，依照她们的想象角度去揣度她们的心理，再加以恳切善意的劝导，很能有效力。

近几年由台湾去美国有两位同学，也证明了假如我们用家人父子的感情待学生，她们也会用同样的感情待我们。一位是李熙同学，在台北时，她的父亲不幸逝世，我们便赶到她家去慰问，并且陪她到火葬场，后来又陪她回家，她深受感动。现在她和她的先生彭清仁君住在美国西岸，但是常与我们通信，也送许多东西给我们。一位是彭阜午同学，她的先生丁履乾君和她的儿女都与我们很要好。前年她要去美国看她的大儿子，同时想开一个画展，我们很鼓励她，同情她，也赞美她为国粹宣传的精神。她回国后，把我们看为一家人，犹如父母一样，赠送我们许多礼品及她自己手做的衣服。这类的感情，不可易得，只有经过我前面所说的“伦理方式”的接触，才能有此成果。

三九 我与约农几次逃出生命的危险

我们湖南人有句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不敢说我们有福，但敢说我们几次逃出了死亡的威胁，则是

铁的事实。

在我只有半岁时的一个七月中旬，正是我家接“老客”——祖先——的中元时候，黄昏时我一人睡在床上，奶妈吃饭去了，不知是否风吹蚊帐而碰上油灯——幸好是老式燃清油灯，若当时是煤油灯，那就不堪设想了——而蚊帐也是老夏布做的，自燃力很小，然星星之火，足可燎原的；因当时无大人在旁，火慢慢地便烧了起来。等到我母亲进房看见蚊帐已经着火，她老人家就大声喊叫，一边不顾一切的伸手去抢救睡在床上的我，老人家因惊慌过度，连手也被火烧到了。家中人等听见她老人家惊叫声，又见房中通红一遍，知道是起火了，连忙打水来浇熄火。火在匆忙中打熄，抱起了仍旧睡在床上的我；我虽然毫发未损，可是浑身是水与灰屑。等家中人把我换洗后抱给母亲看，而这时她老人家因受惊过度，已是神智不清的说：“不是这个毛毛，那个已经烧死了，你们莫骗我！”老人家自从此事发生后，便哭笑无常，寝馈亦忘。直到十月叠经医巫并施，老人家方才稍复正常。还是我祖母她老人家有智慧，对我母亲说：“你的小女娃娃是双眼皮，头上有两个漩涡，两个大拇指是有螺旋纹的，你去看看是不是？”我母亲仔细地看摸了一遍，果然是真的，老人家疑虑顿失，转忧为喜，这才真正相信自己毛毛没有受伤，而被救了出来。但是母亲自受了三个月的“锥心”之罪，吃了不少苦头。若是当时我母亲不及时到房中而发现这场火，那我不烧死，也会被烟薰呛而死。母亲怀我、生我、育我、救我，纵然粉身碎骨，

亦难还报！每一思念及此，则令我心神难安！

约农生下来才三个月，就由五叔五婶带去英国的，到五岁才回来。想在英国的环境卫生和饮食等，当然比我们乡下干净得多，所以五婶带他回平江县娘家住，可能是由于环境饮食的关系，不知怎样得了所谓阿米巴痢疾，大便直泻如水，黏糊如藕粉状且有血丝，时好时坏，拖延日久，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五婶带他专程到长沙来医治，住在姑母俞夫人家，延医吃药由五婶日夜看护，辗转床第三月余，才慢慢医治好。那时只有中医，还是中医治调兼用，才能有此效率。至今约农个子矮小，有人说还是因为这场痢疾的影响所致。他妈妈为他真是费尽了苦心，生他时已经得了病，后来幸保养看护得宜才免于大难，但痛苦经年，所以一直身体极坏，总算救出约农一条性命。所幸约农秉性忠厚孝顺母亲，学成由英返国，还能省侍五婶六阅月，她老人家才去世！约农现在近八十，一生淡泊明志，勤于治学，谦虚以待人，奉公、守法、守份，做到不辱先人，五婶也可以含笑天国了。

一九一九年，我们已在西园开学。有一日下午我与母亲到南门正街买东西，回来便步行回家。到了北正街，忽然下起雨来，我与母亲急忙找捷径走入泰安里，很近西园。哪里料到雨越下越大，只好在人家大门外屋檐下避雨，这家的屋檐没有柱子，是悬空突出来的——长沙小屋有此类屋檐者甚多，下面无柱子，以免侵占街道路面；多半是用两根横木在房子内伸出来，上钉横木再加横“悬皮”——

椽条——盖上瓦片即了事，以方便有人客来访时可聊避雨淋。那时雨正很大，我们站了片刻，看着雨小了些，我和母亲便决定冒小雨回家，当我们走离那屋檐，未到四、五丈，只听到轰然一声巨响而乒乓之声不绝于耳，回头一看，原来我们避雨的那个屋檐竟塌了下来，我与母亲相顾愕然。若是我们再迟一分钟离开，就是不被断椽破瓦砸死，也许要受伤，真是叨天之幸，我们又避过了这场劫难。

同样的一个事实，在一九三四年夏天也临到我与约农身上。那时我正为要申请庚子赔款的补助事，要去外交部请领护照去英国，我们坐平汉路快车先到洛阳，因为先父认为吴佩孚或可襄助，要我们携带着老人家的亲笔信去访他。我们到了洛阳，当然先要找旅馆，找了一家名洛阳大旅社的。据旅馆老板告诉说：“吴大帅不住在洛阳，现住在西宫，离洛阳还有几里的路。”我们便决定次日早去，当时老板听到我们要见大帅，当然是上客，一定要我们住上客房。我看那屋是四合院子，那两间所谓上客房是在南边，但一排三间，最后一间房是沐浴室，我便说“那房子近沐浴室，傍晚时来往洗澡的人一定不少而且很吵，不如还是住那进门两间算了”。这两间与上客房正对面，也是一排三间，最后一间是大门及一小柜台，而与洗澡间正对面。我们的客房，房里既热，臭虫又多，我住里间，约农住外间，我辗转床第彻夜无眠，眼看窗纸放鱼肚白，大约是五时许，忽然间惊天动地的轰隆一声响，紧随着的断椽落瓦声。是时满店的人都被惊醒了，大家喧嚷着披上衣起床出来一看

究竟，谁知正是老板原先所要我们居的那两间上客房，墙壁向外倾倒，屋顶则整个坐塌了下来。若不是我们选了这边两间，我与约农，定遭不测的无妄之灾。满店的人都为我们庆幸着说：“你们两位命大，一定将来有造化。”我们也颔首庆幸得上帝的教恩，否则，枉死他乡，真不知何以善其后？约农却笑我有点Psychic或第六感觉，这件事真是所谓巧合的了。

一九三一年，我辞了二中校长，到上海略为休息，母亲与我、萧八姐，与舍弟昭桦同行去烟台，不料动身那日，突然口咯鲜血不止，经服药后血稍止住，仍旧动身。四妹宝茵原不许我去的，但我说：“既有药，又有母亲、昭桦和萧八姐照顾，可保无妨。”在船上居然很好，到了烟台。后来约农带大姐一同来了，四月八日我因感到学校被封又吐几口血，但觉得小病无所谓。不过仍由海关医生劝去协和医院诊断，据医生说：“不是肺病，乃是吸血虫为害。”正好那年六月，先母与约农同回湖南，因为赵夫人忽然中风。岂料赵夫人还渐渐好了，反而六婶（袭侯夫人）及佛保弟在同日死亡，害得约农弟忙得两头奔走。我因太平洋国际学会九月在上海开会，又因七婶萧夫人六十大庆，便与萧八姐同到上海，我住沧州别墅，她则住七婶家。我一则开会太忙，二则因沧州别墅的电梯坏了，我是住在四楼，每天上下楼梯颇感吃力。我真感谢余日章先生，他亲自爬上四层楼来看我。那时他已有心脏病，我真为他大吃一惊，深恐他太累了！我们缓步同行下楼，每至一层都休息一会，

谁知他回去还好，我次日回到七婶家时，也许是因为回家提了一口小箱子太累之故，当天夜里竟大口吐血。病起时只感喉头痒痒的，似乎有痰欲吐，岂知一咳，吐出来都是鲜血，瞬间转剧，连鼻孔里也淌下鲜血，喉头又感到闭住了气似的。我大喊：“八姐！快来！”萧八姐连忙开灯，赶来看我已是血污满面，而鼻孔血已凝结着，她用纸包着往外拉出两条血条有二、三寸长，这才能呼吸了。七婶在隔壁房，她连鞋子也未穿便走过来，赶忙拿出协和的药，吃了一粒，这才慢慢止住了血，大家坐以待旦，天亮便去医院找四妹来。她那红房子医院，相隔只有一箭之地，她来了一诊断后则大怪家里的人，为什么不昨夜叫她，应当到医院挂急诊号。她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三姐这种吐狂血病，可以被血塞住肺，被自己的血淹死的！好危险！好危险啊！以后家中人有病，万不可再如此疏忽了！”我说：“这是我自己说不要叫你的，不要尽怪他们。”于是她便叫人在她的医院抬来一张可以摇高上半身的病床，把我用两人抬着轻轻放在病床上，半靠半睡的躺着。大姐宝龄与舍弟昭权因祝贺七婶寿诞也在上海，听见四妹的话，便决定打电报到长沙给我母亲。电报上说：“三姐有病，望速来。”我母亲等不及约农，就与佛保弟的母亲陈恭人带同一个家人来到了上海。那时我的病已好了，只是病后身体需要休养，我与四妹同住一房，又承姑祖母聂太夫人及姑母俞夫人，与七婶等等日赐补品，身体很快恢复了。于是我们五人：母亲、陈干妈、约农、萧八姐，及工友杜贵和同去烟台。大

姐与三弟共回长沙，因为三弟已任湖南大学电机系主任之职。这一次我的病能好，可说是四妹宝茵之功。（我们可说是冒了一次大险，而自己还不晓得，后来想起来，真是可怕之极）。当晚若是没有萧八姐用纸扯出我鼻孔内血条，也可能因之闭气而死，所以她的救命功劳也不可忘记的。当我去北平协和医院检验，医生说，不是肺病，可能是吸血虫！我便放心做事了。

一九三七年，日本启衅，芦沟桥事变发生。第二年八月十七日上午九时许，学校被日机投掷炸弹十五枚，我与左、陈、张、萧、谭诸君及学生数人齐躲入防空洞壕，壕上也中了一枚炸弹，幸亏有颗香椿树挡住炸弹在空中爆炸了，我们匍匐在地，幸未受伤。日机去后，我们走出来一看校园，树木焦黑，断枝折干，房屋半数炸毁。那时约农正送五叔去南宁，未受此惊。我们能幸免于被炸，而炸弹仅隔我们几尺，真是险极了。此事亦详述如上集，故不赘叙。

一九三九年逃到香港，起初逃难的人很多，我们一行人借居姑母家中。后来姑母全家去重庆，我们也移住到九龙，不幸五叔大人在九龙因心脏病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去世！那年冬天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变，九龙、香港次第陷日军手中。日本人初来时秩序很乱，除他们皇军到处示威以外，还有流氓地痞到处抢劫。有一日，约农正在弥顿道上买了信纸回来，到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对面，忽然被一个人挡住说：“要搜查身上看是否带有鸦片烟。”那时约农只穿了件

长衫，内衬短衣，两边有口袋，见这个样子便知道不妙，忙说：“我身上并没有鸦片烟”，一面说，一面解开衣服让他查。那人便要拖他到小巷子里去，约农不肯，站在街道上不动说：“你要查就在这里查，我的衣又不多，何必进小巷？”那人便看他的内衣口袋，伸手一摸，只有香港纸币二元。那时香港纸已经贬值到四元才能换日本军票一元了。那人看见没有大用，就挥挥手说：“你去罢！”约农闻言则连忙走开，其实他另外一个衣袋内有五百元美金收条一纸，乃是我们买的爱圃公债收据，若当时被那人看见，定会把约农掳去来勒索。后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内发现死人不少，那都是被流氓抢劫的，或掳了去而无钱赎票的，惨遭“撕票”的人。那天约农回家，当然也感觉逃了一难，但不知它是危险万分的。设若是关入烟草公司内，则断无生理。我们除开家里只有几百港洋之外，更无财物。那时银行保险屋未开，家中连典押的东西也没有。假如约农被匪徒绑架去，又如何能救他？真是吉人天相，苦人天照顾。后来日本人知道流氓滋事生端，便开始大事搜捕，流氓捉去后便音息全无，有人说丢到海中去了，也有人说是暗地里予以枪毙了。总之，后来流氓减少了，但路上被饿死的人加多了。每天都有黑车收尸，可见后来连饿死，也不敢抢劫了！最后因为粮食日缺，日本人准许人民还乡，在大浦道上拖儿带女，就连六、七岁的小孩也背上包袱逃难了，沿途倒毙者，比比皆是。死尸遍地，令人触目惊心，真是惨不忍睹。

我与约农还有一次遇着日本人巷战，两个弯腰驼背扶墙靠壁摸索着回家，子弹掠空嘶嘶之声在头上或左右飞过，幸得有惊无险，而安全回家。我们在美国时，差点乘了闯祸的飞机，差点丧生国外，这都是上面说过的，现从略。

总之，我们是九死一生逃出来的，这就是上帝所赐予的洪福了，也可说是造化了的。

上文说到我与约农在芝加哥坐喷射机逃回生命，这里不再述。但约农五岁由英国回国时，也出了一件冒险的事。在海船上五叔五婶带他回国时，有一日船在地中海内，五叔在船上和人家打桥牌，五婶带约农在客厅窗前看意大利风景，忽然转眼看不见约农了，赶忙到甲板上去寻，岂知走遍甲板，毫无踪迹，五婶大急，便告知五叔，于是到处寻找，并告知船主，满船客人、水手，全体动员，上下甲板，及一二三等舱都各处查看。五婶只哭得要跳海！过了约一小时多，忽然有个水手大喊说：“好了在这里了！快来拿小楼梯来！”原来在起重机旁边，用完起货后，把起重机的粗缆挽成一个大圈，中间是空的。约农只五岁，不知怎样爬进去了！水手把楼梯放进空眼中，不然大缆一向内跌，必要伤损小孩。这个水手极小心的由梯子上下去，把约农抱出来，毫无伤损。五婶才悲喜交集和五叔重谢那个水手。

四十 乡下的医药问题

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说“人命关天”，又说“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图”，都是说不能见死不救。抗战时，我们躲在湘乡老家，遇见亲友或农民的疾病不少。我留学时原有学医的志愿，只因学医的时间太长，我又回国服务心切，才改学生物学、数学、教育学，可以早些回国服务，但是对医药始终抱兴趣。因此在香港逃脱日本人的魔掌时，靠老友余六铁先生的帮助，偷偷的带回许多西药。也许有人责备我这种“试药郎中”（我们乡下俗语，叫医生做郎中）可以误人不浅，但住在穷乡僻壤，不试药，难道见死不救吗？

我回去不久，舍弟昭杭的太太小产了。产下一个六个月的男胎，当然小孩是死了。产妇第一日尚好，第二日便有卅八度的体温，而且瘀血不下——中国医书，叫恶露不下——吃了些益母草、红花、桃仁等也无效。到第三日后，更是温度加高，人也有点昏迷状况。到了第六天更是险象丛生。我带了磺安药片及苏打片，看外国医书，似乎这药是可用的。我便向昭杭说：“我有一种西药可以医，这病叫产褥热，若不急救，是要送命的！”他那时方寸已乱，看见人快要死了，只好冒险尝试。问她本人，也点头许可。我不敢一次服四粒，配苏打两粒，用水吞服，后来每四小时又一样各二粒。那时的温度，已是卅九点五度了！吃药是早上八点钟，到下午四时，热就退了一度。照这样吃药至第二日上午，血水大下，温度也退到了三十七点八度。又吃药一天，到第三日早上八时，温度便完全退了——这是产后第八日。第九日早上温度降到三十七度以下。我说这是体虚，不要紧，那日只服药一次，我也不敢再给她药吃。

可能照医学道理,还要吃,但是我不敢!好在她日日进步,居然满月后,完全好了。这令我欢喜无限,尤其我感到快乐,能救了她一命。

第二个病人,却没有这样幸运!这是我们的亲戚童锡陞的女儿童恩书。她在明德中学(那时在湘乡斜岭)读书。有一日清晨,她去上课,路上忽遇一只恶狗,向她追咬,她极力奔逃,不幸还是被咬一口,伤在右腿上,皮破血流,众人追救,把狗打走。但其中有人说:“这是一只疯狗,危险得很!”童恩书回家把伤口包好,仍旧上课。过几日那只狗果然自死,证明是疯狗无疑。于是大家都慌了!乡下人医此病用极厉害的打药,内以斑蝥为主,服下更增痛苦。我便派人到永丰拍了一电致舍弟昭亿,他在昆明,那里有治疯狗血清,请他设法寄药来衡阳,因为衡阳有他的弟弟昭谏在铁路局,托人较便。我也嘱咐童家,派人在衡阳坐等,岂知药到两礼拜,童家并没有派人。昭谏收到药两个礼拜,还无人接头。他只好派人来问,这里童家才把女儿送到衡阳亲戚朱家寄住,才令人取药,请医生打针。这时童恩书已经发病,针药太迟,被狗咬后七十余日,终于惨死了!可怜!可惜!可痛!因为这件事我尽了大力,昭亿、昭谏也尽了一切人事,而误在童府做事太慢!牺牲了一个最聪明、最好学、也最逗人喜爱的孩子!这件事是我想救人而失败的一次惨痛经验!

我与萧八姐在富厚堂用了一个小女孩,名叫刘冬梅,拿拿零碎东西,传话送信等等。她的叔父,也是我们家的

佃家，忽然得严重的喉痛，中医治了六七天，未见好转，而且两边喉咙肿得差不多合拢了，呼吸困难，滴水不下，好象已经临危了，幸而他的儿子聪明，说“只要到富厚堂问问，看有药能救不能”。他便跑来我家，当时我还家里山上游行，他不敢叫我，幸亏由朱祝生之亲戚葛和成看见，急忙上山告诉我。我登时下山，到房中取出漱口药水及磺安粉一包，要他们先用漱口水洗口，再用磺安粉用喉枪吹入喉上（喉枪是我祖母在乡下发明的，用铜做的，形状象小孩玩的摇鼓，不过柄上开一斜口，以便放药，再用手按另一头的小鼓，药便吹入喉中，这样免得用人口吹纸筒，两人都可传病。喉枪用时，当然用烧开水煮过消毒）。他拿药去，如法医治，登时病人便大咳大吐，吐出脓血甚多。当夜便可吞米汤，次日又吹药，洗口，三四日后，便全好了。他来叩头谢我，并送大母鸡一只，我受叩头，但退了鸡，因为我觉得救了他，就是最大的幸运。现在我想是他当时得了严重的扁桃腺炎！

富厚堂房子很大，所以我们用了两个看门的人。一个守门，一个便进去报告事情。一个名叫曾玉阶，年纪较长，又是个裁缝，我们要他多看门，闲时也为各房做点衣服赚点外水。一个名叫王金魁，他便多走些路，出进报告。一九四四年四月某日，王金魁忽然气急败坏的样子跑了进来。我们只道是有新的游击队来了，不受劝告，直奔进来。哪里晓得他来说：“曾玉阶忽然重病，不能出气，心窝绞痛，一身冷汗，只怕就要归西了！”我听见此话，急忙与约农同

来门房，看见曾玉阶面如白纸，呼吸急促，手捧心窝，哼哼不止。我摸他的脉搏已在六十跳以下。我赶紧要约农进去拿白兰地酒来。酒来时，他的脉搏已降到四十，他起先不肯喝酒说：“我受了戒，不吃酒！”我说：“不是吃酒是吃药。”他才勉强吞下。我又进去拿了两粒强心药Nitroglycerin要他放在舌下，又高丽参数片含在口中，连忙唤人抬轿送到乡下唯一的军医谢盖凡家，请医生打强心针。他在医生家停了两小时，药力渐渐见效，脉搏也回到六十七，才回来，又服药数日，休养半月，总算在死神手里夺回了生命。谢医生也说：“若没有那白兰地和强心药，曾玉阶便会在路上死亡。”我们离开大陆时，一九四九年他还健在，还写过信给我们。

我们看书楼的王子陵，年高七十，已不能多上楼，工作由他的女儿王席珍代做。王子陵极信八字，一九四四年秋天，他自己算了八字说难过七月初四，他深信不疑。六月底，他右耳发痛，发高烧，耳鼻都出血。我看象是中耳炎，传到鼻腔，喉头。但他自己说是大热症，要七窍流血的，而且他的天命已绝，不肯吃药。我看他也要消炎片，便照医昭杭四嫂的方法，勉强他吃药。他无法推，而且有王席珍（也是我的家塾学生）苦劝，只好照吃，一个礼拜，完全好了，已经过了七月初四。我说：“好了，你逃出这关，又有一纪可活，我的八字算法，比你的高强。”他也只好笑谢！

在上文说到陈君吃毛地黄治好肿病，我另有两位病人

也吃这药好了。第一个是萧府三舅的侍女名叫南芬的。她开始脚肿，没有人注意，后来渐渐的到腰部。乡下无医药，也不过弄了偏方草药试试，都无效，看看肿到脸上，连眼皮也肿了。萧三舅只要把她送回衡山。我说：“去衡山更不好，我这里还有点药，不知你敢试不敢？”她说：“回家也是死！我情愿试。”于是我摸她脉搏，也是一分钟一百二十多下，便大胆给毛地黄十滴，同时禁盐，禁辛辣等。第二日头面就好些，继续吃了六七天，腹部也消了，大约半月完全好了。但是仍要禁盐、辛辣等食物一个月。每日在我家吃饭，人也长胖了些，后来回到衡阳，仍在萧家做事。

第二个是我的堂弟昭棉，他身体从小就不好，结婚后更觉虚弱。乡下战时医药不便，无法根治，总是三朝两日闹病。我看他声微气弱，行动无力，略有走动，便有气喘咳嗽。有一夜因有事来富厚堂，他们夫妇及小孩均在上进房子住下。半夜里他的太太忽然来叫我说“昭棉气喘不已，心跳异常”。我去看时也是脉搏快到一百二十多下，而且中间歇至不少。显然是心脏衰弱，只有用毛地黄了。因有陈君及南芬的经验，我便给他十滴，我坐了一小时多，看他的反应何如——因为毛地黄吃多了可以中毒，有呕吐、恶心、抽筋等现象——幸而他都没有，并且安然入睡，第二日，觉得好多了。我便劝他买这药，并且说假如有便人，可到衡阳买一种强心药，应急的药有名叫三硝基甘油片，每发心胸痛时，含一片在舌头下面，不到几分钟，就可止痛。我说我也有心脏病，出门时都带在身边。可惜他请人

去衡阳，没有买到，我便送了他几片。

萧表姊孝徽女士，本是衡阳人，但她在原籍住的时间很少。从小就跟她父母在外省，在浙江最久，也是冯氏学校毕业。同我办艺芳又同去香港避难，后又同回富厚堂。一九四五年胜利后，九月里她定要回去看看老家，也要与她的弟妹们一聚。当然我们没有不赞成之理。却是知道衡阳日军摧毁很大，她的老家江东岸萧顺堂，也受了日本人的轰炸。我更劝她早去早回，如不方便，住一二日即回。她家还有个异母弟孝谦夫妇、堂弟孝岐夫妇，及侄辈数人。但她住不到十天就回来了，说是房屋破损不堪，饮食起居一切都不方便，而且见景生情不能忍受，所以早早回来。路上风尘劳碌，不免容颜憔悴。不料两三日后忽然腹泻腹痛，渐转痢疾，毫无疑问是路上传染的，一日夜起来二三十次，我真急了。既愁她的病，又怕众人传染。只好一面分隔饮食，一面埋掩她的排泄物。我们乡下，最怕两样病，一是天花，一是痢疾。幸好我们的佣人老梁妈是长沙来的，已经跟我们二十余年，她不怕照拂萧八姐。我忽然想起约农曾带回德国药特灵十二颗，便给她连服二颗，以后每四小时一颗，当夜肚子就不痛了，第二日又服三颗，第三日也是如此，还剩二颗，她定要留下以备再发时应用，其实可以不必。但这一次我感觉真是天助。约农是与尹任先厅长到广州去时，因腹痛买的，吃了些还剩这十二颗，一直放在随身小提箱内，久已忘记了，偏偏就得了大用，真是感谢上帝。

约农自己，也受了我这试药郎中的一次医治。这是已在胜利以后，而且他已经做了克强学院院长，克强一部份在长沙，一部份在衡阳。他从衡阳回富厚堂休暑假，便感觉不舒服。有了萧八姐的经验，我怕他也有痢疾。好在他肚子不痛只是脚发冷，鼻尖及面部也发冷，体温加高，每日十二点钟后便高到三十九度点八，下午三四时，热度略减，也不出汗，体温总在三十八度之上，不到正常，如此者三天。我看情形，形象疟疾，但不出汗，也不退烧，又令我怀疑。在香港时余六铁夫人余亚利医生曾告诉我说：有一种恶性疟疾，温度始终不降，她给了我一种药名叫Tota Quine，是奎宁丸一类，但是药性较强，对于恶性疟疾，很有效力。此种药颗粒很小，第一次吃四粒，要在病发之先两小时吞服，以后每四小时三粒，日夜不停。我看乡下没有再好的药，便与约农商量用此药。在上午十时吃了四粒，以后每四小时二粒。夜晚我开小铺在他房中半夜也唤他吃药。这样一连三日夜，果然热全退了，不过很虚弱，好在乡下一切饮食鱼、肉、鸡、蛋都很新鲜，调养不错，等到宝荀八妹请宝苏妹带安医生来湘乡时，约农已经完全好了。宝苏和安医生二三日后才来，看见他已全愈，住了两日，便回长沙去了。我能治好约农，是生平的一件大事。

另外我还治好舍弟的厨子之子王国光。他在端午日用快刀剃鸡，没有把刀放回去。夜晚忽想起，要去收刀子。乡下没有长灯，他也没有带火把，便去暗中摸索，岂料正好将刀摸下，刀子跌下来，砍在右脚背上。他大喊：“快来！”

我被刀砍了！”起初以为有贼，厨房众人，蜂拥而入，方知他是自己不慎，错砍了脚。当时脚背血流如注，众人来告诉我，我就带了磺胺粉，硼酸水及绷布赶去。先把他的小腿上用绷带扎紧止血，再用硼酸水洗净伤口，好在他没有伤筋骨，只是伤口有二寸多长，看起来可怕得很。经我上药包扎后，要人把他背了回去，第二日再用红药水搽过，他年轻力壮，伤口已干，也没有肿，不到一个礼拜便完全好了。

我有一个小侄儿，因为家中煮莲子汤，在炭火炉旁煨热，他便去揭开莲子罐子的盖，不幸把罐子打翻烫了脚——好象是右脚——登时大声痛哭，惊动众人，看见他的脚背红了一大块，好在未破皮起泡。我连忙先用冷盐水洗净脚背，再用自制的火烫药涂上，不用包扎，只要干了又搽，干得太厉害，便用冷盐开水把干的轻轻洗掉，再搽火烫药，两三日就好了，（夜里睡时可用冷绷布包好，日间不必包，以透空气为好。）

这个极简单又实用的方子，连乡下也可办到，并且可以早办好储藏，作家常应用的药，其方如下：麻油一份，桐油一份，澄清溶化的石灰水四份（不管用量杯或普通茶杯，总要照这个比率共成六份），然后放入干净消毒的大瓶中，用干净筷子搅匀，这个混合的水便越搅越浓，成为白浆。用时用干净棉花球涂在患处，可以立时止痛，防止起泡。这个药在小烫伤极灵，如伤处大到五六寸见方以上，就非进医院不可了。不过这药仍可维持止痛，止烂，等达

到医院的时候。另外以上所说用磺胺片、毛地黄等，都是无医院的地方应急的法子，有医院总以进医院为好。

四一 八十岁这年的几件大事

中国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这话大致是对的。耶稣圣经里也说“人生是三个二十加十岁”，这也是七十岁。我曾家自竹亭公到我们六代，但是超过七十岁的只有四个人，聂姑祖母高龄九十三岁，介石五伯祖高龄八十四岁，俞姑母高龄七十八岁，约农的父亲——我的五叔——刚过七十岁后三个月便去世。现在我与约农虽然身经两次大战、抗日、逃难、疾病等各样痛苦，居然能进了八十，实在算是奇迹，不能不感谢祖德、天佑，不然我们并没有特殊功德，如何能享此大年！

自从来台湾后，我们有一件最大的心事，便是如何保守约农千辛万苦带出来的文正公、忠襄公、惠敏公以及祖父母等的手泽。尤其文正、惠敏的日记，这些都有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记录。可说不是我们曾氏一家之宝，乃是国家之宝。我们所住的房子，是木头日本式的，邻舍又近，万一发生火警，如何能抢救！有一次大水，水离二门不过二三寸，水若进屋，书箱浸湿，便无法修整那些书札，那夜直急得我眼巴巴的看着水退，才敢睡觉。约农是急得到处乱走，看有法抬高书箱不能！这些书箱曾经寄在谭季甫妹夫的金瓜石办公处，但因那里潮湿太重，又搬回家中。最后

有吴相湘、杨家骆、刘国瑞、毛子水等各位先生劝我们先由学生书局影印重要的一部份出版，以便流传世界，万一遭大难把原文失掉时，人间还有遗迹可考，我们便欣然赞同。于是把原文拿出，请朱祝生及邵太太每日去打号码，监印，共计出书二十四本，但原稿仍存在家中。自一九七一年下半年国际情形转变，我更觉得保存困难。我与约农那时都年近八十，这些文件如何保存？所以在文正公一百六十岁生日——阴历十月十一日——我们便请了与文正公有血统关系的人，来我家茶会，讨论办法。计来的有俞大维夫妇、俞大纲夫妇、宝苏及蔡声瑞、十妹及谭季甫、绍杰夫妇、卓贻来夫妇、昭承、昭六、昭楠、镇濂、镇洛夫妇、曾周莹（同宗，也是我的学生，承办茶点）。本来也请了俞大彩，但她有事，不能来。那日原请了张五姑母——文正公外孙女（聂崇德老人之女）及其子张鹏云表弟夫妇，其女张心漪与婿费骅，但他们都不能来，因为五姑母病重，就是那日仙逝于荣民总医院！我们都感觉凄惋之至。我们向文正遗像行礼之后，开茶点之前，我就提议保存文件方法，讨论一番后，决计寄存故宫博物院，在坐的均无异议，于是就决定照办。后来由绍杰夫妇陪同我们去赴蒋复璁院长请的筵席，在座上谈到几时到舍下来接收书件，于是定了本年（一九七二年）二月七日上午。在那几天之前，幸而镇洛十爷和十嫂到我家来小住，我便请他们二位，我和朱祝生四人清对学生书局的影印本与原稿，看有无错误遗失。有些很容易对，有些因为原稿纸张脆弱，所印的号码又不明

白，对起来很费力。好在做了一个礼拜，总算都不错。就在七日上午十时，请蒋复璁院长、李霖灿副院长来接收。一共四大铁箱，又我们赠送博物院学生书局出版的书廿四本。新闻记者真是神速，他们不知怎么样得了消息，于是来访问的，照相的，参观的，整日不断。连电视也来照相，照了我们与蒋院长授受情形，及书箱抬上汽车情形，我们送客情形。当然这些文件书籍，与我们相伴差不多四十多年，一旦别离，不禁有点伤感，目送汽车去远才进屋里来（又被电视记者们照了相），不过我们心里也减少了一半压力。几天后我们与博物院订了一个合同，寄存书籍暂定五年，期满后，双方再议办法。我有两个英国朋友，一个是贾惠宜小姐（曾在艺芳教过书），一个是巴克小姐（F. Barker，曾照拂她的母亲到一百岁），她们二位都不远千里来看我。到台湾我家中，看见我们的家藏文献及木造的房屋，都很不放心。等我写信告诉她们说书籍已经寄存博物院，她们都来信庆祝我。可见受了高等教育的外国人，都知道宝贵中国文化。

上文说到我与约农今年都进八十岁，当然也是人生不易之事，不过我们因为多难，又飘泊远离家乡，所以毫无过生日的思想，连家庭小朋友宴也都婉辞了。但是我们的艺芳老同学一定不肯，非要庆祝不可，再四推辞不脱，只好定了本年四月八日来纪念艺芳精神不死，及祝福我们二人的长寿。学生们有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救了我们的性命之功，现在她们一定要庆祝我们寿诞，实在盛情难却。

既定了四月八日，在台湾的老学友便选出了一个筹备会，会员是徐少英、王恮、周莹、李瑞华、丑志琦、左焕芳，地址定在“妇女之家”，并由王恮请王开节先生作一寿序，用艺芳学友会名义邀请亲友及社会人士参加茶会典礼。

四月八日下午三时的礼节是这样的。在两时半，艺芳同学大都到了“妇女之家”，悬挂寿屏、寿对、寿诗、寿幛、花篮……等，由周莹、曾昭楠、曾宪梁、朱祝生……等来悬挂布置。“寿”字挂在中间，诗挂在右边，左边有郑彦棻、黄少谷、黄杰、谷正纲……等先生的联对及张岳军先生的寿礼。对面是同学们所赠的寿屏（王开节先生的手笔）。其余花篮、寿幛等琳琅满目，真使我们既感谢，又惭愧，实在受奖赞过度，只好勉励自己，虽然年老，仍应努力，来报答各位的盛情。

四月八日下午二时半，在“妇女之家”，艺芳在台老同学都到场为我们庆祝八十寿诞。因为恐怕来客人多，所以分配招待人员。招待宗亲有舍弟昭承、昭六、绍杰、镇濂、镇洛、昭楠等。招待亲友有蔡声瑞、葛培萱、俞博生、王耀秦、鄧够珍、李施文、萧孝岳、宣诚等。至于各界要人、党政文教军诸位，则由老同学以主人身份招待。以下午、晚间，礼堂、客厅，分成几大组。一组是薛锦回、蒋冠九、曾昭楣、周颜玉、梁培恺、何璿、何琼、龙澧芬、唐应元、彭阜午、唐新媛。一组是徐少英、王恮、左焕芬、曾宝苏、高传芳、丑志琦、唐天荪、陈志英、赵琛、袁涤非。一组

是周莹、曾荣、王星渝、徐韶光、贾宗兰、李瑞华、王介眉、曾宪蓉、曾宪蕴、魏国珍。他们辛苦数小时，极力招待，真可佩服。另外在美国的老同学有张慧雅、余叔恒、张成智、晏源理、李熙、夏开利、李香林等，她们送了很厚的寿礼还有贺信，远道深情，尤可感谢。另有许多小门生为我服务，例如郭琦玲、郭力行、张一心、林美华、谢叔惠等帮助照拂签名、收礼、登簿等事，郭立力、付凯军帮助照相。但专门照相有专家邓新吾先生，他的相照得又精致又有好镜头。这些朋友我们都在此道谢。

四时前，由周莹司仪，主持会场礼节，老同学薛锦回、王恽、徐少英站在前面，其余站成三排在后面，唱校歌，行三鞠躬礼后，由周莹报告开会意义，请师范大学张宗良校长致辞，（张校长是丑志琦同学的先生，所以同学们都叫他学姐夫。）张君对我们及同学都大加称许，实在令我们兴奋感谢。最后由我致答辞，当然是铭谢盛意，愧无招待等话。说完后由王恽同学送寿屏，徐少英同学送寿仪，同学及亲友欢呼拍掌，要我们切寿糕分赠在坐嘉宾，也由各位招待员送茶点，直到下午五时后，方才尽欢离去。在周旋迎送间，我因为目力太差，由宪蕴侄牵扶；约农因为腿软无力，由李施文女士及其子王慰祖与黄孝明女士牵扶。对她们，我们也诚心感谢。

下午六时许，我们留下了几十位朋友及亲戚便饭。一面吃饭，一面还欣赏余兴。第一节目是丑志琦同学请来的义光幼稚园小朋友表演舞蹈，天真活泼，极为可爱。第二

是徐少英同学邀请海洋学院教授们的国乐团奏国乐，金声玉振，令人听了心旷神怡。第三是邵梦兰校长带领士林高级中学的国乐队奏乐，弦管齐鸣箫鼓并奏，真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想。最珍贵的是邵校长自奏古筝，音韵铿锵，更加悦耳。这三节余兴，更加添了来宾许多快乐，我们深深致谢。排席次时有周莹、唐天荪、李瑞华、魏国珍等请嘉宾入坐，坐位都能看见台上。

贵宾来时，有唐应允、左焕芳发赠寿序。去时有李瑞华、丑志琦分赠各贵宾寿碗，碗由曾宝苏、高传芬、左焕芳管理发出，由朱祝生、朱权奔走递送。这些碗是珊瑚色起金字“福寿康宁”并有我两人八秩寿庆，及“艺芳旅台留美同学赠送”字样，可为长久纪念。

席上有几个插曲，表示朋友们对我们的好感，一是卢光舜大夫极力的劝约农休养，因为约农血压高，所以不要他送客，即去台大医院休息。一是于枢机主教(斌)临去时由周莹陪我送客，那时艺芳同学有好多人在旁，于枢机主教说：“看见你们这样的热心侍奉老师，连我们办教育的人都有了安慰，你们证明了办教育，并不是白费精神！”我深信辅仁大学的学生，也是一样的爱戴于校长。一是荣宝峰大夫赶来为我们拜寿，（荣大夫是为我医耳病极尽心的），向我们道喜，那时他刚下班，还穿着白外褂，到会场才脱下，这样地尊敬我们，实在令我们惭感不已。古语有云“友谊是人生的珍宝”，真是不错的。

这次来访问的新闻记者，也十分亲切和气。问的话既

扼要又清楚，并都写了极好的报导登在当日的各报上。

酒阑人散，我们由舍弟镇洛夫妇陪送回家。以后就必须要做累人又最麻烦的工作——收拾会场，清查及运回家各色屏幛礼物。幸有周莹同学及镇濂舍弟，带领曾宪棨、穆丽卿、朱祝生、朱权、乔寰、潘儒杰、宣冬华……诸君陆续运回，这一天的大事，方告结束。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日，台中东海大学——是约农在一九五五、五六两年惨澹经营所创办的——十七周年纪念。由现任校长谢明山博士邀请参加典礼，并命名一条由学校大门到总办公厅的大路为“约农路”，以资永久纪念。是日由谢校长，查良鉴董事长，黄季陆先生，接往东海大学，由舍亲鄞够珍校长，舍侄曾宪蕴护送。一到大学，便有许多嘉宾，大学教授及同学，一齐鼓掌高呼，表示热烈的欢迎。在剪彩开路时，尤其热闹，极一时之盛。回思约农长东海由创始及开办，不过两年多，他做事十分努力，他有三大目的：（一）科学人材要有国粹及宗教的认识；（二）通才教育；（三）劳作制度。在他短短两年中，当然不能办到完善，但已建立基础。十五年来历届师生，都能更加培植，现在东海师生对于创办的老校长，竟有如此热忱的拥戴，正可证明我所说“一个人办教育，只要诚心诚意，他的心血不会是白费的”。因此写这段事实，以为我回忆的结束。

〔附〕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 曾纪芬 ·

年谱自叙

余幼蒙先文正公之彝训，长历世事之艰难，业业兢兢，常以陨越为惧。今八十之龄忽焉已届，追忆一生经历，感不绝心。子姓群从，多以纪述旧闻为请。因口授此编，令兑之婿为之詮次具稿，并敕诸儿同为参订。

余素乏强记之能，岁月悠远，忽忘已多。凡兹所记，皆余心目中所长在而不忘者，自非身历目睹，悉不属入。又本意以备家乘，示子孙，故所述多家庭琐碎。近年事迹见闻较切，不烦缕述，遂从略焉。迭次转徙，文籍散佚，其应编入而未能觅得者，尚复不鲜，他日兴到，更当补辑。当年情景日久，便成陈迹，因倩人绘图十馀幅，并历年照片附入，亦古人图书并行之意也。岁在辛未，崇德老人聂曾纪芬手题。时年八十越二年，再版重录。

是书印成以后，索观者甚多，后至者竟无以应。今年

长夏无事，思及图绘必须切合旧日生活实况，爰再手述琐屑情事，属兑之婿转请故都画家陈君，增绘成十六幅，并将最近之照片亦附入，重印一过焉。

岁在癸酉八月，崇德老人续题，时年八十有二。

序 二

粤在嘉庆辛未之岁，禹域之内，笃生异人，将以名世首出之姿，膺继往开来之任，曾文正公即其人也。方是时，中国鸦片之役初平，国耻之端已见。莠民交扇，法揆将沦。于是林清突发于宫掖，洪秀全潜育于金田。皇路渐夷，坚冰斯兆。而欧洲值拿破仑新败之后，列国均衡之势初张，外交侵略之机方启，高掌远蹠，竟指远东，波流所届，遍于宙合。铜山洛钟之应，遐迹同焉。自乎竹帛所传，未有重阻洞辟影响交臻事变繁会若斯之亟者也。文正以非常之人，际非常之运，开物成务，以先启行，事功存乎一时，而教泽留于百世。不朽之隆，宝迈古昔。

今者岁躔辛未，距公岳降之辰正值百二十年。感世变之日新，缅遗风之未沫，承学治国，闻者皆欲追念景行。则我外姑太夫人亦适于今年逢八十之庆。太夫人为文正季女，毓德钟祥，躬跻上寿，岿然鲁殿，邦家之光，天锡纯嘏，俾尔戩谷，以为国人矜式。其可无敷陈故

实，以讯悼史。盖太夫人兰闱蕴粹，著于髫龄。生甫周晬，文正奉讳辞朝，欧阳太夫人挈家归里。以太夫人出嗣靖毅公，靖毅星陨，始还侍养。其时初定舒州，旋围钟阜，功成九伐，勋集一门。黄旗紫气，壮长沙子弟之兵；卢矢彤弓，启汾阳异姓之国。于是数勤旃旆，移镇北畿；再领藩封，仍绥南服。太夫人随鸡鸣而问寝，侍翟芻以遄行。唯习女师，不闻邦政。文正治家齐肃，训子纯深。中夜有课读之勤，耀首无衔珠之饰。太郡亦屏忘贵势，亲服贱劳。太夫人精治酒浆，手成履袜，岁时奉献，程督明严。事在文正家书，夙已播闻远近。诸兄惠敏公授文史，兵部公传算学，皆如夙会，不假肆勤。遂得博娴艺事，通习今古。凡其含和履信之怀，直道正辞之节，端操有踪之度，通敏徇齐之识，协于士行，率礼无违。植根擢秀，有由来矣。文正与太郡先后即世，爰归于我外舅中丞公。衡山聂氏，盛自乾嘉，科第连翩，里间称羨。中丞公承华接绪，服政驰声；太母张太君素性威严，精于综核。太夫人恪偕子职，不俟初来。每纾曲体之心，克霁盛怒之色。和娣姒而忘箕帚之忿，捐簪珥而奉匜盥之欢。人疑贵家之女，宁挽鹿车；久知孝妇之诚，能供鱼饌。非夫礼度自然，孰能处难无失？泊乎筮仕江南，移家从宦；关河间阻，舟楫迂回。男钱女布，琐屑评量，剑室弓衣，昕宵摄护。爰从总办制造，以至备兵苏松。鹤甲犀渠，森阑倚于武库；吴头楚尾，领缩鞬之雄州。遂成特达之知，驯履功名之会。而乃续镫断带，载石镇舟，但有奉公，从无自润。去官之日，私囊几竭，

而公帑多贏。治内之职，佐政之效，于斯可睹。俄自两司、开府三省。牙门双节，来苏交慰于疲甿；刺史六条，威棱见惮于墨吏。仕履回旋，又皆往时文正、忠襄立功之域。十年周历，两族光荣。夫人衣锦之地，陌上之花正开；元侯持节之邦，东阁之门再启。于时张太君春秋已高，中丞公切于归侍，遂辞组绂，还卧林泉。辛亥之春，太君毕养；中丞公侍疾积劳，衔恤陨性。马鬣甫成，狼烽遽炽；一隅作难，九鼎遂迁。距文正定功东南之日，正当三纪。天废难兴，无往不复；运数之际，哲者鉴焉。太夫人与时偕行，通变不倦。自尔移居上海，督课诸子，致身实业，以振国贫。先是中丞公手辟恒丰纱厂，未遑整饬。诸子继志，日起有功。遂以衣被之利，操轻重之权，廿载以来，蔚成大业。复以余力，振兴社会事业，教育慈善，施与无吝。平民依如慈母，国人望若福星。盖太夫人早承文正彝训，明通当世之务；复从惠敏兵部亲研西学，深知欲振积弱，须浚新知。制器尚象之规，利用前民之术，训迪诸子，各俾讲求。远挹晚明徐李之风，近拓湘中郭曾之绪。黎民所惧，成效渐彰。仍谓教宗垂训，足挽颓庸；末俗饮狂，宜资针石。丰碑未祀，验长安之奉祠；宝血长殷，绍拂菻之流化。忘身卫道，见性依真，得指归于释老以外，纳象数于名理之中。相陵别墨之旨，礼失可求；蒙庄建德之乡，会心不远。躬参大德，礼祷精虔；融会东西，更无挂碍。故其深识独运，诚感旁乎。业成于家，化行于国。编简所载，闾檐之伦，际会若斯，冀乎希矣。世局之变，文正首当其冲，

亲启其龠。既挽狂澜，纳于轨物，因势利导，弥见渊衷。今文正上作星辰，而中原遂惊陵谷。惟太夫人目睹世运，近八十年。观其会通，究其终始，感盛衰之无端，察盈虚之有朕。岂直秦火所遗，传伏生之经术；蜀老尚在，证武侯之遗闻而已哉？乃若平生穆懿，倭指难穷。活人则写千金之方，澹灾则捐万钟之粟。续大家之诚，则有家政学之成书；广德象之教，则有诸女校之输费。行之终身，劳而无倦；年近耄期，性弥温粹。高情留乎翰墨，微尚寄于楸枰。谢世俗之纷华，超荣观而不与。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如春酿之能治太和，若明镜之不疲累照。式是殊邈，以介龙洪。宜其作女宗之楷模，称彤管之记注，享丰颐于遐耆，受繁祉于昌期。宣颖夙承慈覆，粗识徽犹。幸随扬恽，同读太史公之书；愧比韦皋，曾荷苗夫人之赏。谢傅门庭，预跻末坐；柳公家法，获近馀光。敢谓知言，克彰盛德。但春秋三世，近在所闻；群纪通家，今馀几辈。备家乘，为国光，述往事，诒来者。载笔之职，谅无所辞。承命编写年谱既竟，谨录寿颂以弁简端。民国二十年春日，子婿瞿宣颖谨序。

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壬子 咸丰二年 一岁

是年三月三十日丑时，生于北京贾家胡同寓宅。时吾父文正公以礼部侍郎奉职朝端。金田变起，至是将二年，是月十一日广西兵败，警报适至京也。

吾母欧阳太夫人先后育男子三人，女子六人。余行第六。长兄桢三岁以痘殇；次兄惠敏公(纪泽)；三兄栗诚公(纪鸿)；长姊纪静字孟衡，适湘潭袁榆生(秉桢)；二姊纪耀字仲坤，适茶陵陈松生(远济)；三姊纪琛字凤如，适湘乡罗允吉(兆升)；四姊纪纯适湘阴郭依永(刚基)；五姊幼殇，五姊因脾虚病痢失于调理而殇。故余生而欧阳太夫人及诸兄姊保抱提携，怜爱弥笃。时王父竹亭公、王母江太夫人犹在湘乡原籍，外王父福田公、外王母邱太夫人亦并在堂。

是年六月十二日，文正公奉江西考官之命，于二十四日出都。七月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和县境之小池驿，闻江太夫人讣，即时奔丧西上，而粤寇已犯长沙矣。方讣音初

至京邸，欧阳太夫人率子女成丧。虽有同乡同年帮同照料，专人沿途探报，备极劳忧。文正公一面奔丧，一面请母舅牧云先生由湘赴京接着回籍。其事并见文正公家书。

癸丑 咸丰三年 二岁

是年正月，文正公在长沙督办团练。母舅欧阳牧云先生护送全眷自京回籍，遵陆至襄阳登舟。

欧阳太夫人育子女多，乳苦不足，故佣北方乳媪以哺余。时将南行，遂听其宁家一次，余因往乡间其家小住。其人因贪小利不为太夫人所喜。适同里黎君有乳媪欲南归，即改雇此媪以行。

沿途风鹤多警，幼弱牵随，太夫人劳瘁甚至。惠敏公在舟次几失足溺于水，幸母舅见而拯之出险。

是年十月，文正公始奉东征之命。

甲寅 咸丰四年 三岁

初，叔父靖毅公夫妇无子，以澄侯公子纪渠承嗣，复以膝前无承欢之女，索四姊及余出继。（见文正公咸丰四年七月初六日日记）自是以至十一岁，皆育于靖毅公房也。

是年正月，文正公率舟师发自衡州。八月辞湖北巡抚之命，以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

乙卯 咸丰五年 四岁

是年文正公在江西军次。忠襄公始以优贡出办团练。

丙辰 咸丰六年 五岁

先是曾祖星冈公所居湘乡乡间之宅，曰白玉堂。初析产时，本尚有良田，长房欲之，星冈公不之较，故所有独此一屋及他处瘠田若干。既而分与叔祖，于是竹亭公别构黄金堂。是时余随靖毅夫人自黄金堂迁居梓田，以距靖毅夫人母家较近之故也。

是年文正公仍在江西军次，愍烈公亦率队援江西。

丁巳 咸丰七年 六岁

是年二月初四日竹亭公薨。文正公在瑞州闻讣奔丧，忠襄公亦自吉安归。惠敏公元室贺夫人亦于是年因难产逝世。冬间忠襄公迁居黄金堂对面曾家坳头之庄屋。初，黄金堂之宅相传不吉，贺夫人即卒于是，其母亦卒于是。忠襄夫人方有身，恶之，延巫师禳拔。时文正丁艰家居，心殊忧郁。偶昼寝，闻其扰，怒斥之。未几，忠襄遂迁居焉。

戊午 咸丰八年 七岁

是年五月，文正公奉援浙之命，六月初三日自家启程，再入江西。十月叔父愍烈公殉难于三河，兵败于陈玉成也。

己未 咸丰九年 八岁

是年六月，文正公奉入蜀之命，至武昌而中止，仍定入皖之策。忠襄公于是年构新居，颇壮丽，前有辕门，后

仿公署之制，为门数重，乡人颇有浮议。文正闻而驰书令毁之。余犹忆戏场之屋脊，为江西所烧之蓝花回文格也。

惠敏继室刘夫人来归。

庚申 咸丰十年 九岁

是年文正公在安徽军营。二月，闻叔祖高轩公（骥云）讣。四月，奉署理两江总督之命，移驻祁门，旋授钦差大臣。八月闻淀园之变，奏请北上；既而诏以和议成，止之。

辛酉 咸丰十一年 十岁

是年八月朔日，安庆克复，文正公入驻焉。

壬戌 同治元年 十一岁

是年二月初七日，靖毅夫人因时疫弃养。余因于四月间仍归黄金堂侍欧阳太夫人。十一月，靖毅公亦在枞阳军次积劳致病而薨。先年冬间，长姊适袁；是年二月，二姊适陈；四月三姊适罗。均在湘乡成礼。

是岁以后，与仲兄栗诚公同从塾师邓寅皆先生读书。初读《论语》，虑不能胜，乃改读《幼学》。在塾不知用功，殊少成绩。既而以邓师之子来附学，格于内外之别，遂中止读书。又欧阳太夫人以虽贵而家非甚丰，雇用婢媵无多，所着鞋袜须由余等自作，益无多暇日也。

癸亥 同治二年 十二岁

是年九月二十九日，欧阳太夫人率儿女媳孙自家到安庆督署，惟仲姊未随行。护送同行者为邓寅皆先生及牧云母舅，时惠敏先已东下也。眷属所乘之舟，乃彭刚直特备与文正公自用之座船。四壁张绢素，刚直自画梅花，视常舟为华整，船艄有一亭，可以瞭远，俗呼为长江第一船者也。沿途见岳阳楼、黄鹤楼之胜，眼界一开，颇歆羨之而无由登陟。至皖时以四眼狗陈玉成所居为两江总督行署，所谓英王府也。署中内宅口一进，其前即签押房，其后有一院，在左旁复小有隙地。文正公稍增葺三楹，以分居二女及婿，复隔别其门，出入异路。文正每至一处，常喜种竹，故环室有竹。又喜构望楼，以资登眺，因于三楹上加小望楼。又于上房楼上每夕登楼祷天，不设香烛，惟有一拜垫而已。凡修葺更造之费皆出自养廉银，不动公帑分文也。欧阳太夫人自原籍东下，仅携村姬一人，月给工资八百文。适袁姊有小婢一人，适罗姊则并婢无之，房中粗事亦取办于母氏房中村姬，乃于安庆以十馀缗买一婢，为文正所知，大加申斥，遂以转赠仲嫂母家郭氏。文正驭家严肃守俭若此，嫂氏及诸姊等梳妆不敢假手于婢媪也。

余幼时头上常生虱，留发甚迟，十一岁始留发。因发短年稚，须倚丁婆为余梳头。其时方行抓髻，须以铁丝为架而发绕之。余闻而以意仿制，为之过大，文正见而戏曰：“须唤木匠改大门框也。”文正平日对儿女极严肃，惟亦偶

作谐语。文正又尝对欧阳太夫人云：“满女是阿弥陀佛相”。阿弥陀佛相者，湘乡语云老实相也。

余在督署虽仅髫龄，而随诸姊之后不出署门一步，惟从望楼上得见迎会之高跷，稍知市井间情状耳。

甲子 同治三年 十三岁

是年六月十六日，江宁克复。文正公东下视师，旋仍回皖。九月朔日，全眷赴宁。初十日入督署，亦故英王府也。方师之入城也，搜捕馀党，悉焚其巢穴，巨厦多为煨烬，洪秀全所居之天王府更无论矣。惟陈玉成以先死，其府独空，遂未被灾，故暂以之为督署。及李文忠署江督，则别居新葺之江宁府署也。

忆入金陵督署时，尚未终靖毅公丧，所着为蓝呢夹袄及长嫂贺夫人所遗黄绸裤，缀青花边。文正见而斥以为侈，乃亟取三姊之绿裤易之。此裤亦贺夫人遗物，盖嫂以遗姑，姑又互相袭用也。文正婚嫁儿女，限二百金。乡间买物亦不易，即贺夫人遗物亦不足用也。忆仲姊出阁时，有金耳挖一枚，重七钱，直二十馀缗，一旦为人所窃，欧阳太夫人忧惜之至数夕未眠，盖虑其至夫家无耀首之饰也。

是年十二月初六日，仲姊夫妇自长沙来宁。

欧阳太夫人以婢姬不足用，乃自难民局唤得一侯媪，月给以钱八百。侯姬于陶文毅任江督时，曾入署乳其公子；既而在湘逃难，其夫与子均于乱离中散失，因为贼虏至金陵，被围日久，贼中老弱渐次散出，忠襄因设难民局以收

容之。其来历如是。嗣后吾家回湘，侯媪不愿随往，乃荐之于李文忠之太夫人。后文忠署两江总督时，其人仍健在，且略有蓄积，自置墓地。计其一生，三入两江督署，亦奇遇也。

文正在军未尝自营居室，惟咸丰中于家起书屋，号曰思云馆。湘俗构新屋必诵上梁文，工匠无知，乃以湘乡土音为之颂曰：“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湘谚谓小为细也。其时乡愚无知，可见一斑。忠襄公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文正则向不肯置田宅。澄侯公于咸丰五年代买衡阳之田；又同治六年修富厚堂屋，费七千缗，皆为文正所责（见咸丰六年十一月家书及同治六年二月日记）。文正、忠襄所自处不同，而无矜伐功名之意则一也。

文正官京师时俸入无多，每年节啬以奉重堂甘旨，为数甚微。治军之日亦仅年寄十金二十金至家。及功成位显而竹亭公已薨，故尤不肯付家中以巨资。至直督任时，始积俸银二万金。比及薨逝，惠敏秉承遗志，谢却贖赠，仅收门生故吏所醜集之刻全集费。略有馀裕，合以俸馀，粗得略置田宅。

乙丑 同治四年 十四岁

是年四月二十一日，仲嫂郭夫人来归，即于节署成礼。

是年捻匪猖獗，僧忠亲王督师遇伏，殉难于曹州。朝命文正公带兵北上，以五月二十五日启行。先是适罗氏姊

于三月十八日在署中生子，及是亦乘吉日携幼回湘。姊之姑为罗忠节之妾，性颇悍厉，姊惮于行，临别悲恋不已。又文正公出署登舟之际，全城水陆诸军举炮送行，其声震耳，久而不绝。其子因惊致疾，已登舟，疾甚，遂折回署中也，医治无效，竟殇。

丙寅 同治五年 十五岁

是年文正公在徐州军次。四月，眷属自江宁启程回籍。时忠襄公已再起任湖北巡抚，因留欧阳太夫人小驻武昌抚署度夏。

是年八月初十日，仲嫂生广钧侄于武昌抚署东偏之多桂堂，弥月即起程回湘。

十月二十四日，四姊于归郭氏。即于舟上发轿，欧阳太夫人自送亲。三日回舟赴湘乡。姊婿依永为筠仙侍郎冢子，夙慧能文而早夭，年仅二十有四。姊于归后，与筠仙先生之侧室不相容洽。日食至粗之米，唯以菜蔬为肴，月费一缗亦吝而不与。其境遇艰苦可知矣。初靖毅公薨后，余资七千馀两，忠襄公为足之以成万两，并命与四姊及余各千金。文正手谕嫁女奩资不得逾二百金。欧阳太夫人遣嫁四姊时，犹恪秉成法，忠襄公闻而异之曰：“乌有是事？”发箱奩而验之，果信。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

文正婚嫁子女不许用多金。咸丰九年在江西军营时六月二十四日日记云：“是日巳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

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又摹本缎线绉袍褂料各一付，为纪泽制衣之用，并绸里；又大呢套料羽毛裙料各一丈，为五十制衣之用，并绸里。”

文正在署中无敢以苞苴进者，故太夫人无珍玩之饰。余所忆者，为黄提督翼升之夫人坚欲奉太夫人为义母，献翡翠钏一双，明珠一粒；某年太夫人生辰，又献纺绸帐一铺。此帐吾母留作余嫁奁之用，余至今用之未坏也。

又邵位西丈之夫人因避寇率子女至上海。文正公闻之，派轮船威灵密迎邵夫人并二子及已嫁一女至安庆，每月赠银二十两，俾得赁居。后因邵夫人及长子相继逝世，其次子及婿送灵回浙，其女独处，文正命拜欧阳太夫人为义母，暂居署中。其女以其逃难时衣中所藏珍珠一粒为贄。此珠旋以赠忠襄夫人。忠襄夫人尝有累金珠花一副，为部将某回乡后所献，号为珍贵。此外所藏器玩，无非玉瓶如意之属，亦未见珍奇异常之物。民国十九年夏间长沙火药局之灾，延及所居，毁灭几尽矣。

丁卯 同治六年 十六岁

是年外王父欧阳福田先生暨外王母邱太夫人年皆将八十，又距嘉庆丁卯入学成婚适六十年，十月十一日值文正公五十七岁生日，又欧阳公有一曾孙周岁，乡间演戏称庆。文正公在周家口军次，旋奉命回两江任。

是年正月二十六日，惠敏公在家生一女。栗诚公随侍

在江宁署中大病，时年二十一，而出天花，冬间愈后回湘。

秋间，伯兄嫂并携靖毅公之嗣子媳及孙就学金陵督署。靖毅嗣子名纪渠，字静臣，自幼失学，文正公令每五日须作一家书呈阅。戊辰秋后仍回湘，后官于粤多年。

戊辰 同治七年 十七岁

是年三月由湘东下至江宁。二十八日，入居新督署。五月二十四日，文正公为余辈定功课单如下：

早饭后	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	食事
巳午刻	纺花或绩麻	衣事
中饭后	做针黹刺绣之类	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	做男鞋女鞋或缝衣	粗工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

上验功课单谕儿妇侄妇满女知之，甥妇到日亦照此遵行。

同治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家勤则兴 人勤则健
能勤能俭 永不贫贱

十一月初四日，文正公以奉命调补直隶总督北上。时

欧阳太夫人患喘咳甚剧，故暂居宁署，惠敏公留侍焉，冬间移居下江考棚。惠敏公长女广璇许嫁于合肥李幼仙。其夫家欲其读书，惠敏因逐日亲为讲授《纲鉴正史约》，余辄从旁听焉。其后惠敏无暇多讲，乃自行点读。署中有文正公构造之船厅，中贮制造局所作地球仪器极大，径约六尺，余辈于是粗知地理。栗诚公夙好算学，爰以天元勾股开方即近世所谓代数几何者授余，颇能解悟。惠敏初授余珠算，自是始通笔算。然是时所用算法仍沿古式，非今日之法也。仲嫂郭夫人亦常相从讨论，文史读书之乐，此时为最。文正于新建之署后辟菜圃种蔬，时命余等撷以治肴。八月某日，摘玉爪入饌，欧阳太夫人食之过多，遂致气痛甚剧，服药久之不愈。目中若有虫然，自是右目失明，步履亦艰。其后至保定有郝姓医针治左眼，医术不精，遂两目皆不见物矣。

文正虽命余等学治肴饌，然每食皆在书斋。惟除夜子侄辈同席。上房则母氏率余姑嫂等同食。所至禁用燕菜烧烤之席，僚属皆遵守，相习成风。平日宴客常用之品，惟红烧鱼翅鱿鱼片及豆腐汤等。

己巳 同治八年 十八岁

是年三月二十日随欧阳太夫人到直隶督署。乘舟至清江换车北上，炎热尘坌，至保定多病者。欧阳太夫人偶乘肩輿，或乘后档车，余人则骡车颠簸，不堪其苦。惠敏公到保定后患病，为医所误，致成胃疾。侄男女亦多患病。

欧阳太夫人每言道光二十年随竹亭公入都，正值隆冬，严寒昼短，携幼婢一人坐骡车。往往深暮到店，未黎明即起，呵气着被边头，遂成冰冻，小儿啼号不绝，有时母子均哭，其苦况犹在心目，此行则已舒适多矣。

是年五月，外祖欧阳福田先生下世，年八十四矣。九月间，欧阳太夫人亦患病甚重，头肿咳嗽，十一月间始渐愈。余之姻事即定议于此时，忠襄公作伐之函今犹在也。纳采回聘等事皆忠襄公代办。

庚午 同治九年 十九岁

是年五月二十三日，天津民众击毙法领事丰大业，文正公奉旨前往查办。其时既患右目失明，复苦头晕不能起床，本已请假二月，闻命即行，不敢自逸。念老逢危难，以死自誓，先两日手书遗教而后启行焉。

七月间马端愍遇刺，朝命文正公调补两江，力辞不许，因于九月二十三日入都。正及六十生辰，蒙上赐寿。而欧阳太夫人以次于十月间由运河南下，居盐道署。署中有花园，惟须经过幕僚所居，余等以不便竟未一游。

辛未 同治十年 二十岁

是年正月，仲姊夫妇来署。本以去冬自湘启行，因途中为风雪所阻，未能于年前抵署。春间欧阳太夫人患春温甚剧，腿肿而小便带血，制造局洋员马格里进西药而愈。是年正月十八日伯兄嫂举一子，名广铭。二十六日仲兄嫂

亦举第三子，名广铨。七月，广铭殇。仲兄嫂怜长兄嫂悲哀过度，愿听择一子暂为抚养，俟异日得子再行退还。伯嫂闻之甚喜，即倩余上禀父母。文正公有时寝于上房，则由余侍奉宽衣等事，闻禀欣然云：“即行过继，照李少荃家之办法，何必言日后退还语？”至十一月二十二日，移入新督署，广铨亦即抱归长房。

壬申 同治十一年 二十一岁

是年正月二十三日，文正公对客，偶患脚筋上缩，移时而复。入内室时，语仲姊曰：“吾适以为大限将至，不自意又能复常也。”至二十六日，出门拜客，忽欲语而不能，似将动风抽掣者，稍服药旋即愈矣。众以请假暂休为劝，公曰：“请假后宁尚有销假时耶？”又询欧阳太夫人以竹亭公逝时病状。盖竹亭公亦以二月初四日逝世也。语竟，公曰：“吾他日当俄然而逝，不至如此也。”至二月初四日，饭后在内室小坐，余姊妹剖橙以进，公少尝之，旋至署西花园中散步。花园甚大，而满园已走遍，尚欲登楼，以工程未毕而止。散步久之，忽足屡前蹶，惠敏在旁请曰：“纳履未安耶？”公曰：“吾觉足麻也。”惠敏亟与从行之戈什哈扶掖，渐不能行，即已抽搐，因呼椅至，掖坐椅中，舁以入花厅，家人环集，不复能语，端坐三刻遂薨。二姊于病亟时祷天割臂，亦无救矣。时二月初四日戌时也。余本定是年于归聂氏。其时中丞公侍先翁亦峰公于广东，以二月初十日启程来就甥馆，至沪始闻恶耗，乃电粤请进止。时

电费每字银四元，视今日几四十倍之多。复电命仍赴江宁吊奠，并谒欧阳太夫人。时藩司梅君启照于两家皆有交谊，故寓于其署中。未几由藩署派小轮送至九江，换小舟取早道回粤。抵粤甫三日，亦峰公亦弃养。初先姑张太夫人尚未知文正噩耗，方以为新妇偕至，迓于庭中。及是亦峰公始告之曰：“曾中堂去世，未办喜事。”自此不复能言，竟以不起，时五月二十九日也。

是年四月下旬，奉丧归长沙。蒙特旨入城，以长沙无寓宅，暂居曾子庙。惠敏公旋以银万两购洪家井之宅，宅为劳氏故居，后归于刘君毅斋者也。五月，奉柩浅葬于南门外金盆岭，葬毕入居新宅。

癸酉 同治十二年 二十二岁

是年九月伯兄嫂举一子，名广鑫，即日后袭爵者。仲兄仍伸前议，欲将广铨退还，云不应以小宗乱大宗。伯兄不允，云文正公前已分示，岂尚有他辞？

初文正在日，家中人给月费二缗，尔时物价虽贱，亦苦不足，稍涉奢华之物不能买，亦不敢买也。欧阳太夫人偶唤卖京货之姬入署，且为文正公所诃，他无论矣。及是惠敏主持家政，稍以文正积存俸馀购置田宅，月奉太夫人湘纹十二金，两嫂各十金；两房小孩一概在内，不另给；余与两兄每月六金；各房男女用人薪资在外，均由账房并月费分发。

甲戌 同治十三年 二十三岁

是年八月十三日欧阳太夫人薨，时年五十有九。十一月初五日。改葬文正公于善化县湘西平塘伏龙山之阳，奉太夫人柩合葬。忠襄公所定之兆域也。文正忠襄晚年相约，文正先歿则忠襄为定茔兆，忠襄先歿则文正为制墓铭也。

乙亥 光绪元年 二十四岁

是年九月二十四日来归。时欧阳太夫人之丧已逾小祥，以降服之故，期年即吉也。然国恤犹未及期年，故仅备仪仗而未用鼓乐。惠敏兄弟既在服中，乃由承继靖毅之从兄纪渠出而送亲。

先姑张太夫人家本湖南安乡籍。其祖官奉天锦州，歿后诸子奉丧归，侨居京师。太夫人自少明敏，持门户，应宾客，理家务，皆一身任之；作男子装，豪迈倜傥，无闺阁态。亦峰公时以举人困春闱，留官京师，适前姑甘太夫人逝世，求主中馈者，媒妁以太夫人生庚进。公初殊无意，属二伯翁春帆公退还；而春帆公忘，未送往也。公久而始觉，念其已久未决，难于终却，遂毅然许之。既成婚，相敬殊甚。公一以家事委之太夫人，且谢绝友朋征逐，未几遂第春官，入翰林，家自兹兴矣。春帆公房无后，故日后以儿子其昌嗣焉。

初聂氏自南宋居于江西清江。清初有应禅公者，迁于湖南衡山，是为第十三世。至第十五世乐山公讳继模，以

名德重于乡里，精医理，常入县署狱中，为囚治病，自设药店，并以药施之，至老不衰。县令以公为封翁，谢之，而公仍径行不辍。子环溪公焘以乾隆丁巳进士选授陕西镇安知县。乐山公驰书训子，言甚深至，载于《经世文编》。寿至九十三，环溪公亦年七十八始卒。环溪公孙京圃公（镜敏）、心如公（镜敏）、蓉峰公（铤敏）联翩科第，扬历曹司，均在嘉庆初年，湘南于时称盛。亦峰公即环溪公曾孙也。以咸丰癸丑翰林，散馆拣发广东知县，历宰剧邑，累官至高州府知府，补用道员。广东剧邑，号为难治，公勤恤民隐，循声昭灼，所刊《冈州公牍》等书，为公一生精力所萃。余之来归，已不及见君舅。张太夫人素性严明，虽不知书而无敢欺者。然太夫人对余亦鲜有疾言厉色也。

余之奁资，有靖毅公所遗之千两；及文正公薨，诸女亦各得千两；欧阳太夫人薨，又各分八百两；益以子金，粗足三千。媵遗之丰，过于诸姊，已愧于文正之训戒矣。忆此金存于乾益银号。乾益者，朱宇田君所开。朱君以善居积致巨富，同光宣三朝握长沙商业之牛耳者也。存款折据置一小箱中，而以新帐簿实之。此帐簿多册，余用之屢年而不能罄，皆惠敏公亲为检点者也。

彼时嫁装之衣箱多以八枚为准。余以嫁期屡衍之故，凡已制成而又更易者三次。其实湘省皮箱质料不佳，今皆虫蛀。惟所用床一具，系新建两江督署之时，工程局中饬苏匠制成，金漆雕镂，颇华靡，以示湘中匠人，皆谢不能为，至今尚在湘宅。

余所受聂氏聘礼，内有绿玉钏一双。先是亦峰公在粤买玉，值八百金，令工治为钏而小。张太夫人及诸姑皆不能御，乃权以为聘礼。亦峰公曾言，何人有福，当能御此钏也。及余御之，乃适与腕合。但并非佳料，今已退色。

亦峰公之丧应以上年八月二十七日外除。婚期已定，又遭欧阳太夫人之变，冬间又值同治国丧。时张太夫人意欲从权于卒哭之后，以小轿迎娶，余闻而力持不可，遂定次年成礼。时仲姊在省城，凡检点嫁衣等事皆于归宁时一手任之。然姊婿松生性颇偏执，不听姊数数归宁也。初陈氏境况本寒，兼有旧债，又以其兄杏生之夫人疾病经年，杏生在闽久不归，且无音问，其嫂遂致不起，医药葬费，概由松生举债任之，负累不堪。戊辰春，欧阳太夫人东下得悉其事。适彭刚直以门生之谊晋谒，欧阳太夫人先已闻知有盐票将交商人领运之事，因商之刚直。刚直即以盐票六张特赠陈氏。其时票价每张约值二千金，陈家每年得租金悉以偿其夙债。松生之胞叔宦于闽，有承解湘省协饷二万金，交松生暂存庄生息。适其兄杏生自闽归，乘松生偕仲姊赴金陵之隙，私取该款挥霍罄尽。松生于壬申夏回湘，自念无以对胞叔，且协饷非解不可，乃将盐票出售，得二万金以偿，然仅能弥补，并无盈馀，是以松生贫如故，仅恃盐茶局差月二十缗以度日。仲姊之嫁后生涯，有非人所堪者，而委曲顺从，卒无怨色。姊婿性峻急，患咯血时，扶持调护，真能视于无形听于无声。既未生育，抑郁终身。余每以姊境遇之独苦，又相依独久，至今心伤不已也。仲

姊遇其姒笃爱逾常，其姒患病将终，面属以其女承继仲姊。嗣后杏生续娶生女，亦归仲姊。故仲姊虽未生育而有两女。其长者后适丁氏；其幼者曾随往欧洲，仲姊歿后，仲嫂郭夫人为媒，适朱君桂辛（启铃）为元室。

丙子 光绪二年 二十五岁

八月初七日，长子其宾生，乳名全儿。

初，长沙有玉振银号者，有曾氏族入股份。其经理以赌博亏空，曾氏存款尽蚀焉。反复涉讼，自本年以至庚辰冬不辍。张太夫人有存款七千馀两，未能取出。时有白窠两姬者，北方人也。窠姬且为中丞公乳媪，随太夫人多年，所积资亦在是，均由中丞公手代存玉振。及是太夫人颇加诘责，欲控之于官。中丞公事亲素谨，且不欲以银钱涉讼，伤戚串之情，初犹饰词搪塞，冀缓追索，终乃商之于余。至辛巳年，出余奩资二千两，兼贷适罗氏姊存于乾益之款一千两，凑成三千，奉诸老人，以免转入讼事之漩涡。但又不肯明言此款为余房所出，乃婉恳傅青馀、郭筠仙二公及姊婿陈展堂出面，假托三中人和息讼事，各出一千两，以求了结。盖张太夫人素性严卞，亦峰公之逝也，所遗宦囊六万金，别无产业。还长沙以后，陆续购买田宅，嫁三女，娶二媳，躬自经营，莫敢少欺。佃户有因灾求减租者，辄斥而拒之。中丞公力谋将顺，辄阳为不许而阴以私财恤焉。其时中丞公家居无事，幸有云贵总督刘武壮公所委滇捐帮办一差，月薪五十金，而公中酬应之需皆取给焉。因老人

仅给月费二缗，不问应酬事也。平时日用已苦不足，全恃资息金以为挹注。后既赔偿公款，则日用亦无着矣。初，张太夫人于癸酉夏自广东买舟扶柩，经由广西永州等处回湘，凡四阅月始抵省。亦峰公游宦多年，未尝在湘置田宅。捐馆以后，张太夫人奉丧而归，以素闻衡山原籍不易居，乃径至长沙。太夫人生长北京，素操京语，且幼时即稍患重听，及回湘，与亲友谈，常苦湘音隔阂。适惠敏公以姻家子进谒，惠敏京语纯熟，太夫人喜，因浼以代觅住宅。惠敏乃以所购黄泥墩之宅赁与吾家，月租五十缗，约一年后照原价四千馀金转售。惠敏为书“岳云在望，礼器成图”一联，制榜悬诸大门。余婚时新房为后进五开间，乃太夫人所添造者。

丁丑 光绪三年 二十六岁

是年九月二十七日生长女，乳名银姑，二岁患热病而殇。忆其时甫能行，每教其兄认字，辄知捧字盘而至也。其生时左掌拳而不伸，请湘军营中伤科杨达亭治之，一月渐愈，而卒不能成立。

惠敏长女广璇许嫁于合肥李氏。是年冬李氏派船来迎往安庆，次年成婚，同往者二三两姊也。三姊不久即回，二姊夫妇后即同随惠敏公出洋。

四月间，中丞公之长姊于归新宁陈君展堂（鸣志）为继室。陈时为滇捐局总办。

戊寅 光绪四年 二十七岁

是年新疆平。

七月间，惠敏公任出使英法大臣。适陈氏姊及婿随行。惠敏长女广璇亦于后二年夫妇偕行赴英，未几其婿先回。

十二月间，中丞公纳妾杨氏。张太夫人初不之知也。除夕杨在卧室施放花爆，中丞公斥之，杨忿而饮泣。余方循俗自前院出天行归，将就寝，亦无如之何，只好充耳不闻。尝闻张太夫人诫吾等，言凡除夕切不可生气落泪，否则必有三年不顺。至次年家中果多不利。杨性乖张不驯，中丞公后颇悔之，至辛巳年命人送归衡山，旋遣嫁焉。

己卯 光绪五年 二十八岁

三月中，张太夫人赴衡山。

五月间，长女殇。当其病重时，中丞公携之赴神庙求其病愈，并自己忏悔，立誓将来多做善举。

六月二十七日，儿子其昌生，乳名长儿。

初，长男之原有乳妇乳不充足，另雇一乳妇，满身生疔，食其乳而传染及之，腿际患流注，今之所谓骨癆也。先未觉察，继而溃决，遂迄不收口，以至缠绵十馀年，终于不救。

每年除夕，余向不守岁。是年亦安寝，偶得一梦，闻某处产一麒麟，余亦往观，似见一小兽在小箱中，但余记忆力极弱，不复能记其形状。梦后自思应主祥瑞，查解梦

书，云主名闻天下。次年九月遂生其杰，故乳名祥儿。

庚辰 光绪六年 二十九岁

是年正月，惠敏公任出使俄国大臣。六月忠襄公督办山海关防务，旋以疾辞。

九月初五日，儿子其杰生。所雇乳媪忆仅月钱一千六百，次年携之东下；以后所雇乳媪则皆三四元，民国以后，增至五六元，近年亦昂矣。

八月，中丞公之三妹归于攸县尹君荪舫（自芬）为继室。妹婿后以知县官于江西。

辛巳 光绪七年 三十岁

是年忠襄公被诏起为两广总督。

六月，中丞公偕姊婿陈展堂赴宁。陈初在湘垣办理滇捐，至是奉委办理江宁筹防局也。中丞公寓居宁垣之湖南会馆。

十一月，余率儿女等到宁。次年春间，中丞公始任帮办营务处差，初无薪给，月支八金而已。到宁后，寓马道街合肥试馆之屋。方余之挈家东下也，本非初愿，盖中丞公尚无差委，力不足以贍家也。而中丞公一再函促，余乃以请命于张太夫人。太夫人始亦难之，继而中丞公之长姊陈夫人适以姊婿在宁就差，迎眷东下，怂恿于旁。乃蒙赐银六百两为旅费，以是启行。其时李勤恪公瀚章为鄂督，中丞公囑余于过武昌时以世谊谒李太夫人于节署。李太夫人

在宁时故与欧阳太夫人相过从。相距十年，中更多故，一见即殷殷款接。次日札委督销局差，月薪五十两。由制军之如夫人亲送至舟次。余以舟中狭陋，力辞其报谒，特移舟于汉阳以避之，不意其仍渡江而至也。制军又派炮船一艘护送至宁。初陈氏姊婿充江宁筹防局差，曾约两江差轮拖带两家接眷之船。忽值左文襄由湘东下，差船急欲往迎，遂只肯拖带陈船，置吾船不顾而去。

尔时轮船尚未通行，余雇回空之盐船一艘，随陈氏之舟以行，费钱四五十缗。张太夫人既赐旅费，复以七十馀缗买煤屑四百担（时煤价每担仅一百九十文），装船备用。舟抵华阳镇时，船中携有煤斤，（向例官眷船中带煤亦常有之事，若挟势力者，本可不查），乃大为关卡所讥呵。时惠敏长女广璇嫁于合肥李氏者，方居安庆，闻而遣人关说，始放行。其他自备日用之物亦称是，中有蓝呢轿一乘。凡所携男仆轿夫三名，女仆则中丞公之乳媪窈姬，梁、周、张三姬及乳媪使女共五六人，此外尚有翁氏姊婿同行，翁携一仆。船资虽廉，而过九江时须纳船钞三十金，又火食须自备，亦颇不资也。适翁氏姊出阁在余于归以前，姊婿名炳南，后以知县官于广西。

是年三月，栗诚公卒于京邸；五月，适郭氏姊卒于省城；十月适陈氏姊卒于法国，一年而同气损其三。栗诚公春官不第，郁郁以逝，春秋甫三十四。陈郭二姊皆无生人之欢，尤令人怆念不置。是年适玉振讼事了结，余奁资赔偿公中尚不敷一千，借用三姊之存款补之。三姊再三劝慰，

云汝借吾款吾不要息，俟汝有钱再还本，且不可因银钱而着急忧郁，盖虑余身体本已不强，惟恐继诸姊之后也。三姊之姑待媳不近人情，乡间有时难觅仆妇，则三姊自涤裘器。其姑虽有婢女，不为之执役，反纵容婢女，任意辱骂吾姊。吾姊前生一子不育，后只生一女，因置妾，夫妇亦不甚和。罗姊婚后出外觅事，欲接家眷，吾姊则令其妾往。戊子年姊婿歿于秦州，幸得一遗腹子以传宗，此实赖姊氏之贤。盖姊婿本已不喜此妾，而姊强令送去者也。

壬午 光绪八年 三十一岁

是年春，中丞公随左文襄出省阅兵，余检治行装，屡次上楼，损动胎气，屡服安胎药而暂止，至六月十八日，竟小产。是月朔自合肥试馆迁寓唐河厅。唐河厅者，唐姓之河厅，沿秦淮之屋也。来宁就差亦既两年，仅恃湖北督销局五十金，用度不继，遂略向左文襄之儿媳言之，非中丞公所愿也。是年始奉委上海制造局会办。进见之日，同坐者数辈，皆得委当时所谓阔差而退。文襄送客，而独留中丞公小坐，谓之曰：“君今日得无不快意耶？若辈皆为贫而仕，惟君可任大事，勉自为之也。”故中丞公一生感激文襄知遇最深。是年年终奉文襄命赶制过山炮百尊，限日解宁，竟未遑在宁度岁也。

文襄督两江之日，待中丞公不啻子侄，亦时垂询及余，欲余往谒。余于先年冬曾一度至其行轅，在大堂下舆，越庭院数重，始至内室，文襄适又公出。余自壬申奉文正丧

出署，别此地正十年，抚今追昔，百感交集，故其后文襄虽屡次询及，余终不愿往。继而文襄知余意，乃令特开中门，肩舆直至三堂，下舆相见礼毕，文襄谓余曰：“文正是壬申生耶？”余曰：“辛未也。”文襄曰：“然则长吾一岁，宜以叔父视吾矣。”因令余周视署中，重寻十年前卧起之室，余敬诺之。嗣后忠襄公至宁，文襄语及之曰：“满小姐已认吾家为其外家矣。”湘俗谓小者曰满，故以称余也。

先年中丞公应乡试不售。初惠敏之出使也，中丞公本有意随行，以陈氏姊婿在奏调之列，未便联翩而往，不果。及本年春间来电调往，则以堂上年高，不听远离，余又方有身，不克同行，复不果。郭筠老曾为往复代酌此事，其手函尚在。

癸未 光绪九年 三十二岁

七月二十四日，儿子其炜生，乳名成儿。十一月，移眷来沪。

是年七月，忠襄公任两江总督，冬月到任，吾家已移沪矣。

甲申 光绪十年 三十三岁

初，李君兴锐为制造局总办，曾禀文襄，欲不令中丞公驻沪，预送干薪。文襄拒之，并催中丞公速到差，不令在宁少留。李后为人禀讦，罗列多款，文襄密饬中丞公查复。中丞公复委员密查，复按所控，多有实据。中丞公将据以

稟复文襄，稿已成，旋又毁之，别具稿，多为李弥缝洗刷。继而李以丁忧去，居沪病足，中丞公仍时往视之，未尝以前事介怀也。

继任者为潘君镜如，左文襄督师赴闽，忠襄公来而潘去，以钟君云谷继之。钟办事不协輿情，遂以中丞公升任总办。中丞公初任襄办，月薪仅五十两，潘君去后，加至一百五十两，至此升任总办，始加至二百两。但吾家置备一切日用之物，皆购自外间，从无取诸公中之事。上海为南北通商必由之道，制造局亦繁剧之区，亲友觅事者颇不乏人，只能少送川资，悉出自私囊。公款虽盈馀，而私人实亏万馀金，任沪道后始能弥补。先是局库亏款甚多，在局八年，不独亏空悉已偿补，且赢馀十馀万。时邵君友濂任上海道，力向忠襄公称中丞公之功，故忠襄有疏密保也。

是年七月，法人侵入马江，击沉中国兵舰数艘，惟扬武舰曾还击数炮。虽扬武终被击沉，法提督孤拔亦被我军炮击阵亡。法人讳莫如深，中国反毫无所知。其时北洋连日来数电，云法人欲来占制造局，全局震动，纷纷迁徙。潘镜如家迁苏，蔡二源家迁租界；其余迁租界、迁宁波者不胜纪载，并有中途遭抢劫者。适有卖珠翠之姬曾存翠簪一枝于我处，闻信急来取去，云明日即来攻局矣。余虽闻知，亦惟付之天命，并不知着急。一日中丞公忽云：“余已定得一船，宜略为择要检点细软行李，预备紧急时即率小孩婢媪等上船避往松江。”余云：“君将如何？”中丞公云：“余有守厂之责，不能走也。”余曰：“余向不以自己性命为重，

死亦同死，不必搬动。”中丞公云：“君虽不畏死，其如诸儿何？”余闻其言，亦自有理，不觉涕泣，略事收拾，并未登舟。后亦未闻警报。八月，张太夫人因闻上海风声紧急，且知余方有身，遣一仆来沪接吾等回湘。其时法人已将议和，故亦未行。

乙酉 光绪十一年 三十四岁

正月初六日女其德生。八月间，张太夫人至宁视中丞公之长姊，陈氏姊婿展堂方署台湾道也，旋奉迎至沪小住。忆是年三月，仲嫂郭夫人亦自宁督署来沪，汤君海秋方署沪道，为备瑞生洋行之屋。余亦携儿辈往小住旬日，得观剧，且遍游租界。其时制造局至西门斜桥尚无马路，其自制造局通小东门之马路，乃中丞公倡议令管带炮队营杨君金龙所修。余深居官舍，绝少出门，偶然酬应，必先乘肩舆至斜桥，始换马车也。咏霓茶园者，伶人想九霄所开，其戏园中仅有电灯一盏，每夜须费二元，馀均煤气灯也。余又忆曾往虹口看马戏，人纳票费二元，得坐包厢，妖冶杂遫，殊非所习见。及今五十年，社会风气物质文明之变迁，尤难以枚举矣。

昔文正公恶赌具最甚。尝至栗诚兄室，见案上有骨牌，遽取以出，语欧阳太夫人，太夫人以牙牌占课对，文正不之信也。后澄侯公至宁，文正遂举以赠之。其后惠敏公在保定，得狮子围筹一副，于岁朝玩之。比在沪，因命工仿制，至今余家新年必率儿辈为此戏，盖以其输赢无多而热闹足

娱耳。其他赌博，余盖从未一为之。自余还湘以后，麻将牌盛行，近年几为闺阁中不可少之物，老年人消磨时日，亦复不得不赖此。然余则天性不好，惟围棋则侍文正之日稍复谙之，诸兄皆所笃嗜，余亦喜焉。晚年无事，辄于灯下着一二局。

上海乡间有大开佛会之举，以销农场各物者。余闻其有三木锭脚踏之纺棉车，因饬人买一架，倩本地佣人教余学纺。盖余在湘，虽亦备有手摇小车，既未带出。现纺三锭者，学之不能谙习，久之能纺二锭。曾每夜饭后纺一二两，共纺三四斤棉，搭于乡人织布者，成土布二三匹，此车今尚在湘寓。

丙戌 光绪十二年 三十五岁

是年六月，诏惠敏公赴京，以兵部侍郎帮办海军事务。十月过上海，得在行轶盘桓，知余家清俭犹昔，解装千金以赠。惠敏出国于是八年，年甫四十六，而颐下髯髯矣。

是年中丞公托陈姊丈在台湾报捐道员，盖从前尚是分部郎中也。

丁亥 光绪十三年 三十六岁

自上年冬间，惠敏夫人来沪。其次子广铎方八岁，极聪明。在英国患肠痈，经医开刀，未能收口，至沪时已大肉消瘦，疮口出粪，腿不能伸，发热不退。刘君康侯劝其请孟河名医马培之医治。欲请马医，则非以小轮往迎不可，

时惟制造局有小轮。惠敏本言不宜再服中药，适又急须赴金陵晤忠襄公，爰由伯嫂面托中丞公，派轮接马医来（惠敏初不知也），服其药热略退。惠敏自宁回沪，询悉，即长揖托中丞公代为照料一切，因其即须入京复命，家眷留沪就医也。马医治之日有起色，渐能站立，兼骑三轮脚踏车，至正月照相已丰满可爱。本年二月因饮食不慎，致腹泄日五十余次，卒不救。余帮同照料，夜间感寒；三月，遂患疟疾甚剧。电致宁署延湘乡医者朱君，以高丽参磨汁兑药服之，逾月始愈。方疾剧时，日夜发热不退，余自疑将不起矣，因与中丞公言及，拟书遗嘱将身后儿女之事略为处置。大儿其宾已有痼疾，时十一岁，在旁闻之，纵声大哭，中丞公颇咎余孟浪也。

病愈后约六七月，忠襄公次媳六嫂来游上海，便邀余赴金陵。至八月中，率儿女至江宁节署归省小聚。江宁新督署内宅为七开间，其东后有五间，其西后有三间，此三间原备为余成婚时作甥馆者，此来即居于此。忠襄饬人庀具，供张甚盛。余则追忆前尘，十五年中，来凡三度，不觉百感交集。初拟送忠襄北上即回沪，乃忠襄行至清江，奉诏止觐。忠襄本不乐行，既返宁署，兴致弥佳，见余将行，坚留多住，因勾留一月也。惠敏夫人自外洋携归绒织衣裤线织衣边诸物，颇为当时所不易见，余叩以制法，略得一二，然为时匆促不尽也。每于暇时，触类旁通，稍出新样。曾为中丞公手制绒衣一袭，此物细针密缕，多赖记性，余记性不佳，故衣成而长短不匀。既而与傅兰雅君之

夫人时相过从，傅君即为制造局编译新书者，其夫人娴雅笃厚，与余相得，因悉传其法。彼时欧西妇女亦深重家庭手工，后余又传授湘沪多人学习。傅夫人见余所购纺棉机，因为余言彼邦手摇纺机之制与吾国相仿也。

余感于外国语文与科学之重要，因命其昌其杰两儿逐日从傅夫人学英文。然其时以须习中文，不能专心，直至戊戌以后始认真研习耳。

戊子 光绪十四年 三十七岁

九月初八日，儿子其焜生。

是年三月，为张太夫人六十寿。中丞公赴湘，并携同寅所送联幛等物，为母称觞。

己丑 光绪十五年 三十八岁

是年忠襄公奏保中丞公以道员留苏补用，并交军机处存记。得保后赴京引见，惠敏公在京邸，手画朝日江山于纨扇，并题诗赠行，其诗如次：

朝曦出海月斜初，五色烟云饰太虚。凭我丹青摹造化，祝君绀紫启权舆。阳关四句唱三叠，天保六章图九如。诗画送君情趣永，携归兼当大雷书。

重伯侄以是年成进士，入翰林。

栗谡公之女广珊适俞氏，以是年秋间在湘成礼。

庚寅 光绪十六年 三十九岁

正月，中丞公简授苏松太道。前任龚君照璠放浙臬以去也。中丞公存记名次本在第十，因忠襄适有荐疏，仰蒙简在，遂获超授。

二月二十九日，儿子其贤生。

正月杪，适惠敏薨于京邸，中丞公虑余临产伤心，不令余阅报纸，余既索之急，乃属报馆权宜改印报纸以示余。方余初孕其贤时，自以生育过多，本欲以麝剂堕之，而卒不验。又以其焮之乳母屡致口舌，以烦怒而患牙痛，又不敢服凉剂，故生而不足月。其赋体单薄，盖基于是也。

三月晋署，并迎养张太夫人。三月十九日为太夫人诞辰，署中曾唱戏开筵以娱老人。

莅沪道任后，中丞公曾陆续为余存款，另立折据，云还昔年因玉振事奉归张太夫人者。至交卸沪道时，已有规元八千馀两。但初存时余即云，但求夫妇同心，余向不以私财为重，本无需此。后至甲午年，清算移交，始知亏空八十馀万，无款可交。中丞公忧急，以致痰中带血，或出鼻血。虽取余之存折并将余之金器均变卖，仍不敷尚远。又以股票等物抵押银两，以办移交。所负各债，直至庚戌年始陆续还毕。

忆十一年中丞公曾倩宁波人李晓庵推年命，据称十四年入觐，十六年真除东南第一美缺，其时当值立春之后。是年初九立春，初十即放缺，亦可异矣。

是年张太夫人来署，见余夫妇所衣，识为昔年婚娶时之旧物。盖十五年来除为小孩添制冬夏布衣外，自己有无衣服不暇顾及矣。犹忆先年忠襄公大阅来沪，查视制造局，局中供张筵席，遵谕以筵设于我宅，并云：“余忌口，只吃肉汤煮白菜，别无所须。”诸儿于是初谒叔外祖，老人顾而乐之云：“吾在湘乡应试时，考生均衣竹布长衫呢马褂，汝等正与此辈考相公相同。俭朴可喜，可与吾同餐也。”更衣之顷，中丞公传索官保之小帽，忠襄公笑曰：“无须。”言次即从袖中取旧瓜皮帽一枚冠之于首。今犹忆其帽污敝不堪。即此可见忠襄公平日服御之不讲究也。

辛卯 光绪十七年 四十岁

四月初二日，女其纯生。

初余以欧阳太夫人晚年多疾，时须斟酌药饵，常阅《验方新编》。是书为中药家用之集大成者，凡延医不便或服药久不效，得此足为宝筏。近数十年几家有其书矣！初印本不久即罄，故丙午、丁未之间复刻板于长沙。

初，甲戌年因欧阳太夫人病重，发愿施药。至是始制藿香丸甘露茶及南京张统领绍棠家所传之附桂万应膏，又于暑天买痧药施人。中丞公在湘曾患喉症，吹瓜霜散而愈。至是亦配制之而改用苦瓜霜。又龙虎丸治疯症曾愈多人，后又治愈邵小村中丞之世兄，因常配制送人。

张太夫人因家中产业须躬自照料，是以定于中秋后仍回长沙。太夫人在署时，中丞公每月奉上月费银三百两。

太夫人临行谕云：“余回湘后每月三百仍须照寄，余当为汝等营田地房产。”后遵命照寄。浏阳门、乐心田两宅皆老人所代置。但此间除月费外，又陆续另寄三四万金为造宅之费也。

是年芜湖发生教案，当地未能了结，由中丞公与驻沪法领华格臬在沪议结。

壬辰 光绪十八年 四十一岁

是年七月初十日孛生二女。初天气奇热，闰六月席地卧近冰盆，又食生冷，致腹泄，转痢症，损胎气，故方七阅月而产。初生之婴尚活，未弥月而殇，次婴甫下已不救矣。产后仍病热，经巢君崇山诊治，久之始愈。

是年三月十一日，长子其宾歿。其宾性情笃厚，表率诸弟均以仁让。自四岁起病，医治不得法，拖延十三年，卒至不起。临终，中丞公面许云：“汝为吾之长子，将来诸弟中先得子者即为汝嗣。”故其后以庚子年所生之光坚孙承嗣也。是年八月三十日，由沪运其柩还湘安葬。

癸巳 光绪十九年 四十二岁

是年冬，中丞公升任浙江按察使。

冬间其昌、其杰两儿回衡山原籍应县试。其昌幼时体弱多病，曾默许衡岳进香之愿，遂令乘便酬神。又湘阴左氏本有婚约之议，太和萧氏亦有缔婚之意，遂禀命于张太夫人卜于湘俗所崇事之定湘王神而委禽焉。萧氏经营盐业，

久居扬州，其太夫人为长沙王氏女，故甚欲字其女于湘人也。

甲午 光绪二十年 四十三岁

七月十三日迁出上海道署，寓江西路，因邵小村中丞委台湾转运所差，未赴新任。五月十一日，女其璞生，时犹在道署。

庚寅年初接沪道，由龚前道移交两帐房以及门稿跟班等。概因前任旧人，无甚更张。中丞公既系初任，且秉性长厚，不以私财为重，未知详细稽核。后至交出之时，始知亏空八十万之多。后任为黄幼农祖络，催之甚急。仔细清查，始知接收时已短二十万。其经手帐房徐子静原为前任之帐房，先年冬，邵君小村公子结婚，诸事均托徐代为办理。徐有妾称为楼上太太者，招待客人。邵威坤宅为李六太太，文忠之弟妇也。中丞公为介绍人，是以余亦被邀往陪高亲，义不容辞。见徐妾朝珠补褂，遍身珠钻耀目。闻即其身上之金玉珠翠，已值二万馀。后徐交来飞鲸轮船一只，作十馀万；珠花四枝，珠镯一对，珠莲蓬一版，翠玉多宝串一长串，碧珮十八子一串，共作银一万两。后押于鸿章钱庄交后任，均系精圆珠。其时珠价甚廉，若照后来涨价时，当可十倍。虽存余柜中数月之久，余未曾取出试一插戴也。

是时中丞公虽得迁官，而办理交代极受后任之气，甚至欲请开缺与之对簿。

乙未 光绪二十一年 四十四岁

正月下旬，乘民船赴杭。二月朔日，入臬署。

五月二十八日生子，乳名平儿，八月殇。

八月，命次子其昌随五姑回湘就婚左氏，十一月二十四日成礼。拟俟次年二月迎张太夫人携孙儿媳来署，未果。

是年章淑人来侍，浙江绍兴新昌人也，是为其焜其焜其璧之生母。其年冬间，中丞公以下多患疥疮，诸儿或出痧疹，或患喉症，幸均医愈。余于十月中患腹痛癖块，不思饮食，赖林君伯颖诊治得法，五十馀日始消。

丙申 光绪二十二年 四十五岁

是年九月，中丞公迁江苏布政使。奉旨陛见，旋以留办商埠事飭赴新任。冬间眷属由浙赴苏。

正月，其昌夫妇自湘来署。

任浙臬时尝署藩篆二三次，织造于藩署领款，例有回扣，中丞公一概不扣，于苏于浙皆然。历任织造均以为从来所无，颇感颂。

是年三月张太夫人在湘处分亦峰公遗产暨历年所置田宅，书立分关，略云：

汝父自粤东解组归来，宦囊无几。余因搏节，多获赢馀，所有公馆田业，均系自置。今余年将七十，精力衰疲，难于料理，请凭族戚将公馆田业概行分析。田业共计租谷七千石，伯元兄弟各分二千五百石。公馆

二栋，一在黄泥墩，一在浏阳门正街。黄泥墩公馆系公分所置，本应三股平分，余恐兄弟同居难于翕洽，则专归伯元；浏阳门公馆系仲芳历年在官奉余月费所置，则专归仲芳；第伯元仲芳均有公馆，季萱独无，爰于千五百石之外，加分租五百石，听其自置。除分授外，尚存二千石，余留作日用供膳服御之需，五女食用亦在其内。俟余终年，则将所存之租内提五百石，除银提二千两，分归五女。其馀千五百石租存作公项。

是年张太夫人在湘违豫，病中梦吕祖予以一袍，绣寿字八十，其襟底复有二枚，自谓当寿至八十二。其后至辛亥年弃养，寿八十三也。

丁酉 光绪二十三年 四十六岁

是年三月，长孙女光昭生，其昌所出也。张太夫人时正迎养来署。

十月初十日，章淑人生儿子其燠。

是年为其焜订婚萍乡黄氏。黄亲家蕙堂曾任上海县令，与中丞公颇相得。至是黄夫人携其女以来苏，因得见之也。

戊戌 光绪二十四年 四十七岁

三月十九日，张太夫人七十寿辰，在署宴客。

闰三月初四日，其杰娶妇萧氏。是年上海有四明公所一案，民变罢市，风潮甚厉，沪道不能弹压，江督刘忠诚奏派苏藩司查办，成婚时，中丞公方在上海。

己亥 光绪二十五年 四十八岁

是年秋间，中丞公护理江苏巡抚。诏以溥儀为皇子。此讯传至江南，皆知孝钦后有废立之意。中丞公奉旨陛见入京，余念朝端之变，不知何所底止，心忧莫释。中丞公入京，奉命与总税务司赫德会议加税免厘，寓惠敏公台基厂故宅。此宅即次年为董福祥兵所焚掠者。适惠敏次女患病，留为照料。无事时偶在荷包店盘桓，略购翠件，曾为张太夫人买翠玉镯一付，后遵老人遗命，此镯给与其煖为行聘之物。

庚子 光绪二十六年 四十九岁

是年元旦日，方观儿辈作掷采戏，忽吐血两口。缘每日阅报，知朝事日非，惧有非常之祸，而中丞公方在京中，日夜隐忧，以致吐血，幸向无此疾，医治后未复发。

正月，中丞公在京出门，马惊车覆，被辗而过，幸着重裘，竟未受毫发伤。四月出都，回藩司任，再护江苏巡抚。拳匪事起，首先出示严檄各属实力保护教堂，部署水陆营伍，剿平常昭红帮太湖泉匪，因成保护东南之约。八月西幸，复转运苏漕至行在，相属于路。其年冬，升授湖北巡抚，甫十日，调补江苏巡抚。

九月十三日，次子其昌生长孙光坚，以之出嗣作其宾之子。

辛丑 光绪二十七年 五十岁

三月十二日，其杰生次孙光堃。

八月十三日，章淑人生女其璧。

是年秋间在苏州抚署，为其炜娶妇湘乡刘氏，山西布政使二等子爵刘君肅之女。

是年冬，中丞公奉旨调补安徽巡抚。由苏州坐民船三只至上海，再乘轮赴安庆，先以铜元局为行辕，后始入署。

壬寅 光绪二十八年 五十一岁

是年为女其璞文定，瞿亲翁文慎公方在枢府，以庚帖寄署。

二月十三日其昌生第三孙光圻。

二月，张太夫人自抚署启行回湘，其炜及妇侍行。回湘后，张太夫人染病，中丞公请假回湘省视，并自扬州延医李君往诊。章淑人及其昌儿妇随行赴湘侍疾。旋病愈，即返署，其煖及光坚随行来署，余仍留湘。

癸卯 光绪二十九年 五十二岁

是年夏间中丞公调补浙江巡抚，为张文襄公及皖绅所留。八月，赴宁任乡试监临后始赴浙。

是年其昌入都应经济特科试，岑云阶制军所保也。

三月，其炜生孙女光曜。

五月间，读日本下田歌子所著《家政学》而喜之。稍嫌

其与吾国国情不合，因为斟酌损益以饷国人，命其昌、其杰两儿及侄婿刘寿霖写定之，刻于安庆抚署。

甲辰 光绪三十年 五十三岁

九月初十日，其昌生第四孙光墀。

十一月廿四日，其炜生第五孙光均。

是年夏间，其炜赴日本留学。

是年领南洲湖田照，其昌所经手也。历年江湖之水逐渐南移，湘省濒湖诸县遂多淤出之地，垦务局发照招人领种，余家领八千馀弓，费钱三千馀缗，然仍无力修堤。

乙巳 光绪三十一年 五十四岁

是年中丞公因办事棘手，两疏乞终养未允。八月，以御史姚舒密摺任用私人及扩张铜元局案奏劾，飭查无据，奉旨开缺。初铜元局总办系刘道更新，中丞公因其办理无起色，改委朱道幼鸿。朱到任后，局中盈利十馀万，中丞公奖其能，俾署粮道。其铜元局之馀利有应归抚署者，概未收受，悉留存作派出洋留学生之经费及练兵处经费。其他不得志者因妒生恨，又适有不职之道府为中丞公所参劾，怀恨甚深，遂有结纳台谏纠参之举。朝旨令福州将军查复，虽据查明并无不合，而卒以听信属员为罪。奉旨开缺。九月间乘民船至沪，转附江新轮至汉回湘，即居乐心田宅。

是年自浙江回湘，张太夫人因公中收租银钱等事难于操心，欲交我房经营。因令中丞公手书折据，以田业每年

收租二千五百石作银二万八千两，又现银二万二千两，共作银五万两，每月归老人息三百两，自是年冬月十五日起息。

丙午 光绪三十二年 五十五岁

章淑人以九月十一日生子其焯。

朱孺人是年来侍。

丁未 光绪三十三年 五十六岁

是年二月其焯娶妇黄氏，四川盐茶道、萍乡黄君承暄之女也。就婚于四川盐道署。夏初自川回湘。十一月十六日生孙光地。

戊申 光绪三十四年 五十七岁

是年二月二十七日其贤娶妇长沙陈氏，前浙江杭嘉湖道陈君乃瀚之女也。

三月十九日，张太夫人八十寿辰，演剧宴客。是时湘中戏班戏价每日仅二十馀缗，其演加官时每次赏封仅二百文。昔在湘乡时，每正月玩龙灯，必有戏，澄侯公颇嗜此，常唤至家，不过数缗。又乡间家家供观音，故常有唱戏还愿之举，所唱必有香山传，以木偶偶为之，日才数百文。儿时观之颇以为乐也。

四月，率其焯、其德赴沪。因诸女均渐长成，若有亲事成就，即须办喜事，因就便置备嫁奁。

六月二十六日，其炜生孙光坻。

初，中丞公在沪道任内亏空八十万，皆系因帐房徐某吞蚀所致。爰由内帐房汤癸生君经手陆续追出各种股票，其中以汇丰银行及开平煤矿为大宗。此外则轮船一只（名飞鲸）及码头，亟以变卖，抵偿公款。有纺织新局者，因已数年不分股息，其股票五万四千两竟一钱不值。汤君拟邀余家合办，中丞公当以居官不便自营商业谢却之。汤君乃自行租办，邀其杰为之经理，易名复泰，一年后即盈馀十多万。未几汤君逝世，其族人汤君螿仙乃来访其杰，谓汤君故后，孤寡不能胜此重任，必欲我家合办，并为经理其事，怂恿不已，继以长跪。遂定以汤氏担任四成，余家六成，而其杰为总理。复泰租约本为六年，继改为四年。至光绪三十四年期满，旧股东无力偿还，遂议决将厂拍卖，余家出价三十二万五千两购买，改名恒丰，皆其杰其炜两儿请于中丞公而行之也。然余家实无此巨资，徒以有日后发展希望，不忍弃去，乃设法借款以购焉。余本有来沪置备诸女嫁奩之意，因率其炜东下办理此事。中丞公解组后，宦囊本属无多，加以购厂举债负担殊重，幸纱厂连年均有起色，差不负当日之经营。但湘省湖田修堤所耗不资，又民国十年其杰兴办大中华纱厂失利颇受影响。至本厂因迭次扩充迭借外债，至今未能偿还清楚。此余家近二十年概况也。

己酉 宣统元年 五十八岁

是年闰二月二十四日，其贤生孙女光坤。

三月初五日，其焜生孙光堉。

是年延尹和白君教诸女作画，后朱孺人亦从尹学画。尹君曾在文正公署中作客，惠敏公曾与研求绘事。又容纯甫君有照相机一具，惠敏留而玩之，因以赠尹，故尹为湘中能照相之第一人也。

庚戌 宣统二年 五十九岁

正月二十一日其贤生孙光尧。

是年正月，遣嫁女儿其德于临桂张子武(其镗)。张婿以进士即用知县补芷江，有政声，时余内侄情俞君寿丞以道员筮仕湖南，知其人而作伐焉。中丞公亦尝闻其治行，激赏而许为大器，遂于去冬委禽。及成礼后弥月，即偕赴芷江任所。

二月，遣嫁女儿其纯于闽县卓君卫(宣谋)。卓亲翁芝南以部郎出守杭州，由内侄广钟作伐订婚。卓婿来湘就婚余家。婚后二月，余率其炜、其璞赴沪，新婿夫妇亦同行。时其杰及媳均有病，幸渐就愈。四月，其炜又病湿温，幸夏医应堂为治愈。八月中旬，率其杰夫妇、女其璞、孙儿光堃赴南京看劝业会，见其规模条理颇佳。

是年八月廿五日，中丞公侧室章淑人逝世。信来，适余等方将启行，其杰因送余回湘。

十二月，遣嫁女儿其璞于善化瞿兑之(宣颖)。瞿亲翁文慎公亦居长沙里第也。初女之许婚瞿氏，张太夫人实主之，故太夫人亟欲观其成礼，期前且亲至婿家相度。于是

一年而遣嫁三女，劳扰未获少休，而太夫人又起病矣。

辛亥 宣统三年 六十岁

正月廿七日，其贤生孙光在。三月十七日，其焜生孙光增。

先是张太夫人于上年腊月二十三日因感冒不适，入春加重，至正月十八日弃养。中丞公于病中日夜奉侍，室中温度甚高，偶出入感受风寒，致成温症；太夫人弥留之际，重以哀感不能自持，日益沉笃，至二月二日痰壅失知觉，竟相随长逝矣。浹旬之间，大丧两遭，仓皇惊痛，至今犹心悸也。中丞公之季弟季萱公亦于三月二日哭母兄而逝。至是一年而遭三丧。弟姒无子，乃以本房之幼子其焜出嗣主丧。中丞公遗疏闻，奉旨赐祭，宣付国史馆孝友传，并锡一门孝友匾额。

是年九月一日长沙革命事起。初八日，出城葬中丞公于河西县塘坪之庄田，以舟往，由其贤先往布置。

十一月，与瞿亲家全眷乘沅江轮来沪，适该轮直放上海修理。其时汉阳武昌互攻，炮弹横飞，沅江轮于炮火下安然驶过。其夜泊汉口日清公司码头，枪炮之声，一夜不绝，有如除夕之爆竹。汉口招商局中炮弹火起，其光烛天。其杰留乡照料墓工，其焜其贤在省城照料家务，两媳则率孙男女随来也。

是时省城民党搜括军饷，被其强提存款者甚多。而吾家历年亏空一无存款，幸免此厄。然当此事变，匆匆办理

葬事，即行来沪，惊忧实已甚矣。

壬子 民国元年 六十一岁

是年在上海，寓西华德路谦吉里。家中人口益多，亲友亦纷至，始构屋于威赛路，即今工部局东区小学也。

是年六月十一日，其焜生孙女光琛。七月初五日，其炜生孙女光明。

其贤由监利代子武率南武军返长沙，其时适值四十九标五十标方将围困都督府，因此而不果。谭祖安都督遂委其贤统领其卫队，颇加信任。后大房长孙光孝偶犯嫌疑，几致枪毙，又其勋之妾因吸烟已捕至警局，皆幸经其贤保释。

癸丑 民国二年 六十二岁

是年九月，迁居威赛路新宅。

六月初十日，其贤生孙光墉。十月三十日，其焜生孙光坡。

其贤于夏季病逝。其贤办事认真，不避嫌怨，竟不永年，实为可惜。

张太夫人弃养后，本应将公中租谷提出处分分析，以家中人口众多，丧乱之际，久未妥协。直至是年春始定议，将田产租谷二千五百石归公处分，其银历年加息已有四万两，均由我房提出照分。

甲寅 民国三年 六十三岁

是年八月初九日，其炜生孙光培。十月二十三日，其焜生孙女光琼。

乙卯 民国四年 六十四岁

是年正月，与其杰及儿妇同领洗于上海昆山路监理会。先是庚戌三月，送女其纯赴沪，视其杰夫妇疾。内侄季融邀赴杭州未果。渠常来为余说基督教真理，余深为开悟，遂有服膺之志。回湘后时为亲友言之。及辛亥再来沪上，感于世事日非，实由人心陷溺之故，弥以为欲救人心之迷惑，当从爱人如己入手，自此益坚信力焉。

是年十一月十九日其炜生孙女光锡。

初，中丞公于甲辰年领垦湖田，大修堤垸，而后能施垦种。本意在养活多数农民，产生巨量米谷，詎知投资甚巨而起色仍无，十年之中并无粒米之收。民国元二年之间，其贤及子武婿在湘颇尽力维持，始不致前功尽弃。其后子武复屡次代为筹借巨款，以底于成。丙辰以后，渐见丰收。其款由我家陆续偿还，中丞公之遗志，差克不坠焉。

丙辰 民国五年 六十五岁

是年二月，儿子其煥娶妇合肥李氏，勤恪公之女也。逾月偕赴美国。

丁巳 民国六年 六十六岁

是年四月初七日，其煥在美国生孙光坦。同日沪寓其杰之妇因病逝世。媳素贤孝，明大义，惜其体弱，自来余家，常多疾病，卒至不起。

戊午 民国七年 六十七岁

是年春初，与瞿亲家翁及夫人游杭州，西湖诸胜略皆涉历，其杰及长孙女侍行。自乙巳去此邦，于今十四年矣。昔年油幢丝幃，未能周历，今兹安车野服，转得恣游。瞿亲翁文慎公旋于三月间逝世。

是年元旦制定析产办法。盖以年逾花甲，子孙成立，家事冗繁，难于照管。爰将昔年亦峰公所遗田产及中丞公历年储积家资房地股票现金作为十成处分。余家先世素好施与，中丞公在日，每年捐助善举，为数甚巨。余近奉基督教，稔知博爱之道，首重济困扶危，谨遵《圣经》逢一献十规律，提出一成，作为慈善经费，日后永远不得处分，每年收入子金提作教会以及各公益水旱灾疫捐款，母金非不得已不可提用，庶几先人好善懿德可以垂诸久远。公上提出二成为余赡养，公中应酬亦在此中开支。长子其宾未冠而殇，良为悼念，兹以长孙光坚承继，分给半成。又其煥出继夫弟季萱公为子，因该房尚有祖遗田房产业，亦分给半成。每成应派银八万馀两，其中以厂股占多数，田房产次之，现金则各房几皆负债也。凡立分关九纸，余与六

子、二孙(光坚、光尧)各执一纸也。近因光坚逝世，拟将其半成作为仲芳公子孙中之教育基金，实系无力者可略为补助，但须管理得法耳。又先是将上海培开尔路地亩捐出，由工部局开办公学，援西例名之曰聂中丞公学云。是年十月十三日其炜生孙光焯。十一月十七日其煥在美生孙光址。

己未 民国八年 六十八岁

是年秋间孙男光坚、光堃赴美留学。其煥夫妇以是时回国。

庚申 民国九年 六十九岁

是年十月，女其璞偕婿北上。

是年其杰游历欧洲，上海总商会公举为会长，辞不获已，满一年后始辞去。

是年十一月初一日其煥生孙女光嘉。

辛酉 民国十年 七十岁

三月二十九日，余七十整寿，重伯侄自湘寄文为祝，亲友来会，欲演戏称觴，余固却之。

壬戌 民国十一年 七十一岁

是年三月率其炜、其璧游无锡苏州等处，内侄女俞姑太太偕行。

长孙女光昭于是年四月二十日于归番禺曹铭先(珽)，

曹为留美工学硕士，其时充南洋公学教习。

癸亥 民国十二年 七十二岁

是年五月十一日，女儿其璧适江宁周子竞(仁)。其初为交通大学教习，后任教务长，近为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所长。为人诚实俭朴，兼有才干，办事认真。其杰因商之于余，遂订婚嫁。

是年三月二十四日，其煥生孙光达。

甲子 民国十三年 七十三岁

是年三月为次孙光堃娶妇庐江刘氏，文庄公之孙女，刘君体乾之女。

是年六月晦日，朱孺人以肺病逝世。其咯血病起自庚戌秋，当时治愈。次年中丞公逝世，又常发，迭为治愈，不久又发，至是不救。余前曾经询问云：“汝年太轻又无出，尽可自由，余当令汝兄为汝择配。”渠自不肯，且极守礼法，一人不肯独行，必须有伴，是以虽无出，而余令诸儿尊之如庶母。其杰送其灵柩至湘，葬于县塘坪中丞公之墓侧。

是年七月十八日，其煥生孙光华。

乙丑 民国十四年 七十四岁

是年闰五月为儿子其煥娶妇连平颜氏，筱夏方伯之孙女也。

十一月为孙男光均娶妇贺县林氏，前贵州巡抚林君肇

元之孙女，翰林院编修世焘之女。

十一月二十二日其煥生孙女光来。

丙寅 民国十五年 七十五岁

二月初五日长曾孙女崇谦生，孙男光堃所出也。

八月二十八日迁居辽阳路新宅。以所居威赛路旧宅太大而各房复不能聚处，乃别构此宅凡为四所，除其焜、其炜外皆居于是。

先是长孙光坚患病已久，医者皆言难治，是晨余往视之，神志极清，尚云祖母来未能起立，实为无状，不意余迁入新宅后未半日竟长逝。光坚秉性聪敏，办事切实，稽核湖田事深著勤劳，于夏初尚扶病至湘一次，今竟不起，甚可惋惜。

自是年始，每星期开家庭会，由其杰讲论。

八月初三日其煥生孙光墅。

丁卯 民国十六年 七十六岁

夏间闻长婿张子武之丧。子武自辛亥以来，奔走国事，迄无宁岁。近年在汉口军幕，擘画劳苦，卒以刚鲠遭忌，军败不振，以身殉焉。遇难地在河南邓县之枸林关。秋间始得归柩，冬间卜葬于苏州七子山之原。其生前喜帮助本家亲友，又好购藏书籍，不事生产，卒后萧然无所有，因定以月费资其德，为其教养儿女焉。

戊辰 民国十七年 七十七岁

是年二月，为季萱公夫人六十岁寿，遣其煨夫妇率孙儿等赴湘拜寿，三月，奉之来沪小住。

是年九月杪，余患大头瘟，兼旬昏沉不醒，经牛君惠生医治，打大针八针，后颈上生一疮，亦经牛君治愈。但余素信中医，依常兼服调理药，近年身体似较前略好矣。

正月初九日其煨生孙女光秀。六月二十六日其煨生孙光壘。五月十三日孙光堃生曾孙女崇厚。

己巳 民国十八年 七十八岁

是年八月，偕季萱公夫人挈其炜、其德赴杭州，看博览会，数日即回。

五月十九日其煨生孙光乐。七月二十六日孙光均生曾孙崇训。十一月初十日其煨生孙光壘。

庚午 民国十九年 七十九岁

是年四月初六日，季萱公夫人逝世。其煨儿扶柩回湘，因山向不开，尚未安葬。旋闻共党将近省城，其煨等奉侍五姑来沪避乱。同来多人，随后陆续回湘。后因湘省常有乱事，因留五姑居沪。五姑笃重孝友，守贞不字，侍母终身，秉性仁慈，长斋奉佛，自奉极俭，虽所分产业无多而帮助贫穷亲族极为慷慨。

四月二十四日，孙光堃生曾孙崇山。

辛未 民国二十年 八十岁

本年余八十生日，亲友多欲称觞，余坚却之，仅于是日备蔬食款客而已。子女孙曾内外共计八十余人，几咸集焉。

余所见八十年来妇女妆束之变迁，追忆而述之，实饶有兴味。惜早年闭置深闺，见闻至隘，所接触于耳目者不能概其全耳。大抵咸同之间，妇人之髻多盘于脑后，而为长形，略似今北方乡妇之髻，中须衬以硬胎，其约发处饰以红丝，固以扁髻。

余七八岁所见吾乡间所梳者，名牛角髻，或云是宝庆之时妆，或用木削成，加黑漆发盘于内，其角尖高出于头顶，有三四寸，而燕尾拖于颈间（燕尾以马尾为之），今思其状实堪作恶也。吾近乡间所见则均略矮，不过二寸上下，亦不甚尖，与元宝头相仿，亦是假的。

其后外间髻式流行者曰元宝头，曰扬州桂花头，曰平三套，皆有燕尾，要之皆矫揉造作不任自然。此皆同治以前事。光绪中，则通行所谓巴巴头，挽发两三匝，而髻心隆起，三髻并列，不劳衬托矣。

至于闺女则梳髻，或偏或双，或额覆短发，谓之刘海。及至光绪庚子以后，则无长幼皆留额发，且衔以小梳，使之鬅髻隆起。革命事起，年少妇女亦皆捐其故髻，或盘作蛇形，或仿日本，风起云涌，目迷五色矣。直至民国三年以后，始稍复故，初则为胡蝶髻，继则为菊心髻，盘辫

髻，鲍鱼髻，S髻，横S髻，而最近则为扇子髻，皆梳于脑后。民国十五六年以后，剪发之风盛行，余家少女新妇皆陆续剪为秃鬓，则益为当日所不能逆料矣。

▶ 此十一二岁所见。假发盘成，戴于真发之上，当中亦有长髻心，是真发扎的。



图 一



图 二

◀ 此髻是假的，真发盘于内，当中髻心是真发扎一长把。

▶ 此为扬州桂花头样。用黑绒绕细铁丝盘成种种花样，间有衬金纸者。燕尾则多制以马尾，多亦间有真发者。



图 三



图 四

◀ 北边名为平三套，用真发梳者多，南北皆有。北边亦有用马尾编成者。



图 五

◀ 此为元宝头

▶ 此为狮子望长江



图 六

此两样(按：指图五图六)是在安庆所见，髻是真发，燕尾是马尾做成。

以上均同治以前之样。

至于衣装式样，余忆幼时所见皆淳朴无华，而余家为尤甚，姊妹姑嫂至一衣递袭，已详前记矣。文正素恶纷华，曾手书不准穿大镶花边衣五采花裙，盖今日所视为陈旧者，彼时方矜奇炫异也。自惠敏奉使归国，始携有外洋衣料见赠，价有每尺数元者。然余自己未曾买过贵价之衣料，余家至今穿四五元一尺之衣料者尚鲜。庚子以后，风气弥开，男女皆尚高领窄袖，往时袖宽至尺三四寸，或至尺有六寸，至是裁及数寸。凡西洋服饰若花边钿钮绒毛衣之属，皆为常御之品，而往时之阑干挽袖均捐废矣。昔帝制时代之名器犹不能十分滥用，余家侍妾虽请诰命者犹不得着朱红裙，闻他人家有禁侍妾着天青外褂及红绣鞋者，余家固已从宽也。革命以后无复坊检。民国初年，高领掩颊，状虽不美，犹不至露形。十九年以后，盛行旗袍，可免短衣之丑与长裙之烦，未尝非善法，但袍仅过膝，袖不及腕，胫肘并裸，实非余所乐睹也。

余所见数十年来饮食风俗之变迁亦甚剧。即以筵席而言，文正在日，禁用烧烤，前固已言之矣。往时官场酬应以此为盛设，几成体制。直至民国始全然废止也。顾形式虽改而品数之丰溢，烹制之精靡有过于昔而无不及也。吾湘在清季用一鱼翅席亦不过十缗，已为极侈。宣统庚戌，长沙饥民之变，巡警道赖承裕斥天然台茶肆卖茶百钱一碗为俗奢民富之证。准此而言，当时所谓奢者视今何足道哉？今上等茶馆饮茶恐无廉于一角者矣。民国初元，余家居上海，翅席亦不过八元左右，近年非十六元以上几不能下箸。所闻豪侈之家一筵至数百元者比比而是，人亦不以为怪矣。余意无益之暴殄实可节省，亲朋宴会求适口而不过觥斯为中道。余之所以自奉者，平日常肴虽随时价而异其丰俭。然岁时加设，亦不过数元。又每年元日蔬食已行之多年，生日茹素则近日始实行，自信差无暴殄过甚之咎。惟应酬亦自觉过于疏忽，从未盛设款客，即添菜亦稀有之事，幸亲友相知有素，概可见原矣。

畴昔在官之日不常出外，出外必备驺从。归田以后，始蓄私舆。湘俗以三人舁一桥，所谓三丁拐者也。寓沪以来，蓄一马车。自民国三四年，汽车始通行，但余每出仍乘马车。盖马为天然物力，不用固弃，而汽油则竭数百万人之精力以奉一人俄顷之娱。吾国目前尚无自发油矿之望，何必捐巨金于外国以纵一己之嬉游。余年已老，偶尔出游，并无急事，更可不必求速；况近年上海交通繁剧益甚，无一而非危险之道，故宁求安而不求速也。

廉俭救国说

家慈慨社会之奢靡，爰述先训，贡献当世。盖国奢示俭之意，其杰以为此乃关系世界治乱安否之大问题。因请于家慈，俾广其说。乃陈述古今中外成败得失之故，证之以事效，不觉冗长其词，且推崇古义而薄今说，惧触时忌，或将引起非难，望读者分别观之。苟措辞失当，而引证有误者，知皆其杰之咎也。再，其杰久病，不耐构思，力疾作此，自知多所疏漏，阅者谅焉。

民国二十一年五月聂其杰谨识

历观数千年治乱盛衰之迹，每与一时风尚之奢俭为消息。大抵社会奢侈，则纵欲肆志之表现也；风俗俭朴，则克己复礼之表现也。纵欲望即杀机动，而乱至矣；崇礼义即生机萌，而治隆矣。其消息甚微，而征诸事实证验，未有或爽者也。就一身所阅历，亦有可述者。余生值咸丰初年，粤乱初兴，先文正公赤手空拳，出膺艰巨。时值承平日久，朝野酣嬉，习于虚伪。军事吏治，腐败已极，无可拨之饷，无可战之兵。公初以乡绅任团练，后则总制各省军务，统兵至十馀万，以廉率属，以俭治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竟能造为风气。与一时将吏，以道义廉洁相

勉循，故克和衷共济，戡定大难。一二在上位者，克己制欲，而其成效有如此者。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时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修善堂者，先叔澄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饭常数桌；黄金堂则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当时先母节俭之情形矣。厥后居两江督署，先公常欲维持乡居生活状况，平日衣服不准用丝绸。一日客至，予着羽纱袄，绽有阑干，客去而文正公入，以目注视，问母云：“满女衣何华好？”母亟答云：“适见客耳。”羽纱洋货，质薄而粗，价比呢廉，比湖绉更廉矣。所绽阑干，南京所织，每尺三十文耳。平日亦着此袄，外罩布褂，见客则去罩衣。先公所定章程，子女婚嫁，皆以用贰百金为限，衣止两箱，金器两件，一扁簪，一挖耳，一切皆在此贰百金中。予等纺纱绩麻，缝纆烹调，日有定课，几无暇刻，先公亲自验功。昔时妇女鞋袜，无论贫富，率皆自制。予等兼须为吾父及诸兄制履，以为功课。纺纱之工，予至四十馀岁，随先外子居臬署时犹常为之。后则改用机器缝衣，三十年来，此机常置座旁，今八十一岁矣，犹以女红为乐，皆少时所受训练之益也。余所以琐琐述此者，盖社会奢俭之风，皆由少数人所提倡，贵人妻女，实为奢侈作俑之尤，且每为男子操行事业之累，故先公对于予等，督责如是之严也。余既早受此等训育，终身以为习惯。选购衣料，常取过时货，因其廉也。忆

甲午年，在沪道署中，先嫂曾惠敏公夫人来署，见余所买花边，式样陈旧，因言：“此物无人用矣。今所行洋花边，花色鲜美，胜此十倍。”予曰：“予已见之，且代人买过，然价视此数倍。余所买者，虽已过时，余自爱之，且喜其价为中国所得，金钱不外流也。”嫂笑云：“靠你一人所省，能有几何？”余曰：“虽然，若人人能如是着想，或皇太后能及此，而不爱洋货珍玩，则所省多矣。”盖时值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各省督抚，纷纷在沪采办各国奇巧之物，以为贡品；京内大臣，则更逢迎意旨，请移国防之费，以兴建筑。旋即有中日之战，割地赔款，国势从此不振。一人稍存侈泰之心，而影响如此之巨，嘻，可畏矣！乃甲午战败后，国人不知警戒，不务节俭，以厚蓄国力。其所谓变法兴学者，专务揣摩欧风，而我国廉俭之美德，遂置脑后。社会奢侈，日甚一日，积数十年之漏卮，遂使强邻之船益坚，炮益利，以为侵略我之具，是谁之过欤？近十年来，奢侈程度，又数倍于昔日。步趋欧美陋习，无所不至其极。男女学生，多着西装，袜履之价，至数十元。婚礼摹仿西式，自顶至踵无一非舶来贵品，一盖头纱巾，价至数百元，结婚之场，以外国酒馆为上。总之，一切举动，欲完全似外国人，尤欲似外国富人，而以中国之服饰状态为可贱可耻。此毒深入脏腑，爱国观念，无形消灭，欲保民族之独立难矣！盖国家之个性已亡也。中国立国之精神，与民族之个性不一端，而其特点实惟俭德，中国政教之根本在德礼，而德礼亦以俭为归。孔子答林放问礼之本，曰：“礼，与其奢也，

宁俭。”御孙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故俭为政教之精神也。盖嗜利而以富骄人，为人类同有之恶根性，世界祸乱，皆由于此。惟我国古圣贤深知其故，故其为政立教，推崇德义，而贬抑富豪。孔子言君子喻义，小人喻利。孟子以孳孳为利为盗跖之徒；又述阳虎言，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又以商贾垄断市利为贱丈夫。汉贾谊晁错为我国大政治家，深斥富商大贾豪奢之行，妨害民生，败坏风俗，淆乱礼制，言之痛切。以故数千年来赖礼教维持，以社会清议之制裁，成无形之法律，富豪贪官稍有忌惮。有明之季，尚存此风规，官吏或致富归乡，类为士林所不齿，此实中国特有之民族精神。降至今日，输入欧风，尤以美国为最，尊富人曰上等人，称美豪奢，贱视俭素，学者且从而为之说，风气乃大坏，而国事不可为矣。其影响及于社会经济者，一切器用，拾中取西，我国旧有之工艺，逐渐归于淘汰，而失业贫苦之人多矣。去岁进口货价洋二十二万万元之巨，出入不敷者达八万万元之巨，此为提倡欧风，发展欲望之效验，甚显明矣。譬如病人，更加创伤，流血不止，欲其久活，安可得哉？今人动辄曰此帝国主义者经济侵略之咎也。固矣，然日本从前非居于同等地位，同受欧美各国之经济侵略者乎？何为而彼能自固自强，为列雄所惮如此也？夫起居日用服装之不便，莫甚于日本，假令日本亦竞尚奢侈，好便利，求适体，则必弃其所固有者，而求诸外国，则其所耗价款之巨，不堪设想。如西式浴缸、便具、火炉、衣柜、铜铁床、弹簧褥、地毯等等，皆我国

新人物认为不可少者，彼国则除少数贵族豪商及公共建筑外，凡中上等人家，概无此等物也。寻常家屋，并玻璃窗而无之。夫彼多数人民，能毅然守其旧有之俗尚，而安于不便不适者，盖由能抑制私人之欲望，以保全立国之精神与物力而已。此非教育之力不为功，而彼教育家能于数十年前具此只眼者，则由当时维新诸杰深得力于中国之学术（多数为阳明学者），能见其远且大者。知保存国粹，即所以强固国力，故不为西来文化所侵略也。盖礼教与俭约者，中国文化之美粹也。礼以克己制欲为主，寡欲则俭而约矣。此今人所病为消极道德，吃人礼教者，故反其道而行之，曰：“发展欲望，乃能促进文化。”呜呼！事实证验则何如乎？自古以来，凡能福其民而利其国者，考诸史册，皆富于此消极道德者也。昔大禹承洪水之后，卑宫室，恶衣服，菲饮食，而致力乎沟洫稼穡，开三代盛治之先河，亦千古秉政者之模范也。晋文公时，国人尚奢，公身示之以俭，宫室卑鄙，衣不重帛，食不兼肉，时人乃皆大布之衣，粗粝之饭，晋国以霸。卫文公当国破之后，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数年之间，再振国力。吴王阖闾，居不重席，食不二味，以成霸业。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与士卒共苦，竟吞强吴。汉文帝禁止雕文刻镂锦绣纂组，却贡献，减太官（主膳食者），省徭赋，一时循吏辈起，盛治称三代后之最。宋仁宗力行节俭，屏弃珍物，而良将相之多，为宋代冠，时人有言：“军有韩范，虏骑破胆”，韩范者，韩魏公，范文正公，亦皆以廉俭刻苦为世所称者，而其效乃能威振强敌

也。清圣祖内衣九日一浣，室中毡毯用四十年，平时食无兼味，故能于明末空虚之后，不务搜括，而尽除明代各种苛税；虽经三藩回部缅甸之役，而人民丰乐，国力充富；迄于雍乾，共免全国钱粮八次之多，粤乱以前，并厘金而无之；其他积极事业甚多，如从西洋人亲学天算，派员测定全国经纬度舆图，为中国有正确舆图之始，又能亲制发条自鸣钟，及编成《历象考成》《康熙字典》《七经纂传》等巨籍多种；其好学勤政，而造成二百年太平之盛治，皆由其俭约克己之所致也。他如马援立功交趾，以谦约节俭廉公垂诫。诸葛亮定三分业，以静俭淡泊著称。耶律楚材佐元太祖，军行六万里，兵威远至印度西域，所至劝元主勿杀，保全人命以数百万计，而布衣蔬食，神明淡泊，如处深山中（耶氏深于禅学），皆由其修养有素，发为事功也。以上所举明君良相皆能以廉俭律身而福利强大其国之证，此即中国礼教之本旨。然则道德果消极乎？更证以西国近事，如华盛顿、林肯，皆以廉俭私德闻于世，其成就之伟大，人所共知，无待赘述。再造意大利之加富尔，以身许国，立志不娶，以成大业。现任德总理普鲁宁，独身不娶，所得月俸，除食用外，尽还国库，不蓄私财，故德人虽处极困苦之境，犹能与政府合作，群称普氏为德国救星。俄之史丹林，能使国人耐苦力作，以成其五年计划而人乐从，以其能自俭苦，与众无异，而忠实为人所信故也。印度甘地，为今世之第一英杰，其所以能为国人信仰景从者，亦由其刻苦自励有以致之。甘地日食饭止一蔬，及羊乳少许；

其所着衣服，乃自纺之纱所织，一切洋货皆不用，乃至轮船火车皆不乘，虽千里亦徒步以赴之。今人以为利用科学发明，足以增加办事之功效，然欧美人个人功效，有能如甘氏者乎？世有不战而屈人之兵者，甘氏是也。先文正公有言：“精神愈用而愈出，智慧愈苦而愈明。”此意惟能努力者自知之耳。以上所述我国先民及泰西贤哲，德业事功有成就者，莫不对于一己深自贬抑，使肉体享用至最小限度。约而言之，即克己制欲而已矣。盖肉体欲望，皆属私心之萌动，而与公德心如水火之不能两立者，必能克除私人欲望，而后一切建设有可期。王阳明曰：“杀山中贼易，杀心中贼难。”能克心中之敌，即自胜自强之谓也。以上所述政治家外，他如大思想家卢梭、托尔斯泰、马克斯、苦鲁巴金，皆能屏斥物质之享用，而自甘于俭苦淡泊之生活。卢氏、托氏，皆戒绝肉食者（苦氏似亦不食肉）。又如近世大科学家艾迪生，饮食起居，皆在试验室中，盖于世俗之欲乐无所好也。汽车界两雄，福德与斯龙司，皆不沾烟酒，不喜游乐。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朴拙淡泊，无利欲心，某影戏公司请其一登银幕演说，酬资二十万美金，爱氏谢绝之，盖谓学问非为金钱也。其他科学名人，清操多有类此。其学术事业之成就，初非企图肉体之享用，故不得谓有欲望而后有发明也。反是大发明家思想家，由于欲情浓厚者，未之前闻。故今人言发展欲望，所以促进科学与文化者，纯属臆说，不能证以事效，惟借此自文其过而已。求其反证，则中外历史，凡由治安时代而致于破坏，皆欲望发展

之效，事证昭昭，不可胜述也。乃至近年欧战之大战，现今列国相持之危局，我国二十年来之内争，亦何一非发展欲望之表现乎？其破坏程度，至可惨伤；其所产生之奇巧发明，亦无非为破坏与争欺之用。欲望岂尝有补于世界进化哉？近人好逞己见，淆乱是非，多数人以耳为目，不能抉择，于是薄礼教，毁圣言，自鸣得意，遂造成今日贫乱危急之现象。孰知世界一切纠纷情形，皆尝经古哲所亲历而加以研讨，从其事效，发为精确之结论，循而行之，则举凡经济难题，阶级争端，悉得解决。准诸最新社会主义之学说，多能适合，且世界愈演进而愈见其允当焉，然非此文范围所及，故不详论。予惟欲以个人身受之先训，贡献于当世有指导社会之责者，冀加以严重之考虑。若有多数闻人以身作则，挽回风气，勿轻国俗而重欧风，实行大禹及古来兴国各贤之所为，恶衣服，卑宫室，菲饮食，提倡朴拙粗陋之国货，而群以用华贵精美便利之舶来品为可耻，一转移间成效可立睹也。然现今社会，女子左右风尚之力，较男子尤大，其责任亦更重，故吾尤望我女界能先见及此，妻励其夫，母诫其子，姊妹劝其兄弟，咸牺牲个人之欲望，群策群力，以廉救国，以俭拯民，以不欺安群而和众。期以五年，国防固矣。夫国防者，非可专恃坚垒深壕利器而已也。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孟子所谓城高池深，兵坚甲利，委而去之者，四维不张故也。先文正公曰：“无兵不足深忧，无餉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

耿耿者，不可亟得，斯其可为浩叹者也。”当时情事，大类今日。管孟之慨叹，贾生之痛哭，皆为此而发。集多数重利轻义寡廉鲜耻之人，虽授以十倍欧美之军备，惟以自残，且以资敌耳。反是，苟能行礼义廉耻之教，则贪污恶劣之行，为清议所不容，其力胜于法律之惩罚也；豪奢争欺之习，为社会所共弃，其效尤捷于政令之限制也。如是则人人心目中自具壁垒，以为战守，商贩不羨洋货重利之可图而售销，士民不羨舶来物品之精美便利而购买，此真坚壁清野之法也。今日各国金融恐慌，皆有不可终日之象，凡恃武力称霸及经济侵略之国，早晚有崩溃之可能，其暂得不溃者，恃其所侵略之国以资财供给之耳。即如我国每年购外货二十万万元之巨款，其中至少有半数为供敌国海陆空军之饷源，及炸弹军械之材料也。夫以钱供敌国，人皆不欲居此恶名，而竟有此事实者，欲念所驱使也，此心中之汉奸卖国贼也。诚能人人除心中之贼，使彼一切侵略之具无所用之，尔时各国之人，亦当觉悟此法之善而群起仿效，自除其奢侈之嗜好，废其无益之工业，裁其自杀之军备，相与还醇返本，睦邻修好，世界和平，可坐而致，而其消息则于各个人之克己制欲决之。欲念一日不停，则侵略国之饷源一日不竭，侵略一日不止。盖个人之欲念，影响于世界之治乱者，如此其巨也。顾亭林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吾则曰：“匹妇尤有责焉。”屏斥华美之服饰用具，勤俭刻苦，以激励男子，共造成良好之社会风习，培养国家之元气，保全世界之安宁，非吾女子之责乎？愿吾

女同胞勿以其为老生常谈而忽视之也。

聂曾纪芬述 男其杰撰文

附识一

近阅西医王立才君所撰《致富锦囊》，中述其太高祖母张太宜人节孝事略云：每日纺纱十二两，得工资五十文，除一姑两孩四人食用外，尚能积蓄以还清所负之债。注云：二百年前物价低廉，以一文钱至酱园，可买酱醋油酒各一碗，谓之四碗一文。白米价每升二文而已，见威饭牛所著《陆稼书故事》云。杰按：王母事略，始于乾隆二十九年，其时米价已在每升十数文以外，于王母所得纺纱工资知之，昔时工资每日约准米两升之价，王母日夜兼工，故能得五十文。常人每日不过纺纱六七两而已，则普通日力所得，当为二三十文，故知米价每升为十数文也。盖高宗三巡江南，颇喜铺张，地方多所耗费，社会风习，渐趋奢靡，而物价遂腾高也。陆稼书故事乃康熙年间事，此足证明圣祖励行节俭之成效也。然白米一升二文，系指极贱之时。按张文端《聪训斋语》，康熙卅六年所撰，纪当时白米每石银四钱，则亦不过每升四五文。盖田赋既轻，而其他日用品既无捐税，且农得安其业，而工商不为奢侈之物品，则能使农产物增多，故物价廉而农与商仍有利可图也。按明末时，百物腾贵，民生艰困，乃不过二三十年，遽能使物价低廉至此，则知物价与政治关系之密切矣。物价低则生活易，而人安乐；物价昂则生活难，而民思乱。故不能使物价低

廉生活便易者，谓之政治不良。换言之，即不讲民生主义之道也。研究民生与社会经济之书，莫善于我国古哲《大学》：“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为万世不易之原则。食之者寡，指能生产而不生产，专务巧取豪夺为社会之蠹也，即今所谓寄生虫，吸取剩余价值者也，乃至官吏军警，亦在食之者之列，务求其少，故政令必求其简也。用之者舒，指一切奢侈消耗品而言，亦即《尚书》所谓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也。其他此类之言，见于《论》《孟》《书》《礼》者甚多，皆足互相发明。盖政治不能离社会经济以立论也。近日亚丹斯密司、马克思之流，虽详哉其言，然其精要处，不能于我国古哲学说之外有所增进，则知我先民理智之高不可及矣。既定政治经济之原则，故其立教亦必依据此原则而行，否则政治经济之目的不能达。克己制欲者，即其立教之原则也。譬如铁道，西人知制火车，中国古哲，则兼知铺设铁轨之必要，因无此轨道，则虽机力充足能曳列车进行，必旋致倾覆。今西方各国通社会经济之说者多矣，然不明立教之本，则不能尽推行之效。即如苏俄之经济政策，此与孔孟之主张近矣，然惟知从法律制限，而不知从克己制欲之教育注意，即不能去争欺仇杀之根本；且国内食用奇昂，不务积蓄，而反贱价输出；国内奢侈品并不禁止；其工厂设备之巨大投资，非准国内之需要，而为向国外市场竞争之用，招人敌忌；又大设军备以待之，皆属自困之道，则尚未能自立于稳固之基础也。欲求可大可久之道，舍我国儒术，

更无他途。世之言政治经济者，何不祛除成见，于确经历史证明之实验学说，平心加以研究乎？其杰识。

附识二

昆山教育局长潘吟阁君，两年前赴日考察教育，归撰一文，言日本勤劳俭苦之美风，与宗教大有关系。盖国人皆受佛教之陶铸，其教义安于俭约故也。潘君可谓善观国情者矣。查前岁日本文部省登记，其全国佛教徒凡四千一百馀万人，约十人而七八矣。其维新诸杰，多为阳明学者，亦兼为禅学家也（日本忽滑谷快君撰《阳明与禅》一书，言阳明即禅，禅即阳明，引证其详，其书经刘君仁航译印，今已缺板）。夫安于俭约之教义，乃能使国富强。精神与物质，皆有关系，本文略已具述。尚有一重要意义，有待于说明者。盖安于俭约，则不劳其神于种种事物欲念而能专心于学问职务也。曾文正公曰：“精神要令有馀于事。”此语深堪玩味。今日时局艰危，内政外交教育军事百废待举，当事者虽竭尽全力以赴之，犹虞不足，若更重以私产之营办，嗜好之纷纭，姑无论其能否廉洁，而公事之敷衍废弛，不待言矣。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盖约必寡欲，故心力常有馀，应事不虞竭蹶，所谓用志不纷，乃凝于神，此儒家崇俭守约之深意也。至佛制则更不许蓄私财，衣物推期苟简给用，不蓄长馀，要令简约至极，使不杂用心耳。日人善守此意，宜其精神有馀而发扬蹈厉也，此非我国人之所当愧奋勉力者乎？其杰识。